# 考亭学派的形成与影响

张品端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朱子及其门人以书院为平台，开展讲学著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考亭学派的形成大体经过了三个时期：朱子讲学于福建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为初创时期；讲学于武夷山的武夷精舍，为形成时期；讲学于建阳竹林精舍，为发展时期。考亭学派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其一，培养出一批经国济世的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努力；其二，建书院定学规开会讲，推动了中国书院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其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开辟了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其四，促进了儒学哲理化，使儒家理论思辨水平得到提升；其五，刊刻书稿，促进刻板印刷业的兴盛和发展。考亭学派的学术水平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峰，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在我国近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不仅对福建文化、中国文化，而且对东亚诸国乃至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关键词**：朱子；考亭学派；书院

朱子（1130–1200）一生有近半个世纪在武夷山地区办书院讲学，开展著述活动。四方学者不远千里负笈而来，有志于做学问的人，都把跟随朱子开展学术文化创造活动作为自己的依归。当时，朱子及其门人弟子形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 一、考亭学派的形成

福建建阳考亭是朱子晚年定居及讲学之地，故朱子学派被称之为考亭学派。考亭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朱子，其基本学术力量是以拜朱子为师的一批弟子群为主体的，主要活动在民间的一批知识分子。考亭学派的学术活动是以书院为载体，其学说作为古代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学术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充分注意朱子学与书院共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考亭学派的形成大体经过了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

### （一）考亭学派的初创时期

1170–1178 年，朱子讲学于福建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是考亭学派的初创时期。在这八年里，南宋中央集权统治较为稳定，学术文化上的争鸣较为活跃，知识分子纷纷建立书院，讲学授徒，著述立说。

乾道六年（1170），朱子（时 41 岁）葬母于建阳县崇泰里（今建阳区吕口镇）的寒泉坞，于此地建寒泉精舍。淳熙二年（1175），又在崇泰里云谷山建晦庵草堂。这时期，考亭学派的主要特点及学术活动主要表现为：

**作者简介**：张品端，男，福建光泽人，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朱子有一批开展学术研究的弟子群。如黄榦、祝穆、蔡元定、范念德、刘爚、刘炳等，这时都前来就学。据载，黄榦（号勉斋）于淳熙二年（1175）带着刘清之（号子澄）的介绍信来到崇安县五夫里。时值大雪，朱子又外出，他留住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①]，直到第二年（1176）春朱子归来，才开始从学朱子，后跟着朱子来到寒泉精舍。祝穆（字伯和，祖籍徽州歙县，其曾祖父祝确为朱熹的外公）与弟祝葵也于此时前来师事朱子。蔡元定，他早在 1159 年时就从学朱子于五夫里，后朱子讲学寒泉精舍，蔡元定又带领几个儿子到崇泰里建西山精舍，就近从学于朱子。西山精舍与朱子云谷晦庵草堂隔山对峙，近在咫尺，“元定每忍饥读书时，朱子寓云谷，每欲质疑，辄揭灯为望，及至，庵留数日，通夕晤语”[②]。刘爚、刘炳兄弟也是自此时就学于朱熹门下，“朱子编集程氏遗书，公（刘爚）兄弟研究通读，晨夕不息。”[③]

朱子与弟子有一批论著陆续问世，如《家礼》《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与弟子赵师渊共同完成）、《周易本义》《诗集传》《八朝名臣言行录》《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近思录》《西铭解》等。考亭学派的这些论著，其中《伊洛渊源录》于 1173 年编成，是收集北宋以来的理学家及其弟子的言行，按照传授关系排成理学谱系。该书反映的是洛学思想宗旨与师承授受源流，兼及濂学、关学等。朱熹明确指出，此书所取乃“圣贤之用、义理之正”，并且“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为后世法”。可见，它是一本中国学术文化史的重要论著。应该说，《伊洛渊源录》从师承关系上溯源探流，上接孔孟，下启来学，确立了道统谱系，后人遂有“濂洛关闽”的说法。

《近思录》于淳熙二年（1175）编成，此时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到寒泉精舍，同朱子共研周、张、二程的书。他们深感理学著作“广大宏博，若无津涯”，初学不易入门。于是，二人商量编辑《近思录》，作为读“四君子之全书”的入门书。他们缀取“四君子”书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 622 条，分 14 卷”[④]。这本书可称为北宋四子理学著作的一个撮要，它有助于初学理学者“致博反约”。叶采把《近思录》视为经书，与四书并列。他说：“是则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也。”[⑤]南宋以后士大夫大体都承认，“《近思录》，又是四子之阶梯……加意振兴，以宏教育”[⑥]。在宋末之后，《近思录》一直是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该书为我国第一部哲学文章选集，后来陆续有所修订增补，影响较大。

《西铭解》，是朱子对张载《西铭》所做的诠释，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二程以为此书发“前圣所未发”，是自孟子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见解。

朱子对张载《西铭》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作了新解。所谓天地之塞指气，所谓天地之帅指气之本性，就是说：物都是天地所生，人与万物都是气构成的，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朱子通过对《西铭》作注，发挥其义，着重阐发了“理一分殊”“天人一体”的理学思想。所谓“理一”，就是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总的理，一个总的根源。所谓“分殊”，就是万事万物各具一理，每一个事物之理，是总的理的反映。后来，朱子用“理一分殊”来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关系，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也就是哲学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实中的问题。“理一分殊”

① [元]脱　脱：《宋史》列传第 189 卷《黄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777 页。
② [清]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同治七年（1868）正谊书院刻本。
③ [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朱　熹：《书〈近思录〉后》，见于民雄：《近思录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6 页。
⑤ [宋]叶　采：《近思录集解·原序》，见于民雄：《近思录全译·附录》，第 456 页。
⑥ [清]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序》，见于民雄：《近思录全译·附录》，第 457 页。

论所主张的从“分殊”到“理一”的认知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于分门别类的研究，并进而发展到整体综合研究的过程也有共通之处。由此，李约瑟称朱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就用“理一分殊”理论来解释当今世界民主、自由、人权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朱子完成了两部集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他先编出《论语集义》和《孟子集义》，然后按理学观点取其“精粹”为《集注》，又把为什么这样取舍的道理，或给学生的问答，编成《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的编成，标志着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开始确立。

考亭学派的学术文化创造活动，使竹林精舍（后扩建改为沧洲精舍，理宗为表彰朱子，特赐“考亭书院”）成为与当时吕祖谦金华丽泽书院，张栻长沙岳麓书院、陆九渊金溪象山书院齐名的理学研讨中心之一。

### （二）考亭学派的形成时期

1183–1190 年，朱子讲学于福建武夷山的武夷精舍，这是考亭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时期。这八年，朱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夷精舍讲学授徒、从事学术创造活动。对于朱子在武夷山讲学的情况。宋末的王遂《重修武夷书院记》说：“朱子之讲学武夷，诸生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可见，朱熹当时已负盛名，其影响远及千里之外。

考亭学派的基本学术力量聚集在武夷山。朱子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其门人弟子都以武夷精舍作为接受朱子思想，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据记载，蔡元定、潘植、潘柄、郑可学、方士繇、廖德明、范念德、余大雅等一大批弟子聚集在武夷山，有的从师朱子数年之久。例如顺昌余大雅（字正叔）与其弟余大猷（字方叔），师事朱子达十年之久（1179—1189）；江西周谟（字舜弼），于 1178—1191 年间多次师事朱子，朱子曾赞扬他“讲学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当此岁寒，不易见操，尤不易得”[①]。他们刻苦钻研，长期潜修，坚信只有把“义理”弄清楚，才能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道德意义。他们在武夷山所做的学问也更具本学派的特色。

考亭学派校勘编辑了一批著作。仅朱子就校勘了《书经》《诗经》；编辑了《尚书古经》《尚书序》；著《诗集传》《诗序辨说》；又编写了《诗风雅颂》《诗风雅颂序》《小学》等。这时期，朱子在武夷精舍还给朋友、门人写了数十篇函信，阐述理论，回答问题。如《答黄商伯书》，回答门人黄灏（江西都昌人）所提问题，信中说：“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②]。这里深含着考亭学派理论的出发点。在《答徐子融》中，朱熹向其门人徐昭然（江西铅山人）讲解理气形体问题，体现了考亭学派既尚综合又尚分析，既重会通又重条理的方法论特点。

此外，朱子在武夷山还写了几十篇序文，如《丞相李公奏议后序》《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张南轩文集序》《律吕新书序》等，从中发挥了他的理学观点。

考亭学派的学术思想更加系统化。在武夷精舍，朱子的重要论著《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先后成书，至此，集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基本完成。朱子“四书学”体系的建立，完成了儒学原典从重《五经》向重《四书》的转变，一改过去由独尊《五经》而转向重《四书》，并将其合称《四书五经》。

---

①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② 朱　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四，《朱熹集》，尹波、郭齐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222 页。

《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朱子理学思想的一些主要观点和范畴已经形成。如《中庸章句》前面的序言，是考亭学派关于“天理论”宇宙观的纲领性论述。序言提出了作为哲学思想的最高的范畴“理”，阐述了一理与万事的关系，“理”无不包摄，无所不在。《中庸或问》卷二曰：“道之流行发现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朱子以“理”为世界的本源，把儒学的本体论，从“尊天”上升到“讲理”。朱子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理”有三层基本含义：其一，是形而上的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精神，又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即宇宙本体）；其二，是客观世界的法则和规律，天地万物各自体现这种法则和规律；其三，是人性的最高体现，也就是人的本质之所在，是一切道德伦理的准则。这样，理就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人伦性质、经验性质（物之理）三种性质。

这时期，考亭学派的学者们基本聚集武夷精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研究力量。所以，当时湖湖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①]。按照朱熹的说法是“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中”。这个“中”，就是说成为天下学术文化的中心。

### （三）考亭学派的发展时期

1192–1200 年，朱子讲学福建建阳考亭，是考亭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时期。这八年，朱子大部分时间是在考亭书院讲学，开展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等。

绍熙三年（1192）六月，朱子把家从崇安五夫迁居建阳考亭，于所居之东建竹林精舍。绍熙五年，以四方来学者众，扩建精舍，更名为沧州精舍。这时期，许多学者远道而来建阳考亭，有的还在附近建书室，就近求学于朱子。如叶味道（字贺孙），浙江永嘉人，在建阳崇泰里建“溪山益”，从学朱子。陆九渊逝世（1193 年 1 月）后，陆门弟子部分也来到考亭师事于朱子。如包约、包扬、包逊三兄弟本为陆九渊门人，这时“领生徒十四人”来考亭从学朱子。

朱子在考亭书院讲学，有志于研究学问的一些门人，都把在考亭搞研究工作视为自己一生事业的重要部分。此时重要的门人有蔡元定、黄榦、刘爚、蔡沈、陈淳、叶味道、李方子、廖德明、李闳祖、杨楫、辅广、范念德等。这些门人程度高，无须采用口授的方法，通常采取个别问答的方式。如杨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朱子回答：“此起于张程。某认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②]

在沧州精舍，朱子还向门人布置课题研究任务。朱子与蔡元定共同研究《楚辞》和《参同契》。朱子考虑到自己对有些经书的传注工作不及完成，就将对《尚书》的传注任务连同稿百段交付蔡沈。后来，蔡沈经过十二年努力，终于撰成《书集传》。朱子 67 岁开始修《礼书》，他把《表》《祭》两篇交给黄榦编写，稿成，朱子非常满意。他说：“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国邦、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③] 朱子对《礼书》的传注只完成了 23 卷，其余部分由黄榦、杨复（字志仁，福建福安人）等撰写。后来，他们终于撰写完成了《仪礼经传通解》68 卷。

这时期，朱子主要著作有《孝经勘误》《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楚辞集注》等。考亭学派学者通过学术文化活动，提高了研究水平，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成为 12 世纪末中国学术研究的一支新兴力量。

---

①《宋史》列传第三九五卷《王阮传》，第 12053 页。

②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70 页。

③《宋史》列传第一八九卷《黄榦传》，第 12778 页。

## 二、考亭学派的影响

以朱子为代表的考亭学派的学术思想，被称之为闽学（后来称朱子学）。朱子学是宋末、至元明清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官方哲学，对近古中国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我国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家，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①]这是对孔子和朱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给予的充分肯定。以朱子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那些贡献，有那些影响呢?

### （一）培养出一批经国济世的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努力

朱子的这些门人弟子，大多数都是当时南宋著名的学者和志行高洁的地方官吏。在为官方面，他们同情民间疾苦，清正廉明，反贪祛欲，安贫乐道。在为学方面，他们身体力行，建书院，办学堂，授徒讲学，广泛传播理学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人），在任参知政事时，坚持民族气节，力主抗金，多次提醒理宗皇帝说：“宗社之耻不可忘”。嘉定七年（1214），金遣使索求岁币，真德秀上疏千言，力主不给，皇帝准奏，停付岁币。嘉定十年（1217），他知泉州。泉州是宋代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于征税苛重，每年番船抵港只有三、四艘。他到任后，废除苛征，番船骤至三十多艘，海外贸易兴盛。同时，也促进了与海外文化的交流。

又如，黄榦历任江西新淦县令、知安庆府、汉阳军等，为官抚仁爱民，多有惠政，晚年家居授徒讲学以终。他于庆元二年（1196）创办潭溪精舍，又于嘉定九年（1216）创建环峰书院，用朱子思想教育士人，研讨辩论学理，阐明义理，兴举实学，为朱子学的传播竭尽全力，并通过授徒讲学和著述，造就人才。《八闽理学源流》称：“……而黄门人最多，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

从文庙的情况来看。自宋朝以后，祀孔庙者 40 人，福建就有 13 人（胡安国、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李纲、朱熹、黄榦、蔡沈、陈淳、真德秀、蔡清、黄道周），其中除李纲外都是理学家，五人为朱子先辈，都和朱子有学术渊源关系，六人为朱子门人和其后学。

由于朱子及其门人以文化传承创新为己任，积极开展讲学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当时南宋政局稳定，社会发展作出了努力。

### （二）建书院定学规开会讲，推动了中国书院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书院自唐代开始创立，北宋书院兴盛，后封建王朝逐步把兴办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官学上，不再重视书院。加之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到了南宋初年书院一度由兴盛走向衰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朱子及其门人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书院。南宋末，仅建阳一地建立的书院就有庐峰书院、云庄书院、溪山书院等十九所。由于考亭门人黄榦的带动，南宋末福州有书院 54 所，其后元、明、清时代又有很大发展。据记载，福州“每岁节院五日，各遣弟子入学……凡乡里各有书社”[②]。陈淳在闽南亦积极创办书院，“漳泉士人争师之”。南宋末，书院教育兴盛，全国创办较有影响的书院三百多所，为北宋三倍，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朱子之后，全国各地书院代代相延，长盛不衰。清代任士林说：“朱子既歿，凡所居之乡，所仕之邦，莫不师尊之，

① 钱　穆：《朱子学提纲（代序）》，见《朱子新学案》，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0 年，第 1 页。

② [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南宋淳熙刻本，福州市地方志编委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年。

以求学讲学，故书院为尤盛。”[①]

首开书院会讲制度。北宋，书院还是独家之说，往往带有一种“门户之见”，没有开展不同学派在书院自由讲学活动。书院会讲制度始于南宋，作为一种教学形式，由于朱子、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人的努力而趋于成熟。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子与其门人范伯崇和林择之，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前往潭州（今长沙），访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开展会讲活动。朱、张岳麓书院会讲的中心是“中和”问题，并涉及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察识持养之序及太极等。这次会讲十分热烈，据侍行的范伯崇说：“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辨”，以朱子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朱子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俩（南宋江西学派代表人物）聚集江西信州鹅湖寺（今上饶铅山鹅湖书院），进行学术讨论。“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辨，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②]这次鹅湖之会就教学的路径、方法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朱子的观点是要“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之意是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道问学”“尊德性”的分歧。这次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教育史，以及学术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淳熙八年（1181）二月，朱子邀请十多年的论敌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升堂讲学。陆讲《论语》喻义章，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论，当时听讲的人中有的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朱子认为陆九渊讲得很好，称他“切中学者隐微浑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他将陆九渊讲稿刻石立碑，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陆九渊这篇讲义，后来成为理学家们具有纲领性的文件。

从以上三次会讲来看，朱子打破了书院传统的“门户之见”，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自由讲学开了先例，促进了书院学术研究的繁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会讲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在知南康军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学规》）。这个学规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是朱子为培养人才而制订的书院教育方针。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该学规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时期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近古中国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

### （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开辟了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朱子一生著作宏富，是宋代以前著述最多的学者。朱熹逝世后，考亭书院的学生继续进行朱熹未完成的经书传注工作。据戴铣《朱子实纪》载，朱熹门人中号称高弟而有著述问世的就有 68 人。如刘爚著有《奏议史稿》《礼记解》和《四书集成》等，蔡元定著作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皇极经世》《燕乐原辩》《太极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阴符经解》《运气节略》《脉书》及杂学若干卷，杨复著有《祭礼》《家礼杂说附注》等，李方子著有《辑晦庵先生事实》《清源文集》《道统论》《理性篇》等，陈宓著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钞读通鉴目》等。朱子的文章和他与师友门人的书信，后人汇编成《晦庵朱文公文集》100 卷，《续集》10 卷，《别集》

① [清]任士林：《重建龙津书院记》，载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四部丛刊本。

②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91 页。

11 卷，并将师徒问答编成《朱子语类》（140 卷）等，为后人研究朱子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考亭学派诸儒，长期潜心著书立说，扩大了儒学研究的范围，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如黄榦的体用论，陈淳的知行论，真德秀的性情说，熊禾（建阳人）的全体大用论等。他们在伦理学和人性论方面突出地发展了朱子的学术思想。由于朱子门人极力传播朱子学，明代前期又出现了吴海（闽县人）的气节学，陈真晟（漳浦人）心学图，蔡清（晋江人）虚静论等。这些学术观点，大都为朱子言而未详而详之，为朱子之后的新论说，充实和发展了朱子的思想体系，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出现了宋末至明代中叶朱子学的繁盛时期。

（四）开展儒学哲理化创新工作，促进了儒家理论思辨水平的提升

在仁学理论方面，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并以心性言仁，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朱子对孔孟仁说的发展表现在，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以廓然大公来实现仁。他特别重视仁与爱，仁与公的相互联系，强调通过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离爱而言仁”。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贯彻到道德践履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把中国古代的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人性论方面，朱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人性纳入天理哲学体系。他通过“性”这一枢纽，使道德论与宇宙论合而为一，并使“天理”外化为纲常名教，以建立人论哲学。

在认识论方面，孟子从“尽心”“知性”“知天”和“性善”论的思想出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自我完善。认识外物，不需向外用功，只要“反求诸己”以达到“诚”的思想境界就可以了。朱子借《大学》的“格物致知”来阐发其思想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这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盖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①]这一思想是符合认识论由表及里，由粗到精，由“现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

在心性论方面，朱子在总结、吸取前人心性哲学思想（包括佛教心学）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心性论思想体系，把儒学伦理与思辩哲学紧密联系结合，丰富了宋代理学心性论的思想内涵，发展了中国的心性哲学。使理性的、伦理的、人文的世俗思辩哲学逐步取代隋唐时期盛行的宗教哲学，改变了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为宋以后儒家哲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可见，在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进程中，考亭学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学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对此，已故的张岱年先生评价说：“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②]

（五）刊刻书稿，促进了刻版印刷业的兴盛和发展

考亭学派的学者在各地著书立说，为书坊刻书提供了大量的书稿，有力地推动了刻版印刷业的兴盛。仅朱子本人的著作刊行的就很多，其中有的还一再刊刻出版。他知漳州时，刊印了《四书集注》，在闽北刊印的就更多了，如《论孟精义》《五朝名贤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以及《楚辞集注》等都是在建阳书坊刊刻的。朱子门人刘爚的《云庄刘文简公文集》，祝穆的《事文类聚》，

① 朱　熹：《大学章句》，《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第 11 页。

②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第 1 页。

蔡沉的《书集传》等在建阳均多次刊刻出版。南宋著名学者刘克庄曰：“巍巍考亭，为闽阙里，两坊（指麻沙和书坊）书籍大备。”

古代书院不仅藏书，为书肆销售扩大市场，提供读者群，而且还自行刻书，以满足教学需要。如建安书院刻《周易本义》，武夷精舍刻《小学》。[①]书院内自行刻书是书院的传统，元代屏山书院刊刻《止斋先生文集》，明代紫阳书院刊刻《瀛奎律髓》，清代福州整峰书院刊刻先儒遗著有 55 种，正谊书院有 525 种。

在南宋、元、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刻版印刷业十分活跃，各方面刻书的很多，有官刻、书院刻、书坊刻、也有家塾刻，先后出现许多刻书家，有的全家、全村、全镇以刻书为业。当时著名的建阳书坊就是全村以刻书为业，有万卷堂、勤有堂、一经堂、群玉堂和建安堂等。他们所刻印的书，在中国雕板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得到后世的藏书家们的重视。

从上述可见，考亭学派建书院，讲学著述，开展学术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峰，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在我国近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不仅对福建文化、中国文化，而且对东亚诸国乃至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① 朱　熹：《答蔡季通》，《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尹波、郭齐点校：《朱熹集》，第 5156 页。

# 论朱熹对《楚辞》中“草木、鸟兽、器物”的注释

徐 涓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 要**：理学家朱熹注释《楚辞》名物与前人大不相同，他以“格物致知”为方法，综合比较，合理辨析，求真求实，力求简明扼要地揭示出名物的本来面目，这在注释《楚辞》中的“兰”“蕙”“鹈鴂”“玉珥”“璆”“锵”等名物中有极好体现。

**关键词**：朱熹；《楚辞》注释；草木；鸟兽；器物

朱熹认为，近而一身之中，远在八荒之外，大而天高海阔之广，微在一草一木之间，无不各有其理，人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便是致知，格物所以致知。人在一物上研究获得一分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理上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理上研究愈多，则我之知识便愈来愈广。“所以格物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人通过对外在对象的考究以把握义理。”[①]朱熹格物致知要求，“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②]“‘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③]“‘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一句话里，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朱子一生有时颇能做一点实地的观察。”[④]胡适明确指出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有科学归纳精神。

朱熹以“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去研究学问，他在考证《楚辞·天问》中“启棘宾商”时，订正古人之误、古书之谬，提出自己研究目标，那就是求实求真。他说：“大抵古书之误，类多如此。读者若能虚心静虑，徐以求之，则邂逅之间，或当偶得其实。顾乃安于苟且，狃于穿凿，牵于援据，仅得一说而遽执之，便以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误之中，或复生误。”[⑤]朱熹认为古书谬误多如此类，告诫读者需平心静气，徐徐求索，以获得对象的实在情况，或称为本真状态。若是苟且偷安、牵强附会，见一木便认为得知山林，就难以窥见事物全貌，以致获得错误认识。朱熹强调读者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虚心静虑面对对象；第二，持续反复求索；第三，全面考虑问题；第四，求索目的为得其本真。这种求得本真就是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在注释《楚辞》时有明显表现。

**基金项目**：2018 年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A201815)；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455)

**作者简介**：徐涓，女，安徽潜山人，厦门大学博士，博士后，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陈 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96 页。
② [南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0 页。
③ 胡 适：《胡适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65 页。
④ 胡 适：《胡适全集》第一卷，第 367 页。
⑤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194-195 页。

朱熹注释《楚辞》，运用这种“格物致知”研究方法，对《楚辞》中出现的各种名物加以科学考察，以揭示事物本真面貌。朱熹对《楚辞》中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椒桂、蕙茝、荃、留夷、揭车、杜衡、芳芷、薜荔、芰荷、芙蓉、𦸇、菉、葹、薆茅、鹈鴂、萧艾、榉、荼荠、白薠、苏草、紫贝、薜荔、女罗、幽篁、屏风、苴莵、蒿萎、玉珥、璆锜、瑶席、玉琠、竽瑟、参差、交鼓、箫钟、簏、戈、甲、铗、宝璐等草木花鸟器物进行训诂，力求简洁勾勒出名物之真实状态。以下试以朱熹注释《楚辞》中的“兰”“蕙”“鹈鴂”“玉珥”“璆”“锜”等名物加以论述。

## 一、兰与蕙

### （一）三家注“兰”“蕙”

朱熹善于挖掘名物本来意义，如对《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秋兰”，三家注释如下：

王逸：兰，香草也，草秋而芳。[①]

王逸注非常简单，洪兴祖不满意王逸注释，在《楚辞补注》中对“秋兰”详加注释：

相如赋云：“蕙圃衡兰。”颜师古云：“兰即今泽兰也。”《本草注》云：“兰草、泽兰二物同名。兰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经》云：“零陵郡都梁县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泽兰如薄荷，微香，荆、湘岭南人家多种之。此与兰草大抵相类。但兰草生水傍，叶光润尖长，有歧，阴小紫，花红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泽兰生水泽中及下湿地，苗高二三尺，叶尖，微有毛，不光润，方茎紫节，七月八月开花，带紫白色，此为异耳。”《诗》云：“士与女方秉蕑兮。”陆机云：“蕑即兰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高四五尺，汉诸池苑及许昌宫中皆种之。”《文选》云：“秋兰被逴。”《注》云：“秋兰，香草。生水边，秋时盛也。”《荀子》云：“兰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种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椏，不对生，花心微黄赤。”《楚词》有秋兰、春兰、石兰，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别也。近时刘次庄《乐府集》云：“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则黄，在秋则紫，然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谓多识草木鸟兽，而能尽究其所以情状者欤。”黄鲁直《兰说》云：“兰生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舍香体洁，平居与萧艾同生而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然兰蕙之才德不同，兰似君子，蕙似士夫。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招魂》：‘光风转蕙泛崇兰。’以是知楚人贱蕙而贵兰矣。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也。蕙虽不若兰，其视椒、榉则远矣。其言兰蕙如此，当俟博物者。”[②]

洪兴祖引用司马相如赋中出现“蕙”“兰”这两种香草，用颜师古注说明 “兰”指“泽兰”，引《本草注》说兰草与泽兰同名，看来似乎是一物，又引《水经》训诂兰草与泽兰，引《诗经》陆机疏来解释“泽兰”，再以《文选》注说“秋兰”生在水边，后又用《荀子》之言认为兰生深山，再引《本草》解释“山兰”情况。洪氏可谓旁征博引，但此处是“山兰”还是“泽兰”，不甚清楚。洪氏指出，《楚辞》中用兰多种，王逸没有分别，只是说香草。所以他又用宋人刘次庄之言以说明屈原博

① [东汉]王 逸：《楚辞章句》，《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页。
②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8年版，第15-17页。

学多识，以黄庭坚《兰说》表示“兰”生深山并且香味馥郁，与“蕙”不同。最后回到《楚辞》文本，揭示“兰”与“蕙”品质不同。凡680余字，读完之后，仍然不知此处是“山兰”还是“泽兰”。朱熹删去洪兴祖大段注释，将文字缩减为以下67字，注为：

兰，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兰，与泽兰相似，生水傍，紫茎赤节，高四五尺，绿叶光润，尖长有歧，阴小紫，花红白色而香，五六月盛。”①

朱熹先是对“兰”进行解释，后引用《本草》文献中记载加以说明，清晰简洁有助读者理解。

再有，《离骚》“岂维纫夫蕙茝”句中“蕙茝”，三家注释如下：

王逸：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贤者。②

洪兴祖：《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湿地。”陶隐居云：“俗人呼燕草，状如茅而香，为薰草，人家颇种之”。引《山海经》云：“薰草麻叶而方茎，赤花而黑实，气如蘼芜，可以已厉。”又《广志》云：“蕙草绿叶紫花。陈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黄鲁直说与此异，已见上。椒与菌桂木类也，蕙茝草类也，以言贤无小大，皆在所用。茝，白芷也。③

朱熹：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湿地，麻叶而方茎，赤花而黑实，气如蘼芜，可以已厉。”陈藏器云：即零陵香也。④

王逸注释仍极简单，仅为12字，洪兴祖旁征博引《本草》、陶隐居言、《山海经》、《广志》、陈藏器言、《南越志》等文献资料，注释字数达170字，一说是赤色花朵黑色果实，一说又是绿色叶子紫色花朵，一说是薰草，一说是零陵香，究竟是何物，洪氏只有罗列，没有取舍辨别。朱熹先引《本草》说明，蕙就是薰草，而后将其状态、颜色、气味都一一介绍，最后引用陈藏器言说明蕙就是零陵香。

朱熹在《楚辞辩证》中考察“兰蕙”说：

兰蕙，名物，《补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详，已得之矣。复引刘次庄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则黄，在秋则紫，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黄鲁直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蕙。”则又疑其不同，而不能决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而亦云似泽兰，则今处处有之，可推其类以得之矣。蕙则自为零陵香，而尤不难识。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而花有两种如黄所说者，皆不相似，刘说则又词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可佩。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可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时而误耳？⑤

朱熹认为，《补注》中对兰蕙解释，引用《本草》已经很详尽，但又引刘次庄、黄鲁直等人说法，则越发模糊，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朱熹根据《本草》，结合生活经验推类，认为兰似泽兰，蕙是零陵香。又认为古今香草有不同，古者花叶皆香，可刈可佩，今者花香但叶无气，不能可刈并可佩。朱熹不仅从文献出发，而且还结合生活经验对名物加以考证，《语类》中有一则有趣的记载：

侍先生过水南，谷中见一种蒿，柔嫩香气，温润可爱，因采一二茎把玩。先生曰：“此即古

①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页。
② [东汉]王　逸：《楚辞章句》，《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页。
③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④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页。
⑤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5–176页。

人所谓兰是也。”又云：“蕙亦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①]

学生侍奉朱熹路途山谷中见到一种蒿草，此草香味馥郁，柔润温软，煞是可爱，便采来把玩。朱熹告诉学生这就是古人所谓兰，而蕙也并非今天蕙草，而是零陵香。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研究“兰蕙”的过程，他利用《楚辞》文本，考察多种文献，并且结合生活所见，最后果断抉择，以把握名物“兰蕙”之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朱熹还强调应该联系现实生活经历对物进行考察，他对那些没有实践经验而强为注释的做法予以批评。据《语类》载：“陶隐居注《本草》，不识那物，后说得差背底多。缘他是个南人，那时南北隔绝，他不识北方物事，他居建康。”[②]朱熹认为陶隐居注释《本草》，很多名物不识，注释差错甚多，因他是南方人，居住在建康，那时南北隔绝以致他无法亲临北方实地考察。

### （二）与吴仁杰论“兰蕙”

朱熹对“兰蕙”分析注重考察古今兰蕙之不同，他在与吴仁杰书信中有关于兰蕙之专门讨论。据《文集》记载：

> 《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说兰蕙，殊不分明。盖古人所说似泽兰者，非今之兰。（泽兰此中有之。尖叶、方茎、紫节。正如洪庆善说。若兰草似此，则决非今之兰矣。）自刘次庄以下所说，乃今之兰，而非古之兰也。今并引之，而无结断，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细。又所谓蕙，以兰推之，则古之蕙恐当如陈藏器说乃是。若山谷说，乃今之蕙，而非古之蕙也。此等处正当掊击，乃见功夫。今皆如此放过，似亦太草草矣。[③]

《草木疏》书籍全名为《离骚草木疏》，乃朱熹友人吴仁杰撰写，其中对兰蕙的引证极为繁复，约有 1200 字，[④]此书撰述过程中，吴氏与朱熹论学，顺便寄自己稿件与朱熹过目，朱熹提出建议，认为吴氏说兰蕙仍不分明，指出古人所说兰似泽兰，正如洪兴祖所解释这种尖叶、方茎、紫节植物，决非今天所谓兰草；洪氏论及刘次庄及其以下所解释，都为今之兰。黄庭坚所说乃今之蕙。朱熹进而建议吴氏当于此处仔细推敲，不应草草放过。

### （三）后学论“兰蕙”

至于《离骚》中“兰蕙”究竟为何物？明代大医药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详尽记载，李氏对诸家关于“兰蕙”之误解一一分析，并引朱子之说为强有力之证据，认为《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之兰并非所见之兰花，乃是兰草，蕙则是零陵香，李氏所述正是对朱熹见解更加细致的阐释与发挥，据载：

> 寇宗奭曰：“兰草，诸家之说异同，乃未的识，故无定论。今江陵澧州山谷之间颇有之，山外平田即无。多生阴地幽谷，叶如麦蘘冬，而阔且韧，长及一二尺，四时常青，花黄绿色，中间瓣上有细紫点。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淡。开时满室尽香，与他花草又别。”朱震亨曰：“兰叶；秉金水之气而似有火，人知其花香之贵，而不知其叶有药力。盖其叶能散久积陈郁之气，甚有力，即今之载置座右者。”时珍曰：二氏所说，乃今之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兰有数种，兰草、泽兰生水旁。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兰花亦生山中，与三兰迥别。兰花生近处者，叶如麦蘘冬而春花；生福建，叶如香菅而秋花。黄山谷所谓一干一花为兰，一

① [南宋]朱　熹：《朱子全书》第十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284 页。
② [南宋]朱　熹：《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 4285 页。
③ [南宋]朱　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 2838 页。
④ [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干数花为蕙者，盖因不识兰草蕙草，遂以兰花强分别也。兰草与泽兰同类，故陆机言兰似泽兰，但广而长节。《离骚》言其绿叶紫茎素枝，可纫，可佩、可藉、可膏、可浴……故朱子《离骚辩证》言古之香草必花叶俱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佩、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质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兰似泽兰，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两种者，不知何时误也……今所谓兰，无枝无茎。因黄山谷称之，世遂谬指为《离骚》之兰。寇氏本草亦溺于俗，反疑旧说为非。夫医经为实用，岂可误哉！今之兰果可利水杀虫而除痰癖乎？其种盛于闽，朱子乃闽人，岂不识其土产，而反辨析如此。世俗至今犹以非兰为兰，何其惑之难解也。①

李时珍分析认为，寇宗奭、朱震亨所谓兰草实乃兰花。兰有多种，如水兰、山兰、泽兰，但兰花虽也生山中，但与这三种兰迥异。黄山谷所言兰蕙者，盖为不识兰蕙而强加分别，《离骚》之兰似泽兰，非今之兰花，正如朱子加以辩证，而蕙就是零陵香。今天之兰，因黄山谷所言导致世人错误以为便是《离骚》之兰。今之兰盛产于闽，朱子是闽地人，岂会不识本地土产，而要加以辨析么？李时珍分析极为明确细致，游国恩先生对李氏见解很是推崇，认为：“兰之为物，旧说纷纭，李时珍之辨最为明确。其所引朱熹之说，已见于‘纫秋兰以为佩句’下。又此文兰九畹于蕙百亩，行文偶而相对耳，其数原不可拘。诸家纷纷考说，且或据此以论兰蕙之贵贱，殊失之泥。”②

对于朱熹注释“纫秋兰以为佩”中“兰”，近来学者多有讨论，如莫砺锋先生认为洪兴祖的注释太繁琐，而朱熹注释的字数不到洪注的十分之一，表达简洁，但又不影响对诗歌意思理解，“例如《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一句，单是洪氏补注就引用了司马相如及颜师古注，《本草》注、《水经》、《诗经》陆机疏、《文选》注、《荀子》以及宋人刘次庄的《乐府集》、黄庭坚《兰说》等，凡六百余字，来解释一个‘兰’字。而朱注只是说：‘兰，亦香草，至秋乃芳。’然后引了一段本草，字数不到《补注》的十分之一，又并未影响对诗义的理解。”③朱熹注释此句中“兰”草情况，确实如莫砺锋先生所说，表达简洁又清晰明白。但朱熹注释不仅如此，更多是明辨是非，果断抉择，朱注引用《本草》就是明确表示此处兰与泽兰相似。黄灵庚先生在《楚辞章句疏证》中对“兰蕙”进行疏证时，将洪兴祖之解释评价为：“洪氏杂引众说而未能断，盖多闻阙疑。”④然后引朱熹注释加以说明。也确实如黄氏所言，朱熹对兰的注释表现出超凡的辨别力，求得《离骚》之兰的合理状态及本真面貌。

## 二、鹈鴂

诸家对《离骚》中“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离骚》）句“鹈鴂”解释如下：

王逸：鹈鴂，一名鶗鴂，常以春分日鸣也。⑤

五臣之吕向注：鹈鴂，秋分前鸣，则草木凋落。言我常恐此鸟之鸣，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谗臣为言，以害忠良矣。⑥

洪兴祖：鹈，音提。鴂，音决。一音弟桂，一音殄绢。《反离骚》云：“徒恐鶗鴂之将鸣兮，

①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四库全书·子部七九·医家类》第7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0页。
②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86页。
③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④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
⑤ [东汉]王　逸：《楚辞章句》，《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页。
⑥ [梁]萧统等编，[唐]李善、张铣、吕延济、吕向、刘良、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3页。

顾先百草为不芳”。颜师古云：“鶗鴂，一名买鞠，一名子规，一名杜鹃，常以立夏鸣，鸣则众芳皆歇，鴂与鴃同，鞠音诡。”《思玄赋》云：“恃知已而华予兮，鶗鴃鸣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鸣。”李善云：“《临海异物志》鶗鴃，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服虔曰：“鶗鴃，一名鵙，伯劳也。顺阴阳气而生。按《禽经》云：鶗周，子规也。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鴃鸣而草衰。”《注》云：“鶗鴃，《尔雅》谓之鵙，《左传》谓之伯赵。然则子规、鶗鴃，二物也。《月令》仲夏鵙始鸣。”说者云：“五月阴气生于下，伯劳夏至，应阴而鸣。”《诗》曰：“七月鸣鵙。”《笺》云：“伯劳鸣，将寒之候也，五月则鸣，鹹地晚寒。”《左传》：“伯赵氏司至也。”《注》云：“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陆佃《埤雅》云：“阴气至而鵙鸣，故百草为之芳歇。”《广韵》曰：“鶗鴃。关西曰巧妇，关东曰鶗鴃，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①

朱熹：鶗鴃，鸟名，即《诗》所谓“七月鸣鵙”者。盖鴃鵙声相近，又其声恶，阴气至，则先鸣而草死也。②

王逸注释鶗鴂为鵙鴂，以为当是春分日鸣。五臣注以为鶗鴂为秋分前鸣。洪兴祖引《反离骚》、颜师古、张衡赋及《注》、服虔、《诗经》及《笺》、《左传》及《注》、陆佃《埤雅》以及《广韵》等文献加以说明，但此处鶗鴂是子规？是杜鹃？还是伯劳？是同物不同名？或者是不同物？就洪注来说，殊不分明。朱熹注释删去洪注所引大部分文献，仅留所引《诗经》“七月鸣鵙”，认为鶗鴂乃鸟名，声恶，鸣叫后则草木枯死。其实朱熹对此也有疑惑，不知这鶗鴂到底是何鸟雀，他在《辩证》中说：

鶗鴃，颜师古以为子规，一名杜鹃。服虔、陆佃以为鵙，一名伯劳。未知孰是？然子规以三月鸣，乃众芳极盛之时；鵙以七月鸣，则阴气至而众芳歇矣。又鴃鵙音亦相近，疑服、陆二说是。③

朱熹分析鶗鴂是子规，还是鵙？认为子规乃三月鸣，此时众芳茂盛；鵙乃七月鸣，此时众芳枯萎，故而同意服虔、陆佃之看法。去古已远，鶗鴂到底为何鸟？历来众说纷纭，但古今解释不外乎三家意见，“其一主买鴂，即子规。其二主伯劳，骞公引《文释》，李善引服虔是也。其三主布谷，《楚辞音》、《张衡传注》引《广雅》是也。”④详其上下文意，春天草木繁茂，而秋天才万木衰歇，朱熹所说当是。游国恩也以为王逸所说春分时鸣不可取，当以秋分时鸣：“王逸谓鶗鴂常以春分鸣。然春分正众卉芬芳之时，安得谓使百草不芳？且《骚》词恐其先鸣，则其当以秋分时鸣审矣……《章句》说不可从。”⑤比较朱熹与洪兴祖两家注释可知，洪氏旁征博引但缺乏辨析，朱熹注释简要精当，适合阅读。

## 三、“玉珥”“璆”“锵”

《九歌·东皇太一》中“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句中“玉珥”“璆”“锵”，几家注释如下：

王逸：玉珥，谓剑镡也。剑者，所以威不轨，卫有德。故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

①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9 页。
②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第 22 页。
③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第 183 页。
④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三辑，《姜亮夫全集》(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518 页。
⑤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11 页。

也。《尔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锵，佩声也。《诗》曰：“佩玉锵锵。”言己供神有道，乃使灵巫常持好剑，以辟邪要，垂众佩，周旋而舞，动鸣五玉，锵锵而和，且有节度也。或曰纠锵鸣兮琳琅。纠，错也。琳琅，声也。谓带剑佩众我，纠错而鸣，其声琳琅也。①

洪兴祖：抚，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剑珥谓之镡。镡，剑鼻，一曰剑口，一曰剑环。”耳，珥饰也。镡所以饰剑，故取以为名焉。珥，音饵。镡、覃、淫二音。璆，渠幽切。锵，七羊切。《礼记》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状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莹若珠之色。此言带剑佩玉，以礼事神也。”②

朱熹：珥，剑鐔也。璆、锵，皆玉声。《孔子世家》云：“环珮玉声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琳琅，美玉名，谓佩玉也。此言主祭者，卜日斋戒，带剑佩玉，以礼神也。《补》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盖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韩退之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用此体也。”③

王逸认为玉珥乃剑镡，璆、琳、琅，皆为美玉之名，并引《尔雅》《诗经》加以说明，洪兴祖引《博雅》《礼记》《尔雅》《本草》补充王逸之说，认为璆、琳乃美玉名，琅为石之美者。朱熹认为玉珥为剑镡，只有琳、琅为美玉，璆不是玉石，而与锵一样，为玉声。他引用《孔子世家》《玉藻》等文献加以证明。

对于璆、琳、琅的注释，楚辞后来注家多从朱熹之说，如明代汪瑗认为“璆璆然也，锵锵然也，皆玉佩之鸣声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为佩者也”④，陆时雍也认为璆乃玉声，而琳琅才是美玉之名，“璆锵，皆玉声，琳琅，美玉也”⑤。清代屈复《楚辞新集注》⑥与马其昶《屈赋微》则全部引录朱熹注释原文，“朱子曰：璆、锵，皆玉声，《孔子世家》云：‘环珮玉声璆然’”⑦。戴震也基本从朱熹之说，认为“璆锵，玉声。琳即禹贡球琳，美玉也。琅即琅玕，或谓之珠树，或谓之碧树，其赤者为珊瑚或谓之火树”⑧，清代王夫之则认为“璆、锵、琳、琅，皆玉声”⑨。综合而看，各注家都以为璆为玉石之声，但也有见解与朱熹完全不同者，如清代胡文英便以为“璆，玉佩也，琳、琅、锵，鸣之声也。”⑩

关于璆、琳、琅之注释，姜亮夫先生其著作《楚辞通故》第三辑文物部中引录王逸、洪兴祖、朱熹之说而后认为“按三家说以朱说为允”⑪，姜氏对朱熹之说表示赞同。

（下转第 42 页）

① [东汉]王　逸：《楚辞章句》，《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第 106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7 页。
②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 55-56 页。
③ [南宋]朱　熹：《楚辞集注》，第 29-30 页。
④ [明]汪　瑗：《楚辞集解》，《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4 页。
⑤ [明]陆时雍：《楚辞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1，第 430 页。
⑥ [清]屈　复：《楚辞新集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23 页。
⑦ [清]马其昶：《屈赋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2，第 666 页。
⑧ [清]戴　震：《屈原赋戴氏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2，第 406 页。
⑨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2，第 202 页。
⑩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1302，第 565 页。
⑪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三辑，《姜亮夫全集》（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39 页。

# 朱熹诗“穷”字义涵探析

谭升元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朱熹作诗喜用“穷”字。在其诗作中，直接援用“穷”字的就有 68 题 71 首之多，且时间跨度广，前后 45 余年。考其家世与生平及其 1300 多首诗作，“穷”字有主要有以下义涵：一、述自身长期遭遇的经济窘境与不会作诗的自谦之辞；二、抒发爱国忧时、视民如伤的儒者情怀与平生山水情志；三、对理学的毕生追求及遭遇党争之祸的感慨。喜用“穷”字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有意入诗，有着多维度的义涵表达。

**关键词**：朱熹；诗作；“穷”字；义涵

历来学界对朱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学，而对其诗文方面述之较少，且多着力于其文学与理学的关联性、文学的思想性等方面的宏观论述，而就诗文本身的微观研究并无显著的成果，较为遗憾。从以诗证史的角度来说，朱熹的诗词可以补证史阙；从诗史互证言之，其诗词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朱熹生活经历及思想。朱熹在诗作中大量援用“穷”字，且时间跨度长，对于朱熹的研究而言，这是不可忽视之处。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其诗作本身来看，朱熹的一生实可总结为“穷以贯之”。

## 一、人穷与诗穷

家道中落与自身仕途坎坷直接造成朱熹经济上长期拮据的处境，有时甚至需要朋友接济，在其诗作中多有用“穷”字直抒自身经济的遭遇；而作为诗论家与诗人的朱熹，其诗论见解独到，诸多评论为世人所共识，且在当世便以诗名世，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流传至今。而在其诗作中用“穷”字言不擅作诗，实为自谦之辞。

### （一）家道中落与自身经济窘境

朱熹于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尤溪，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一生大部分时光在著述讲学中度过。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翁、遁翁，别号紫阳，别具深意。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朱氏始祖为朱古僚。朱松《韦斋集》卷十《录曾祖父诗作后序》详细记载了婺源朱氏自朱古僚以下四世的情况，从“资产甚富”[①]的名门大族过渡到中等官僚阶层再渐至沦落到小地主阶级。而到了“朱熹的祖父，家业已经一蹶不振”，[②]及至其父朱松，更

**作者简介**：谭升元，男，贵州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孔学堂（贵阳）签约入驻研究生。

① [宋]朱 松：《韦斋集》卷十 ，《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 页。

② 束景南：《朱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9 页。

是“俯仰水菽之养，朝不保夕”[①]了。朱松虽然通过苦习举业踏入仕途，但仕途不顺，且于朱熹 14 岁时因病而逝，终未能保住小官僚的地位和摆脱经济上困境。

朱熹出生恰逢乱世，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其间也有过短暂安顿的生活，但随着朱松病逝而结束。朱松去世后，朱熹遵从其嘱托，师事武夷三先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其父生前对朱熹寄予厚望，送朱熹入学时对其说“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久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送五二郎读书诗》)，显然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朱熹的身上。朱熹承父志，习举业，于“绍兴十七年秋举建州乡贡”且“绍兴十八年春以第五甲第九十名登王佐榜进士”。[②]然同其父一般，朱熹的仕途也坎坷不平，据《宋史》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③]，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据此说，并且根据行状总结“朱熹从筮仕到逝世，凡五十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间，‘士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其余四十年，都奉祠。以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④]高令印通过严密的考证指出朱熹从政“累计方愈七年”“奉祠二十一载”。[⑤]

总的来说，朱熹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年少时大多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且一生从政的时间短暂，大部分时间都在奉祠，俸禄微薄。至“‘庆元党禁’时期，已无政治生涯”[⑥]。这就致使自身经常遭遇经济上窘境。故其诗作当中经常用“穷”字直抒其经济上的尴尬处境，如“抱病守穷庐，释志禅幽趣”(《夏日二首》其一)，“抱病守穷庐，闭户常罕出”(《游石马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得出字》)，甚至打趣“古来穷庐士，岁暮多苦心(《奉酬上野表兄饮酒之句》)”，“诗人从古例多穷，林下如今又两翁”(《寄江文卿刘叔通》)。

### （二）诗人之论与诗人之诗

朱熹的诗论爰及周代以逮南宋。朱熹云：“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⑦]其诗论也颇为中允且有独到的见解，如“古诗须看西晋以前”，“东晋诗已不逮前人，齐梁亦浮薄”[⑧]。批评宋人“以文为诗”的现象时说“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中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一百首也得”[⑨]，指出“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⑩]。可谓鞭辟入理，已为学界所共识。评论陶渊明诗“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⑪]，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尔”[⑫]，论李白诗“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⑬]。认为“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去那泛声，遂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

① [宋]朱松:《韦斋集》卷九 ,《四库全书》本，第 17 页。
②《韦斋集》卷九 ，第 178 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767 页。
④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79 页。
⑤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0 页。
⑥《朱熹事迹考》，第 66 页。
⑦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4 页。
⑧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324 页。
⑨《朱子语类》，第 3330 页。
⑩《朱子语类》，第 3324 页。
⑪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4 页。
⑫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5 页。
⑬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5 页。

子便是”[①]，“诗社中人言，诗皆原于赓歌”[②]，见解独到。其诗论被文征明称为“诗人之言”。

朱熹的诗论源于家学渊源与博览群书的深厚学识底蕴。在其父其师的教育与影响下，朱熹早年遍览典籍，出入佛道，从学李侗后逃禅归儒，终生服膺理学。其诗论必然以儒家诗教为统摄，师法众长，崇古而不薄今，在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基础上主张平易，如“诗须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③]，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处规模，不可学”[④]，批评黄庭坚“黄诗费安排”[⑤]。

朱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甚至还写了十多首词。诸如《全宋诗》收录其诗 1412 首；《全宋词》收录其词 18 首；郭齐经过严密的考证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收其诗 1202 首，词 16 首。尽管上述诸家大都对其诗词的收录存在着误收漏收的现象，且相关学者已作出考辨。[⑥]但就数量上来说，在理学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邵雍；于历代诗人的诗歌数量来看，也毫不逊色。就其质量而言，朱熹于当世就以诗名世，“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⑦]。尽管历来学者对其诗歌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客观地讲，大有可观者不在少数，尤其是古诗，明代胡应麟甚至说“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⑧]。近体诗亦有可观者，诸如《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武夷棹歌》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对于所作不多的 16 首词，缪钺指出“只有少数理学家能作出好诗，朱熹就是其中一位。他不但能作诗，而且还作了十几首词，这在理学家中是很特殊的”，而且认为其诗“绝大多数是具有诗的意境韵味的，并且有少数特别精彩，不可不注意”[⑨]。郭齐也认为“在整个南宋，除少数大家外，在诗歌数量和质量上能超越朱熹者也屈指可数”，并近一步指出“朱熹在南宋诗坛的应有地位是不容抹杀的”。[⑩]皆可谓公正客观之论。

但是，朱熹在其诗作中常言自己不善作诗，诸如“我穷诗未工，最觉貂难续”（《次张彦辅韵》）“我穷初不能为诗，笑杀吹竽滥得痴”，且自注“仆不能诗，往岁澹菴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幸，多类此云”。[⑪]（《寄江文卿刘叔通》），在庆元六年（1200）所作的《和刘叔通怀子蒙之韵》一诗中也自注“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韵尤非所长”[⑫]。考其“诗人之言”的诗论及诗作的数量与质量，实为自谦之语。

## 二、穷达与穷景

钱穆言：“纵观朱子一生，出则志在邦国，著述则意存千古，而其徜徉山水，俯仰溪云，则俨如一隐士。”[⑬]朱熹理学思想源于儒学，儒家历来主张积极入世，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语）的穷达观。而这种“兼善”有别的穷达观在南宋理学集大成的朱子身上趋于同质，具体

①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30 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33 页。
③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8 页。
④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6 页。
⑤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324 页。
⑥ 此方面成果较多，诸如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11 年版；胡迎建:《朱熹诗词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石立善:《奈何唐诗入宋集——〈全宋诗〉与〈朱子全书〉误收朱子佚诗五首辨析》,《宋史研究论丛（第 13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杜春雷:《朱熹疑伪诗考辨》,《宋史研究论丛（第 20 辑）》，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等等。
⑦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12 页。
⑧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第 316 页。
⑨ 缪　钺:《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第 82 页。
⑩ 郭　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⑪ 郭　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第 847 页。
⑫《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第 842 页。
⑬ 钱　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7 年，第 1850 页。

表征为即使仕途坎坷，仍时刻心系国事民生，在其弃佛归儒后，更以传播理学为己任来致君行道，遏制人欲物流，匡扶社稷，拯救万民。在其诗作多有体现，而在这类诗作中，更是直接用“穷”字表达出对国事民生的关注与关心。而作为理学家的朱熹，非常推崇“曾点气象”，往往在徜徉山水间言理悟道，然山水胜景却又不时地感发朱熹的诗情，故朱熹常在登山临水间，大量援引“穷”字入诗，抒发其“平生山水心”。

### （一）爱国忧时与“视民如伤”

严羽《沧浪诗话》载：“本朝尚理”而“唐人尚意兴”，[①]“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自南宋以降渐成共识。宋诗是继唐之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高峰，傅璇琮等主编的《全宋诗》共 72 册，收录近 9000 位诗人诗作 20 余万首，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宋诗之所以在臻于成熟的唐诗这座巍巍大厦前另辟蹊径取得自身的成就，根植于有宋一代的现实土壤。宋朝统治者吸取隋唐五代灭亡之教训，推重文治，松于武备，致使宋廷内忧外患，几近覆灭，由此而产生大量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等现实主义优秀诗篇。

自幼受其父其师爱国思想的浸染，作为诗人的朱熹，同其他爱国诗人一样，应该而且必须在其诗作中表现对国事的关注。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主完颜亮亲率 60 余万大军南下，直奔临安，意图一举灭亡南宋。是年十月金人攻陷扬州，刘錡留守瓜洲，以身作诱，“佐以步卒设伏林中，金人既入，张弩俄发，金人以运河岸狭，非骑兵之利，稍稍引去。追击，大破之，斩其统军高景山”[②]，当听闻此捷报后，朱熹情难自已，遂即作诗“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其四）；是年十一月虞允文“督师败金兵于采石”[③]，金主完颜亮也在慌乱中被部下所杀。朱熹难抑兴奋在其诗中写到“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感事书怀十六韵》）。两首诗作中，朱熹分别以“穷寇”“穷凶”形容金兵，表现出诗人对局势的及时关注和对金兵的极度憎恨，体现了诗人爱国忧时的儒者情怀。

朱熹除了在其诗作中表现爱国忧时外，还表现了对下层民众的怜悯与同情。朱熹从政的时间短暂，而且除了“立于朝者四十日”以外，都是在地方为官，而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隐居乡野著述讲学，故在其诗中朱熹也常以耕农的形象示人，如“凿井北山阯，耕田南涧湄”（《感怀》），“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卜居》）。正是这些经历使得朱熹深入基层民众的生活，体会下层社会的艰辛。绍兴三十二年（1153）五月，朱熹官同安主簿，面对官商沆瀣一气，民不聊生的同安，朱熹把“视民如伤”的匾悬之于同安县署大堂之上。期间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的负担，并题诗“度量无私本自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叫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题米仓库》）于墙以示警醒。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县遭遇水灾，“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④]，巡视灾情十日，目睹受灾情况，感慨到“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⑤]面对天灾人祸给老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朱熹只能深表同情却无能无力，深感痛苦，诉之以诗“眷焉抚四海，失志嗟何穷！”（《杉木长涧四首》其四）

### （二）“平生山水心”的山水情志

作为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作诗费时费工夫，有碍于对道的体悟，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

①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96 页。
②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781 页。
③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3588 页。
④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963 页。
⑤《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 1963 页。

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了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①]又说“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者耳”[②]。承认黄庭坚诗“精绝”，但又说“知他是用多少工夫”，[③]指出江西诗派“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诗，要做何用”[④]？

但是作为诗人的朱熹，在面对“万象争回巧，千峰尽乞盟”(《至上峰用林择之韵》)的大自然时又不能不作诗。《朱子语类》载“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⑤]，朱熹自己也说“江山景物之奇，阴晴朝暮之变，幽深杰异，千状万态，则虽所谓三百篇犹有所不能形容其仿佛，此固不得而记云”[⑥]。乾道三年（1167），应张栻之邀携其徒林择之入湘湖讲学论道，在讲学论道之余相携游衡岳，在短暂的数天竟唱和 149 首，辑为《南岳唱酬集》。朱熹自身就作了 53 首，[⑦]不可谓不多。甚至其间作诗曰“平生山水心，真作货食饕”，与作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的《倒小水坑作》中“穷出鲜外慕，殖志在丘野”同一表述。但是在游览既竟的时候，又深感愧疚，对同游者说“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防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防平中，而其流几至于丧志”。[⑧]在《东归乱稿序》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再次强调“始予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之间得凡百四十余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为荒矣，则又推数引义，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见于唱酬前后序篇宜详矣。’”[⑨]而在与其徒蔡伯崇、林则之东归的途中又有唱和两百余篇，自解“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不能无言者，则未免以诗发之”[⑩]。

综上，尽管朱熹多次申明作诗费工夫，有碍于对道的体悟，但是看见山水之胜景，又不能不作诗。在朱熹千三百首诗作中，自然山水类的最多，其次是酬唱交游类，但有很大一部分酬唱交游的背景又是在自然山水间进行，直接抒写山水之胜，景物之奇。在朱熹的这部分诗中，时用“穷”字，有直接体现以自然山水作为客观的审美对象，如“行行遵曲折，水石穷出赏”(《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薄领淹穷海，莺花绕故林”(《次旬父韵》)，“逮兹势力穷，犹能出奇伟”(《温汤》)；亦有诗人欲穷尽山水胜景之意，如“逐势风威乱，望穷山景翳”(《对雨》)，“欢余未已去，更欲穷幽寻”(《登罗汉峰》)，“乘高一骋望，表里穷暇观”(《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穷探意未已，理策重跻攀”(《游密菴分韵赋诗得还字》)，“西穷濂溪原，东尽溢城关”(《游天池》)。在登山临水间亦常引发诗人的情思，如“寒水粼粼受晚风，轻舠来客思无穷”(《分宜晚泊江亭望南山之胜绝江往遊将还而舟子不至择之刺船径渡呼之予与伯崇佇立以俟因得二绝》(其一))，“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云谷杂诗十二首》)“诗翁不愁思，逸兴莽何穷”(《放船二首》)。

朱熹不单是理学家中最会作诗的人，“道学先生惟朱子诗最工”[⑪]，放之于南宋诗坛，可与比肩者亦在少数。但同大多封建文人一样，朱熹也“不厌其烦地吟咏，无休止的咀嚼个人心理感受”[⑫]，

①《朱子语类》，第 3333 页。
② 朱　熹：《南岳倡酬集序》，湖南：南岳文物管理所。
③《朱子语类》，第 3329 页。
④《朱子语类》，第 3334 页。
⑤《朱子语类》，第 2674 页。
⑥ 朱　熹：《南岳倡酬集序》，湖南：南岳文物管理所，第 2 页。
⑦ 参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714 页。
⑧ 朱　熹：《南岳倡酬集序》，湖南：南岳文物管理所。
⑨ 朱　熹：《南岳倡酬集序》，湖南：南岳文物管理所。
⑩ 朱　熹：《南岳倡酬集序》，湖南：南岳文物管理所。
⑪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上海书店，2002 年，第 479 页。
⑫ 郭　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2 期，第 86 页。

时常以诗抒怀。或抒无边的惆怅哀怨，如“原为清宵梦，燕昵穷余欢”（《拟古八首》其二），“相望无穷期，相思徒谅为”（《古意》）；或抒发友朋间交游之欢娱，如“昨来邂逅坝城东，定交斗酒欢无穷”（《题祝生画》）；或赞美朋友，歌颂友情，如“珍重诗翁且疆健，东阡南陌兴无穷”（《次秀野种栗韵》），“平章个里无穷事，要见三山老放翁”（《题严居厚溪庄图》）；或述失落感伤，如“穷秋一雨至，暂且复肃肃”（《试院杂诗五首》），“追薪爨品绝，论茗浇穷愁”（《康王谷水帘》）；或言孤芳自赏，远离世俗的高蹈情怀，如“十年殄瘁无穷恨，叹息今人少古风”（《次韵伯崇登滕王阁旧蓋闻往时延阁公拜疏于此云》），“时当冬候穷，开岁五日疆”（《立春大雪邀刘圭甫诸兄遊天湖》），“数石无穷年，流水日千里”（《云谷杂诗十二首》）等等。

## 三、穷道与道穷

自朱熹厉志圣人之学起，把对理学的追求作为毕生的目标，在皓首穷经，著述讲学，同人论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理学体系的建构，最终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者。而朱熹对理学的执着，又与南宋的政治生态互为关联。南宋的历次党争皆表现为道学人士与反道学人士之争，随着朱熹在学术上的影响和地位的提升，渐至成为党争的中心人物。在此过程中朱熹愈加感到“吾道难行”，而在淳熙、庆元年间，朱熹对于党争的现状更是发出“吾道当穷”的感慨。在其诗作中，大量援用“穷”字入诗，一方面阐述了“穷道”的过程与感悟，一方面则是抒发“吾道当穷”的感慨。

### （一）对理学的毕生追求

《朱子行状》载朱熹“少长，厉志圣贤之学”[①]，《宋史》也据此说，“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②]，清人王懋竑在《朱子年谱考异》里指出这个时间段当在绍兴九年（1139）朱熹十岁时。[③]是故朱熹言“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易做。今方觉得难”[④]。而自朱松病逝至从学李侗的这段时间，朱熹虽在武夷三先生的教育下接受了二程理学，但也渐至浸染了武夷三先生的好佛老之说，结识道谦后更甚，一度耽于禅说。但是在师从李侗后，渐渐认识到佛老的弊端，逃禅归儒，笃定理学。朱熹曾形容从学李侗前的为学经历，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⑤]。也正是这种遍览百家，深入道佛的经历，让朱熹对道佛的认识更加透彻，对其批判的更加彻底，更加笃定其理学之路。

朱熹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丰盛，直至弥留之际还“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南城吴氏杜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在这种不断埋头著述与诸家论战的过程中建构起自己体大精深的理学体系，是故钱穆言“南宋朱子出，才始集诸家之大成。朱子思想极阔大，又极细密”[⑥]。从厉志圣人之学到晚年在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朱熹不可动摇的一代儒宗地位，成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至海外。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足可以和孔子并论，“在中国历史上，千

① [宋]朱熹：《朱子全书·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4页。
②《宋史》，第12769页。
③《朱子全书·附录》，第175页。
④《朱子语类》，第2611页。
⑤《朱子语类》，第2620页。
⑥ 钱　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01页。

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①]

朱熹也常援“穷”入诗表述这种追求理学心路历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以自然山水作为理的观照进行体悟，如“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登麓赫曦台联句》），“君看灞桥风雪中，南来北去莽无穷”（《奉答择之四诗意到即书不及次韵》）；（2）表现包括自己在内的理学家醉心于道而固守穷节的精神，如“夫子生名世，穷居几岁年？”（《挽籍溪胡先生三首》其一），“问道无余事，穷居不计年”（《挽延平李先生三首》其二），“誓将百年功，来守固穷节”（《云谷次吴公济韵》）；（3）直接以诗的形式讨论理学内容，如“何心分彼我，无地著穷通”（《和秀野韵二首》其二），“也应妙敬无穷意，雪未消时草已生”（《再答林择之》），“圣言妙温无穷意，涵咏从容只自知”（《送林熙之五首》其二），“天理生生本不穷，要从知觉验流通”（《送林熙之五首》其二）；（4）哭悼道友，追述其在理学上的得失，或是鼓励他人厉志圣人之学，如“但使穷新得，终当订旧讹”（《哭罗宗约二首》其一），“喜有象贤堪嗣事，故有鸿业自无穷”（《奉同都运直阁张丈哭敬夫张兄张丈有诗敢次元韵悲悼之极情见呼词伏幸采览二首》其一），“愿言更励坚高志，力索穷探慰所思”（《次韵别伯崇二首》其二）。

### （二）党争之祸感怀

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不图进取，腐败成风，内部争斗不断。道学的沉浮也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南宋理学集大成的朱熹，一生仕途坎坷，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其短暂的仕途中，辞官 40 多次。这其中包含着朱熹的道学人格与灵魂同南宋政治现实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历次党争皆与道学息息相关，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素有“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的孝宗即位后便启用一批长期被秦桧压制的道学人士，朱熹便于该年六月上封事主张“修政事，攘夷狄”[③]，在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任命主战派张浚为右相，同时任命主和派汤思退为左相，直接引发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相党之争。而张浚是道学人士，这实际上成了道学人士与反道学人士之争，而随着张浚“符离之败”至“隆兴和议”，主战的道学一派以失败而告终，道学人士也相应被逐。渐渐地孝宗对道学人士的态度也发生了喜剧性的转变，认为“儒生之论，真不达时变”[④]，转而青睐近习人士，故在乾、淳年间，又形成了“道学党”与“近幸党”之争。是故有学者指出，乾道三年处于道学与反道学之争的剧烈时期，朱熹与张栻、林用中相游南岳唱酬的《南岳酬唱集》未刊刻行世的原因或基于此[⑤]。朱熹虽然仕途坎坷，但基于其坚定的道学人格及在理学上的影响，也渐至被推至道学与反道学之争的漩涡中心。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为提举浙东茶盐公事”[⑥]，赴浙东赈荒，基于其坚定的道学灵魂，“劾知台州唐仲友”[⑦]，王淮与唐仲友是姻亲关系，是故“淮素善仲友，不喜熹”[⑧]，“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痛革之。’郑丙为为吏部尚书，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⑨]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① 钱　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 年，第 1 页。
②《宋史》，第 697 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 573 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690 页。
⑤ 参见林阳华《〈南岳倡酬集〉版本流传与朱熹师徒理学思想传播》，《文学评论》2017 年第 4 期，第 72 页。
⑥《宋史》，第 12751 页。
⑦《宋史》，第 12072 页。
⑧《宋史》，第 12072 页。
⑨《宋史》，第 12072 页。

也有相关记载：“会先生（朱熹）劾台守不法，不丞相庇之，章十上，始罢而去”[①]，“王丞相淮当国，不喜晦翁，郑尚书丙始创为‘道学’之目”[②]。在接下来的王淮、周必大、留正等的相党之争中，束景南先生指出“淳熙九年归武夷后，在反道学氛围中，七年畏谗远谤不敢出，三家相党纷争中，两年十六次上辞免之章不赴任”[③]。而在绍熙末庆元初，朱熹以侍讲身份上疏弹劾韩侂胄遭罢，绍熙五年（1194），“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④]，而“自熹去国，侂胄势力益涨”[⑤]，其党羽更是“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为伪党，至此又变为逆党”[⑥]，“于是自庆元至今，以伪学、逆党得罪者，凡五十九人”[⑦]。韩侂胄党建立逆党党籍，昭告天下，永不录用道学人士。朱熹更是成为被打入伪籍的逆党之魁，韩侂胄党甚至“乞斩熹”[⑧]。自此，道学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造成了自秦桧以来又一次大‘党难’与‘学难’”[⑨]，朱熹也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在党禁的阴森冰冷环境氛围中含恨而终。

其诗作中也常常表达出深处反道学高压环境下的心境，如乾道三年（1167）作《赋归云洞》中感慨“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穷”，淳熙三年（1176）其道友汪端明去世，痛呼“只今还一恸，即此是穷途”（《挽汪端明三首》其三），而在淳熙十年（1183）更是无比沉重地说“诸君莫惆怅，吾道更当穷”（《和林泽之凤凰山韵》）；受反道学党的打击迫害，其生活写照从侧面也反应出了这种“道穷”的心理，如淳熙以后和他人诗时感叹“平生壮志浩无穷，老寄寒泉乱石中”（《和人游西岩》），庆元党禁期间更是给朋友寄诗言“政使暮年穷到骨，不教吟出断肠声”（《寄江文卿刘叔通》（其一））。

朱熹作诗喜用“穷”字。就其诗作数量而言，其一千三百余首诗作中，直接援用“穷”字的就有 68 题 71 首之多[⑩]，有的诗作中还反复出现，如《夏日二首（其一）》《赋归云洞》《寄江文卿刘叔通》；从时间跨度来看，从绍兴二十年（1150）至庆元元年（1195）及以后，前后 45 余年，如《拟古八首（其二）》（绍兴二十年）、《题岩居厚溪庄图》（庆元元年）、《寄江文卿刘叔通》（庆元中）。朱熹诗作最早可见于绍兴十八年（1148）所作的《远游篇》。彼时朱熹千里赴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故于此诗中可见其一往无前的气概与志在四方的胸怀，与尔后在候职中消磨岁月的情形形成巨大落差，如稍后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邵武道中》与《古意》即表现了蹉跎岁月、虚度时光的惆怅。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不平，《远游篇》这样的篇什在后来的诗作中已难觅踪迹，加之思想上的转变，在其后的诗作中喜用“穷”字，如庆元间所作《寄江文卿刘叔通》连用三个“穷”字，蕴含了“人穷”“诗穷”“道穷”等义涵。结合朱熹诗作及其相关史料，不难看出其诗作中大量的“穷”字实则是一条贯穿朱熹生平、思想及成就等方方面面的线索。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632 页。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 138 页。
③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842 页。
④《宋史》，第 717 页。
⑤《宋史》，第 12768 页。
⑥《宋史》，第 12768 页。
⑦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39 页。
⑧《宋史》，第 12768 页。
⑨ 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9 页。
⑩ 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及编年皆按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

# 洪受生平及著述

王水彰

（金门县好人好事运动协会）

**摘　要**：洪受在金门享有崇高学术名望，他撰写了《沧海纪遗》一书，使后人对明代金门的文史资料的搜集，有所了解与突破。洪受的生平、家世、宦途事迹、重要交游、经历事迹，史未见传，文献不全。然而仍可由其有限的文史资料中，探索这位明代金门作家中的传奇人物。

**关键词**：地方志；洪受；金门作家；《沧海纪遗》

## 一、家世与生平

洪受，生卒年不详，字凤明，一作凤鸣，凤山人（今金门金湖镇西洪村人），以经传多所发明。在庠教授，史称大师，门徒多成名。所著有《四书易经从正录》《沧海纪遗》。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以贡历国子助教，夔州通判，卒于官。[①]洪受之父洪登，封国子监正学。[②]至于他的家世后裔，从史迹、《同安县志》《金门县志》中，都无从考证。他的故居凤山（今西洪即是），有“凤穴”传说：

### （一）双凤穴

洪受故居西洪村，即是今日的“榕园”。历来就有风水“凤穴”之说，因有风水宝地之赐，曾是名儒辈出之地，多人在朝中任官。因为拥有“双凤穴”，即是一只凤公、一只凤母的风水宝地，村人出外作官者众，故有：“人丁不满百、京官三十六”[③]之美誉，流传迄今。美中不足是村内男丁外出在朝为官，其夫人均留守在家不能外出。有算命先生行脚到该村，村妇均请教算命仙：她的丈夫何时返家？引致算命仙的好奇，竟然这么小的村落就有多人在朝为官，必定是有风水缘故。算命先生说：“若要您们先生回来，后面那块石头去敲掉。”那块石头所在地就是“双凤穴”[④]，这石头被敲掉后没多久，全村在外为官者不是辞职、被免职，或因他故离职。这些为官者也都回归家乡，官位当然也就没了。此乃自古以来民间重视的“风水”之说，仍然流传至今。

当“双凤穴”石块风水被敲掉即死了一只凤，据说另外一只悲伤过度，哭到吐血而死。为何吐血？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到：因为西洪一带每到冬季强风一到，飞沙走石，尘土飞扬，此地失去了屏障。因此，整日黄沙滚滚，湮去了农地、房舍，也湮没了整个村落。使原本覆盖有一层红泥土也渐

**作者简介**：王水彰，男，金门县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理事长，金门县红十字会荣誉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① 金门社教馆：《金门县志下册》卷十二人物志，金门县政府民八十年增修，第 1496 页。

② [明]洪　受：《沧海纪遗》，[清]黄锳补录，郭哲铭译释，金门县文化局，2008 年，第 107 页。

③ 唐蕙韵：《金门民间文学集・传说故事卷》，金门县文化局，2006 年，第 54 页。

④《金门县志下册》卷十二人物志，第 1496 页。

被强风吹走，剩下了赤裸裸的“红赤土”，这是金门最常见的土质，乍看之下，就像吐血赤裸的一片。在风水的地脉来说：“风水就没有灵气了，就因为没有碧绿的活水与花草，那只凤也就哭到吐血而死。”[①]迄今的西洪又名“榕园”，仅剩留有一座传统闽南古厝。见图上。

图 1 ［明］洪受故宅内设置犹存

（二）凤穴石凤

又另一说：“凤穴”这块风水宝地被人破坏。当时在朝者，有人心怀不轨，眼见朝中为官者大部分均是金门同一村庄之人。这个村落地理风水一定很好。因此，叫了地理师来金门实地了解，不出所料，西洪村的一块石头，即是“凤穴宝地”。风水师悄悄告诉当地村妇：“你们这个风水真贵！真厉害！看您们村人在京城做官的很多。”村妇们回答：“唉！做官是好，不过家里男人都没有回来，我们都独守空闺。”风水师说：“你们要你先生回来的话，得拿石钻来凿，把这块石头像凤眼的眼睛弄瞎，自然你先生就会回来。”[②]村妇们为着要自己先生回家，不疑有他，按风水师吩咐行事，结果这“凤穴石凤风水”即遭破坏。

说也奇怪！又是巧合，这些西洪村人在朝做官之其中一位，在早朝时四处环视，竟然都是同为西洪村人为多，而喜出望外地说：“咦！都是我们西洪的人嘛！”[③]因得意忘形而笑出声，引来皇帝的注意，即问：你笑什么？他说：“我在看着左右都是我们金门西洪的人。”皇帝因此生气，早朝乃朝廷严肃圣地，何能嘻笑喧哗，若是你们要造反，岂不轻易而行？而陷我皇帝于危机之中，因为你们都是自家人。最后皇帝下令，要他们解职回家。因此，西洪村至今人丁全部流失，村落已废。

从当今的科学求实依据里，显然与风水师的推理、论定，是有悬殊的落差。又自明代洪受在世至今，已逾四百五十年，期间朝代更替、历史轮回、社会的流动与转变，欲从文史资料，探求西洪村的典故已是很难，更何况要研究洪受的生平、家世、宦迹、交游，确也苦无足够文献可资参考。

①《金门民间文学集・传说故事卷》，第 54 页。
②《金门民间文学集・传说故事卷》，第 56 页。
③《金门民间文学集・传说故事卷》，第 56 页。

## 二、宦途与事迹

### （一）宦途

洪受宦途，从泉州文史资料、同安县志，遍查无着，足见明代前中时期，金门确实海中孤岛，地方文史记载稀少。唯笔者依据今榕园“慰庐”[①]大堂内文载：“洪受字凤鸣金门西洪人，学问精博，早年曾任州、县学校教授，所授门生登科第甚众，一时望重士林，被尊为‘大师’，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岁贡出任北京国子监助教，后升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县）通判，卒于任所。”或许洪受当时任教、为官均在外地，史料无记，有待再加探索。

### （二）议浯洲书院宜复兴

元代浯洲場司令所建的书院，到明代隆庆年代时（1568–1572）仅存遗址。洪受《议浯洲书院宜兴复》一文云：“浯洲在胜国为子弟员者，不知其几，然有书院，又有赡士之租，亦可见有司之加意焉。闻之故老，当时书院有学官一员，以主其事，今其址尚在，宜请而兴之。”[②]洪受建议兴建浯洲书院，并未受到官方重视，故浯洲书院并未重建。又洪受再于《宾祀之纪》文中，仍然皆有言及兴复浯洲书院，可作为乡饮酒礼及乡贤崇祀活动之场所，可见洪受当时重视浯洲书院的兴建，结合地方礼仪庆典集会之场所设施，也可知当时金门并无书院的存在。1967年《金门志》已改回“浯洲书院”之名。洪受《沧海纪遗·宾祀之纪》一文有“诚于浯江书院兴复之”之名。另“浯江”仍是“浯洲”之误植。[③]文中洪受对培育家乡子弟教育，非常重视。如下文：

> 盖浯洲在今时充员于黉宫者百有余人，而地瘠业薄，贫寒者多，鲜有能造学而受业者，加以风波之险，出入之际，往往为难，故有一年一至学者，或二、三年一至学者，苟于县学分教，请得一员常在书院，一洲之书生，布时受其业，则耳提面命之下，自有日就月将之益矣。[④]

洪受关心家乡子弟向学，必有书院设立，方便学子上课，目前书院旧址仍在，应请相关单位要重新兴建。浯洲地贫人穷，贫寒之士为多，少有人能到县学（同安）深造，加上渡海求学，风波险恶，往来非常困难。得一年才到县学一次，也有二、三年才去县学书院一次。如果县学能在家乡地设立，抑或是办分院，可方便乡学子弟就学，老师也在当地面授教学，必定会使学子功课有日进月升之效。

> 且古者县治于民，犹父兄之于子弟，循行上课皆常事，至于读书而亲正句读，陈伦行而亲至其门，皆以其地之便故耳。今浯洲隔海，任长任满而去者未尝一托[⑤]足焉。而民风恬退，不尚争竞[⑥]虽有乡宾之请，亦无有应其礼以至于县廷[⑦]者，如得学官住书院，则可以代行其典礼，而孝子、悌弟、贞妇、烈女、皆可得而祭也。且古所谓：“乡先生没，则祭于社”者浯洲固有其人焉，但未举之耳。有书院则立祠有其地：有学官则主祭有其人。岁时之间，率子弟以行礼，则人之敬学，而高山仰止之思，其于风化之助，岂浅鲜哉！幸留意焉。[⑧]

① 慰　庐，在金门金湖镇榕园，即明代的西洪村，“慰庐”系洪受故居。
②《沧海纪遗》，第9页。
③《宾祀之纪》第五，《沧海纪遗》，第52页。
④《沧海纪遗》，第61页。
⑤“托”，《金门县志》作“托”。
⑥“争竞”，《金门县志》作“华竞”。
⑦“廷”，《金门县志》作“庭”。
⑧《沧海纪遗》，第62页。

古代治县之官，对百姓而言视同父兄子弟之亲，规劝学业乃自然之事。浯洲孤悬海岛，每一任县令任期满离去前，均无亲身踏入金门此地。加上金门民风纯朴谦让，虽有县城邀请乡宾参加，但都没有人过海入城赴会。显现当时金门与内陆交通非常不便且有远隔。如果能派驻县学官入住金门，便可以他替代县城官员，在金门代官府行事典礼。包括：孝子、悌弟、贞妇、烈女、也都可以就近奉祀。在古制所谓："乡里中退隐的士大夫过世，要加以奉祀在乡里"，浯洲是有这样人物，但也从未被奉祀。如有建立书院，奉祀之地便可迎刃而解，而学官即可作为主持祭仪的人选。在逢年过节时，率领后生晚辈行礼仪，让大家知道尊敬学术，并可敬老尊贤，对民风教化助益良多，益见洪受在家乡的兴学教育，不遗余力。

### （三）明代金门卫所之设置

明代是金门史上光辉时期，在文治、武功，均有辉煌史页，最突出者是金门建置了守御千户所。《金门志》载：洪武二十年（1387）置金门守御千户所，及峰上、官澳、田浦、陈坑、四巡检司，又置烈屿巡检司。[①]可见明初就已注意到浯洲（金门）地位要冲，并设立了莅土临民之官司驻守。因此，明代金门地区置有：峰上、官澳、田浦、陈坑（成功）及烈屿五个巡检司。明代初期，同安最基层行政体共有八个巡检司，金门就占有五个之多，益见明代金门在闽南海岸防卫地位之重要。

### （四）议巡检不宜在县坊

明代中末时期，军政腐败，洪受《议巡检不宜在县坊》指出："弓兵出直于官为巡检者利其直，又足以肥己，不惟不责以供役，实乐其卖放而去，导致巡检司无兵驻守，巡检相率县居，习于为常。"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大举洗劫金门长达五十多天，也不见巡检司与千户所驻军的出击保卫。洪受《抚院诉词》云：

> 奈何官军空食廪粮，罔知报效，连年纵寇劫掠，民不聊生。某年某月某日，倭船一艘，由料罗登岸，指挥王鏊见委地驻札，不惟不与交锋，却且潜遁无迹致倭如入无人之地。[②]

洪受对当时官军怠惰批判有加，特别是金门的巡检，与驻守料罗之官军败坏无能，在倭寇大举侵入金门洗劫时，未见千户所官军有驱逐倭患，保卫乡民之举。研判当时金门千户所官军，已是腐化败坏无能了。《金门县志》云："结营所在，刁悍兵丁凌辖士民，孱愚者不敢触其锋。"[③]正说明在明代驻守金门兵丁，不法与腐化的一面，也证实了金门岛屿在明代海防地位险要。

金门地处福建闽南沿海小岛，没有大河巨川，又无高山挡风蓄水，先天水源不足，在人口繁衍下，垦荒代木，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明代隆庆年间，洪受有感而发写下："浯地隘而瘠薄，加以风沙飘压之患，民之有常业者无几，故或有煎晒而业于盐者，或有杂作而业于庸者，保生盖甚难也。"[④]金门孤悬海岛，民赖渔盐、地瓜、花生、杂粮，日食维艰，柴草米谷全赖内地运载供应。洪受道尽金门农产业不振，维生困难。洪受的苦民所苦，用文字加以表达，以期博取官员的重视，俾解民困。

金门的田浦村[⑤]在大地村之东北方，紧邻海边，洪武二十年（1387）在金门设五处巡检司，田浦为其中之一，每处巡检司原编弓兵百名。洪受在《议巡检不宜居县坊》载："盖弓兵额编，多为南安、永春山居之人，见波涛汹涌，则胆落神惊，势不得不出直于官，为巡检者利其直，又足以肥己，

---

①《金门县志》卷一《大事志》，1992年。即《金门志》第十册《文化志·官职志》，金门县政府，2007年，第436页。
②《词翰之纪》第九《抚院诉词》，《沧海纪遗》，第74页。
③ [清]林焜熿：《金门志·风俗记·杂俗》，台北市台湾银行经济研究院，1960年， 第397页。
④《本业之纪》第六，《沧海纪遗》，第54页。
⑤ 田　埔：即金门县金沙镇内洋里田埔村，紧邻在大地村的东北方，居民有王、柯、陈姓，以王姓居多。

不惟不责以供役，实乐其卖放而去也，此司之所以无兵也。”[①]由于弓兵贿贴巡检，以致弓兵实际上并无驻守在巡检司城，使田浦巡检司成为空城，方有百姓迁居于城中。明天启六年（1626），蔡献臣曾建议于料罗筑城，并提议可至田浦、陈坑二废巡司城，同时谈及田浦同住人数家，颇不愿拆城。[②]可见洪受、蔡献臣两位先贤对家乡的海防，驻设的见解大致相同，厚爱家乡之心一致，因此，建请朝廷筑城保安。

洪受在《沧海纪遗》载：“啸卧亭后有石塔，上镌‘宝石’二字及‘文台宝塔’‘湖海清平’等字，为明百户陈辉书。”[③]《湖海清平》落款时间是万历丁未夏三十年（1607），至今“文台宝塔”成为该塔名称。陈辉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题刻的《文台宝塔》与《湖海清平》诸字，见证于金门历史一页，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究其题刻的历史背景，有待探取。研究者认为：明代金门文风兴盛，人才辈出，明万历《同安县志》载：“同安乡榜，始盛于嘉靖戊子七年（1526）、辛卯十年（1531）及万历戊子十六年（1588）。”前戊子八人，浯居其五，联捷者四；辛卯七人，则皆浯产；后戊子十一人，浯九。夺魁者二，浯一；相继登第者八，浯五。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联翩者五，浯四。以封城论，同安分有十里，浯地尚未备乎一里。科名风节，接武比肩，为阖邑冠。统计明兴同捷乡、会闱三分之，浯有其一，其中冠南宫、取鼎甲、选词林、拜阁学及文武乡榜、文武进士，以至由荐辟、由学校、由吏员、不可枚举。故谚云：‘无地不开花’。而邑人亦曰：‘无金不成同’。海中撮土，亦灵怪矣哉。”[④]谅必是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斯时金门人才辈出，引致金门所百户陈辉题赞此塔为“文台古塔”，彰显金门文风兴盛为主因，推测当时的洪受以文载道，教文在乡。

### （五）建中军镇料罗游议

洪受有《建中军镇料罗游议》文：“浯洲、澎湖，均海中岛屿也。而大小不同，澎湖去漳、泉四百余里，而礁澳险隘，海波汹涌，我兵防汛，率一月、半月而始济，彼贼也亦何利而乐蹈不测之渊，以冀兴者手？浯洲则系泉、漳门户，地辟民众，鸡犬相闻，缙绅杂沓，号称‘海滨邹鲁’。无事则游食之辈，已窥伺而有觊心，多难则云合影从之徒，遂剽掠以为巢穴。先庚申四月间，被倭寇抄劫掠屠者万四千余人，聚党集伙，凡有两月，然后由此攻泉郡陷兴化，全省骚动，费用国帑，劳动制阃，计几经书，乃绍安绥抚，少定一时。是权以远近难易之势，计以去住得失之形，不备内而备外，当时主议者虽远谋，亦觉过计矣。虽云海寇多据此窃发，招集萌蘖，不斩将成斧柯：而置兵十有余年，总哨已八九更易，中门岂尽无潜滋，而何一虏竟不见得也。又况战舰易损，兵饷加多，未获难图，已成先丧乎？”

综观之，洪受身为金门一分子，对家乡的关照厚爱，对朝廷的设防备布阵营的建言，以致金门为泉、漳门户要塞；又周详到澎湖的设防、军中的调防与职责的严明赏罚，历历细诉其中。金门饱受倭害，岛民惊吓，生活于恐惧中，道出斯时金门地位要比澎湖重要。或可遣调兵力驻守金门，以防内地遭受打扰。在执法上无避亲疏，赏罚分明，激励军士勇气。若能建置中军驻卫料罗，则是安定民心，保卫泉、漳良策，并且要知人善用，知臣莫如君，希望抚台大人考虑。所以说：“耕作要问奴仆”，要战争攻克致胜，就得向干城腹心来多请益，看来洪受不但是杰出文儒，亦是文才武略显要的先贤。

①《建置之纪》第二，《沧海纪遗》，第8页。
② 蔡献臣：《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铳城议》，《清白堂稿》，金门县政府，1999年，第136-139页。
③《词翰之纪》第九，《沧海纪遗》，第70页。据《湖海清平》之落款应作陈辉。
④《旧事志·丛谈》卷十六，《金门志》，第419页。

## 三、重要交游

### （一）洪敏、洪兴周、洪石朴

金门西洪村于明代间，满门贵戚，因此有“人丁不满百，京官三十六”之谚，想必这可能是做小官，或在京师任职，抑或是小差使或差役者之统计？今已无从探索。而能从《金门志》寻找到的除洪受外，尚有明洪武年间的洪敏，时任南京国子监助教，但其存世资料很少，无从考证，只能假设：洪敏、洪受应是同村、同宗的国子监助教。

与洪受同时期的尚有洪兴周、洪石朴两人并以诗名。因为年代久远，文献无考，无从探究，因此推断：他们四位应同属西洪村的洪氏族亲。《金门志》载：“兴周尝至常思岭，与一狂士论文，咆哮不上下，请焚香分韵为诗。兴周振笔疾书云：‘行到尚书岭，无端忆故山，乌飞青幛外，人在白云间。翘首观天近，伤心去路难。纷纷名利客，不若走僧间。’狂士乃为折服。”译意：走到尚书岭，联想起故乡金门，眼见鸟儿飞出青山之外，自我恍惚随之置身在白云间。抬头望着蓝天好似近了些，低头感伤此去一路艰难。看到世间为逐名夺利之人真辛苦，倒不若像寺庙的老僧那般清闲悠哉、与世无争，更适人意。

洪石朴好作回文诗，直夸既佳，倒诵亦妙，可以倒背如流。其诗曰：“熏风拂石枕窗南，酒兴诗随笑语谈。云挂暮山青泼墨，雨含朝水碧拖蓝。芹香野掠于飞燕，叶尽霜经既就蚕。婚嫁已还生债负，身闲一世老贫甘。”译其大意：南风轻拂石间徐徐，送到枕倚在窗前的我，趁着酒兴我吟诗赋词笑语漫谈。浮云飘挂暮色山头，有如青色泼墨的山水，雨滴掺和朝露像是碧绿泼写的画卷。芹草芳香弥漫四野，可看到飞燕来到，叶落霜临是蚕儿育茧时刻。儿女俱已婚配完成，了却此生所负之债责，无事一身轻，即便到老苦也甘愿。

从洪兴周与洪石朴的诗词，可以觉察到二位先贤乃文雅风趣之士，谅必是与洪受同宗族亲，共同文雅之好，不但可就近互相照顾、相互砥砺，互补长进，亦可为斯时文人雅士之榜样。也可发觉到兴周与石朴会是属于悠闲雅士，自得其乐且又是自负之人。而洪毕竟是身为京师国子监助教，对他们西洪村的族亲也有启发文学之辅。

### （二）蔡肖兼、李振南、陈遵江

洪受在《沧海纪遗》成书之前有感：“今读邑旧志，遗逸者甚多，每握腕而不能自已，乃知古人有沧海遗珠之恨，良有以也。夫作于前者，固后人兴起之攸资，而遏迭前光亦岂山川秉灵之意哉，且逮置之备于昔者，今也废坠而不存矣！不谨书而详志之，将孰表维之耶？往与同志谋为别纪而未果，兹在京师适有所感，而蔡君肖兼[①]李君振南、陈君遵江，皆语彦也，遂以其事嘱余，余力虽不逮，幸三君可与讲议也。乃至孟夏之日，构思草刻，以俟君子。”洪受自序文中的蔡君肖兼，即琼林蔡贵易，于是年秋登进士，至于李振南、陈遵江，俱系别字，《金门志》无可考。在隆庆二年（1568），金门中举人的有丁卯科李明科（李厝人）及与蔡贵易同中甲子科举人的陈荣祖，很可能是此二人。此时洪受已在北京国子监任教，而他们三人是京城参加会试。但试后放榜，只有蔡贵易登科进士。

洪受在自序文中叙及与蔡肖兼、李振南、陈遵江三人关系，同在京府，会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同是金门人，倍感同属乡亲之情的可贵，与之谈起著书《沧海纪遗》构思，获得一致的认同与支持，加

① 蔡君肖兼，即蔡贵易，蔡献臣之父，金门平林村（今琼林村）人。

深了洪受致力成书的动力。显然洪受在他们四人中，是年岁稍高长的乡彦，能在京师相会，在“人不亲土亲”的心境下，又兼皆为有学之士，大家共商家乡事，自然产生了兴致与动力，促使洪受的《沧海纪遗》撰述更具信心与力量，由他们的鼓励与相助，也增加了《沧海纪遗》书涵的深度与广度。

## 四、各类著述

### （一）《四书易经从正录》

洪受的文学著述有《四书易经从正录》，原书已佚。今从《同安县志》艺文目录采入。

### （二）《沧海纪遗》

《沧海纪遗》十卷，是书成于隆庆戊辰二年（1568）五月，为金门有方志之始，内分十记。[①]厥后有清代贡生黄锜，又纪明末科目以补之，民国后，曾收入上海中国图书有限公司之明清笔记小说丛书，由中华书局发行。洪受最著名的著作即是《沧海纪遗》，是最早的金门纪遗类著作，开创金门地方志的先河。洪受感叹：“读邑旧志，遗逸者多，每握腕而不能自已，乃知古人沧海遗珠之恨，良有以也。”因而动念纂述家乡文献，遂发愤撰述《沧海纪遗》。[②]明代时金门隶属同安，早前所撰的《同安县志》，对金门的相关记载，却是寥寥无几，让洪受觉得有“沧海遗珠”之憾。洪受很早就有为金门写别纪的构想，但却缺少助力。后来，他在京师遇到蔡贵易、李振南和陈遵江等金门同乡，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协助，才开始将理想付诸实现，《沧海纪遗》成书于隆庆二年（1568）。因部分内容佚失，后世曾加以补述，才成为现存可见于世的书样。清人黄锜就曾增补过《沧海纪遗》。洪受将金门岛上的山川名胜、民风习俗、词翰精华等各种史料，加以搜集纪录，希望让将来的郡邑之志或国家之史，有所取材。在其《自序》中指出：

> 同安背山面海，为县治；而海中之山，可居者有五，浯洲其一焉。浯之生齿，盖在万计也。我国家之建置，为千户所者一，为巡检司者四。其所以捍卫边圉，奠厥民居者，亦云备矣。二百年来，休养生息，教化涵儒，人才之生于其间者，访荐辟、登科第、起岁贡、而育黉宫者，彬彬甲于上都矣。然民风俗尚，多从简朴，而无市井纷华之弊。其于不二之老，宏博之儒，贞烈之女，亦在在可数焉。余读邑旧志，遗逸者甚多，每握腕而不能自已，乃知古人沧海遗珠之恨，良有以也。
>
> 夫作于前者，故后人兴起之攸资，而遏佚前光，亦岂山川秉灵之意哉。且建置之备于昔者，今也废坠而不存矣！不谨书而详志之，将孰表孰为之耶？往与同志谋为别纪而未果，兹在京师，适有所感，而蔡君肖兼、李君振南、陈君遵江，皆浯彦也，遂以其事嘱余。余力虽不逮，幸三君之可与讲议也。乃于孟下之日，构思草创，以俟君子一曰《山川之纪》、二曰《建置之纪》、三曰《人才之纪》、四曰《风俗之纪》、五曰《宾祀之纪》、六曰《本业之纪》、七曰《物产之纪》、八曰《灾变之纪》、九曰《词翰之纪》、十曰《杂纪》；列图于后，以便览焉。[③]
>
> 隆庆戊辰五月
>
> 浯洲洪受凤鸣自序

蔡献臣是同安壬子县志的修撰者，他对洪受的沧海遗珠之憾，心有戚戚焉！因此，在后来的同安

①《金门县志》下册，金门县政府印行，1992 年， 第 1545 页。
② 郭哲铭：《名山功成继往开来》，《金门日报》2010 年 1 月 1 日。
③ 洪　受：《沧海纪遗·自序》。

县志中，把许多金门的山川人物之奇，编进了县志。洪受自幼就有奇才之誉，但在科举考试中，却没能金榜题名。他认为，金门的山水虽奇，真正奇特的，却是人才辈出。因为在他写成《沧海纪遗》之前，金门就已经在福建乡榜中缔造过“一榜七士”的纪录。不过，在洪受身后，金门还有蔡献臣等五人，在万历十七年（1589）缔造了一榜五进士的纪绿。用洪受的标准，那更是奇中之奇。洪受虽然没有在科甲中登第，但他所撰的《沧海纪遗》却是金门志的“鼻祖”，当今的金门志，均有采录自《沧海纪遗》之文献素材。他对金门历史的贡献和重要性，并不亚于金门历代有官阶的读书人。

《沧海纪遗》全书凡有十纪并列图于后。每纪之前尚有“小引“，说明纂录之意。“山川”篇约占全书18.23%，但蛀蚀得相当严重，“建置之纪”，占全书9.41%，略论浯洲所属行政阶位、沿革，以及在其中所设官司现状，文末检附洪受亲撰的《水债不宜入厦门》《巡检不宜居县坊》《浯洲书院宜兴复》等三篇文字。第三篇“人才”则是该书篇幅最大的一样，占全书35.29%。但今日所流传版本有大篇幅为明末科第，是清代汶水贡生黄锵所增纪。第四篇“风俗之纪”，占全书比例3.53%，其中忠实记载了明代中叶浯洲的岁时节令，与风俗礼仪，包括冠礼、婚俗、丧俗、学仪，以及岁令风俗，相当珍贵。[①]

第五篇为“宾祀”，篇幅占全书2.35%，内容则为记述乡饮之礼和乡贤祭祀，这两种典礼具有敦风化俗之功。第六篇“本业之纪”，占全书2.35%，记载岛上的生计产业，也提到浯洲的风沙之患。第七是“物产之纪”，是篇幅最短的一章，仅0.59%。第八篇是“灾变之纪”，占全书4.7%，洪受撰写此篇主要的立意，是要执政之人，了解浯洲受倭患盗寇之苦，故纪“丁未纪事”和“庚申之变”。前者是嘉靖二十六年（1564），朱纨备海靖边的防戍工作，后者是嘉靖三十九年（1559），倭寇掠寇浯洲三都震动之事，字字血泪，详实叙述了金门饱受倭寇、海盗掠夺之苦，先人生命财产遭受浩劫，令人不忍卒读。第九篇“词翰之纪”，篇幅占全书21.17%，乃是洪受搜集明代当时文人的作品而成。第十篇，“杂纪”，篇幅占全书2.35%，主要用意在于“备遗”，记录一些较为传奇、或在士大夫眼中，比较无法登堂入室之事。因取舍间失之于个人主观，故以杂纪记之，对于当时金门的社会动态、文史纪载，相当可贵。

### （三）太武岩十二奇志

浯洲称海国，中有太武山岩[②]，亦奇观之所萃也，齐谐志之矣。浯洲（金门）是四面临海之岛，岛之中挺起的山即是太武山，这里的山奇景观是华萃之所在，古代有许多地志之书，对太武山的美景早有记载。

> 醮月、蟹眼、名曰奇泉；眠云、夸鳌，名曰石奇。以灵奇，则日倒影塔、玉几案；以幽奇，则曰古石室、石门关。其他千丈之壁，一览之亭，与夫风动之石，偃盖之松讵非种种称奇耶？愚闻山之奇也，以物；物之奇也，以人。如清源、紫帽奇矣！得虚齐、紫峰而奇始彰。鸿渐、三秀奇矣！得次崖、苏槐而奇益显。大抵奇于人，不奇于物也。如以物论，则一石之怪，一壑之幽，大孰不以奇称。彼松亭者，固昔日之奇也，而今安在哉？故论武峰之奇胜者，当日勒石赋诗，少鹤丁公为山发一奇也。而桂峰之精构，奇益争而胜矣！以至一榜七士，复榜八士[③]，天下真奇，孰大于是。

① 金门县宗族文化研究协会：《金门古典文献探索》，金门：金门县文化局，2011 年，第 42–43 页。
② 太武山岩：《金门志》作“太武岩”。
③ 复榜八士：万历十六年(1588)戊子科一榜八人有：蔡献臣、蒋孟育、赵维藩、陈基虞、黄华瑞、黄华秀、吕大楠、张继桂等八人中乡试举人。

而余少浪得奇材之誉，无能继群公之奇迹，不亦落寞否？而搜奇括异，欲抒山川之毫端，亦云奇在此，而不在彼也。探奇者，当自得于物外，自非大观，鸟能腼此。是为志。

### （四）咏太武山十二奇景

太武山“海印寺”位在金湖镇太武山顶，是岛民膜拜的圣寺。相传建于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岛上林木稀少，从福建沿海眺望，太武山隆起的山阜，由东延展到西，像一位偃卧的隐士，状似仙人卧地，以此称颂金门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宝地。太武岩位在太武山顶幽谷，自然也就是一座赋有天地灵气的庙宇，太武山的十二奇景，就当时的情境，洪受以他精湛的诗文，将这十二奇景注入诗文，使景色与诗文相结合，更显灵气。

1. 海印岩

上下波光迥不穷，翚飞太武印其中。龟毛兔角三千界，老纳收来跨海东。

海上水波映射光影，上下截然不同，雄壮秀丽的太武海印刻入其中。有名无实的空幻大千世界，老僧尽览横跨在于海东的胜地，其意乃是佛家用语，有名无实的空理，三千界与海印岩佛寺有关的佛家用语，即是宇宙间的大世界是在大千世界之上，出家修佛，大凡世界四大皆空。

2. 玉几案

策紧芒鞋经几遭，主山低处案山高。莫嫌履坦无多法，月里锄泥玉满蒿。

穿上草鞋加快脚步，尚不知走了多少趟，到了这主峰低迴案山突起之处，不需嫌说沿途平坦便无特别之处。在黑月里，利用月光之下锄泥翻土，但见明亮皎洁月光，映照着山道夜景。

3. 浸月池

山岚未尽月期初，汲水耀金孰欠余。意气相将今夜赏，须弥跳入广寒居。

山岚尚未散去新月初上之时，像池中取水但见耀眼金光，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意兴气昂就在今夜饱赏景色，遥想由须弥山巅上，跃升进入月宫广寒居住。

4. 眼云石

孤峰顶上待风雷，静里阴晴知几回。身世由从一短睡，何劳问法点头来。

独矗孤立在峰顶上冒风顶雪，横倚在宁静深处望晴见雨。论起身世恍若一场梦境，又何须高僧讲经点化。

5. 偃盖松

根深固蒂历春秋，长护灵阿守白头。意气不嫌风雨恶，神情懒向荆棘留。

根深蒂固经历无数春秋岁月，长年护持灵山直至白头不悔。其气概不畏风雨险恶阻挠，神情依然俊傲焕发不顾荆棘难处。

6. 跨鳌石

跨鳌石兮石跨鳌，登山航海任游翱。世人不识他心乐，只手携来落一毛。

跨鳌石啊石跨鳌，上山下海任其游翱。世间人们不知它心中之快乐，只凭个人揣见难窥其全貌。

7. 石门关

历偏风尘既足还，峰头依旧石为关。可邻半夜未归客，伸手无从露一班。

走遍尘世犹仍赤脚返还原处，山顶峰处依然石门当关。可怜那些深夜未归的人，无从伸出手却感受到石门关所带来的温情。

8. 蟹眼泉

凝云攒不映流虹，化雨随风到海东。无数鱼龙沾残润，偏留蟹眼夺天工。

云朵凝聚于群石堆累处，辉映现出一道流动的彩虹，之后化变成雨滴，随着风飘降落在大海的东缘。无数的鱼龙尽得分沾残润，更留下了这巧夺天工的蟹眼泉源。

9. 倒影塔

笔尖撑破太虚空，影落寒江何处逢。可是化龙踪迹隐，月明孤屿照鱼翁。

笔尖撑破了穹苍的天空，倒影映落寒冷江面，要何处得能相逢。这可又是鱼儿化龙，所以匿隐踪迹，只有见到明月孤岛，映照着渔翁垂钓。

10. 千丈壁

壁立千丈意气昂，白云深处露锋铓。丈夫自有冲天志，休向女流新俗妆。

高壁矗立千丈极显昂扬意气，直到白云深处才现锋芒锐气。男儿自有凌宵冲天大志向，不可像一般女子，只知道追求时尚的妆扮。

11. 古石室

天生高士构蜃台，铁壁银山绝往来。何事关心关不住，长余日色映苍苔。

这一座先天形成的石室，好比是高士构筑的海上蜃台，有如斧削的峭壁，阻绝了外界铜臭世界。有什么关心的事而总是关不住，只有那长年日照不到的，生长青苔的地方。

12. 一览亭

东西南北绝玲珑，万象森罗在眼中。有佛不留无应去，圣凡今古自同风。[①]

无论东西南北，到处均是绝色，玲珑有致。大小事物各种现象，也皆森然罗列在眼前。有佛不留佛自离去，自古圣贤、常人自应一同风范。

洪受在文学的著述无法探索，从以上十二奇景的诗文中可以了解到其人才学倘佯在自然的境界里，走笔成文、贴近自然的景致里，使事物文体相得益彰，从文理上看，可以肯定是饱学之士。

### （五）光州固始辩

洪受在《沧海纪遗》序文言：

夫闽以光州为祖者，盖相传谬也。[②]虽亦有之，而未必其尽然也。余读《五代史》记唐末群盗起，有寿州王绪者，攻陷光州，而为其州刺史，以审知之兄王潮为军校。时蔡州秦宗桧、宗权，会王绪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攻之，率绪众南奔，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绪性猜忌，潮与前锋将谋杀之于南安，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至，耆老相率遮留，潮引兵团彦若，逾年克之。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后，潮遣审知攻败之，晖见杀。唐以潮威武节度使，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审知卒，长子延翰立，以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禀为福州刺史。钧，审知次子也；禀，审知养子也。二人谋杀延翰。翰死而钧立，子继鹏杀之。鹏立无道，控鹤都将连重遇[③]，迎延义立之。义立而鹏见杀。义，审知少子也，复为重遇所杀。义杀而延政立。政，喜审之子也。以建州建国。南唐李景破之，遂降南唐，迁其族于金陵。泉州军将留从效，亦降南唐，景以为清源节度使，是岁景之保大四年也。

夫审知未入闽之初，闽之人民盖亦众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观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审

①《沧海纪遗译释》,《金门古书新译释》，金门县文化局，2008 年，第 207–209 页。
②“夫闽以光州为祖者，盖相传谬也”,《金门志》作“夫闽祖光州为，相传之谬也”。
③“连重遇”,《金门志》作“连重迈”。

知既入闽，至于漳浦，始云有众数万，则前此之众盛未可知矣。今全闽郡县，上自大夫，下至黎遮，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间或有之，亦审知之子孙，与其士卒之余裔耳：然保大之际，且于迁于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末[①]，而谬相沿袭耶？故君子以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余概夫时俗之不察，故耆之以附于此。[②]

（六）杂记

天下之理，“正”而已矣。其不在乎正而错举者，皆“杂”也。以“杂卦”终焉。是故“人材之纪”正矣，而亦有不以人材纪者；“宾祀之纪”正矣，而亦有不以宾纪者。至于“风俗”“词翰”之类，是非邪正之间，若郑雅、紫朱之不可以一概论，故以“杂记”记之。

天下间的道理只有“正”字一个，其他不纯正而错置的都算是“杂”。古代圣人删修制订《诗经》，不保留变之与淫音。传撰《易经》，均将杂卦放在篇末。因此，本书“人材之纪”是正体，另有非人材加以传述之人；“宾祀之纪”是正体，而还有不以宾祀加以传述之人。至于“风俗”“词翰”之类，是介于是非邪正之间，不比郑雅、紫朱，那样泾渭分明，且不可混为相提并论。故以“杂记”加以记载登录之，延今传文之作亦同。

（七）后述

太史公作《史记》，有“本记”“年表”“世家”“列传”诸类，予独以“纪”言之何也？曰：“国史有礼，以垂宪也。郡县之志，不可以仿史，余乃琐言余录类耳，敢以仿史耶？不敢以仿史，而何《史记》之云。纪者，记也识也。记其事而识之，辛桑之乡，亦各有志焉。”嗜观《豳风·七月》之诗，所陈者皆农夫女工之事，而尤致意于眉寿之老。[③]

太史公作《史记》，有“本记”“年表”“世家”“列传”等类别，您为何只有用“纪”这种体裁来传述呢？我回应说道：国家史籍有其制度，也是要留有传授典范。地方府县之志，不可作以仿效国史体式，而我更只是记字？既然不敢仿效国史体式，又哪有所效法《史记》之类的话。纪字就是记载，也是记忆。记载以往之事同时加以回忆，希望所有人的家乡事也都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志记录。我一向喜欢读《豳风·七月》这篇诗，其内容所陈现都是农夫女工之人物，其中那些当官之人，固然可以寻觅整理资料而了解其事迹；但那些贞节烈女、年高德劭默默无闻之人，也是相当的多。可以见到当时洪受对金门家乡的文史记载，相当重视，特别在贩夫走卒、老弱妇女更需要有地方志的记录，才有《沧海纪遗》一书的成册。

## 五、洪受著作评价

洪受的文学著作，由于年代久远，仅在《同安县志》有《沧海纪遗》十卷，计有五种版本，现存三种版本，均源自《金门文献丛刊》本，《四书从正录》见于《同安县志》，但书已佚，无传。又《易经从正录》在《同安县志》《金门志》均登入《四书易经从正录》，但是书已佚，无传。因此无从查获。当时的金门是海中孤岛，洪受在求学、任教期间，均在岛外的内陆，更是求存无着。仅就现有的《沧海纪遗》，在地古迹遗存的诗文资料，作为文学评价的依据。

① “本末”：《金门志》作“本始”。
② 《沧海纪遗译释》，第 235–237 页。
③ 《沧海纪遗译释》，第 245 页。

### （一）《沧海纪遗》的评价

金门之有地方志，始于明代隆庆年代间，洪受撰著的《沧海纪遗》，他在教授生涯中人称“大师”，且位至国子监助教，若果没有高深才学，是不能出任此职。《沧海纪遗》撰记于明隆庆二年（1568），旨在补正斯时同安县志，对金门记载之不足与充实。因此才有“沧海遗珠”之意。《沧海纪遗》一书，对金门文献的记载考据，有不朽的开创之功，亦可说是书为《金门志》提供最实受的文献资料。该书最大特色是一部明代史料，该书几乎相似于明代浯洲（金门）史记。与地方史志、论古说今、地方史料贡献良多。浯洲（金门）在民国四年（1915）以前，归属在同安县或马巷厅[①]，而府籍上属于泉州府。所以一直以来，浯洲（金门）是依附所属，没有自主的地位与意识上的自觉，与同安县或泉州府城是有所区隔，毕竟还是一座孤立的海中岛；对外浯洲人仍自称是“同安人”或是“温陵人”[②]。因当时环境因素、人物交往等原因，是不得不取用“泉州府”“同安县”之属。

从1368年《沧海遗纪》到1682年《金门志》历经林焜熿、林豪父子两代经营，历314年，《金门志》于清光绪八年（1882）刻印付乡梓，板藏于浯江书院。然而，这珍贵史迹资料，均得归功于明代洪受的开卷，才有清代黄锺先贤著书文史采实大功。

金门县文献委员会标点本《沧海纪遗》一书于1969年出版，由王秉垣、李怡来两位先生加以标点，用新式标点符号点校而成，为现今通行最广之版本。[③]该书成版虽然没有再加入其他资料，但其对金门文献继起之功不可抹灭，并于1969年由金门文献委员会出版印行，并列为《金门丛书》之二。

台湾古籍校释本，乃采用由吴岛以金门文献委员会王秉垣、李怡来两位先生标点本为基础，作部分注释，并加以《金门志》相关材料缀补而成[④]。其中还有引用其他史料编纂了《浯洲八景表》《浯洲潮汐表》《金门建置沿革表》《金门历代荐举表》《闽年号表》《金门古今地名表》《明代职官表》等，由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于2002年成书。洪受的《沧海纪遗》其文学评价则受台湾古籍出版社高度的肯定。

### （二）“太武山”得名

太武山之得名，有洪受《沧海纪遗》云：“浯洲……其盘郁峻拔而中起者，为太武山，自麓俎顶，盖十余里，岩岩之势，皆积石也。近观之，则群石团结若兜鍪状，故以太武名。其纷纠萦纡若印章篆刻，亦谓之海印。昔人有句云：‘要知海印分明处，一点青山下大江’。越江望之，则又见修然若偃卧之形，故俗谓之仙人倒地。”洪受又云：“太武山雄伟庄厚，独冠屿上，海上人别呼为仙山。”[⑤]在金门居民心目中视为“大山”（即太武山）。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岛民均会登“大山”上的海印寺膜拜，祈求合家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洪受《太武岩十二奇志》一文指出：太武山有十二奇胜，分别是：

泉奇：蘸月池、蟹眼泉。

石奇：眠云石、夸鳌石。

灵奇：倒影塔、玉几案。

---

① 清乾隆四十年(1775)设马巷厅，金门隶属。1912年撤马巷厅，金门复归同安县管辖。

② 温陵：即泉州别称，如：明代金门的士大夫对外习称自己是郡属温陵人，籍是同安人。例如黄伟人称“温陵十子”。蔡复一、蔡献臣在撰文刻书均用“温陵蔡复一”“温陵蔡献臣”。许獬，人称“许同安”。至清代中叶以还浯洲人环境意识抬头，始少用“温陵”与“同安”，并开始用“金门”自称。

③《金门古典文献探索》，第45页。

④ 吴岛校释本，于《山川年纪第一》及《物产之纪第六》两篇补入较多。见《金门古典文献探索》，第45页。

⑤《山川之纪》第一《抚院诉词》，《沧海纪遗》，第1–2页。

幽奇：古石屋、石门关。

其他：千丈壁、一览亭，风动石、偃盖松。[①]

实际上风动石也可列入石奇，后人又增海印寺、羊肠路、万顷田、步云梯、励房石诸胜。[②]清道光年初林树梅搜访古迹，续得六景，撰《太武山十八咏》，比洪受又多了海印岩、瀑布泉、羊肠路、仙人迹、万顷田、步云梯等六景。[③]金门古来先贤均有摩崖诗，刻书在太武山成石碑，期能长保永志。之所以如此，是继承了洪受的文学传统。洪受的才学书成美化了太武山十二奇景的诗词，先行后效，引致金门若干作家对金门类似景点深情歌咏。如，清林树梅效法洪受的《咏太武山十二奇景》添撰了《太武山十八咏》。

## 六、结语

金门之有地方志，始于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洪受最著名的著作《沧海纪遗》，是最早的金门遗迹记录书，且开创了金门地方志的先河，被誉为《金门志》地方文献史料的鼻祖。另著有《四书从正录》《易经从正录》，可惜书已佚无传。嘉靖乙丑（1567）年，洪受以贡历国子助教，夔州通判，卒于官。至于他的家世后裔，从史迹、《同安县志》《金门县志》中，都无从考证。洪受的文学创作、宦途事迹等有待后人再继续探索研究。

观诸洪受对家乡的关照厚爱，建议朝廷对金门的建设、防备与布设阵营，以致提议金门为泉、漳门户要塞；又周详到澎湖的设防、军中的调防与职责的严明赏罚，历历细诉其中。对于当时金门的书院设置，家乡学子的修习书文更是重视。

洪受不但是杰出文儒，亦是文才武略兼具的文学作家。从《沧海纪遗》到《金门志》，是金门有史料之始，洪受身为金门人，创始金门史志的一大功迹，足为后人效法与敬仰。

①《词翰之纪》第九《太武岩十二奇志》,《沧海纪遗》，第 62 页。

② [清]林焜熿:《旧事志・丛谈》卷二,《分城略・山川》,《金门志》，第 9 页。文中所增诸胜亦列“风动石”，但洪受《太武岩十二奇志》一文本已有列入。

③《顾云诗编校译》，见《台湾诗编校译》，2005 年，第 3–6 页。

# 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略论

陈　炜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蔡献臣（1563—1640），福建省金门县人。金门琼林蔡氏是一个科举世家，蔡献臣的祖父蔡标是琼林蔡氏第一位举人，父亲蔡贵易是第一位进士，蔡献臣万历十七年（1589）以二甲第六名中进士，官到光禄少卿。这个科举世家对科举情有独钟，通过姻亲、交游，蔡献臣在各种人际交往中织就了一个科举人事的关系网。蔡献臣的哲学思想中年之后推崇王阳明“致良知”说。在文学思想方面，蔡献臣认为作文作诗，要学会作人；诗古文与制义相通；诗人应当积极入世，作品不可遗落世事。蔡献臣一生著作甚富，诗文集《清白堂稿》十七卷，有崇祯刻本，此书流传不广，不太引起研究者注意。池显方评蔡献臣诗“明净高远”，可概括蔡献臣诗歌的风格。

**关键词**：明代文学；闽学；蔡献臣；《清白堂稿》

今天的金门岛，明代称浯洲屿。其地理位置在今厦门岛以东、大小嶝岛、角屿之南的洋面上，退潮时最近处距小嶝、角屿二千米左右。明代浯洲屿文风鼎盛，出过二十来位进士，如果加上原为浯洲人、后以其他县籍考上进士的，则有近三十人之多。明代浯洲进士最有代表性的，有会元许獬、云南布政使蔡守愚、少司马蔡复一、光禄少卿蔡献臣等。

琼林蔡氏自五代时期迁至浯洲，传至十七郎者始居平林。从十七郎传至第十四世，出现了第一位举人，就是蔡献臣的祖父蔡标。标，字宗德，又字懋修，号兼峰。蔡标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53）[①]。嘉靖三十年（1531）辛卯科举人同安中式七人，蔡标为其一。对琼林蔡氏来说，蔡标是这个家族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现，开启了琼林蔡氏科举仕途的时代。

琼林蔡氏第十六世、蔡标之子、献臣之父蔡贵易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进士。贵易（1538–1597），字尔通，号肖兼。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乡试，隆庆二年(1568)成进士，授江都令。母丧，隆庆五年（1571）服除，补崇德知县。调任南京户部陕西司主事。出知宁波府，迁贵州按察司副使、督学。万历二十一年(1593)，晋浙江按察使，万历二十三年（1595），罢归。

蔡献臣（1563–1641），字体国，号虚台，明福建同安县浯洲平林（今金门县琼林村）人。为避倭寇侵犯骚扰，献臣父举家由浯洲迁居到同安县城，献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万历十六年（1588）成举人，十七年（1589）联捷成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名。授刑曹，渐迁湖广按察使，罢归；起为浙江海道，升浙江副学使、光禄少卿。贬官归，居同安城南近二十年。卒，赠少司寇，赐祭葬。蔡献臣墓在今厦门市同安区前街后山。墓碑楷书“皇明赐进士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前尝镇兵备按察使浙江提学副使虚台蔡先生暨诰封淑人池氏墓”[②]。墓前有两副对联，一曰“立朝屹如山居乡清如水真乾

**作者简介**：陈炜，男，福建金门县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蔡标生卒年史无明文。按：蔡献臣《旌表庶祖妾贞节杨氏传》：“年二十四，王父讣自京师，号痛欲殉者数矣……生嘉靖丁亥，卒万历甲申。”（《清白堂稿》卷十七）杨氏生于嘉靖六年（1527）丁亥，杨氏二十四岁，即嘉靖二十一年（1553），是年蔡标卒。

② 尝，本当作“常”，避明光宗常洛讳。

坤正气能绍往开来为江南之夫子，宅心温似玉接物煦似春堪砥砫中流使民思士仰称斗北之一人”；二曰“识远才闳持论每依名节，志芳行洁任事不避怨劳”。今存。

献臣族兄蔡守愚（1552–1621），字体言，一字发吾。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次年成进士，殿试二甲第十三名。授南祠祭司主事，日与汤显祖等吟唱，汤显祖有诗赞之，以为“每当高宴出才情”[①]。可能受守愚的影响，并经其引进，蔡献臣进入南都诗人的圈子，参与酬倡。守愚官至云南布政司。

献臣妇为嘉禾屿（今厦门岛）池浴德女。浴德（1539–1617）[②]，字仕爵，号明洲。嘉靖四十三年（1564），浴德与献臣父蔡贵易同举乡试。同乡同年，池、蔡两人意气相投。次年，乙丑科浴德成进士。贵易成进士晚浴德一科，即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门当户对，后来献臣娶浴德女，颇为顺理成章。浴德初授浙江处州遂昌知县。“民有讼，一毫纸锾不输官，只袖米半升往返，民称‘池半升’。”[③]擢南宫考功，转北吏部稽勋司。万历八年（1580）大计，转郎中，后晋奉常奉使还家，遂家居三十七载。有《空臆录》《怀绰集》《居室集》，诗深厚如初、盛唐。

蔡献臣妻弟显京、显方。池显京（1563–？）[④]，字致夫，号念苍，浴德嫡配傅氏所生。蔡献臣与显京同年生，献臣月份稍大，故称显京为内弟。显京自幼与蔡献臣为文友。万历十九年（1591），显京移居郡城泉州，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举人，时已四十七岁。显京授和州知州，忤巡按，劾罢。起补湖州通判，转怀庆同知。后以督运，因兵事阻艰稽期，削籍；染眼疾，寓建州年余，归家一年，卒。“显京善文章，精草隶，画犹绝伦。晚喜禅学。三任皆腴地，而袖风载月以归”[⑤]。有《迈征堂诗义》。池显方（1588–？），字直夫，号玉屏子，显京弟。卒于明清鼎革之后。显方长身玉立，秀致云流，在海隅穷岛中可谓鹤立鸡群。天启四年（1624）举应天试，上春官，不第。参禅乐道，结庐玉屏端山。曾与钟惺、谭元春唱和，海内名辈董其昌、汤显祖、何乔远、张燮、曹学佺、黄道周皆折节与之交，尤与同里蔡复一称莫逆。显方有庵名“淡远”。有《玉屏集》《南参集》《淡远诗集》《晃岩集》等。

蔡献臣四子：蔡谦光、蔡甘光、蔡学光，蔡穌光。

蔡谦光(1585–1636)，字裒卿，号六吉，蔡献臣长子。谦光年十六岁，献臣以其文示同寅，莫不击节；谦光归闽就试，屡列高等。闽闱不利，改南雍，复改北雍，皆不利。谦光筑室南郊，攻诗书画。卒年五十二。有《干云斋诗初集》，池显方为之序。蔡谦光诗与献臣风格不同，献臣诗“明净简远”，谦光“娟秀高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即一千多年前曹丕说的“气”，虽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谦光娶福建漳浦林士章孙女、汝韶女为妇。林士章（？–1611），字德斐，号璧东。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名。官终南礼部尚书。林汝韶（？–1607），字君纶，号光璧，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浙江参议、广东徽宁兵备。后移居漳州城北长桥土城。

蔡甘光，字稼卿，一字雨卿，号雨人；原名定光，字静卿，号岂夫。蔡献臣次子。蔡甘光生卒

① 汤显祖：《送蔡体言仪部入都》，《汤显祖集·诗文集》卷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新一版，第 356 页。

② 蔡献臣《池岳母傅宜人七十偕寿序》：“岁壬子，宜人年登七裘，而岳翁奉常公七十有四。”（《清白堂稿》卷六）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年七十四，逆推，池浴德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蔡主宾《蔡献臣年谱》考订池浴德卒于万历三十六（1618）戊午，误。池显方《告叔父鹭洲文》：“丁巳冬告别父奉常公。”（《晃岩集》卷二十），明确说，浴德卒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池显方《先奉常明洲府君行略》：“嘉靖己亥十一月初九夕，先宜人梦青龙饶室，越日而府君诞……年七十九犹矍跃。”（《晃岩集》卷二十）池显方《先妣慈惠林太孺人行状》：“丁巳违太府君。”（《晃岩集》卷二十）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亥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十九。

③ 池显方：《先奉常明洲府君行略》，《晃岩集》卷二十。

④ 蔡献臣：《寿内弟池致夫和州守六十》，此诗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六十。逆推，显京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⑤ [道光]《厦门志》卷十二《列传·宦迹》。

年不详。甘光读书不怎么刻苦，甚至自暴自弃，无心向学，沾染豪奢的坏习气。蔡献臣作诗教导他，以为立身必须谨慎，先师有明训，男儿应当不断进取。天启元年（1621），蔡甘光为岁贡生。南明永历年间，授监纪推官兼摄佐贰。有《恢斋近草》，舅氏池显方序之，以为甘光诗文之体数变，近来又别出心裁，诗以淡为主。池氏认为品诗首雄浑，冲淡次之。甘光当前忙于应酬，淡尤难。诗之淡，有陶渊明之淡，此为上；等而下之，则晚唐幽寒峭削，淡而不冲，故不可学。池氏此文，引导甘光往雄浑的方向发展，似也有规劝其杜门谢客，盘餐应酬之意。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仅记其娶陈氏、张氏，余不详。

蔡学光(1597–？)[①]，字敬卿，号壮如。起北京监生，授恩贡。蔡献臣三子。学光行冠礼时，蔡献臣写了二首《训学儿加冠》诗勉励他：珍惜光阴，努力攻诗书，砥砺青云之志。蔡献臣对他寄于厚望。蔡学光娶晋江丁启浚女为妇。丁启浚（1569–1636），字哲初，一字亨文，日造之子，福建德化籍，晋江人。启浚母，为明代著名散文家王慎中女。启浚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与献臣同榜；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晚献臣一科。由司理晋吏部郎中，又升南京太常少卿，刑部侍郎。有《平圃文集》《平圃诗集》。启浚有诗名，交游较广，既与闽曹学佺等倡酬，又与漳州张燮等互有赠答。蔡献臣曾对丁启浚说：“予与公同举于乡，而学儿幸馆贰室，公教诲之如子。”[②]

蔡穌光，原名孚光。穌光，字中卿，号诤虎，贡士。蔡献臣四子。献臣对此子有所偏爱。蔡献臣年五十，有四男二女；“四男两女无金诒。”[③]此时，蔡献臣虽从三吴观察中谗归，子女双全，多子多福，乐在其中。蔡穌光娶大同巡抚张廷拱之女为妇。张廷拱（？–1633），字尚宰，号辅吾，同安县大嶝岛（1915 年金门建县，属金门县；今属厦门市翔安区）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怀宁知县，改丰城知县、迁安知县。天启年间，任祠祭司郎中，削职归。崇祯初复职，升佥都御史巡视大同。

蔡献臣二女，长女适晋江丁启浚之弟丁亨中。丁亨中（1584–1628）为启浚同母弟。

次女适金门陈基虞子元錞。基虞（1565–1642），字志华，号宾门，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次年成进士，与蔡献臣同榜。官南雄司理、广东按察司副使、南刑部郎中。《清白堂稿》卷一卷端署名：“婿陈元錞季和、外孙丁棟幼宰、陈涞同校阅。”献臣婿陈元錞，字季和。

总之，献臣家族是个科举世家，也是一个文学世家。

蔡献臣交游广泛，与己卯科泉州、漳州籍同年的交往尤其应引起重视。此科福建 31 人，泉、漳 22 人，而同安占 7 人，7 人中浯洲 5 人。[④]蔡献臣的诗文与同年进士，特别是泉州、漳州同年交游有较多记载。

姻亲、交游，蔡献臣在各种的人际交往中织就了一个科举人事的关系网，由此反映了这个科举世家对科举情有独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蔡献臣特别重视与闽南一带的科举人家的交往，其姻亲以同安县城为中心，向内是浯洲本岛，向外则扩大到泉、漳二府，都是闽南地区。方言相通，习俗相近；离自己所居地不太远，交通较便利也是一种选择。

蔡献臣的哲学思想近于王阳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思想，遭到墨守朱子学的学者反对，以为王学专知而遗行。蔡献臣认为“致良知”与《四书》是一脉相承的：“致良知一脉，直接孟氏

① 蔡献臣《壬子二月十一日初度放歌》：“学儿十六资太慵，童孚颇慧尤耽玩。”（《清白堂稿》卷十二上）。按：万历四十年（1612）为壬辰年，学光年十六，逆推，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孚，即四儿孚光。

② 蔡献臣：《少司寇丁哲初公六十一初度序》，《清白堂稿》卷六。

③ 蔡献臣：《壬子二月十一日初度放歌》，《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④ 己卯科进士浯洲人五人：蔡献臣、蒋孟育、黄懋贤、陈基虞、黄华秀，其中蒋孟育以龙溪县籍考中进士，黄华秀以南安县籍考中进士。

之传，而溯《大学》之绪。”[①]实际上“致良知”就是孔孟之学，“天下有不真知而能行者乎？”蔡献臣还认为：“夫致良知之学，是知行合一之学也。”[②]蔡献臣特地从《四书》中摘出部分与“致良知”之旨合者，编为一书，自撰序文，又撰后记，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蔡献臣先后作了《又和王阳明先生韵》《再和王阳明先生韵》《草萍又和王阳明先生韵》等诗，表达了对王阳明为人、功勋及学说的崇敬。

戊戌子科，蔡献臣名列闽闱第二，解元为晋江潘洙。次年己卯科蔡献臣以二甲第六名及第，潘洙则落到三甲一百七十二名。蔡献臣对潘洙非常敬重，以为己卯科“负文章经济之才志”[③]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王志远，另一位即潘洙。潘洙的制义作得很好，不负解元之名。但是他关于制义的意见与蔡献臣不尽相同。万历三十九年（1611）潘洙过同安城南与献臣会面，献臣出制义稿相示，潘洙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太正”，“文字须用逆势，不逆不奇”；另一条是“宜以题就文，不宜以文就题”。蔡献臣不同意他的评论，以为：“文以正合、以奇胜，然人各有能、有不能。余平平者，乌能奇？”制义文有平正，有逆奇，不可强求一律，意即自己的制义以平正取胜。他又说“余偶拈一题，辄尔落笔”，构思之后即疾书，“有漫兴便觉超逸”[④]。就是说，蔡献臣作制义时，并不去考虑以题就文，还是以文就题的问题，顺其自然而已，故其制义有超逸之致。我们知道科举考试，最看重的是时文，即制义文。凡是科举取得功名的士子，几乎都自矜其制义，蔡献臣也不例外，即便他博取功名之后，仍然乐此不疲。蔡献臣制义文集可考的有《玄白草》《诗经制义》《解颐草》《仕学全稿》，以及课生徒的《仰紫堂问业》等。至于献臣的序文多为制义而作，既有师友，也有生徒，多达二十来篇。浯洲岛制义，蔡献臣认为最佳者有两位，一位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甲进士蔡复一，一位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会元许獬，后继者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卢若腾。蔡献臣以为卢若腾制义“词缜理邃”，“谈事谈理，靡不自出胸臆，而斐然成一家言”。[⑤]

蔡献臣先后任职刑部、兵部、吏部、礼部。地方，则广东右参政、按察使、常镇兵备、浙江按察司巡海道、提学副使，经历丰富。生长海边、担任过常镇兵备、巡海道的蔡献臣，海防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提升兵船只制造质量。尽量改进造船用料，增强坚固的程度，延长使用时间，以提高对倭寇及海盗抗击的性能。二是对来犯的倭船，给予坚决的打击或驱逐。万历四十四年，倭船来犯，官兵战船出击外洋，倭奴披靡而去。三是在沿海建造铳城以备红夷。嘉靖、万历间防倭，万历后期、天启间备红夷。蔡献臣曾撰文建议在浯洲料罗、陈坑设置铳城。天启五年（1625）冬至六年（1626）春，“贼艘停泊料罗、陈坑间者，月无虚日，或入村焚舍，或登岸取水，或烧沉兵民船只。虽未大肆剽掠，然居民走匿山间，而渔舟废业矣。若使二地有城、有铳、有铳城，贼安敢尔乎”？[⑥]四是在《同安县志》特设《防圉》一志，分述“巡司”“御所”“储食”“水寨”“机兵”等海上防御诸问题。其中浯屿水寨设在浯屿还是厦门，当时看法不一，蔡献臣认为问题不在于水寨设在何处，关键是如何构建闽海一体的防御，看法比较圆融。

蔡献臣的教育思想也颇为丰富。任浙江提学副使期间，蔡献臣撰写《浙学道钦条演义行十一府》一册，对诸生提出十多条要求，诸如：未论做官，先论做人；读书者，将以开性灵、裕经济；孝子

① 蔡献臣：《〈浙江戊午同年齿录〉后序》，《清白堂稿》卷四。
② 蔡献臣：《〈致良知四书摘〉序》，《清白堂稿》卷四。
③ 蔡献臣：《〈王玄亭方伯集〉序》，《清白堂稿》卷四。
④ 蔡献臣：《仕学全稿·又题》，《清白堂稿》卷五。
⑤ 蔡献臣：《题文元卢海韵〈制义〉》，《清白堂稿》卷五。
⑥ 蔡献臣：《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铳城议》，《清白堂稿》卷三。

义夫、烈女节妇，纲常所与立；《四书五经》宗尚宋传，这是祖宗规矩；欲工制义，必先熟读经史；夫举业之文，其弊曰生、曰晦、曰堆、曰艰、曰突、曰太凌驾。至于学使的使命，蔡献臣说，必定秉公心、公道；学使专督学校，不管民事；学使的工作有其独立性，道内各役，不得有所干预。这篇《演义》较为全面地反映蔡献臣的教育思想。

文学思想方面，蔡献臣没有专门文章论述，各类文章谈及的也不多，但是从零星片断，仍然能够多少寻找其线索。首先，蔡献臣认为作文作诗，要学会作人，遵从先师即孔子的遗训。其次，认为诗古文与制义相通。要作制义，必须熟读诗古文；诗古文抒写怀抱，与制义名理也没有什么不同："郁郁诗赋与经义，皇家取士必须工。义闱圣贤之名理，诗写情事之襟胸。本根枝叶虽有间，八股八律将无同。更有命题长与枯，亦与歌行涩韵通。"[①]再次，诗人应当积极入世，作品不可遗落世事。他在给妻弟池显方的诗集作序时写道："比修业东山，益有味于陶之冲淡闲远，一切尘坋不留肺腑，故题其庵曰'淡远'，而诗亦以名。其得于抱膝长吟之外者深矣。予非知诗者，将何以进直夫？夫冲淡闲远，固禅性得之，然乃枯槁遗世者之所为，即和靖诸什亦以无怀、葛天自赞。直夫妙龄壮志，方当对大廷而履亨衢。"[②]池显方读书东山，诗风一变，以淡远为主，其庵亦名"淡远"，蔡献臣认为冲淡闲远，固得禅意，但是你正当壮年，切不可遗世作枯槁语，应当积极进取，对大廷而行之康衢大道。蔡献臣次子蔡甘光，著有《恢斋近草》，舅池显方为之序，以为"品诗者，首雄浑，次冲淡"，蔡甘光"门多车、坐多客，盘餐札墨之应酬"，诗如何可能"淡"？ 池氏此文，引导甘光诗往雄浑的方向发展，往关心世事方向发展，其实也是蔡献臣的意思。

蔡献臣一生著述很多，可考者有：《玄白草》《诗经制义》《解颐草》《同安县志》《仕学全稿》《仰紫堂问业》《勘楚纪》《仪曹二难存稿》《钦条演义》《致良知四书摘》《四书肤证》《清白堂稿》《四书合单讲义》《笔记》。除《清白堂稿》和《笔记》，都是制义、讲义之类。蔡献臣一生的注意力主要是在理学方面，诗古文似为理学方面之余事，而且应酬部分占了相当部分。这样说，并不是他的诗古文没有成绩。《海氛未戢亲闱系思恳恩予假以便归省疏》，因闽海海氛未靖，请假省亲，是篇很有特色的疏文。《发吾兄〈百一斋制义〉序》，由制义连带论及蔡守愚的诗，又由诗回论制义，文字不多，内容曲折丰富。蔡献臣许多寿文、墓志铭、祭文都是为乡人、亲戚友朋所作，因为他对写作对象很熟悉或者比较熟悉，因此也就避免了这类文字的空洞或熟套，有比较具体的内容，情感比较真实，有些文章很能打动人心，《云南左布政使发吾蔡公墓志铭》《祭云南右布政发吾兄文》《祭司马总督蔡元履文》《祭长婿丁亨中文》，都朗畅可诵。蔡献臣诗，带有较明显台阁和理学家习气，王志远序蔡献臣集，将其与蔡复一稍作比较，以为"敬夫之文以才情胜，体国之文以识力胜，并称两蔡先生"[③]。所谓才情，我们的理解，是诗文更有情感，即更文学色彩；所谓识力，是诗文更见识，更见理学特色。例如蔡献臣过武夷山诗，不写武夷山水之胜，而抒写对朱熹的怀念及承继其学说的愿望之类。不过蔡献臣写乡情亲情诗，也有较深的感情，足以打动人心。这类作品，在集中占有较大比例，则是其诗的一大特点。池显方为蔡献臣长子蔡谦光《干云斋诗初集》作序，说谦光诗"娟秀高华"，不似其父的"明净高远"[④]。"明净高远"四字，可概括蔡献臣诗歌的风格。

《清白堂稿》十七卷，崇祯刻本，今存。这次点校以此本作为底本，间或改正一些讹误。清咸

① 蔡献臣：《论诗赋经义》，《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② 蔡献臣：《池直夫〈淡远诗〉序》，《清白堂稿》卷四。
③ 王志远：《〈虚台先生文集〉序》，《清白堂稿》卷首。
④ 池显方：《〈干云斋诗初集〉序》，《晃岩集》卷十一。

丰间，琼林蔡氏族人有钞本十五卷，系从十七本过录，而缺十七卷本中的第八第九卷，而将十七卷本的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移作第八、第九卷。此钞本有文物价值，版本方面则无太大价值，故不作为参校本。本书有部分代作的作品，目录中代某某作数字，或置于干支之前，或置于其后，今统一置之于干支之后，特此说明。本书附录有：《虚台蔡先生小传》《蔡献臣传》《明蔡贵易墓志铭》《明蔡君哀卿墓志铭》。

附带说明：本文为点校本《清白堂稿》之《后记》，点校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接第 15 页）

## 四、结语

朱熹对“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中“兰”之注释被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引用，对“恐鹈鴂之先鸣兮”(《离骚》) 中“鹈鴂”之注释符合上下文原意，对“璆锵鸣兮琳琅”(《九歌・东皇太一》) 中璆、琳、琅之注释更是赢得后续注家的认可。综观这些《楚辞》花鸟虫鱼器物类的注释，都贯彻其格物致知方法，认为“物必有理，皆所当穷”，这必须于实在处下工夫，还要考虑事物方方面面，合理取舍，综合类推，格物方才有所得，朱熹将其举例为“‘且如火炉，理会得一角了，又须都理会得三角，又须都理会得上下四边，方是物格。’又曰：‘格物不可只理会文义，须实下工夫格将去，始得。’”[①]朱熹强调格物须全面考察，才能有所得，他在考证《楚辞》中兰、蕙时，既根据文献，又结合生活经验，这样综合得出结论，自然真实可信。

① [南宋]朱　熹：《朱子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04-605 页。

# 蔡献臣与万历己丑科泉漳同年交游考

王石堆　陈庆元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蔡献臣，福建同安县浯洲（今金门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同榜闽人共 31 人，其中泉州 15 人，漳州 7 人；而泉州 15 人中，据蔡献臣统计，同安县有 7 人。据《清白堂稿》及其他文献，与蔡献臣交游重要的己丑科泉州、漳州同年有 9 人：潘洙、柯凤翔、郭日烜、蒋孟育、黄懋贤、陈基虞、黄华秀、王志远、黄一龙，其中蒋孟育、黄懋贤、陈基虞、黄华秀四人为浯洲人。

**关键词**：蔡献臣；万历己丑科；科举同年；金门县

科举制度中举人同榜、进士同榜，都称作同年。明清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一次会试，录取的人物又非常稀少。蔡献臣中举的万历十六年（1588）戊子科乡试潘洙榜，录取 100 名；蔡献臣中进士的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焦竑榜录取 247 名。

蔡献臣（1563–1640），字体国，号虚台，贵易子，明福建同安县浯洲平林（今金门县琼林村）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十七年（1589）进士，授刑曹，渐迁湖广按察使，罢归；起为浙江海道，升浙江督学、光禄少卿。卒，赠少司冠。有《清白堂稿》等。

考试时间间隔长，录取的人数少，一般说来，同年间都会有一定的情谊，而同乡（大到一省，小到一县，甚至一乡一岛）同年情谊也就更加深厚些。蔡献臣同榜己丑科福建中进士者 31 人，其中泉州 15 人，漳州 7 人；而泉州人中，据蔡献臣统计，同安县有 7 人。

前此一年，戊子科乡试蔡献臣同榜，次年并与之同成进士的有晋江潘洙、同安浯洲蔡懋贤、同安浯洲人南安籍黄华秀、同安柯凤翔、同安浯洲人陈基虞、浯洲人龙溪籍蒋孟育等；漳浦王志远、海澄黄一龙，万历十年（1582）举人，亦己丑科进士。陈基虞后来成了蔡献臣的亲翁。本文着重讨论蔡献臣与泉漳籍己丑科同年潘洙、柯凤翔、郭日烜、蒋孟育、黄懋贤、陈基虞、黄华秀、王志远、黄一龙等 9 位的交游。

## 一、晋江潘洙

潘洙（1562–1620），字士鼎，号鹏江，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解元，次年成进士。授庐州教授，升工部都水司主事，藩臬江浙，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有《中奉集》。潘洙年长蔡献臣一岁，举人、进士与蔡献臣同榜。蔡献臣说己丑科“负文章经济之才志，而卓然欲有树于世者”得闽人二人，一为潘洙、另一为王志远。潘洙“清真”，“念不及私”[①]。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曹学佺与〈石仓十二代诗选〉整理与研究》（2016ZDZ002）

**作者简介**：王石堆，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 级台籍博士生；

陈庆元，男，福建金门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学研究中心主任、金门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① 蔡献臣：《王玄亭方伯集序》，《清白堂稿》卷四，崇祯刻本。按：下引此书不再注出处。

蔡献臣成进士次年，即万历十八年（1590），献臣以校艺入南都，在京城别潘洙，作诗云：“一从世路各东西，马首风尘望欲迷。乍喜德星占太史，且看文苑动青藜。秋高月入官衙冷，夜静樽开天汉低。兹夕他乡须潦倒，萍踪明日又分携。”[①]去岁，蔡献臣初授南都刑部山东司主事，已经过了一年，与潘氏马首风尘，各自东西；此行总算有一校艺之职，似乎比较重要些；然而，短暂入京又离京，明日萍踪分携，依依不舍。

万历二十五年（1597），蔡献臣父蔡贵易卒，二十八年（1600）春，蔡献臣还在同安守丧期间，潘洙过访，蔡献臣有诗纪其事，其一云：“相思无素书，乘兴枉高车。古寺寻芳草，狂歌慰索居。经纶堪付汝，拓落好凭余。细雨花枝动，春园欲荷锄。”其二云：“托契期千载，相看共百年。斲轮而自老，谈艺我犹贤。握手悲头白，谁人问草玄。壮心降不尽，风雨夜杯传。”[②]蔡、潘乡试中式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如今都将近五十了，仕途都不十分顺畅，故有“悲白头”之叹；毕竟是老友，期待百年情谊。此二诗写得很轻松自然，没有太多的雕饰，两情相契流于言外。

万历三十九年（1611），蔡献臣寓居同安城城南，潘洙过访。潘洙制义，蔡献臣认为与蔡复一等同为当世名家。蔡献臣连夜出示自己制义稿，就正于潘洙，潘洙有两条批评意见，一条是“太正”；第二条为“文字须用逆势，不逆不奇”；第三条为“吾侪宦稿，宜以题就文，不宜以文就题”。[③]蔡献臣对潘氏的批评，有自己的看法，十二年后，蔡献臣旧事重提，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这一年，潘洙年五十，有人为潘氏画像，蔡献臣题作像赞。像赞大意说，潘氏个头不高，不能豪饮；言虽然呐呐，而四筵常为之倾倒。这是相貌，性格方面。潘洙品格，蔡献臣将其概括为：“锦心绣口”“坦中直肠”“鉴彻”“纯和”“介洁”“疏脱”“渊猷”，因而命之曰“真人”[④]。蔡献臣对这位同年友十分了解，也有较深的情感。

万历四十八年（1620），潘洙卒，蔡献臣为作挽诗，云:“闽海萃精灵，源山产人杰。吾友天下士，清真沁心骨。文章蚤成名，魁首犹芥掇。雅负经纶志，矢励羔素节。榷木口碑扬，官人水鉴澈。一麾参大藩，厘剔穷纤屑。两粤长百僚，拮据心长作古今隔。人生百岁间，淹忽如朝夕。贤者所自树，千秋名不灭。无为惜君短，所嗟未九列。九列亦瞥尔，能得几时热。斗酒泪俱倾，犹疑叙平昔。”[⑤]“源山”，即清源山，在泉州，首二句说潘洙是福建泉州人。以下叙潘洙的成名和仕历。潘氏成名很早，为闽闱解元。满腹经纶，口碑甚佳。先为参藩，后为布政使，即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潘氏劳瘁，一心为民，民肥己瘦，年未六十遽然长逝。蔡献臣说去年夏天咱们分别，今年夏天还收到你的书牍，佳约未践，已作古今之隔，十分痛心。

作此挽诗前后，蔡献臣又为潘洙作祭文，略云：

> 吾兄弟两榜之附骥者有几？两榜中其负意气称相知者有几？其杰然于榜中能为同籍光宠者有几？三十年来其剔历中外、旦夕槐棘者有几？无论剔历中外、旦夕槐棘，即存于世者有几？若吾士鼎，冠两榜矣，意气矣，杰然矣，槐棘旦夕矣，胡遽溘然也。真耶？梦耶？呜呼。灵辄归矣，真矣。士鼎之为文，布帛也，菽粟也，而有渊然苍蔚之光；士鼎之为人，温玉也，醇醪也，而有毅然担当之勇；士鼎之为铨，金茎也，水镜也，而有皦然不缁之操；士鼎之为藩臬长，甘雨也，和风也，而有百年必究之画……回视客夏，登堂握手，剌剌不忍去，犹如昨日事，而

① 蔡献臣《别潘士鼎时以校艺入南》,《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② 蔡献臣《潘士鼎大参首春枉驾》,《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③ 蔡献臣《仕学全稿自序・又题》,《清白堂稿》卷四。
④ 蔡献臣《潘鹏江年兄五十画像赞》,《清白堂稿》卷七。
⑤ 蔡献臣《挽潘士鼎方伯》,《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转眼遂成隔世矣。涕泪浪浪，伤如之何。[①]

万历戊子、己丑科，潘洙、蔡献臣联捷由举人而进士，这种情况，泉州同籍者没有几人。两人意气相投。“三十年”，举其成数，实际上只有二十多年，他们时而同官中央，时而又外放任职，经历也相差无几，潘洙溘然而逝，恍然一梦，然而灵辒归矣，又不能不相信现实的真实。潘氏为文，渊然苍蔚之光；为人，温润如玉；为事，敢于担当；为衡官，有如明镜；为藩臬长，如甘霖和风。去夏握手，犹如昨日，转眼已成隔世，不觉涕泪浪浪。在蔡献臣诸多祭文中，此篇是最为感动人者之一。

## 二、同安柯凤翔

柯凤翔（1541–1619），字志德，号桐冈，号三槐，同安县从顺里下崎人。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第四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蔡献臣同榜。授刑部四川主司，先后为平乐、赣州、庆远知府，官至两浙都转运使。

万历三十二年（1594），蔡献臣为其庶祖母杨氏上《祖妾孤贞难泯微臣遵例直陈乞赐旌表以裨风化疏》，提及：“氏殁于万历十二年，年五十九岁，屡经该学里老柯凤翔、陈荣弼等举呈旌表，院道府县等官勘结明白。”[②]蔡献臣与柯氏同乡，柯氏年长蔡献臣近二十岁，故称“里老”。献臣庶祖母杨氏殁后，柯凤翔为旌表杨氏出了很多力，因为杨氏身份为妾，故难以旌表之。经蔡献臣努力，朝廷终于破例，此为后话，然而与柯凤翔等里老的出力也是分不开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柯凤翔卒，蔡献臣为作祭文，略云：“惟公蚤而含颖，壮而蜚英，强而遇合，晚而康宁。既魁于乡，雁塔题名。筮仕鹓署，谳决称平。两守大郡，循良着声。转运之司，军国是经。不磷不缁，出纳如衡。解组归来，屏迹市城。课尔兰玉，乐吾钓耕。鞅履葵扇，高卧门庭。人拟羲皇，士慕典刑……自做秀才，迄于宦成。胸中不怒，分外靡营。无责于人，人无责焉。”[③]

一两年后，凤翔子振霄请铭，蔡献臣所作铭略云：“故两浙运使桐冈柯公，讳凤翔，字志德，余同年友也。年十八，补邑弟子，为督学王白、岳麟洲二公所赏拔，贤缙绅授经子弟者争迎致之。岁戊子，以《易》魁于乡，为第四人。己丑，遂成进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寻擢员外郎郎中，出知平乐府。丁母恭人高氏忧，服阕，补知赣州府，调庆远府，竟擢两浙都转运以归。公坦衷质貌，不矜名，不藏机，而行己居官，尤兢兢不爽尺寸。”[④]

崇祯四年（1631），柯凤翔已卒十余年，蔡献臣致书当道，请柯凤翔入祀乡贤祠：

> 敝邑故宦柯凤翔，号桐冈者。繇己丑进士而郎刑部，守平乐、守庆远、守赣，历两浙转运以归。窃见本宦，性资清和，操履纯素，攻苦久下；董帷魁名，联拾夏芥。比曹筮仕，肺石自以不冤；剧郡三膺，脂膏毫无濡染。醇醇仁心为质，在在去后见思。逮司吴越之龃，更造商民之福。货行流水，蠹塞漏卮。宁革例以输公，耻析羡以肥己。冠挂神武，入里而必趋；迹屏市廛，非公则不至。睦邻敦族，让畔分金。盖当官则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而处世则于人无争、于已无患。寿跻大耋，德能婴儿。真有古君子之风，绝无涉末流之态。后生仰止，贤祀宜崇。[⑤]

① 蔡献臣：《祭同年潘鹏江方伯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②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二。
③ 蔡献臣：《祭柯三槐转运年兄文》，《清白堂稿》卷十四。
④ 蔡献臣：《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桐冈柯公暨配累封恭人陈氏墓志铭》，《清白堂稿》卷十四。
⑤ 蔡献臣：《与吴节推公》，《清白堂稿》卷十一。

柯凤翔虽然与蔡献臣是同榜进士，相差二十岁，已经是两代人了。老一辈为乡后人树立典范，让一代的良好风气代代往下传，十分重要。蔡献臣请柯氏入祀乡贤祠的意义，不完全在于柯氏本人，而是为一邑的子孙后代着想。

## 三、同安郭日烜

郭日烜（1545–1592），字宗实，别号旭东，同安人。年十三，父卒。万历元年（1573）举人，六上公车，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蔡献臣同榜。万历四年（1576），献臣父为浙江崇德知县，日烜上公车过访，时蔡献臣以童子侍坐，得以结识。日烜成进士年已四十五，官安云南宁州知州，万历二十年（1592），日烜入云南，行至龙津卒。

崇祯七年（1634），蔡献臣为作墓志铭，略云：“逮己丑赐对，而君与余名第相后先也。时登榜者同得七人，越辛卯，而恂所卒于比曹。越壬辰，而君卒于龙津。呜呼。天乎。何畀之厚，遇合之难，而夺之亟哉。君讳日烜，字宗实，别号旭东，”[①]“同得七人”，“同”即同安县；七人：柯凤翔、郭日烜、蔡懋贤、蒋孟育、黄秀华、陈虞基及蔡献臣本人。恂所，即蔡懋贤，成进士次年卒，详下小节。己丑科福建成进士 31 人，同安一县独得 7 人，超过四分之一，蔡献臣十分重视同县同年的情谊，诗文每每及之。

## 四、同安浯洲蔡懋贤

蔡懋贤（1550–1591），字德甫，号恂所，浯洲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二甲第五名，与蔡献臣同榜。官刑部山西司主事。

蔡懋贤是诸同年友逝世最早中的一位，卒于成进士次年，二蔡交往时间较短，可述论的内容也不多。懋贤虽则也是蔡姓，但与琼林蔡不同宗。懋贤其先自漳州迁来，至懋贤才第四世。[②]从懋贤此族自漳州迁浯洲，以及蒋孟育族自浯洲迁漳州，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由内陆迁浯岛，或者由浯岛迁内陆，此类迁进迁出，应当比较频繁。懋贤年二十补同安县弟子员，万历十三年（1585）举于乡，比蔡献臣早一科。卒年仅四十二。懋贤有四女，其中一位适池显方（显方父池浴德为蔡献臣岳翁），这样说来，蔡懋贤与蔡献臣也沾亲带故，从辈分上说，蔡懋贤还高蔡献臣一辈。

蔡献臣为蔡懋贤之作《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陈氏墓志铭》，铭曰：“盖高茫茫杳难测，畀君孔厚夺胡亟。一命方膺遽长毕，龙光夜夜斗牛色。堂垂双白藐诸孤，一蒌拮据甘于荼。半世别离今归居，仁者必后征大苏。”[③]

## 五、同安浯洲蒋孟育

蒋孟育（1558–1619），字道力，同安县浯洲人。父执教漳州府南靖县，孟育随之往；入龙溪（治今漳州市）县学，遂以龙溪籍参加科考。[光绪]《金门志》有传。孟育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十七年（1589）进士，两次科考都与蔡献臣同榜。改庶吉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卒，赠吏部尚书，

① 蔡献臣：《安宁州知州郭旭东暨配李孺人墓志铭》，《清白堂稿》卷十四。

② [光绪]《金门志》卷十，以为懋贤“平林人，贵易族”（台湾银行，1960 年，第 256 页），恐非。蔡献臣《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陈氏墓志铭》：“比部之蔡，其先景美，自漳沈溪徙居于同，三传至达公，达生骥庭公鉴，娶于倪，君父母也。”（《清白堂稿》卷十四）

③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四。

谥文介，有《恬庵遗稿》等。

《清白堂稿》有关蒋孟育诗文只有一篇，即《蒋仲旭〈伐檀草〉序》。孟育二子，长蒋雯，次蒋升。升，字仲旭，着有《伐檀草》，此集为制义文。蔡献臣称道蒋升制义，以为升有家学，其制义有父孟育之风："蒋子升者，恬庵宗伯子也。年方弱冠，而文章奇天下。其笔意之飞动，超迈种种，出人意表。盖其体裁虽有迩来风尚，而另有一段超逸之致，经生家谓是必建旗鼓而唾手大物者，予曰：'唯唯。'虽然，不佞与宗伯公同举相知，余肤末不足道，而宗伯之文，沉潜粹雅。壬午，王麟洲文宗一试而首拔；戊子，杨复所太史覆阅而深赏，其遗稿固在也。夫文能切理为主，而气以达之，使蒋子根原其家学而驰骋于时局。"[①]蒋升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就是说天启末年，蒋升文章已经奇于天下。蔡献臣认为，蒋升文有"笔意飞动""超逸之致"，一是根源家学"沉潜粹雅""文能切理""气以达之"，其次则为"驰骋于时局"。

《恬庵遗稿》存蒋孟育致蔡献臣书牍两通。万历四十三年（1615），蔡献臣补浙江按察司巡海道，迟疑未就任，蒋孟育致书促之，云："以此时正宜居卿执，不然，当已开府，乃借参藩，道固委蛇，虽然，宁绍之福也。方今时事，惟随在补救，易以为力，幸亟趣装揽辔，胸中成算，随在布之，以为人望。弟冒滥未能自去，留滞白下，非其所安，无足为年丈言者，复无著述论建自成一集，可以酬谢大编之赐，为愧为愧！"[②]据此书牍，蔡献臣曾寄孟育诗文，孟育自谦无集可呈。是岁秋，献臣到达任所，履任新职，有一番作为。蔡献臣有复函，今佚。

蔡献臣赴宁绍海道任次岁，蒋孟育再致书，略云："客岁翰教，所谓雉膏鼎实，弟以瓦鬲煮而盛以土铏之器，安所得饪之？谨诵以为谈资耳！"[③]书牍内容与蒋、蔡交谊无大关联，不备述。

## 六、同安大浯洲陈基虞

陈基虞（1565–1642），字志华，号宾门，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次年成进士，与蔡献臣同榜。官南雄司理、广东按察司副使、南刑部郎中。

崇祯四年（1631），蔡献臣与陈基虞及蔡复一弟蔡仁夫倡修太武山海印岩寺，蔡献臣说："太武者，浯洲之宗也。海印岩所以庄严神居，而浯人时攀跻而游憩焉。巍巍乎、奕奕乎，宏规也哉！夫岩宇之废兴，亦吾浯文事所关隆替也。万历初，金令公及先肖兼公倡修之。天启丙寅，陈宾门、蔡仁夫与予复倡修之。"[④]太武山是金门最高峰，山有海印寺，此寺事关浯洲文事，即科举的兴隆，故浯洲人很用心呵护，废坏必修葺，蔡献臣与陈基虞等提倡复修。

崇祯七年（1634），陈基虞年七十，蔡献臣作《寿陈宾门宪副七十》，有云："一从弱冠托交心，五十年余气谊深。"[⑤]从十几岁结为友，同乡、同科，俩人的友情长达五十年。蔡献臣同时还作了一篇寿序，略云："忆予与宾门翁初倾盖也，翁甫十八，予长二龄……今五十年余矣，头白矣，赋归来矣。其在宦途也，无数月不通书问；其家居也，无数日不相晤语。且予之女结褵于翁子，翁之孙女许聘于予孙。"[⑥]蔡献臣次女适金门陈基虞子元錞，陈基虞的孙女又许配给蔡献臣之孙，同乡、同年，又有双重的姻亲关系，在蔡献臣所有的泉漳同年中，陈基虞当是最亲近一位。

①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五。
② 蒋孟育：《答蔡体国》，《恬庵遗稿》卷三十一。按：下引此书不再注出处。
③ 蒋孟育：《答蔡体国兵宪》，《恬庵遗稿》卷三十二。
④ 蔡献臣：《辛未太武岩门堂僧舍募疏》，《清白堂稿》卷八。
⑤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卷下。
⑥ 蔡献臣：《寿宪副陈宾门亲翁七十序》，《清白堂稿》卷六。

陈基虞家多藏书，蔡献臣曾与之倡和，在同年中文化品味也较高。

## 七、同安浯洲黄华秀

黄华秀（？–1598），字居约，号桂斋，同安县浯洲人。入南安庠。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蔡献臣同榜。授韶州府推官，招南京浙江道御史。

黄华秀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设使华秀生年和蔡懋贤相当，年也不到五十；如若与蔡献臣相当，则不到四十。华秀卒，蔡献臣为作祭文，略云：

> 予兄弟并起海上，皇路联翩，三山歌鹿，金台题雁，肝胆共怜。余入留署，兄出李官。宦辙各天，室远心迩。鸿鱼之问，予后子先。暨予告归，音驿都废。兄也常然，征书于粤。簪笔柱下，揽辔南天。钟阜玄湖，余获追随。再司其铨，二三知己，谈必促膝，聚必流连，杯酒壶局，间日不见，如有失焉。予耽名理，兄表风裁。太阿龙泉，射隼埋轮。白蔺虹吐，三尺石坚。都城纷拏，迎刃以剸。万口称便，惟余黔浅。时披胸臆，兄曰韦弦。载集良朋，努力千载。游神汗编，修予罔弃。予亦心许，遽讣以旋。胡别未几，兄无夙疾，一旦长捐。[①]

《清白堂稿》没有其他诗文提及黄氏，但是此篇祭文却为我们提供许多蔡、黄交往的信息。首先，两人并起于海上，即同时起于海上孤岛浯洲，同一年至省城入闱，乡试中式；一起进京会试，同一年金榜题名成进士，肝胆共怜。成进士后，献臣往南都，华秀往广东，宦辙各在天一方，而室远心迩，鸿鱼之问不断，而且往往华秀先致书献臣，献臣后作答书，可见秀华极重情义。后来两人又同官南都，或促膝交谈，或雅集流连，或杯酒壶局，两三日不见，便怅然有失。黄华秀受到众人称赞。华秀既无夙疾，也无任何征兆，倏然而逝，让人无法接受。黄华秀的事迹，文献很少记载，蔡献臣此篇祭文为我们保存了若干史料。

## 八、漳浦王志远

王志远（？—1621），字而近，一字而玄，号玄亭，会之次子，志逵弟、志道兄，漳浦人。万历十年（1582）举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蔡献臣同榜。官湖南参知、历四川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赠太常卿。有《王奉常集》《钹镂稿》。

志远弟王志道云：“吾仲兄而近，与公同己丑进，与敬夫三人皆以文字声气相交。”[②]王志道说，王志远与蔡献臣、蔡复一相交，一以文字，一以声气。文字，即诗文；声气，即理念、观念、生活态度等。万历四十八年，王志远往中州，蔡献臣有诗送之：“携手看花三十年，鬓毛如许总相怜。文成大雅堪谁并，义激当机羡尔偏。此去天中崇屏翰，尚闻辽左报烽烟。同心海内几人在，决胜还期日月边。”[③]“携手看花”，即成进士同榜。蔡、王成进士至今已经超过三十年，“三十年”，举其成数。三十多年进去了，鬓毛如许，蔡献臣已经年近六十，志道年龄相近（详下）。当年同心者，如上文论及的潘洙等人，都已经化为异物，只有咱们为文仍称大雅。辽左烽烟频报，期待京城决胜捷报。

万历四十八年（1620），潘洙卒于广西左布政使任上，王志远代之，不数月，志远亦卒，蔡献臣为作祭文，略云：

---

① 蔡献臣：《祭同年黄居约侍御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② 王志道：《虚台蔡先生文集序》，蔡献臣《清白堂稿》卷首。
③ 蔡献臣：《送王玄亭方伯再入中州》，《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闽己丑举者三十一人，今几何年，独五人在耳。客秋，去我藩士鼎，兹夏又丧而玄，而二兄俱以粤藩薨于位。夫方伯尊官也，然未三事；六十不称短矣，然仅下寿。呜呼。兄何以死哉。兄与士鼎俱有烂然传世之文，有毅然必为之志，有矞然不染之操，有卓然经济之才，有挺然不可屈挠之气，天下信其为正人君子。而二兄又俱以苍生为责，国是人才为念者，不啻一路福星而已。士鼎入粤仅年余，而兄代之不数月也。呜呼。又何以死哉……兄官京师必过予，过必剧谈；兄走轮山必过予，过必剧醉。嗣后每别，必手书寄予，寄必输心。总之发舒其忧时感事之见，而不挂寒温升沉于笔端、舌端者。①

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闽省进士31人，王志远卒，只剩下5人而已。蔡献臣认为王志道与另一同年潘洙都有卓然有经济之才，都有传世之文，都有毅然之志、爵然之操、挺然不可屈挠之气，天下信其为正人君子，可惜年龄都刚刚到六十，虽然不算短命，但只能称为下寿。王志远家漳州，蔡献臣居同安，同安是北上必由之路，志远过同安，俩人必醉而方休；献臣官南都，志远入京城，必过访，过访必剧谈。别后，则鸿雁不断，书牍所发尽为忧时感事之见，不涉及寒温凉热升沉这些个人小事。

王志远卒后，弟志道持志远文集请序，蔡献臣序之，略云：

吾闽举己丑若干人，负文章经济之才志，而卓然欲有树于世者，得二焉，曰王而玄，曰潘士鼎。士鼎之清真，而玄之挺劲，皆予所逊谢……公生雅好读书为文，每对知己，未尝不商榷人才与当世要务，卓识确见，不苟为同。语合时，目光炯射，意神豪激。予心折而玄，以为真奇男子……公文工而裁，诗史而逸，涉笔核而辨，长篇短章，率抒胸中之奇，而妙合古法，读之想见其为人。予既序士鼎之文，而复缀此于公集中，千古人琴，寄兹一慨。②

这篇序文，也是潘洙、王志道并提。蔡献臣认为潘洙“清真”、志远“挺劲”，都是自己所未能及者。志远文有真知灼见，不随意应声苟同，意神豪激。志远之文精工而善剪裁，诗有史识而飘逸，无论长章还是短篇，率抒其胸臆之奇，又与古文法相合。志远集已佚，赖此序我们了解到一些概况。

王志远弟志道，与蔡献臣也有很深的交谊。志道（1574–1646），字而宏，号东里，志逵、志远弟，志超兄，漳浦人。万历四十一（1613）年进士。终官左副都御史。崇祯九年（1636），王志道年六十六，蔡献臣有诗寿之，云：“涉世多公十载余，文章勋业百无如。锁闱大谏舒忠赤，宪府敢言动殿胪。归到山中安石望，闲来方外子云居。年周花甲神情旺，求旧伫迎驷马车。”③志道已经官至中丞，此篇似偏重于应酬，诗稍乏味。不过蔡献臣与王志道关系亦至密，故蔡献臣卒后，其《清白堂稿》由王志道序之。志道云：“今先生集，不佞道序之，一死一生，乃见交情。”④

## 九、海澄黄一龙

与蔡献臣同榜进士，漳州郡还有一位黄一龙。一龙，字鳞伯，文豪子，海澄（今龙海市海澄镇）人。生而颖敏，寓目成诵。万历十年（1582）乡试第八人，早蔡献臣两科。初授行人，万历十九年（1591）分试京闱，出为广东按察使，中道卒。有《延露编》。

蔡献臣为之序，略云：“予读鳞伯《延露编》，大抵取才先秦，模法司马，而铸气于眉山氏。疏

① 蔡献臣：《祭方伯王玄亭年兄文》，《清白堂稿》卷十七。
② 蔡献臣：《王玄亭方伯集序》，《清白堂稿》卷四。
③ 蔡献臣：《寿王东里中丞六十三》，《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④ 王志道：《虚台蔡先生文集序》，蔡献臣《清白堂稿》卷首。

畅洞朗，令人一览，跃如楮毫。立台未几，辄慷慨论天下事，若《倭奴》《修省》《效忠》《救时》诸疏，皆殚忠赤切，事情凿凿可裨实用，有贾生、苏轼之遗风庶几哉！孔门所谓达者欤！考鳞伯生平知己为卢璧山观察，而鳞伯所论作文三长，太上殖学以拓识，其次程古以缀词，其次赡才以鬯意。今观鳞伯之文，所为识与词与意者，有一之不备乎？否也。列之《文苑》，名不虚立矣。虽然，以鳞伯之文，可以追踪古人，陵厉时辈，而未竟其所诣；以鳞伯之才，可以大展底蕴，襄赞明盛，而未竟其所施。则年为之域也。盖予览漳《文苑传》，而咨咨慨焉。夫林公悦、刘国征、高朝宪三君，其才品皆隆、万间表表标奇者，而文章烂焉，建竖未究，宁独鳞伯然乎哉？人不可以无年，盖自古叹之矣。”[①]林公悦，即林缵振，公悦其字，漳浦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有《海云馆集》；刘国征，即刘庭兰，国征其字，漳浦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这诗文疏达尔雅，毕即弃去；高朝宪，即高克正，朝宪其字，海澄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有《玉堂初稿》《木天署草》。林、刘、高与黄一龙并列入[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文苑传》，蔡献臣认为此四君在隆、万间才品并表表标奇，可惜天不假人，才华发挥未尽，不免遗憾。

蔡献臣己丑科同榜闽人 31 人，本文考证 9 人。此榜泉漳进士人占闽人总数三分之二强，同安一县则占泉漳三分之一，而浯洲一岛又占同安一半稍强。蔡献臣与同年的交集，科第为其基础，地域则为重要因素。蔡献臣与泉漳同年交集，既有仕宦之交、乡谊之交，还有文字之交，甚至姻亲之交。限于篇幅，本文仅作简略考证，各种交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① 蔡献臣：《黄鳞伯侍御〈延露编〉序》，《清白堂稿》卷四。

# 册封使谢杰及其《琉球使录》浅探

徐梦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谢杰是明万历七年奉命册封琉球的闽籍副使。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琉球的却金之举至今为人称颂，所著写的《使琉球录》与《〈琉球录〉撮要补遗》记录了自身的琉球之行，兼具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并且首次在琉球使录中详细记录了日本在琉势力，揭示了日本对琉野心，所绘《琉球过海图》更是钓鱼列屿主权属于中国的力证。

**关键词**：谢杰；《琉球使录》；中日琉关系；钓鱼列屿主权

在我国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有一条如海上游龙一般的岛链，因其“地界万涛，蜿蜒若虬浮水中”[①]，在古代被中国定名为“流虬”，后转谓“琉球”。

自明初起，琉球就正式与中国建立了封贡藩属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走上了繁荣之路，从远处东南，地多荒僻，产物无几，凡食物器用多需内地的贫苦小国成为了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的东亚海域交易圈主角。琉球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于明清两朝每逢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中国统治者秉持着抚夷四海，万国来朝的外交理念，大都爽快地应其所请，派遣大型的册封使团，并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后，琉球世子（嗣位新君）才正式称王。明清时期，琉球成为与中国朝贡贸易次数最多的藩属国之一，被称为“虔事天朝为外藩之最者”。琉球的高速发展引来了邻国日本的觊觎，日本势力慢慢渗透进琉球，并最终于清末强行吞并琉球，废藩置县，结束了中琉之间长达500余年的友好交流。

中琉之所以能在通讯科技极为落后，航海技术尚未成熟的古代社会如此长期地保持着友好的交往，除巨大的贸易利益驱动外，还与明清政府500余年间派出的23次册封使团，43名册封正副使有着极大的关系。因琉球为海外藩国，故琉球册封使身上不仅肩负着外交使命，还须亲自督造能够远渡重洋的册封舟，招募可靠的“驾船、执舵、观星、占风、听水、察土以及医卜、技艺之流”[②]。封舟建造与人员招募工作均在与琉球隔海相望的福建省进行，根据工作进行的顺利程度，历时少则三月，多则两年有余。琉球册封任务的特殊性使得在历任43位册封使中，以闽籍人士为最多，共计8位，足见闽籍册封使的重要地位。

在8位闽籍册封使中，又以明万历七年（1579）出使琉球的闽籍册封使谢杰最具研究意义。他不仅为闽籍册封使中著作最丰，回国后官职升迁最高的使者，更是第一位洞悉日本对中琉的威胁并专门为之著书立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使者，故而谢杰其人及其琉球使录均值得我们关注、探析。

**作者简介**：徐梦可，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琉球国》，明崇祯间刻本。

② [明]陈　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 287 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 年。

## 一、闽籍册封使谢杰生平事略

传世载有关于谢杰生平事迹的主要文献有：《明神宗实录》、明何乔元《闽书》、明喻政《（万历）福州府治》、明夏允彝《（崇祯）长乐县志》、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十七《明故资政大夫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叔祖绎梅公行状》及卷二六《祭从祖大司农文》、清万斯同《明史稿》、清张廷玉《明史》、清孙尔准《（重纂）福建通志》、清梁章钜《长乐诗话》、清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五、民国李驹《长乐县志》及《（民国）福建通志》等。

以上典籍虽皆载有其人其事，但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连其生卒年都未见明载。直至方宝川先生根据民国年间谢铤所编《东岚谢氏宗谱》（藏于福建长乐江田祠堂）“邦锡公派下”《谢杰传》抄本所载：“公生嘉靖丁酉年（1537）三月二十四日申时，卒万历甲辰年（1604）四月十四日辰时，享寿六十有八”，这才首次明确考定谢杰生卒年。且此传为现今记载谢杰生平事迹的文献中最为翔实的一篇，除生卒年外，还载有明神宗颁谕的祭文与赐藏之地等诸多重要史实，弥足珍贵。

谢杰（1537–1604），字汉甫，号绎梅，又号白云漫史，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县江田人。

谢杰先祖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末年宣王时期的申伯，“吾谢之先，以申伯受封赐姓，至晋为望族”。申伯三十六世孙谢衡于西晋永嘉五年（311）因“永嘉之乱”，由河南阳夏迁至浙江东山（今浙江上虞县），定居蒲兴村百花巷内，为东山谢氏始祖。东山谢人才辈出，有东晋宰相谢安、名将谢玄、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山水派著名诗人谢朓等等。但从南齐谢朓后至南宋理宗谢星止，因当时战火纷飞，社会混乱，现未考据到有关谢氏家族的确切记载。宋末，谢衡十九世孙谢星因得罪贾似道，被贬至福建玉融（今福清）出任知州事，又逢战乱，不得归乡，为避兵祸而渡海移居东岚村（今属福建平潭），“东岚谢”由此得名。有元一代，全族终农不仕。至明初，朝廷颁布迁界之令，“东岚谢”奉命内迁漳州、泉州、长乐、闽侯、福清等地。谢星八世孙谢钟遂又西至长乐（今属福建福州）相土置宅，七迁而于该县江田里定居，全族人于此繁衍生息，故谢杰自称长乐江田人。

自迁至长乐始，谢杰一支世系如下：

钟－琬－盘－士穆－廷衮－杰－汝璿－肇淛、肇濂、肇沅
　　－汝珈－肇浑、肇溯
　　－女

曾孙：日泰、日隆、日＊

谢钟子谢琬善诗，与明初十才子王恭、高廷礼辈为友，为人君子、博雅，著有《东岚秋思卷》。谢琬孙谢士元官四川右副都御史，谢文礼官州教授，谢文著官郡太守；曾孙谢廷柱官按察司佥事，谢廷瑞官郡太守，至此江田谢氏“一时金紫辉映，称鼎族矣”[①]。

谢杰便出生于此望族，乃琼山公谢廷衮第四子，最少，为继室林氏所生。林氏初生子谢照，然而照出生数月后，被其继兄谢熙无意失手坠死。廷衮欲杀子谢熙，林氏劝之。而后，全家日日诚心祈祷，求天赐贵子，不出一年，谢杰在全家人的企盼中降生了。出生之时，异光烛天，视为祥兆。

据明谢肇淛《明故资政大夫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叔祖绎梅公行状》对谢杰的记载：

> 蚤岁以颖悟闻，从父命之咏涛，应声而就，末句曰：“中有真龙人不识，风云交处海天清。”父甚惊异。既长，工诗赋古文词，兼通当世大务，肮脏有志节。方闽之窘于倭也，当事者恇恐

① [明]谢肇淛：《小草斋集》（下册），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莫知为计，公为诸生，奋然曰：“大丈夫秉节钺，不能肉诸鲸鲵而令阑入内地，涂炭黔首，则将焉用保障矣？”挺身上军门，画战守策甚详，多见采用，寇竟解去。

可见谢杰自幼起聪慧警敏，博学善古文词。且年少时，已对倭寇深恶痛绝，能奋起直面倭患，对御倭策略心中有沟壑，又经后期实践不断积累成长，在了解倭寇、抵御倭寇方面终成大家。

隆庆四年（1570），谢杰乡试中举。据明何乔远《闽书》卷七十七《英旧志·谢杰》记载：

其举乡试时，已落卷矣。分考官房中夜甍然有声，起视无有，旋复就睡。旋复有声，如是者再。起视之，得杰卷。遂以上主考，得与荐。

与其降生一般，颇具传奇色彩。

万历二年（1574），荣升进士，位列第三甲八十八名，被授予行人司行人职位，官正八品，职专捧节、奉使之事。

万历三年（1575），出使楚藩，宴席中被赐金币，推辞不受。

万历四年（1576），琉球请封。谢杰受命为副使，以钦赐一品服与正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一同往封琉球，册封中山王尚永。接受朝廷任命后，萧谢二人便前往福州城准备册封的一应事宜。在此后两年多的准备时间里，谢杰充分利用其作为福州本地人的自身优势与丰富阅历，深谙当地的市场行情与民风民俗，展现出了极强的监督管理才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谋划作用。对于谢杰的能力及贡献，正使萧崇业十分肯定。

万历七年（1579）五月二十二日，使节团正式从福州梅花港开洋出海，册封琉球王尚永。在航行过程中，历经风涛之险。舟裂、柁折，乘船至中流时，又逢风雨雷电交加，“有龙三，倒挂于船之前后……舟中仓惶无计”[①]，但谢杰或易柁而往，或取敕示龙，冷静应对，令全团安然度险，终于六月五日抵达琉球那霸入港。

在琉球期间，有三事值得一记。其一为赚金轶事。当时出使琉球，朝廷均许私人携带一定量的货物与琉球人进行贸易，赚取赢利。颇具商业头脑的谢杰巧借册封礼，将其母舅捎带的原本滞销的数百网巾销售一空。清徐葆光于《中山传信录·风俗·剃顶发》中对此事记载甚详：

前明琉球人，不薙发，惟不用网巾。万历中，册使谢行人杰——闽之长乐人，母舅某从行，携网巾数百事，至无可售；谢使迟册封礼久不行，云本国既服中华冠带，册封日如陪臣有一不网巾者，册事不举；琉人竞事一空。福建至今相谑强市者，则云“琉球人带网巾也”。

谢杰的商业头脑与灵活机变，至今于福建商人群体间广泛流传。虽说如此，谢杰却绝不是一个唯利是图、贪慕钱财的人，可从以下这第二件事中见其人品及其对金钱的真正态度。

第二件事为却金逸事。按惯例，琉球国王会专设七宴（即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与登舟宴）款待天使使团，并七宴七酬金，但皆被谢杰断然拒绝，并作《却金吟》以示其志。

后琉球使者来朝进贡，又欲赠予谢杰厚礼，谢杰均辞不受，且如实上报朝廷。谢杰却金一举受到琉球朝野的崇敬，因此特建却金亭以记之，名显一时。清长乐人梁章钜评云：“自后中山册封使皆相沿却金，实先生（指谢杰）启之。”

其三意义最为重大，也最值得一提。谢杰在出使琉球期间就已敏锐地感知到了日本对琉球、对中国的骚扰与威胁，为使者中第一人。于他之前出使琉球的使者，对于日本的描述仅寥寥数语，并

① [明]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年。

且仍是自持中国大国身份，对日本在琉球的势力无视，甚至蔑视。据已存文献来看，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萨摩藩征战琉球之前，明人似乎多讳言琉日关系。相比于其先前的使者，乃至于他之后的使者，谢杰对日本侵略野心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与高瞻远瞩，还有不同于当时其余人的直言无讳，敢为人先的勇气，都着实难能可贵。他在使录补遗中就针对日本特撰有《御倭》及《日东交市记》等文，归国后还著有《虔台倭纂》专著，分析中日琉实况，详述御倭策略。这些著述都兼具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战略意义。

万历七年（1579）十一月五日，萧崇业、谢杰一行人完美完成册封使命，返抵福州。

归国后，谢杰晋光禄寺丞，从六品，掌酒醴膳馐之事；后又晋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掌礼乐之事。任上，恪尽职守，公正廉明，有错必究，“中贵人为之请不得，事悉精办”[①]。

万历十八年（1590）七月，任通政史司右通政，正四品，受理内外章疏与臣民密封中诉之件。

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迁南京光禄寺卿，从三品，主管祭祀社稷、宗庙、朝会、丧葬等礼仪，一丝不苟。于祭祀懿文太子时，因皇上仅派遣祠祭官拜祭，以贱代贵，于礼不合，谢杰直言“请如哀冲、庄敬二太子例，遣列侯”，神宗应允。此后大典，皆以此为制。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累迁顺天府京兆尹，正三品，管辖京城及周围各州县地区。当时京城买卖人“亡命不齿伦辈”已成风气，是为一恶。但在谢杰的治理下，规规矩矩，令行禁止，经世才干得神宗赏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巡抚南赣，提督军务。据明喻政等纂修的《（万历）福州府志》记载，谢杰“清四弊，陈三策，以汰虔兵之虚冒者，军民按堵，钤阁肃然”。除军务外，谢杰作为巡抚，还兼有考察、推荐管辖区内大小地方官的权利与义务，故而不断有下属贿赂谢杰。针对这一现象，谢杰于巡抚衙署上亲书一联：“贿而后荐，干戈之盗。荐而后贿，衣冠之盗”，以戒风气，清名远扬。巡查至赣地，逢当时已归田且早年间令谢杰“几死于杖”的知县刘禹龙。当年，谢杰之父谢廷衮任琼山县教谕、临江县训导等教官职位，虽官品低，俸禄少，但仍享受乡绅特权，故而其族人假借谢父之名漏税、轻役。此行为虽与制不合，但在当时社会，利用身份特权行小小特殊之事，蔚然成风，不足挂齿。可此事被当时的知县刘禹龙知晓，因刘与谢父素有龃龉，刘便直接将此事上告其同乡巡按御史处，逮捕谢父。因谢父年事已高，故谢杰主动替父受罚，险些死于廷杖之下。而如此仇怨，谢杰却并不放在心上。当两人身份地位幡然转变时，谢杰不借权势欺压，甚至无一语刁难，时人均叹服其肚量。

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擢升南京刑部右侍郎，正三品，负责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二十五年（1597）春，因皇帝荒于政事，谢杰直谏十规言，从“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十方面，有理有据地桩桩历数神宗皇帝如今政不如初的实情。其疏言辞恳烈，不避忌讳，力劝神宗为社稷着想，勤勉于政，但并未得到皇帝的回复。于是谢杰多次上书请辞，终还是被皇帝温言慰留。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应召回北京任刑部左侍郎，正三品。不久，迁户部尚书，正二品，总督仓场，主管大运河起点（通州）至终点（北京）的公家谷物仓库群。当时因朝鲜侵略，甘宁一带的边疆又不断受外族侵扰，加之四方频起的自然灾害，使得朝廷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粮储告急。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杰为充实京仓以备边储，一改先前以银两代替漕粮的惯例，要求各地必须以

① [明]何乔远：《闽书》卷七七《谢杰》，明崇祯二年（1629）刊本。

实物（谷物）上缴，有效地确保了漕米供应。万历三十一年（1603），近1万艘的北上漕运船队延误，运河即将结冰，而输送漕粮的任务还未完成。谢杰“旦夕焚香吁天，祈河不冻以济漕艘。癸卯之冬，冰果不合，灌输衔尾直至潞河，军国藉以无恐，咸谓公之精诚能格天也。”虽记述带有些玄幻色彩，但谢杰的兢兢业业可见一斑。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四日，谢杰仍如往昔省视工作。但于辰时，谢杰竟因心力交瘁，操劳过度而突发暴疾，卒于任上，享年68岁。谢杰第二子儒梅疾往北京，奔丧治事。殁时，房无媵妾，衣无绫罗，宅无楼台，田无百亩，家无千金，乃至连出殡时的棺饰都简朴敷衍。为官三十载，谢杰廉洁如初。

神宗听闻谢杰之卒，极为震悼，随即颁谕祭文：“谕祭曰：惟卿秉心贞洁，操行端庄。释褐大廷，抗旌异域。夷金能却，君命有光。逮列寺之荐更，闻奉公之益恳。建牙虔镇，雀苻之警全销；正席仓曹，京坻之储日积。未究厥用，遽瘁尔躬。言念劳臣，可无异恤，特颁谕祭，以轸遐思。灵如有知，服兹宠渥。”[①]并追封其为太子少保（从一品，虚衔），遣尚宝司丞吴君默护柩归里，太常博士姚若水于途中祭之，并令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廷玑就宅致祭，吏部尚书裴应章为其书写墓表。种种安排可见谢杰死后哀荣。部议祭二坛，造坟安葬，诏准如例。据《东岚谢氏宗族》“邦锡公派下”《谢杰传》载，其墓于“闽县光裕里瀛田山（即今长乐县营前镇湖里村长安山南麓），坐乙向申，兼卯酉分金。”文化大革命时，此墓被毁，现仅有墓前一对文武石翁仲保存完好。

## 二、谢杰琉球使录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琉球使录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琉球正使陈侃所做的《使琉球录》。嘉靖十一年（1532），陈侃被任命为琉球册封使后，随即至存放封典的礼部查阅往昔册封琉球所留下的案卷时，惊觉所有旧案已因火灾而烧毁无存，另存放于福建布政司的案卷亦因年旧失修已遭风雨侵蚀而毁伤，故而陈侃之前的使琉行纪均无从可考。陈侃归国后，便以自身之亲历，将琉球山川、风俗之殊，往来闻见，悉出实录，并集群书志其略、辨其异，从而编纂出了我国第一部《使琉球录》。出于可使后来奉使册封者有征而无惧与可备史馆之采择的目的，陈侃将此录上表朝廷，遂成先例。之后历届册封使归国后，皆会据此次的琉球册封之行纂写使录。除清道光十八年（1838）正使林鸿年的《使琉球录》散佚外，其余皆保存完好。

万历七年（1579）册封琉球副使谢杰所留下的琉球使录有二，一为与正使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二卷，二为其独纂的《〈琉球录〉撮要补遗》。

### （一）《使琉球录》二卷（合编）

《使琉球录》二卷，是书题：“户科左给事中临安萧崇业编、行人司行人长乐谢杰同编”。

萧崇业（1522–1588），字允修，号干养。祖籍南直隶，明洪武年间其祖奉命迁云南，遂落籍临安卫新安所，建水州（今云南省临安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由庶常授兵科给事中，转工科右给事中，先后封事十余次。万历四年（1576），朝廷任命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为正使，行人司行人谢杰为副使，共同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尚永。

该书首列萧崇业《自序》有：“使琉球，旧有录，纪胜图流、规舟秩则，较前录稍增益，兹不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七七《谢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具述。”

由此可见，该书为万历七年（1579）萧崇业与谢杰出使琉球期间基于前人使录的基础上共同编撰完成，详细地记述了其出使琉球的经过及在琉期间的见闻、活动、感悟等，通过与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琉球正使陈侃所做的《使琉球录》相比较，可知其体例多援引自陈录。

陈侃《使琉球录》首列：自序、诏敕、谕祭文；次有：使事纪略、群书质异；末附：天妃灵应记、夷语、夷字、题奏、后序。

萧崇业与谢杰同编的《使琉球录》首列：自序、琉球过海图、诏敕、谕祭文、谕祭祈海神文、谕祭报海神文；上卷：请留诏敕、使事纪、礼仪、造舟（操舟记）、用人、敬神（天妃灵应记、临水夫人记、天妃显异记、广石庙碑记、重修广石庙碑记）；下卷：群书质异、题奏、艺文（大安禅寺碑记、千佛灵阁碑记、中山八景记、息思亭说、洒露堂说、洒露堂记、使琉球录序、重刻使琉球录叙、航海赋）；末附：夷语、夷字、皇华唱和诗。

其中《大安禅寺碑记》与《千佛灵阁碑记》为宣德二年（1427）册封琉球正使柴官所作；《中山八景记》为天顺七年（1463）册封琉球正使潘荣所作；《天妃灵应记》与《使琉球录序》为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琉球正使陈侃所作，《操舟记》《临水夫人记》与《天妃显异记》为副使高澄所作；《广石庙碑记》《息思亭说》与《重刻使琉球录叙》为嘉靖四十年（1561）册封琉球正使郭汝霖所作。另《使事纪》中还罗列了自宣德二年（1427）内监柴官往封琉球伊始，至嘉靖四十年（1561）正使吏科左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李际春往封琉球的一系列历史情况，同时收录了先前仅存的两部《使琉球录》（即陈录与郭录）中的《使事纪》部分。萧崇业与谢杰费心收录先前使者的琉球纪事入此书，补充了陈侃之前琉球使录的空白，更好地展现了琉球历史风貌，也为研究先前的奉使册封者提供了基础材料。并且国内现已无嘉靖四十一年（1562）册封琉球正使郭汝霖所作的《使琉球录》全本行世，只能通过此书一窥郭录。

观此书，可明确得知谢杰此次册封琉球的整体过程，大致概述如下：

万历元年（1573）冬，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请封。

万历四年（1576）秋，明廷任命萧崇业与谢杰为册封琉球正副使。九月一日，二人随即奉召前往福建准备册封事宜。

万历七年（1579）五月初六，封舟从旺崎发船。次日，抵长乐。十五日，册封使团于长乐天妃广石庙行谕祭礼。二十二日，在福建准备两年有余后，册封舟终于长乐梅花港开洋。

二十四日，便遇大风，“舟中瓶瓮、门椅皆扑，人人揣恐，失之方向”，连行七余日，终不见山。三十日，遇三龙并起于海，光怪可骇。六月初五，终至琉球那霸港口登岸。

六月二十九日，行祭王礼。七月十九日，行封王礼。八月，共度中秋。九月初十，琉球国设宴饯行。十月初八，又往琉球王城一别。十月二十二日，登舟回国。在琉球共待四月有余。

十月二十七日，遇海上风暴，册封舟“颓然若屋宇将倾之状”，舟上“人人愈益惴恐”。二十九日晚，终见台州山，“于是无不哗呼舞蹈，哄然色笑焉”。

十一月初五，入闽城，回京复命。至此萧崇业与谢杰的使事任务方完，耗时三年有余。

此书明确著录为谢杰所撰的有“艺文”中的《洒露堂记》以及《皇华唱和诗》中与萧崇业的唱和之作。

《洒露堂记》记述了正使萧崇业为琉球国天使馆之堂命名之缘由，文辞优美，行文流畅。

《皇华唱和诗》前有萧崇业所撰《小序》：“余二人居中山四阅月，辄有属缀，皆与使事相关，非徒流连光景者比也。诗以时次，不论格云。”可知这些诗作是以作诗时间为轴收集，亦为他们此次使琉经历与感受的真实记述。言为心声，溢于笔墨。

《皇华唱和诗》收录了《梅花开洋》《过东沙山》《迎熏歌》《见山谣》《三龙吟》《祭王漫赋（有引）》《封王篇（有引）》《王致词清辨虽其臣素通汉语者不能过口占一绝》《王至使馆（有引）》《述志兼谕夷中君长》《却金行》《东光寺待月不至冒雨归》《中秋宴集》《海月咏》《水亭观龙舟》《膳亭口占》《九日游东寿寺》《即事》。因《皇华唱和诗》有缺页，现仅保有唱和之作十八组，实际收录应有更多。

另此书开创性地绘有《琉球过海图》，把中琉之间的海上道路以图画的形式清晰地表现出来，所遇海山皆有标注，另有一行小字标明针路，但并未标明作者。依笔者浅见，此图出自谢杰之手。依据有三。一、萧氏为内陆人，对造船、航海一事所知不多，其在《使琉球录·使事纪》中直言“于是舟之庇也，大都多谢君指画焉”，肯定了闽人谢杰在此方面的能力与贡献；二、《琉球过海图》下记萧崇业一言：“图海，犹之绘天也，岂易得其肖哉！即善丹青者，鲜不龟手矣。第水路必用针，亦古人指南之法，此图似不可少云”。从此句话的语境亦可确定，此图并非萧氏所作，而是出自他人之手。三、在谢杰的另一著作《虔台倭纂·倭防》篇所附的多张图中，有一张为广东自辽东地段沿海海防长图，可知谢杰极擅绘制海图，并重视海图的实质性作用。

萧崇业与谢杰合编的《使琉球录》（二卷）现行世有明万历七年（1579）序刊本、《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本、《台湾文献丛刊》本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明史·艺文志》《（崇祯）长乐县志·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乾隆）福州府志·艺文志》等书除著录有萧崇业、谢杰同编的《使琉球录》二卷外，还另著录有谢杰《使琉球录》六卷。最早著录此六卷本的是《（崇祯）长乐县志·卷十艺文志》。例如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明史·艺文志》抄本载：

萧崇业　使琉球录二卷
陈　侃　使琉球录二卷
谢　杰　使琉球录六卷

明代书籍总合目录《千顷堂书目》亦载：

萧崇业　使琉球录二卷
陈　侃　使琉球录二卷
许士霖　使琉球录二卷
谢　杰　使琉球录六卷

如上所举，均将萧崇业《使琉球录》二卷与谢杰《使琉球录》六卷分列开来。那么是否确有谢杰《使琉球录》六卷本，若有，究竟何在？是刊本？还是抄本？至今仍无从得知。据方宝川教授考证，疑有误。但依笔者大胆推测，此六卷本或许是谢杰所写的所有与琉球有关的著作的统称，即与萧崇业同撰的《使琉球录》二卷、《〈琉球录〉撮要补遗》二卷（因附在万历三十四年册封正使夏子阳《使琉球录》二卷之后，故也算为二卷本）与《虔台倭纂》二卷。

### （二）《〈琉球录〉撮要补遗》不分卷

《〈琉球录〉撮要补遗》不分卷，是书题：“长乐谢杰著”[①]。另有谢杰自注言明作此书的目的为：“《琉球录》，为使琉球作也，业已备矣。然就中有文而烦者、有阙而略者，余为撮其要而补其遗；盖期于简要，工拙非所论云”，且在“御倭”篇后又直言此书为“旧政告新之意也”。从《〈琉球录〉撮要补遗》之题名至以上种种自注可知此书为谢杰对其与萧崇业同编的《使琉球录》的续补之作，是谢杰私人对此次使琉之行的多方面记录、总结与感悟。

册封琉球副使私人单独著有长篇的《使琉球录》，谢杰为第一人，也为明朝时期唯一一人。在此之前，仅有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琉球副使高澄作《临水夫人记》《天妃显异记》与《操舟记》三单篇，皆收录于萧崇业与谢杰同编的《使琉球录》中。而在清朝时期，中国政府共派遣了8次琉球册封使团，每次归国后均上呈琉球使录，其中三本琉球使录为册封副使单独编纂，分别是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副使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清嘉庆五年（1800）册封副使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

谢杰该书附于夏子阳、王士桢合编《使琉球录》二卷之《附旧使录》中，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面世。

夏子阳（1552–1610），字君甫，号鹤田，江西广信府玉山县六都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绍兴推官，先后在兵部、工部任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兵科左给事中充册封琉球国正使，并拜访时任仓场总督的谢杰“访求使事要领”[②]，并重点询问“造船惟坚、用人惟练、督造有司惟良”等方面。万历三十四年（1606）五月二十四日黎明从福州梅花港开洋，奉命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尚宁。

王士桢（？ –1607），字衷一，号旭阳，山东济宁泗水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作为副使与夏子阳同使琉球。

关于此续补之作的成书时间，谢杰并未言明，而学术界则主要持两种看法。一、此补遗之作乃谢杰自琉球归国后当即所作，依据为前任使者的作品刊行于后任使者的《使琉球录》中已有先例，不足为奇；二、此补遗之作为谢杰归国后二十年所作，依据为谢杰于此书中自题：“以上八条，多前录所遗，余怀之二十余年，不以告人。”但两种看法都尚未提出强有力的依据，故此作的成书时间并无定论。

笔者细阅此作与其余史料，推敲得出此书应成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左右，即是在当年与夏子阳谈话之后整理而成，依据有三。

一、此补遗之作有表明重要时间节点的文字记述。第一篇《原委》记：

> 关白之乱，闽抚台曾请停封，余有疏从臾之；比得允，闽人皆向余贺。余曰：“未也。关白存，我不遣封，彼亦不敢请。关白若平政，须别议耳”。今果然。余固知夷之必请，又知高庙神灵之必不欲废此典也。

这与夏子阳《使琉球录》中记述相符：

> 万历二十有八年（1600）正月，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遣长史等官表请袭封，距其故中山王尚永之薨已十二年矣。所以迟迟者，盖惕于日本关白之乱也。先是，福建抚臣许公孚远议：以海警，欲令领封；业有成命矣。嗣以世子表请，议改遣武臣往；而世子又援礼制及己卯例为

① [明]谢　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 287 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 年。
② [明]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 287 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 年。

请，甚恳。礼部上其议，遂得旨仍用文臣二人往。

已可明确此作成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后。

二、此作比之要上表朝廷可备“史馆之采择”的《使琉球录》更像是对夏子阳等后来奉使册封者的专门建言之书。它既删去了官方材料，如题奏、诏敕等，又删去了使琉日程记录，如航海过程、在琉经历等，所写的八篇正文外加两篇琐言均为册封任务中需要重点了解与注意的部分。其中封舟建造、匠役选用与航海敬神三个最关乎生死性命的方面，则是不止给出建议，更是“详推其始末，以告来者；庶后人知前事之可循，不敢轻于变易也”。而琐言二则中则以先前的琉球册封之行为例，直言了对夏子阳此次出使琉球的期望，“此番奉使，计不至己卯，亦不必如辛酉；得如甲午足矣。”

三、此作有关日本的记述颇多，对日本极为关注。《〈琉球录〉撮要补遗》正文共计八条，其中四条都涉及日本，《御倭》一条还令附有“日东交市记”一文专门谈论日本对中琉两国的骚扰与野心。若是此作和其与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二卷）写于同一时期，那么在《使琉球录》（二卷）中就也应有对日本的一些记述与关照，但所查并无记录。而若是此作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左右，则相当于成书于谢杰另一专论日本的著作《虔台倭纂》（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之后，那么谢杰在一份琉球使录的补遗之作中极为关注日本便有逻辑可循。

《〈琉球录〉撮要补遗》共八篇，末附“琐言二则”，文中散见对夏子阳此次出使琉球的建言，具体如下：

第一篇《原委》介绍了琉球之名的由来、所辖地域、邦国与官吏制度、各阶级的穿戴区别以及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尤值一提的是，该篇首次比较详细地将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记载在案，描绘了他们迁往琉球国后的生活情况，亦建议后人可多招募闽省河口人为通事以通琉球，记录如下：

> 洪（武）、永（乐）二次各遣十八姓为其纪纲之役，多闽之河口人，合之凡三十六姓，并居彼国之营中。子孙之秀者，得读书南雍。俟文理稍通，即遣归为通事，得累升长史、大夫。今所存者仅七姓，缘所居地狭，族类不能藩故也。每科、司出使，必以河口土著人充通事，谓之“土通事”。七姓充者，谓之“夷通事”。土通事能夷语，夷通事能华语。七姓言语、衣服与夷无别，仅以椎髻别之。髻居中者七姓、居偏者夷种也。七姓男虽贤，不为国婿；女虽美，不为王妃：盖其祖训然尔。

第二篇《使礼》记录了册封琉球时中琉双方应有的礼节，包括礼服穿戴、册封礼仪、宴会礼仪与交流用语等，还多记逸事，以期提醒后来奉使册封者需注意的问题与提前解答他们会有的疑惑。一、册封使“衣则科赐麒麟、司赐白泽，玉带则俱自备”，谢杰的玉带即为多方转借，后来册封者也应提前准备，此事亦从侧面展现了谢杰为官之清贫。二、琉球世子先是以“旧典”为借口，封王礼跪拜，祭王礼却不跪拜，被萧谢二人以礼义孝劝服，后“瞿然亟拜”。琉球国在众多藩国中虽“最为守礼”，但还需册封使们多为提点劝告，不得马虎行事。三、因“以华音一字夷音皆三、四字”，故每每相谈琉球言数十句，译者仅数句翻之，不必疑惑，语言差异而已。且平日问安皆为长史，即“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华语夷语皆通，沟通交流不成问题。

第三篇《封舟》强调了最为重要的造船事宜，大到册封舟的整体布局、形制到小到每一根木材、铁钉的选择都一一提出建议。还记叙了在闽省以上价却买到下铁一事，险些令造船官被军法处置，幸而当地人谢杰熟其事，弄清真相为“精黠奸户故求多于有司，诸具物往往以丑恶相欺售”，方“乃释造船者不治”，以此提醒夏子阳“因知此差之难，非特海上风涛之患，而且有地方玩视之苦”。

另关于如何运巨木于众乡之间，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一、巨木每过一乡便由当地乡人帮忙运输，不给钱银，属义务劳动，共需调动乡民“似有十万之数”；二、拨兵六百，给粮给钱，专于运输。看似第二种方法比起第一种更加人性化，更易于管理。但谢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盖散十万之众于数百里间，借其朝旦之力，则人乐于易集；虽不给，且不怨也。萃十万之事于数百人，责以旬月之久，则人苦于难继；虽给以厚植，不堪也。”所以担任册封使思考问题不能过于表面，因考虑实际，懂得变通。

第四篇《用人》把“造船所急在船匠，行船所急在船梢”与随船军队人员的选择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不可专选一地一国之人，必须考虑地区特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谢杰把每一地区人员所擅之事都一一归列出来，并明确其选择标准，另后来者有例可依。而且从此亦可看出，册封舟的建造与航海过程中，既有福建的福州、漳州、南安、万安、长乐梅花人等参与，还有浙江的定海人，甚至琉球人共行。

第五篇《启行》非如一般的琉球使录记录封舟开洋后的航海路线，而是详记了封舟在闽的行驶路线，且对为何常任命当地县丞为引港人的原因“详推其始末”使后人“不敢轻于变易也。”封舟刚启行入港，便伤其四舱，谢杰初虑以战船、盐船替之，但幸得一父老建言，别船“实由南而北或北而南，率循汇不远。惟封船自西徂东、自东还西，乃冲横浪万余里”，切不可轻易更换。大洋航行与江河不同，所思所考必须依特殊的实际情况而定。此篇中，还强调了不知姓名的二父老之贡献，谢杰认为其二人为神之使者，特为此次册封保驾护航而来。从此观念可推出，海神信仰在科技水平不甚发达的古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六篇《敬神》更是重点突出以天妃妈祖为主的海神信仰。“众役初往，事神颇虔，因得晏然抵浒。归日，稍有易心，不复如从前之敬信”，便遇海难，失舵飘摇，最后还是求神卜珓，方得平安。海上每逢风起前还有妈祖所示先征，令船队可以提前准备；甚至遇传说中的“龙神迎诏”，其声势骇人，“人心汹汹惧甚”。但谢杰不畏，书“诏敕在船，龙神免朝”八字示龙，风波遂平。虽然历届册封使都经儒家教诲，不语神鬼之事，但海上经历使他们不得不更加笃信海神，以此增强自身乃至整个团体的信心与勇气，提高渡海成功率。

第七篇《国俗》描绘了琉球当时的真实境况，如气候、物产、房屋、服饰、习俗、律法、宴会演乐、国人性格乃至文化程度等方方面面。在方方面面中，又可见中华文化文化对琉球之影响，总评“琉球虽夷俗，然渐染于中华，亦稍知礼义”，“风尚似胜北虏远甚”。同时琉球又有日本文化的直接渗透，“教书、教武艺，师皆倭人，聪警雄俊则不逮倭”。谢杰所具的敏锐洞察力令其马上领悟了琉球频频请求中国政府册封的根本原因是想借中朝之威势，防倭寇侵略之心，直接表现在琉球国“未封之前，岁多凶、船多坏；封后，则常丰、常宁。所以外侮既除之后，知其必请封不已也。”把琉球国的真实面貌与请封目的展现于后人面前。

第八篇《御倭》及其后所附的“日东交市记”，更是直接记录了册封使团在琉球时与日本势力冲突之始末，亦记录了中琉双方面对“倭人”时的做法，提醒后人“不急倭衅、不中夷巧、不违众情”，才能不辱使命。琉球国小民贫，又与日相邻，因财不足，多借贷于日。每逢中国使船至琉，其余国家商船或来贸易，或是不来，但日本每每必至。名为贺喜，实则追债，无利不往，常夹道纵观明朝使团。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使琉时，就因日人围观不退，琉兵挥鞭赶人，被日人怒而拔刀削其鞭，虽未引发更大的纷争，但气氛紧张，因引为鉴。至萧谢二人使琉时，琉人知中日素有

交恶，又因日人在琉居所距天使馆不到二里，恐又引发争端，便提议迁册封使团于唐营（即“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在琉聚集地）。萧氏知谢杰“世海上居，宜洞倭情”便问计于杰，杰举五理由谏拒：一、并无先例，“岂有堂堂中国而避外夷乎”；二、距离甚远，恐联络颇为不便；三、有法可治，严令使团众人不与日人交互，无交流，自可无虞。四、此为夷计，琉人不促日人迁反促明人迁，是以倭情为借口，意在锢明便己；五、日不足惧，日人号倭奴，是因其有主，其之所以寇掠中国，是被沿海“恶少”所愚用，今未有主，双方又无冤仇，无需恐惧。萧氏从杰谏，拒之。虽然使团众人“奉法凛凛”，但还是发生了意外事件。八月二十六日飓风起，明人日人赶忙各护其船，混乱间日本有一首役受伤，血流淋淋，眼看冲突一触即发，幸而谢杰验伤发现，此乃无意间所受之刀背伤，非有意相杀之刀口伤，才使得风波未起已息。谢杰不经感慨道：“盖其时之天幸如此。”从中琉双方的严阵以待可知日本在琉势力之强，其后册封者需多加提防。

最后附琐言二则，有自注：“琐言，本不欲言，势有不容不言者，故仍言之。”

《〈琉球录〉撮要补遗》前八篇皆为已成事实的事件记述，是望后人能以此为鉴，听从建议从而更好地完成册封使命；琐言二则则是针对发展中的事件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翻滚，人们也要做出应时的改变。

第一则《事权》首句便提出“天下事，假之以权则易集，权不在手则难成；况使夷航海，大事、危事乎！”在闽省准备众多出使事宜时，权力集中于何处亦关乎使事顺利与否。对此昔日三次册封，因当时社会环境不同，结果亦大不相同。嘉靖十一年（1532）陈侃之使时，虽有藩司主管，按台统筹，但行事多与册封使商讨，府、县亦是积极配合。册封使虽说无全权但可总领整个准备工作。至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之使时，恰逢倭人时常侵犯，军门自顾不暇，所以册封使可全权安排准备工作。而至万历四年（1576）萧崇业、谢杰之使时，四海昌平，军门全权负责所有事物，册封使只能在规定下行事，“以故役之在官者，日就惊危；使之在事者，日就局促”。后奉命册封者应努力得自主权利，“计不至己卯（萧崇业、谢杰之使），亦不必如辛酉（郭汝霖之使）；得如甲午（陈侃之使）足矣”。须“知此差之难，非特海上风涛之患，而且有地方玩视之苦”，把权力把握在自己手里至关重要。

第二则《恤役》更是关注了先前册封使从未关注过，之后册封使也极少关注过的使团航海利益问题。谢杰也深知“利者，君子所不道”，但此利非为己私，而是为了使团众役，且“苟非利以驱之，何以结其心而得其力”。出于此，谢杰对往年册封使团所获利益都十分关注。此篇载自明初起，每逢琉球国王册封，都准许随行约五百名人员各携带百斤（约60公斤）货物，同琉球人展开贸易。嘉靖十一年（1532）陈侃使节团由此获利1万两，随行人员各分得8–40两不等；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使节团得利6千两，众人各分得5–20两不等；但至谢杰当年（万历四年），虽所带货物精巧如前，但使团总获利仅3千两，人各分得仅1–16两，众人大失所望。谢杰对此商品贸易利益骤减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一、汇聚那霸港的“番船”数的减少，使得作为贸易中转站的琉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大减少；二、由于万历年间“海禁”政策的宽松，华南地区与南洋之间的直接贸易扩张，使得原本以中国商品为中介贸易之主的琉球地位大大下降了。以这个趋势发展，谢杰对夏子阳此次出行能否招募到好的船员也颇为担忧，故建议夏子阳多支付些出行津贴，并告知众人琉球今“所蓄积必已稍充，不至如前之贫甚”，以期吸引当地有经验的好船员。

从《〈琉球录〉撮要补遗》全文内容来看，更是明确了其成书时间应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

夏子阳谈话之后。

该书现行世有会稽夏氏宗谱活字本与《台湾文献丛刊》本。

## 三、谢杰琉球使录的价值探识

历代册封使的琉球使录都是以其亲身见闻书写而成，其所含的珍贵史料价值非其他文献所能及。他们对自身的出使始末，每一个册封环节均有详细的记述。所载的各类中对琉的诏敕、仪注、琉对中的奏疏、表文，都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中琉两国的宗藩关系与相应的规章制度。关于封舟建造的一系列事宜更是所记甚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造船史，尤其是明代福建造船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琉海上航路的记载，更是打开了中国海洋交通的新的一页，是当时航海技术的直接体现。海上航行时还每见海神天妃显灵事件的精彩叙述，是研究中琉海民海神信仰的珍贵历史资料。在琉期间对琉球国风土人情、山川物产的记载，回国后还特意集群书以质异，展现了当时琉球的真实面貌，订正了前人的纰漏异辞。以上种种均是各琉球使录基本都具有的，为世人所公认的史料价值，而谢杰的琉球使录除了具备这些史料价值外，还另有三方面的特殊价值。

### （一）闽籍册封使使录的实用价值

“使琉球，与使他国不同。安南、朝鲜之使，开读诏勅之后，使事毕矣；陆路可行，已事遄返，不过信宿。琉球在海外，候北风而后可归，非可以人力胜者。”琉球册封使的任务远繁多、困难于其余国家册封使，不仅是需“远涉异国，阅历半载”，在出使前还需在福建花费一年半载的时间用于准备出使事宜。

古代中琉航路险阻万分，必须“以造舟为重视”，同时“浮海以舟，驾舟以人”，船员的挑选同样至关重要。福建造船史悠久，尤其是谢杰家乡长乐，位于福州东南闽江出海口，古称吴航。旧传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或以为，所谓吴航，实则是东吴在建安造船的具体场所。二说不管谁是谁非，总之长乐有着悠久的造船史当是事实。长乐又为琉球贡船及中国封船出入之口，使团中的梢公、译员等职多出于此地。福建沿海又“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皆漳、泉、福宁人”，而其余“熟于海道者，或取之梅花定海军，或取之镇东万安军，又或取之琉球夷梢医卜，各取之所便。天文生一名，不用南京取之，于闽各色把总省祭官之流以备委用，强壮武艺之夫以资御辱。”这个由五百人左右组成的册封使团，绝大多数都为福建人。

琉球册封使任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使得闽籍册封使的重要性凭借着当地人优势凸显出来，也使得其编写的琉球使录比之其余地区琉球册封使的使录更具实用价值。谢杰亦深知自身优势，故而在琉球使录的记述中亦在此方面多着笔墨。

从造船方面论，小到钉子的购买：“钉必须坚，务择精铁。其铁须买之尤溪，价必多给，方得上好；慎勿轻买、轻收”；木材的选择：“木必用松，桅木必用杉，舵木必用铁力；余若樟木、杂木，亦皆随宜而用”，大到舱房的打造：“每舱多用龙骨，欲实而密，令坚致可久”；封舟的形制：“舟带虚艄长十七文、阔三丈有奇，舱分二十八”均有详细记载。

从人员方面论，其余册封使均有载的封舟船匠与船艄的选择，谢杰根据不同地区人员的特性分而载之：“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船梢有三：伙长司针者、舵工司舵者、阿班司篷缭鏊橹及执诸事者……然福、漳二匠虽兼用，而漳匠可量多数名。伙长诸役虽多用漳人，而福人亦不可尽弃：以其各有所用也。”而对于其余册封使少有关注的运送木

材的人员、舟上护卫军、福建内陆航行引路者的选择，谢杰也有详细的记录。运木应“木过一乡，即以一乡之夫拽之；隔一程，有夫来换，前夫即遣归。二程、三程，以后皆然”；舟上护卫军“不贵多，贵精。船中择漳人，须试其谙于过洋者；择梅花、定海人，须试其谙于闽、浙海道者；择万安人，须试其谙于闽、广海道者”；海上航行虽危险，但封舟建造完毕后从内陆河流发往梅花港的航线也同样至关重要。因封舟是针对大海航行而造，故在内陆河流中不免会出现不甚契合的各种问题，这时就需当地引航者，走好封舟启行的第一步，需“用闽县县丞或簿、尉一员，引至长乐界上，乐丞來接，闽丞方归。”

因谢杰生长于海上贸易经济发达的繁荣港口，其对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关注也远甚于其余册封使。此商业的敏锐触觉投射到琉球使录的编写中，则表现为对历年册封使团所得盈利的记录，与如何以利招募到更多更好的所需人员的思考。

谢杰琉球使录不仅是对当时实况的记录，他还对每一个选择都详推其始末，力求为后人提供一本如何更好地完成册封任务的工具书。比起其余琉球使录单纯的史料价值，谢杰其书还具有可操作性极强的实用价值。

### （二）记录日本对琉野心的开创意义

琉球原为属于中国藩属的独立小国，现为日本冲绳县与鹿儿岛县的组成部分。日本在琉球发迹时便开始觊觎琉球，边境骚扰不断。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便正式发动对琉球王国的侵略战争，使琉球进入了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一国两属”时期；清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更是径直宣布把“琉球国王”降为“琉球藩王”，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正式率兵接管、吞并了琉球，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侵略、吞并绝不是突然起意，一夕促成的，必然是先对琉球国进行势力渗透。作为直接前往琉球的册封使团，是有极大的机会直面日本在琉势力，并把其记之于使录上表朝廷。

因陈侃之前的琉球使录已不可考，故在谢杰之前的琉球使录仅见嘉靖十三年（1534）陈录与嘉靖四十年（1561）郭录。陈录载，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二十三日，当琉球国王欲往天使馆拜访册封使时，“因日本人寓兹，狡焉不可测其衷”，所以只能派遣长史先行谒见，表示将在日本势力离开琉球后，再亲自前往天使馆会面。陈侃面对琉球国王这一行状，评曰“海外之国惟彼独尊，深居简出，乃其习也”，复曰“井底之蛙，其可语以天日之高明也哉”，对日本在琉势力似乎不屑一顾。陈侃好似并未意识到，日本在琉势力之猖獗已足以影响到琉球国王在琉球国境内的正常外交行为。当然也不排除陈侃已了解真实情况但仍粉饰太平的可能性。陈侃通过琉球长史等人的协助，记录有琉语、琉字（使录中称夷语、夷字），琉字后附陈侃注：“夷国上下文移，往来书札，写止此数字。”将夷语、夷字与日文相比对可知，琉字中所用为日文字母，琉语中亦有许多日文词汇，陈侃是否了解此情况现不得而知。郭录有关日本的记载更是仅“有贼船从其境上过”一句而已。

而至谢杰琉球使录，虽与萧崇业合编之《使琉球录》二卷未有关于日本的记载，但其在归国二十年后所写的《〈琉球录〉撮要补遗》却有一半的章节都有关于日本的记述。第一篇《原委》：“关白之乱，闽抚台曾请停封，余有疏从臾之；比得允，闽人皆向余贺。余曰：‘未也。关白存，我不遣封，彼亦不敢请。关白若平政，须别议论耳’。”记录了日本势力对中琉正常册封行为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篇《使礼》：“封舟抵浒，国相以下跪迎。王时为世子，不迎；以倭舶在近，不免戒心，故尔”，哪怕在中国天朝使团旁，日本势力对琉球王依然有很强大

的威慑力。第七篇《国俗》，谢杰发现了在琉球“教书、教武艺，师皆倭人，聪警雄俊则不逮倭。器械亦钝朽，具数而已。苟非恃险与中朝之神灵，为倭所图久矣。”日本对琉球已经开始展开了文化渗透，琉球若非借着中国之势，可能已经成为了日本属地。第八章《御倭》及其后所附之《日东交市记》更是对日本在琉势力的直接的、详细的描述。

从谢杰琉球使录中可知，谢杰对日本人在琉球文武教育中的地位，琉球在财政上对日本人之依赖，日本与琉球商贡贸易之频繁，日本人露刃而市的事件后所代表的日本在琉势力的雄厚，琉球人缺乏雄武气度又军备不修根本无力阻拦日本侵略的事实等等，都知之甚详，并把它们记之使录。

在其之前的使琉人员对此仅有片语只言的记录，而观其余史籍资料，更是可得出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萨摩藩征琉前，明人均讳言琉日关系，对此记述甚少。而促使谢杰写成《〈琉球录〉撮要补遗》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使琉球的夏子阳，虽意识到“琉球行且折于日本矣”，但对日琉关系也无进一步的记述与分析，且当时已是琉球被迫提供日本侵朝战争粮草之事十三年后，萨摩藩侵略琉球三年之前。比较之下，谢杰对日本在琉势力的观察相当敏锐、深入，对日本侵琉的野心，琉球欲借中国之势抵挡日本的策略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此后中日琉关系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谢杰对日本的认知与分析，均得到了史实的印证，足见谢杰之高瞻远瞩。

谢杰琉球使录中对日本在琉势力的记述与分析相比于其之前，同时代，甚至之后的琉球使者都要详细、深入，为琉球册封使中第一人，极具开创性意义。

### （三）提供了钓鱼岛属于中国之力证

明清两代册封使所撰写的琉球使录还有一重要的意义，那便是提供钓鱼岛主权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的力证。因琉球使录本质为册封使上呈朝廷，得皇帝亲自批阅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出使报告，故具有极高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从明嘉靖十四年（1535）陈侃到清同治五年（1866）赵新，十三部琉球使录对中琉航路上的钓鱼列岛虽记载详略程度有所不同，但都连续不间断地记载了钓鱼列岛处于在我国的海疆之内的事实，是记载钓鱼岛主权属于我国的最丰富、最集中的文献。关于中琉分界，记述亦为明确。中琉海疆自然分界为黑水沟，黑水沟以西为中国，以东属琉球。分界岛山为赤尾屿、故米山，赤尾屿位于黑水沟以西，是册封使团往琉球时所经的最后一座祖国岛山；故米山位于黑水沟以东，乃琉球国西南国门，是册封使团往琉球时所见的第一座琉球岛山。关于琉球所辖三十六岛的记录也证明了钓鱼列屿不在其中。这种延续而详尽的文献记载，日本是没有任何文字可与之比拟的。

但文字记述有时因古今词义的发展，断句的不同，还有名称的改变，可能会对史籍材料的解读有所不同。日本国就曾以清道光十八年（1838）林鸿年、高人鉴《使琉球录》中所记针路试图证明钓鱼列屿不属中国，而属日本的扭曲事实。

林鸿年、高人鉴合编的《使琉球录》已散佚，当时针路被收录在清同治五年（1866）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二中：

>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五虎门放洋，午未风，用辰针。申刻，过竿塘；二更，西见东沙；三更，未风，用卯辰针。初五日未刻，南见半架山。初六日，酉戌风，用卯针。未刻，取钓鱼山。申刻，取久场岛。酉刻，巳风，用卯辰针。近晡，转辰巳风。初更，转午方，用卯辰针。初七日黎明，取久米赤岛。酉刻，申酉风，仍用卯辰针。初八日黎明，西见姑米岛。申刻，见马齿山。酉刻，湾泊那霸洋面。初九日辰刻，进那霸港。

久场岛，久米赤岛，就是先前使录中未使用过的岛名。而实际上，久场岛指的是中国的黄尾屿，

久米赤岛则是中国的赤尾屿。这是中国文献中首次引用琉球名（一说为日本名），因是琉球船工的误判而导致使录的误载。日本政府便试图以此为证据，并利用中日语言词序的差异与以读音有关联或相似的岛名来指代中国的钓鱼列屿，以此窃取中国的固有领土，其野心昭然若揭。针对日本这种不符合史实的行径，复旦大学的韩结根教授的《从琉球语“友昆姑巴甚麻”及久米赤岛等地名考释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与郑海麟先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一书中都有具体的分析，并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这一论调，故在此不再赘述。

文字记述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证明，但若能又辅之以图，必然不会再造成别国的有心误读。谢杰琉球使录中关于钓鱼列屿的文字记载存于与萧崇业合编的《琉球使录・使事纪》中：“三十日，过黄茅。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在卷前还有《琉球过海图》，分16页，组合而成便是福建梅花港至琉球那霸港的整条航行路线。

《琉球过海图》不仅绘出了台湾东北方附属岛屿，记载钓鱼屿、黄尾屿、赤屿等钓鱼岛列屿的各岛名称，更是详尽地标注了通往琉球的“针路”。此航线以文字排成一线：“梅花头（福建闽江口之梅花镇），正南风，东沙山，用单辰针， 六更船。又用辰巽针，二更船，取小琉球头（台湾基隆）。乙卯针，四更船，彭佳山（台湾彭佳屿）。单卯针，十更船，取钓鱼屿。又用乙卯针，四更船，取黄尾屿。又用单卯针，五更船，取赤屿。用单卯针，五更船，取故米山。又乙卯针， 六更船，取马齿山。直到琉球，大吉（“针路”中所说的“更”，原本是个时间单位，但在此是用来计算里程的单位，一昼夜为十更，一更的里程约五十至六十里）。

此航海图表明，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已对福建、台湾沿海的岛屿直至琉球沿路所经过的海山岛名称、海上景观、海域环境、往来航线的风向、针位、里程等极为熟悉，中琉间已有较为成熟的海上航道。这些重要的航海元素均是由中国人反复验证并记录下来的，它是中国古代王朝管辖海洋的历史痕迹，印证了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如鸡笼山、花瓶屿、梅花屿、彭佳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早就为中国人所认识，并纳入了中国经营海洋的版图，是无法磨灭的主权标志。同时，也证明至少早在明代，中国文献已不把钓鱼列屿归为琉球所属。文字辅之于图，且可按图索骥，实地考察，明确了钓鱼列屿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

这种对钓鱼列屿的海图描绘，在日本古代文献中不见一丝痕迹，可见日本妄称“尖阁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国的固有领土”是无视历史的欺世谎言。

谢杰原作此《琉球过海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古代擦亮中琉海上交通的道路，已是具有开创性的实质意义；同时对于现今中日针对钓鱼列屿的主权争端问题，也提供了明确有力的历史证明，更是极具现实意义。

谢杰为人正直，心胸宽广；为官清廉，鞠躬尽瘁；为使不辱使命，首开却金之风，在日琉面前维护了中国天朝的尊严；所撰写的琉球使录不仅在当时颇具实用价值，还少见地把日琉关系写进使录中，敲响了明人对日的警钟，在现今更是研究中琉关系的珍贵史料，是钓鱼列屿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明。

# 莆田玉湖陈氏的家谱编纂与家风承传

方宝川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莆田玉湖陈氏以宋初陈仁为开基祖，世代繁衍，名人辈出，史有“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之称誉。莆田玉湖陈氏家谱，创修南宋，毁于元初，复修明初。至今所知见之旧谱，仅约有清代与民国时期的 6 种。以陈俊卿、陈文龙为代表的一代名丞、官宦与学者，满门忠烈，垂名青史，不能不说是玉湖陈氏世代，积德行善、诗书传教、事亲孝悌、清廉忠义的祖训濡染与家风承传之所然也！

**关键词**：莆田；玉湖陈氏；家谱；家风

陈姓为莆田大姓之一。自古以来，入莆陈氏有“十八陈”之说。一般认为莆田陈氏开基于陈迈。陈迈 (585—658)，字斯征，号元一。原籍河南颍川。自幼聪慧好学，胸怀大志。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领泉州兵马镇守莆田。唐武德二年(619)，莆田置县，擢为县令，为有史记载的莆田首任县令。遂举家卜居莆田城内刺桐巷，世称“刺桐陈”。明弘治十八年(1505)，莆仙陈氏各宗支后裔同尊陈迈为兴化陈氏肇基始祖。

宋代莆田李俊甫《莆阳比事》记载:“陈氏旧族五，新族三十三，嗣是而来，尚未数计。”[①] 由此可见，早在宋代莆田陈氏就不止“十八陈”了。看来陈氏由各地入莆以后，各著所居，始为新旧诸派。宋人陈俊卿《玉湖陈氏谱系图序》云：“吾祖从钱塘而来，四历代而诞俊卿，盖隐约将百年矣。”[②]时人黄公度《莆田陈氏族谱·序》亦云：“陈氏之先，本於虞舜之苗裔……故浙江之地有邑曰钱塘，在周其始祖膺焉。迨其端国之祖，奉朝命之来，保正莆邦，始居钱塘之地……而凌采之子曰仁，迁于玉湖住焉，钱塘之居一裔守祠耳。”[③] 所以莆田陈姓并非全部来自河南颍川陈迈。约唐末五代由浙江迁入莆这支莆田陈氏，宋初以陈仁为开基祖，定居于莆田白湖北岸白沙后埔边，也就是今荔城区镇海街道阔口村。因明代后期，以“白湖”雅称“玉湖”而改为今名。所以这支陈氏支系被称后人为“玉湖陈氏”，也就是目前莆田最大的陈氏支系“玉湖陈”，俗称“阔口陈”。

玉湖陈氏家谱的编纂究竟具体始于何时？史无明载。就笔者所知见，目前存世的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玉湖陈氏家谱约有以下几种：

1.《玉湖陈氏家乘（高林房）》不分卷，[清]陈天爵纂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陈天爵纂修，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本。晋江图书馆藏。

3.《莆阳玉湖二忠珠江、涵江家乘家训格言事略全集》不分卷，[民国]陈镜鸿等编，民国二十四年（1935）石印配抄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作者简介**：方宝川，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③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4.《莆阳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陈道中纂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5.《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陈道中纂修，民国二十六年（1937）刻本复印。泉州市图书馆藏。

6.《莆阳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陈镜堂等纂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上列的 6 种玉湖陈氏家谱，其最早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陈天爵纂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玉湖陈氏家乘（高林房）》不分卷。是谱现存线装三册。

首册有欧振声、黄公度、陈正卿、陈俊卿、陈玭、陈士章《序》文及“世系考”“谱例”“传记”“名公事述”“墓志铭”等。其十四世孙陈玭《序》曰：“玉湖陈氏谱创于工部待郎公，修于枢密忠肃公。事方就绪，元兵南下，子孙播迁，祠宇陵夷，文物荡毁，入我皇明，曾祖省斋公，始重为谱……总为二十卷，题曰《莆田玉湖陈氏家乘》。”[①] 所谓“工部待郎公”即“玉湖陈氏”第四世陈正卿（1112—1184）；“枢密忠肃公”即“玉湖陈氏”第八世陈文龙（1232—1277）。据此推知，玉湖陈氏家谱当创谱于玉湖开基后的第七世陈正卿，初成于宋末第八世陈文龙，而题为《莆田玉湖陈氏家乘》二十卷的当复修于明初的省斋公。另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欧振声《玉湖陈氏家乘·序》载：“陈君天爵承其祖友右先生命出世谱”[②]，又可知是谱乃陈天爵所续修，且仅系高林房之支谱。从该谱“世系考”究之，陈氏始祖瑞国公为浙江钱塘人，五代后周郭威时，奉命来保正莆邦。至曾孙仁公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卜居玉湖，至宋丞相正献公俊卿(仁公曾孙)，陈氏遂世居玉湖。值宋祚倾移，胡元离乱，悲二忠殉国，室庐残毁，无心故居，携其子德期、德秀，寓兴福里高林。后有若德期公者，由高林而迁宁海；有若郡库士心永公者，再传郡宾宗珠公，复由宁海徙居涵江之集奎。

第二册《玉湖陈氏高林房世系表》。所载宋卿公(陈俊卿之长兄)为玉湖陈氏第四世，宋卿生钦绍，钦绍生兖，兖生粲，粲生文龙。文龙生二子：梦雷、梦云。陈氏由玉湖迁往高林是在文龙之后。是谱修至高林房的第三世煜，煜公即作者陈君天爵之五代祖，记事止于乾隆三十年（1765）。

第三册为艺文部分，内容丰繁。收录了陈宓的《仰止堂规约》《仰止堂乡约》，陈文龙的《重修卢氏族谱序》《复姻家许侍郎书》《复唆都元帅书》《报仆巡警事宜书》《被执过合沙赋诗与伸子诀别》，黄公度的《黄公度和正献公韵兼呈方次云》《夏日陈应求见访》《和应求春日见寄》，以及文天祥的《文天祥与陈察院文龙启》《文文山题正献公六梅亭》等许多的文章。

玉湖陈氏祖祠有“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之石刻楹联。其中“九代八太师”的第一代即为玉湖陈氏的开基祖御赠太师“沂国公”的陈仁，第二代太师为一世蜀国公陈贵、第三代太师为三世赠太师冀国公陈诜。第四代太师为四世左承相太师魏国公陈俊卿，第五代太师为五世赠太师永国公陈钦绍，第六代太师为六世赠太师安国公陈兖，第七代太师为七世赠太师荣国公陈诜，第八代太师为八世状元太师参知政事忠肃公陈文龙。以上始祖加八世共九代，除二世没当官外，其余都是太师。而“两丞相”则为四世陈俊卿和八世陈文龙。

①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②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号六梅，一作陆梅。宋代文学家、政治家。《宋史·陈俊卿传》云："幼庄重，不苟言笑。父亡，执丧如成人。"宋绍兴八年（1138），陈俊卿"黄公度榜"榜眼及第。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五载："宋陈仆射俊卿，布衣时梦功名事。仙人谓曰：'在黄公度口。'陈过黄公度语之。黄曰：'我状元，汝榜眼。'陈曰：'君何尊己而卑人?'黄曰：'夫然则状元尔，榜眼我。'绍兴八年（1138），黄状元，陈果榜眼矣。及谒御，高宗问曰：'乡土何奇，辄生二卿?'黄对曰：'子鱼、紫菜、荔枝、蚝。'陈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不如卿。'即改陈状元云。"[①] 后授泉州观察推官，服勤职业，严以律己，同僚宴集，恒谢不往。秩满，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己，改南外睦宗教授，通判南剑州。未上秦桧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任内直言敢谏，斥责奸党，阐明公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高宗称其仁者之勇，擢为兵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孝宗立，俊卿奏《为国之要》献言，命为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迁礼部侍郎参赞军事。改提举太平兴国宫。又以宝文阁侍制知泉州，不久出知建宁府。乾道二年（1166），升史部尚书，受讯馆金使，拜同知枢密院事。三年（1167），任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四年（1168），升右仆射同平章事。抑却私党，奖掖廉洁，整肃吏治，渴求人才。五年（1169），孝宗以俊卿为左相，允文为右相。六年（1169），因不同意允文关于与金通和以及遗使到金国将徽、钦二帝灵枢迎归陵寝的主张，乃自请补外，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在福州任上，政尚宽简，严于治盗，海道晏清，以功进秩。不久，进银青光禄大夫，提举临安洞霄官。淳熙二年(1175)，再知福州。五年（1178），起判建康府，政尚宽简，罢无名之赋，深受士民爱戴。转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官留守。八年（1181），授醴泉观察使，封申国公。九年（1182），以少师致仕，晋封福国公。十年（1183），再封魏国公。淳熙十三年（1186）去世，赠太师，谥正献。

时人黄公度《玉湖陈氏家乘·莆田陈氏族谱序》评陈俊卿曰："凡俊卿之见诸行事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义立身，真宋室之贤相也。"[②]著有《陈正献集》十卷、《奏议》二十卷、《表札》二十卷，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9 首，《全宋文》卷 4646 收有其文。《莆风清籁集》卷五存其诗 4 首。

陈文龙（1232—1277），初名子龙，字德刚，一字君贲，别号如心。陈俊卿五代从孙。自幼"苦学不厌，未及弱冠之年，即以工赋、律而名噪郡庠。以能文章，负气节而著称。咸淳四年（1268）"陈文龙榜"进士，廷对第一，状元及第。度宗御笔改其名为"文龙"，字"君贲"，并被破例加官，授为宣义郎、镇东军节度判官。到任后，秉公处事，不挠不屈，人皆惮之。先后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升为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咸淳九年（1273），上疏极言奸相贾似道之过，被贬出知抚州。到任后，为官廉正，治民宽恕。再受诬告，劾罢归家。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病死，恭帝即位，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德祐元年（1275）春，元军直逼宋都临安，急召人京，起为左司谏，寻迁侍御史。离家赴阙时，决心以死报国。同年（1275）十二月，陈文龙累迁参知政事。元军攻破临安北之独松关，因朝廷决定议和，抗战无望，壮志难酬，便以母老为辞，请求归养。次年（1276）五月，益王赵昰即位于福州，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复为参知政事。十一月，元军直逼福州，知府王刚中献城降。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端宗由海上退往泉州。陈文龙尽散家资，募兵死守兴化。因泉州蒲寿庚献城降元。端宗逃往潮州，兴化顿成孤城。城陷之后，文龙被执，忠贞不屈，一路绝食，押往杭州，饿死岳庙。端宗闻讯赠太师，谥"忠肃"，赐所祀庙名为"昭忠"。明清两代，朝廷曾三

① 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次敕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

由此可见，玉湖陈氏的四世陈俊卿和八世陈文龙，均为宋代贤相，声闻朝野，垂名青史。此外，据玉湖陈氏家谱所记，陈俊卿之后，玉湖陈氏的经考试、举荐、封赠在朝廷内外为官的就有 70 多人，均未发现有丝毫被史志披露为劣迹者。这当与玉湖陈氏的祖训家风，息息相关。今从玉湖陈氏家谱及其相关文献史料所载的陈氏祖训、堂规、乡约等等来看，陈氏一门世代养成了积德行善之家、诗书传教之家、事亲孝悌之家、清廉忠义之家。

## 一、积德行善之家

撰于淳熙八年（1181）八月秋后吉日，赐进士及第龙飞天下状元翰林院官同邑黄公度的《玉湖陈氏家乘·莆田陈氏族谱序》曰：

> 陈氏之传，式微数世。然善始者自有令终，积善自有余庆。揆之先人德行有余，阴骘不少。至七世，而余友陈俊卿，登绍兴第，为进士第二人。兄弟五、六辈皆显贵，视他辈犹有光矣。凡俊卿之见诸行事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义立身，真宋室之贤相也。是后世子孙显贵，绳绳不绝，盖可卜于他时矣。绵绵瓜瓞，诗固有之，余独不为君之后代期乎？陈世族之未可量也。[①]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泉州同安县主簿任，道经莆田，登门拜访陈俊卿。两人遂倾盖如故，交谊笃深。陈俊卿在朝之时，曾多次举荐朱熹；朱熹遭诬，更是屡屡挺护。陈俊卿去世后，朱熹不远千里前来哭吊，并为其撰写《行状》。该《行状》也称：“公之家自沂公以来，皆以好施周急，闻于乡里。”[②]

作为朱熹的入门弟子、陈俊卿的四子陈宓，嘉定三年(1210)，知安溪县。时安溪地僻无药，居民信巫尚鬼。陈宓设“惠民药局”于县衙大门边，聘医生诊治并制药。撰写《惠民药局记》，为民医治，不计盈利。次年（1211），又建“安养院”，收容老弱病残民众。创设印书局，刊印《司马温公书议》《唐人诗选》等书。六年（1213），在前县令修一木桥的基础上，用石重建一座“凤池桥”。上表《辩经总制补解钱》，为安溪百姓减少税赋。将例钱归人官钱，取废寺上等田为“赡学田”，民感其德，为之建生祠于凤池桥旁。出知南康军(今属江西)时，郡内水灾，陈宓奏请减去十分之九税赋，并筑江堤防洪，救济百姓。改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时大旱，陈宓亲率僚吏挨家挨户分给救济之钱粮药品。

陈宓之孙陈瓒，少有气节，宋末乱世，无意仕途，遂尽散粟帛以济饥寒者。

诸此，无不说明了玉湖陈氏自开基祖陈仁开始，都以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关心民瘼、情系疾苦而闻名于世。正是因为陈氏的“先人德行有余，阴骘不少”，所以报以陈氏世族，“子孙显贵，绳绳不绝”。

## 二、诗书传教之家

绍兴八年（1138），陈俊卿进士及第时，曾与宋高宗有一名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③] 陈俊卿十分注重子孙后代的诗书传教。曾立有遗训称：“凡立身则以本朝名公为师，若行事当直而无挠

①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②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③ [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为上……吾有书卷，宜授诵讲，可以明道，可以持身。”[①]所以，陈俊卿立志一生以先哲为师，多次延请朱熹到莆田讲学。

陈俊卿有五子：长陈寔、次陈守、三陈定、四陈宓、五陈宿。长子陈寔，虽是父荫补入仕，授承务郎，仍勤学不缀，博极群书。淳熙间，任泉州军州事通判，历提举广南市舶，泉州市舶司提举。嘉定间，再任泉州军州事通判，终福建帅司参议官，奉直大夫，封开国男，赐金紫服。次陈守、三陈定、四陈宓，均执弟子礼于朱熹。其中：

陈守，字师中。以恩荫任工部员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节，除奉直大夫，后为将作监。

陈定，字师德，自幼聪明过人，以父荫任承奉郎。可惜 25 岁英年早逝。朱熹为其撰写了《陈师德墓志铭》，对其出身官宦名门，而不屑于科举场屋之习，极力赞扬。曰:

> 师德，莆田人，姓陈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国夫人聂氏。师德生秀异，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则已知古人为己之学，而不屑为举子之文矣……呜呼！有如师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书者，止于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视世俗之学，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则既绝矣。夫岂不足以颇慰公、夫人之念，与其兄弟朋友之思哉![②]

陈宓（1171—1230，一作：1171—1226）,字师复，号复斋。南宋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以父荫入仕。庆元三年(1197)，监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亲院，再主管西外。嘉定三年(1210)，知安溪县。七年（1214），入监进奏院。后出知南康军(今属江西)，义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改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仿白鹿洞规制，创延平书院。十七年（1224），改知漳州。闻宁宗崩，请致仕。宝庆二年(1226)，提点广东刑狱，不就，以直秘阁主管崇禧观致仕。卒，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帝为感动，诏赠直龙图阁。

陈宓著作颇丰，有《论语注义问》《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之稿数十卷，惜已佚。《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二十三卷，有清抄本行世。《全宋诗》卷 2852 至 2857 录其诗六卷,《全宋文》卷 6954 至 6971 收其文十八卷,《莆风清籁集》卷五存其诗四首。

陈宓在其师朱熹去世之后，为了感念朱子的授业之鸿恩，先后创设了“朱文公祠”与“仰止堂”，并亲自撰写了《朱文公祠记》，并定立了《仰止堂规约》。其《仰止堂规约》曰：

> 宓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间来访先正献公所寓之馆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义，与友人潘谦之讲论其间。潘久游先生之门而有得者也。间有好修之士，旬一集共讲四子书。本文公之说，而绌绎发明之，如是十余人。潘谓：“人之为学，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约。”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而不约可乎？”遂取圣贤格言为训。又以《吕氏乡约》檃括继其后。凡存心养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条目具列，终身所行不过于此。宓告之曰：“学基于少，成于壮。自壮至老，皆行所得于少时者也。孔门之徒，所以独称颜子为好学，盖颜子自少时，固已从事于博文约礼之间，致力于克己复礼之际。博文约礼，所以启其约也；克己复礼，所以践其约也。夫而后一旦深造于卓然之域，诸友后生志锐正当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于文字语言之末，而徒以博文涉猎为务，不知择其所谓明白简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则将有童而习之，白首莫得其源之弊矣。况敢望颜氏子之卓哉！宓过时而学者也，故深加惩创其述以验诸同志云。

① 莆阳玉湖陈氏家乘编委会:《莆阳玉湖陈氏家乘·丞相俊卿公遗训》，2010 年。
②《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第 4201—4203 页。

宝庆丁亥季秋六日书

辨志：

人之为人，必先辩志。毫厘之差，千里之异。儒有二途，小人君子。学有两端，为人为己。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为己者诚，为人者伪。轻利重义，物我一视。拔伪存诚，隐显一致。凡我同心，请加审谛。透此二关，方是少憩。

致知：

人心有知，在致其极。理本无形，惟物是格。物无精粗，各有其则。近而修身，远而家国。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往古来今，循环代续。心之所感，喜怒欣戚。身之所接，嗅味声色。一家之内，父子主仆。一国之中，刑政礼乐。天高地厚，浑沦磅礴。动植生成，鸢飞鱼跃。考诸往古，治乱因革。揆厥来今，变通酌酢。一理弗明，不免漏落。一义弗精，立见乖错。所以穷理，贵乎该博。所以临事，贵乎审度。方其用功，一一累积。及既融会，一乃贯百。熟谓格物，惟务扞格。熟谓虑事，不必纤悉。凡我同志，要当深识。毋贪近功，一蹴至域。

正心：

仁义礼智，天锡至善。根诸吾心，盎背睟面。宽裕温柔，刚毅奋发。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火燃泉达，其端甚微。仁戒姑息，义防愤激。礼胜则离，智毋诡谲。致乐治心，中心和乐。致礼治躬，外貌严恪。直而必温，宽而必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修身：

人之一身，百体皆具。苟失其则，易置冠履。耳目无加，手足莫措。仪容顺正，筋骸乃固。头容要直，项颈中峙。视必聚精，听必倾耳。色欲睟面，声从腹起。口如守瓶，鼻如嗅馨。固颐垂颌，脊挺肩平。手效抱鼓，足毋箕踞。立微磬折，坐若泥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以此律身，外邪敢侮？体胖心正，貌肃神凝。为学则固，察理必精。克勤小物，大德以成。凡我同志，勿怠勿轻。

处事：

欲正其义，不当谋利。欲明其道，不必计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徒见小利，难成大事。小善必为，勿谓无益。小过必改，勿谓无伤。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时至则行，未至勿远。临事不敏，易至失机。处事欲速，必有不达。疑而勿询，犹正墙面。谋而无断，作舍道傍。

又：

仕止久速，和任清忠。各当其可，以集大成。富贵贫贱，患难夷狄。素位而行，无不自得。横逆之来，反己自修。人非我是，飘瓦虚舟。威武所加，孰不震怵。自反而缩，虽死弗屈。[①]

从上述各条的规约中可以得知，除了报答朱子师恩之外，旨在建立家族书院，教导子孙，读书受业，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并将其立为诗书传教之家训。

陈宓的《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四有《读先君新弟落成诗有感因韵书示蒙孙》两首诗。其一曰：

信矣贤愚共一初，都缘勤怠遂殊居。渊源有本天同健，潢潦无根夕易除。何事不为尘所染，平生须有善堪书。要从陋巷甘勤苦，始得声名满观渠。

①《玉湖陈氏家乘》，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其二曰：

吾家清俭莫忘初，昔日儒酸白屋居。世事直须防满溢，天公偏是喜乘除。看来负廓三千顷，不似传家一卷书。谦损却能丰萃致，试观沧海受川渠。[①]

亦旨在教育儿孙，不忘祖训，操守清贫，笃实博学，诗书传家，修养身心。

另有陈俊卿从孙陈均 (1174—1244) 字平甫，号云岩，又号纯斋。南宋史学家、理学家。自幼受从祖父陈俊卿、从父陈宓影响甚深，恪守祖训，弘扬家风，安贫乐道，淡泊名利，嗜学不倦，慕尚义理，闻义必为，恬于仕进，与理学家真德秀、郑性之、潘柄、杨复、赵汝腾等交谊深厚，磋商学问。后至临安，入国子监为太学生。藉此博览群史与朝章旧制，又广采故老轶闻，仿效朱熹《通鉴纲目》体例，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稽古录》、徐度《国纪》、熊克《九朝通略》等史书，删繁撮要，博考互订。曾两度辞官，一意治史，以一人之力，累积十余年，编撰《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一名《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载了宋太祖至钦宗九朝事迹。故老遗闻，可补史缺。《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帙省约，便于寻阅，故苟非大事，则略而不书。"

由上可见，玉湖陈氏，书香门第，薪火相传，百年南宋，执莆阳学术之牛耳。所以，莆田玉湖陈姓家族厅堂联有："理学源流宗玉湖，文范德业贯莆阳。"

## 三、事亲孝悌之家

《宋史·陈俊卿传》云："幼庄重，不苟言笑。父亡，执丧如成人。"黄公度《莆田陈氏族谱序》评陈俊卿曰："凡俊卿之见诸行事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②]玉湖陈氏宗祠记有《陈俊卿家训》称：

事亲必孝，待长必敬。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冠婚丧祭，秉礼必慎。学文必功，习武必勤。治国必忠，治家必严。居功毋骄，见恩必谢。士农工商，择术必正。毋听妇言，而伤同气。毋作非法，而犯典刑。毋以众而暴寡，毋以富而欺贫。毋以赌博而荡产业，毋以谣辟而坠家声。制行唯严于律己，处世当宽以绳人。

朱熹为陈俊卿三子陈定所撰的《陈师德墓志铭》亦曰："师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尽爱敬，剂和烹饪，必躬必亲，左右福旋，不违义理，而未尝失颜色。于兄弟尤友爱。"[③]由此可见，玉湖陈氏的确是一个事亲孝悌之家。

## 四、清廉忠义之家

陈俊卿一生为官，服勤职业，严以律己，同僚宴集，恒谢不往，直言敢谏，斥责奸党，阐明公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奖掖廉洁，整肃吏治，渴求人才，政尚宽简，严于治盗，罢苛杂赋，以功进秩，位高丞相，却没有、也不想给子孙留下金银财宝、高屋广厦，仅有万卷诗书。曾作《示二子》诗曰："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如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④] 明确以清白为人、勤俭节约之家训教导子孙。其子孙后代也确实遵其家训"治国必忠，治家必严"而行事，以廉为吏，以义立身。例如：

① 陈　宓：《读先君新弟落成诗有感因韵书示蒙孙》，《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四，清抄本。
② [清]陈天爵：《玉湖陈氏家乘》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待刻稿本。
③《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201—4203 页。
④《全宋诗》第 37 册，卷二〇五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其次子陈守，以恩荫任工部员外郎，六授郡符，三持使节，除奉直大夫，为将作监，始终以廉洁奉公著称。

四子陈宓为官一世，谨守父训，刚正不阿，劝诫圣上，敢言直谏，针砭时弊，鞭辟入里，直至身死，家无余财，库无余帛。

陈宓之孙陈瓒 (1232—1277)，至端宗趋海，建宁、邵武、南剑州(今南平市)和福州相继沦陷，张世杰奉命退往广州。陈瓒倾家财 300 万缗，渡海至广东，献给世杰做军费。陈文龙被俘北去，陈瓒率义军攻杀叛将林华，收复兴化城。因寡不敌众，城被攻破，率部 500 人和元兵展开巷战，力不能支，被执拒降，瓒大骂不绝，被元将唆都车裂于五门。

直至陈文龙，更是秉公处事，不挠不屈，为官廉正，治民宽恕，离家赴阙，舍生取义，四邻降元，孤城难支，直面强敌，誓死报国，毁家纾难，募兵守城，城陷被执，忠贞不屈，一路绝食，饿死岳庙。可谓前赴后继，满门忠烈。

综上所述，不能不说是以陈俊卿为代表的玉湖陈氏世代积德行善、诗书传教、事亲孝悌、清廉忠义之祖训濡染与家风承传之所然也！

# 论梁章钜《长乐诗话》的成书背景

李灵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梁章钜生平著述种类繁多，尤以诗话为丰，多达十几部，而《长乐诗话》是其现存的第一部地域性诗话。《长乐诗话》的编纂成书，其主观原因是由于梁章钜本人祖籍为长乐，再加上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学者的自我认知，促使其编纂《长乐诗话》；而客观原因则与长乐独特的人文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长乐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文与地理景观，清代地域诗话的蓬勃兴起，这些都为《长乐诗话》的成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长乐诗话》；梁章钜；文化底蕴；地域性

《长乐诗话》是清代学者梁章钜现存著作中的一部地域性诗话，其论诗范围仅限于长乐县一邑之诗人、诗事，展现了长乐一县诗学的历史发展状况。《长乐诗话》在辑录体例上遵循以人为目，以时为序，诗人行迹与诗事并行的原则，记录了长乐县历史上许多文采出众的诗人，其成书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一、作者的主体性因素

《长乐诗话》撰写完成于梁章钜自京师回籍调养期间，而其成书原因或有两点可考。首先，梁章钜的祖籍是福建省长乐县江田里，清朝初年时，他的祖父带领全家移居福州城，此后梁家才定居福州，因而梁章钜也许是为传扬家乡之诗学而编纂《长乐诗话》。其次是他虽做官多年，却未曾沉迷宦海，而是一直坚守本真，不忘学者本分。他坚持著述，生平所著卷帙浩繁，著述种类多达七十余种，从始至终都以学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搁笔，或许是这两方面原因促使他即使在家闲居调养，也坚持执笔著书，才有了《长乐诗话》。

### （一）弘扬故乡之诗学

梁章钜家族系出自名门之后，其家学渊源深厚。他曾在《退庵自定年谱》中称其家世乃是“自泉州宋丞相文靖公派下分居福州长乐县南乡之江田里，国初迁居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五传，皆为郡县学诸生不断，河间范文达公督学闽中，以‘书香世业’匾旌吾昌”。[①]此外，梁章钜在其组诗《述祖德诗》30 首中则相继列出梁氏一族自周代一直到宋代负有名望德行的先祖 30 位，其中文靖公梁克家列于第 21 位。梁章钜祖上这一支自明至清十四世，代代出秀才，可以看出梁章钜出自传统社会里典型的书香世家。更为巧合的是梁章钜中进士之时，座主竟是纪昀，此前梁氏家族已有两代出自纪昀门下，梁章钜恰为第三代，一门三代皆为纪昀门生之事一时传为佳话。

---

**作者简介**：李灵燕，女，河南三门峡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① [清]梁章钜：《退庵自定年谱》，二思堂丛书本，光绪元年刻本。

我国文人多自幼时便启蒙读书，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之下，文人的骨血里皆有着浓厚的怀乡情思，不论是暂居别处还是羁旅异乡，都心系故乡，因而创作了无数感人肺腑的思乡之作。不仅如此，传统文人面对家乡的历史人文与山川美景，也向来都不吝辞藻，极尽赞美之言，以显故乡之名。梁章钜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有着良好的学术修养和不凡的诗歌鉴赏能力，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再加上长乐文化底蕴深厚，诗学发展繁盛，梁章钜自然也不能免俗。纵使梁章钜的祖父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带领全家搬迁至福州城定居，使得梁章钜并非在长乐县长大成人，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梁氏一族自宋时分居长乐县，至清朝之时已繁衍近千年。尽管世事变迁，其家族经过近千年的传承，梁氏一族的血脉早已深深扎根于长乐县的土壤之中。长乐作为梁章钜家族的传承之乡，无论子孙如何搬迁，都不能磨灭长乐刻在梁氏子孙身上的印记。其本人也常以长乐人自居，因而在著作中时常自署为“长乐梁章钜”。梁章钜在《退庵自定年谱》中云：“丙寅，三十二岁，家居，辑《长乐诗话》八卷，自为序。”[①] 此时因积劳成疾而自京师请假回籍的他，在福州调养已有一年。既是调养，自然就无案牍劳形之事，可得片刻之闲暇，因而《长乐诗话》的编纂也要得益于梁章钜回籍调养的机缘，此时正是提笔著书，弘扬故乡诗学的大好时机。

### （二）彰显学者之本色

梁章钜幼而颖悟，自四岁开蒙之后，因其父在外任职，多年未归，一直由母亲王氏为其课之。直到他五岁之时，其父梁上治担任内廷咸安宫教习期满回籍，此后梁章钜则随父识字读书，九岁即能作诗，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成进士。梁章钜考中进士以后，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两次兼署两江总督等职，是福建历史上少有的朝廷重臣。

梁章钜为官多年，做官期间尽忠职守，兢兢业业，政绩斐然。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做官之余仍然笔耕不辍，勤于著述，一生都致力于学术创作。挚友林则徐在为梁章钜撰写的墓志铭中评价他是“自弱冠至老，手不释卷。盖勤勤于铅椠者，五十余年矣”“仕宦中著撰之丰无出其右”。[②]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梁章钜虽然半生为政，却又不是纯粹的官僚。他在为官之余仍能不废诗书，广交诗友，其四十一岁之时拜翁方纲为师，直至翁师逝世，共受业三年，期间颇受赞誉。随后他又参加宣南诗社，与陶澍、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多有交游，迟暮之年又拜阮元为师，多有进益。文人自古以来便是学而优则仕，但每个读书人心中又都渴望能以学术立身，他们希冀能像屈原、司马迁、班固那般有一部著作可流传千古，青史留名方不负寒窗十载之苦。然而历史上有才名的文人不胜枚举，身处高位者更是不计其数，但若非负才使气，招人嫉恨，以致身陷囹圄，便是沉迷宦海，钻营弄权，背离圣贤之道，因而自古以来既能高居庙堂又能著述等身的文人便寥若晨星。梁章钜却是一个例外，虽宦海多年，但因其生性低调勤勉，故而能够一直坚守初心，内心始终不忘读书治学之本分，实现了官员与学者这两种身份的完美融合。他深知一个文人若无只言片语留存纸间以益后世，便是枉读诗书，因而在其回到福建调养身体的九年间并没有醉心于“朝吟诗书，暮赏烟霞”的闲适生活，而是在任南浦书院讲席之余，仍然笔耕不辍，相继撰写了《长乐诗话》《东南峤外诗文钞》《南浦诗话》等著作，其学术思想也在此间逐步成熟。《长乐诗话》则是梁章钜家居赋闲期间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其现存诗话著作中的第一部地域性诗话，为其后期的诗话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以自身一生

① [清]梁章钜：《退庵自定年谱》，二思堂丛书本，光绪元年刻本。
② [清]梁章钜：《长乐诗话》，张善贵校，长乐：长乐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9 年，第 7 页。

的学术创作彰显了学者本色，不负学者之名。

## 二、长乐县客观的人文历史环境

福建省长乐县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县名便源自于《诗经》之中的文句，取“长安久乐”之义。长乐县历史悠久，且地处闽江口南岸，东部为滨海平原，西部为玉田平原，交通发达，气候宜人，名贤辈出，集历史、文化、经济的发展优势于一身，有着“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称。

### （一）海滨邹鲁之文化底蕴

长乐自唐武德六年建县，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千年以来，理学、宗族、商贾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且“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长乐早已深入人心，宋、明、清三朝中榜者不计其数，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长乐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留下了寺庙、祠堂、摩崖石刻、书院等众多名胜古迹。现存的如文岭阜山姚坑，是宋代状元陈文龙、姚勉故里；潭头晦翁岩则曾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讲学处，岭南还留存有明代状元马铎的旧居，这些都是长乐悠久历史的遗存。

长乐深厚的文化积淀更体现在不断涌现的灵秀多才的文人名士，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名贤辈出，如《长乐诗话》中所记载的历代贤达才俊，如晚唐时的林慎思，字虙中，号伸蒙子，是晚唐八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幼时就聪敏好学，与其他兄弟四人筑室读书于方安里筹峰山中，后又读书于筹峰山下溪边，名其读书之处为“坑湖草堂”。许是家学渊源颇深之故，唐咸通年间，林家兄弟五人先后中进士，创造了福建历史上一家兄弟五人都金榜题名的奇迹，时有“五子登科”“兰桂同芳”的美名。林氏兄弟接连考中的佳话使得长乐读书之风渐盛，故而后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又如诗话中所载明代的王恭、高棅、陈亮、郑定等均为长乐县人，与林鸿、王褒、唐泰、王偁、周玄、黄玄六人并称为“闽中十子”。他们是明初闽中诗派的成员，该诗派崇尚盛唐诗风，主格调，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长乐谢肇淛，字在杭，万历壬辰进士，明代博物学家、诗人，博学多才，诸子百家均有涉猎，与名士徐熥、曹学佺等多有交游，并组织“莲社”，经常切磋诗文。谢肇淛生平所撰著作繁多，有记载掌故风物的博物学著作《五杂俎》十六卷，还有《文海披沙》八卷，《小草斋诗话》四卷，《小草斋集》三十卷等等，不胜枚举，为我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以上诗人之外，尚有陈烈、敖陶孙、黄榦等众多文才与气节兼备之名士。这些文人的诗歌作品与个人传记为梁章钜编纂《长乐诗话》提供了素材，且前文提到梁章钜家族一脉自宋代时便迁居长乐，科场得意和出仕为官者世代不绝。正是这些“绍祖宗之文德”的先辈为梁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与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长乐也得以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福建的历史文化名县。

### （二）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长乐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临近闽江口南岸，与台湾隔海相望，东临东海，北接闽江，海运发达，对外交通便利。长乐还有着迷人的山水风光，群山之中林木葱郁，青石之间溪水蜿蜒，令人流连忘返。长乐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也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佛教文化自传入以后便逐渐兴盛，当地百姓之中信众颇多。至今此地仍然保留下来多处寺庙，常有信众焚香参拜，更有许多外地游客前去参观。如鹤上沙京莲花山下的龙泉寺，始建于南朝，曾与鼓山的涌泉寺、福清的黄檗寺齐名；又如明永乐年间所建的华光寺，也有浓郁的南国寺庙的艺术特色；还有众多古刹名寺，如营前太华寺、青云寺、文殊寺、古槐竹林寺等，都给人流连忘返之感。而县域内的多了几分寂寥而少了几分烟火气息的自然景观，在令人心怡的同时也陶冶了诗人的情性，为他们提供了写作素材。

长乐文人自幼便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对寺庙清淡闲适的生活状态也颇为向往，再加上寺庙多建于环境清幽之地，景色宜人，因而吸引众多文人前去游览，并与寺中僧人多有交游，也写下了许多游寺之诗。比如《长乐诗话》中所载宋林嗣复《游西峰寺》诗云："参遍曹溪众所钦，元堂虚寂砌虫吟。定回瞑目谁相顾，好鸟衔花下翠林。"[①]陈毅游皇恩寺作诗云："楼殿参差倚白云，菩提枝老挂金新。门开海国多留月，地接梅林早见春。岩溜暗滋封藓竹，砌风长扫隔窗尘。禅僧喜客非超俗，平日能来有几人。"[②] 这两首诗语言清新，平淡有味，描写了寺庙中因人员稀少而更显得清寂幽静的自然环境，也间接反映了寺中僧人清逸出尘的生活品味。此外还有明代的陈亮、郑定、林慈等诗人也都有多篇诗文为寺庙而作。此外，长乐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常年温暖湿润，夏长少酷暑，冬短少霜雪，一年四季，百木不凋，郁郁苍苍，因而除寺庙众多之外，还有引人入胜的山水风光。古代文人大都有游历山川的喜好，行走在青山之中，泛舟于碧波之上，兴之所至，便提笔赋诗，此中文人也不例外。如林恕为筹岩作诗曰："千叠群峰一草亭，长留猿鹤守柴扃。天空远见孤帆影，谷静惟闻万籁声。山屐破苔花雨霁，野桥流月水云轻。道人怪我青袍湿，疑是龙灵来听经"。[③]又如壶景山，因山垂一井，其状如湖而得名，高棣为其作诗云："碧海有奇观，壶山天际浮……道意双白鸥，幽期永相共。"[④]再如陈容，字公储，号所翁，喜与佳士论文对诗，凡山川胜迹，多留题咏，可以说长乐地方的山水之间布满了长乐文人活动的印记。除作诗外，还留下了多处摩崖石刻，其中宋、明两代石刻居多，如朝元观摩崖石刻、仙字岩摩崖石刻、六平山摩崖石刻等，不仅文笔甚佳，笔锋也苍劲有力，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前来参观，也为我们研究长乐文人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 （三）地域诗话的逐渐兴盛

明代是诗话创作极为兴盛的一个朝代，现存的明代诗话著作达二百多本，按诗人群体来分的话，这些现存的诗话著作中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地域性，这类诗话为后人对地方文献的考证梳理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如明朝晚期郭子章的《豫章诗话》，还有曹学佺的《蜀中诗话》。但直到清代，地域诗话才开始兴盛，不仅仅是体现在数量有所增加，规模逐渐扩大，而且在撰述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从清顺治至道光年间，仅由闽人编纂的诗话就有十余种，可见地域诗话发展之盛。这种开始自觉关注地方诗学思想与创作状况并逐渐形成地域诗派的意识当从宋代的江西诗派开始兴起。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诗歌派别，由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组成，宗法杜甫而反对西昆体，语言技巧方面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求"无一字无来处"，其影响遍及整个宋代诗坛。到了清朝，清人更是将地域诗话发扬光大，陈鹏年曾曰："余东吴旧吏也，缅风流于一行，发潜德之幽光。所不能辞也。"[⑤]

明清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福建地方经济借此得到了长足发展，闽地文化的发展开始受到文人们的关注并日益兴盛。清代地域诗话发展繁盛，福建的地方性诗话也大量涌现，文人们相继创作了许多有地方特色的诗话作品，如郑方坤的《全闽诗话》，杭世骏的《榕城诗话》，陶元藻的《全浙诗话》等，尤其是郑方坤的《全闽诗话》，无论是内容、篇幅还是体例都可谓是福建地域诗话著作的标杆。梁章钜当时深受此风影响，自觉搜罗整理乡邦文献的意识逐渐加强，并成为其开始关注地方诗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因而创作了《长乐诗话》《南浦诗话》《三管诗话》《闽川闺秀诗话》等一系

① [明]王应山：《闽都记》，明万历间修清道光十年重刊本。
② [明]夏允彝：《长乐县志》，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③ [明]夏允彝：《长乐县志》，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④ [明]夏允彝：《长乐县志》，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⑤ 陈鹏年：《陈鹏年集》，李鸿渊校，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 936 页。

列地域性诗话。《长乐诗话》是梁章钜回籍休养期间所作，也是梁章钜编纂区域诗话的一次尝试。诗话所录 62 位诗人均是长乐县籍，相较于《全闽诗话》而言所录范围更小，仅限于一县之地，搜罗更为详备，是其所作区域性诗话的代表作之一。与此同时，梁章钜对于诗话创作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在《退庵随笔》“学诗”中曾说：“诗话莫盛于宋，今《四库》所录，自《六一诗话》以下二十余家，求其实系教人作诗之言，则不可多得；国朝吴景旭所撰《历代诗话》至八十卷，嗜奇爱博，而尚非度人金针。余尝欲就宋人各种中精择其可为诗学阶梯者，盖以明人及我朝名流所著都为一编，庶几为有益之书，未知此愿何日酬耳。”[①]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梁章钜认为诗话创作须有益于后世，可为后人学诗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才是有为之作。这一点在梁章钜的诗话作品中都多有体现。

## 三、小结

综上所述，《长乐诗话》虽然只是一部仅限于辑录长乐县一邑文人诗文传记的诗话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能与严羽《沧浪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这类大家的作品相比肩，甚至在篇幅和所记录的人数等方面都远不如郑方坤的《全闽诗话》和杭世骏的《榕城诗话》等地域性诗话著作，但这部诗话对于梁章钜本人却意义重大。他既是清代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可以说是一生显要，著作等身。但在梁章钜众多著述之中，仅《长乐诗话》一部作品是与其祖籍长乐文学发展状况有关的作品，且是生平第一部诗话作品，可见他对其家乡长乐文化发展之重视，是梁章钜为家乡长乐诗学发展所作的一份贡献。

除梁章钜本人的重视之外，长乐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渐渐由最初偏安闽越一隅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的文化名县，声震八闽。但纵使长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其受到闽地经济、交通、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限制了长乐与外界的文化交流，长乐地区的文化发展一直未能引起政府和文人的重视，许多长乐文人的传记文集或是残缺不全，或是只能偶然得见于他人著作之中，有的资料甚至早已因保存不善而散佚不传，令人扼腕。因此，《长乐诗话》的辑成不仅对梁章钜本人十分重要，对于长乐地区的文化传承也意义重大，是研究长乐地方文人及文学发展状况十分重要的人文历史文献。

①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一，清道光刻本。

# 从台湾聚落名称探析闽粤移民垦台史

黄秋菊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沿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垦社会，闽粤移民前仆后继地横渡黑水沟来台开创新天地，今日台湾各地仍保留与沿用当时形成的区域单位名称。从地方的命名方式，生动地反映清代台湾时期族群互动与移垦历程。

**关键词**：清代台湾；台湾地名；闽粤移民；垦台历史

当年来台先民挤在又黑又小的船舱，历经艰难九死一生，[①]凭借着对台湾的无限憧憬，前仆后继从原乡横渡到台湾这块绚丽的海岛，先民渡台的历史轨迹，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从大小地名中去探寻。地名，一个地方的名称，让人清楚地指认出它的位置。一个地名承载着该地的历史文化脉络，是解读当地文化历史最直接的资料凭借，为有意义的空间的语言符号。[②]地名的命名方式，可能从自然山川、植物地景、人文历史与建筑等因素产生，如清时期闽粤移民开发台湾时留下的地名，即是人与环境互动之下的结果，与先民生活关系密切，富饶意趣。本文以文献研究，专注在清朝台湾内部社会的族群互动下，对清代闽粤移民开发台湾时留下的那些我们熟知却不甚注意的地名中，去发掘人文意涵。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地名是人与环境互动下的产物，是区域发展的佐证，更孕育着来台先民辛勤的拓垦意涵。

本文内所列举的地名，资料来源多参考自台湾行政部门的“地名信息服务网”。[③]透过地名可以解析出该地的环境与变迁，了解地名的由来是探索该地区的重要线索。

## 一、协助清政府平定民乱

闽粤移民，不同方言群与不同祖籍地的移民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关系常有矛盾而引发械斗，[④]“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是当时台湾移民社会的写照。

### （一）六堆

康熙六十年(1721)，爆发朱一贵事件。六堆为台湾南部客家族群的代表区域，其架构最初乃是清

**作者简介**：黄秋菊，女，台湾高雄人，闽南师范大学与赣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① 据《台湾县志》记载，偷渡来台过程艰辛，客头用“湿漏之船”载运，舱盖封顶，如果遇上大风大浪，尽入鱼腹。途中若遇风暴则全数葬身大海；若幸运抵台，客头怕被人发现，往往不敢直接靠岸，遇岸边之沙洲，将船客赶骗离船，当时俗称“放生”。偷渡客由沙洲徒步涉水上岸，往往全身陷进泥淖中，叫做“种芋”。或是从沙洲走向岸边，遇上涨潮迎波漂溺，则为“饵鱼”。

② 简宏逸:《台湾地名研究的新尝试：以南崁、大安、古亭、土库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教育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台湾文化研究所，2012 年，第 4 页。

③ 参考网站：http://gn.moi.gov.tw

④ 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6 页。

代广东客家移民开垦台湾南部所组成的聚落防卫组织。最早的起源一般认定为因“朱一贵事件”[①]促成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临时性战斗任务编组，向下淡水溪（现高屏溪）的方向命名：前队为麟洛、长治；后队是内埔；左队属佳冬、新埤；右队即高树、美浓、杉林与六龟；中队称竹田；先锋队在万峦，遂形成“六堆”组织的分布概念。因战乱结束，六队组织为去除军事意味，将“队”改为“堆”，转化为聚落的概念，成为现今六堆地区的型态。在整个历史进程与环境的造就下，虽然保家卫民的民团组织不复存在，然而“六堆”一词成为台湾高屏地区客家族系的族群认同及追溯历史文化的地域代号，这是在台湾地图上找不到的精神家园。

### （二）诸罗与嘉义

诸罗县名，来自县治一带原有的番社名称：“诸罗山社”，取其前二字“诸罗”而命名。台湾入清版图后，清政府承继郑氏时期的行政区划，将原天兴府州改为诸罗县，辖域不变，县治改设于诸罗山。[②]

1786 年，台湾中部爆发了严重动摇清廷统治的“林爽文事件”，乾隆皇帝派前亲信福康安代表他御驾亲征，岛内则主要仰赖临时组成的义勇军防堵。淡水、彰化先后陷落，诸罗被困，军民不屈，清高宗获悉乃赐名嘉义，以示嘉许全城军民义举。事件平息之后，南侧的诸罗县蒙皇上恩赐，改名嘉义。[③]

### （三）林内

林内位于云林县东北端，林内未开发前是浓密如荫的大林野，后来闽人郑萃徘自福建漳浦来此地开垦，在乾隆、嘉庆年间因平匪有功而获封赐，从此传家立业人口集结，因村庄在树林内创建，故名。[④]

### （四）褒忠

于云林县境内，原名“埔姜仑”，仑为沙丘之意。乾隆五十一年（1789）林爽文事件，当时本地一位名为张源懃的庠生纠结乡勇数千人来抵抗，守庄数月屡败爽文军，事后也协助官府平定其他地方的动乱。乱后，张生除获朝廷封官赏赐外，其居住地亦获赐“褒忠”二字为庄名。[⑤]

### （五）太保

位在嘉南平原之北部，朴子溪以南地域，属嘉义县。按太保旧称“沟尾庄”，系王得禄之故里。王得禄曾平定了林爽文之乱，收复诸罗，也在平定蔡牵之乱中有功，而后被诏任浙江提督。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病乞回乡，清廷加封为“太子太保”之衔，于是援用“太保”为庄名。[⑥]今日太保市为台湾“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地址。

## 二、因开垦单位渐成聚落之名

吴沙入垦兰阳平原，产生很多与其相关的聚落地名。兰阳地区原为平埔族噶玛兰人的居地，明崇祯七年(1634)，占据北台湾的西班牙人进攻宜兰；八年后，荷兰人驱逐西班牙人，直到郑成功复台

① 时值清圣祖康熙六十年四月，五月下淡水地区客家先民组成“六堆”团练组织。详见曾彩金主编《六堆客家社会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之研究》历史源流篇，第 79 页。
② 参考网站：http://nrch.culture.tw。引用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③ 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2001，台北市：猫头鹰出版，第 45 页。
④ 参考网站：http://gn.moi.gov.tw
⑤ 参考网站：http://gn.moi.gov.tw
⑥ 参考网站：http://teacher.whsh.tc.edu.tw

后才离开。由于宜兰远离府治，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所以从明末到清代嘉庆年间以前，闽粤移民的垦殖脚步一直未曾抵达，但后来西部平原的垦拓面积几乎已达饱和，于是先民便将焦点移往边陲地区的宜兰，期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嘉庆元年(1796)，第一批移民由祖籍福建漳浦的吴沙率领，从今日的乌石港进入头围，然后逐步向南拓展，嘉庆七年（1803）抵宜兰市建立的五个据点——五围。由于当时官府的行政范围尚未达到兰阳地区，所以对于移民来说，这里还是一块无政府管辖的化外之地，为了保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园，移民们以三十至五十人为一“结”，由“小结首”带领开垦，数小结合成一大结，大结有大结首，大结首之上还有总结首，负责维护结内治安及协调垦务。如今宜兰地区还有许多地方保留着结、围、城等地名，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开发背景所致。[①]

### （一）二结、四结、五结

嘉庆元年(1796)吴沙率领福建移民进入兰阳平原，当时入垦的最小单位“结”，是由若干家户组成，依照组成一一编号后就延用为地名。由于吴沙是漳州福佬人，所以他招募的大都是同乡。不过这些“同乡”倒不一定是“同语”；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来自诏安、平和、南靖的客家。所以，几个全数为客家组成的聚落，就被称为“客人城”。[②]

二结、四结、五结在今日行政单位为宜兰县五结乡的行政区域。闽粤移民在兰阳平原的拓垦过程中，得力于“结首制”，所谓“结首制”是将三十至五十人编成一“结”，由“小结首”进行开垦，“结”下的田园分成数“份”，每位力垦者一份。在“小结首”之上，上有大结首、总结首和土地资本家，“小结首”负责的区域称为“结”，大结首负责的区域称做“围”。这样的基本拓垦单位，有别于清台湾闽粤移民的拓垦经验，存在着较大的诱因与个人意愿加入成份。[③]

### （二）头城

是闽粤移民在兰阳平原第一个开发的据点，为宜兰县的最北端，最早在嘉庆元年(1796)，吴沙带领二百多闽人移民进垦宜兰，头围系吴沙初次筑土围城做根据地之所在，因此有“开兰第一城”之名，其广招闽、粤移民前往开垦，头围就是三籍合垦小区，并逐步开垦二围、三围。[④]头围是闽粤移民在兰阳平原地一个建立的开垦据点，当时是噶玛兰地区人口与商业之最；日治时期改称“头城”。

### （三）壮围

壮围乡于兰阳平原东部，东临太平洋。其旧名“民壮围”“民壮围堡”，清嘉庆年间，吴沙最先在此地建筑土城来防御番人，因而取名为“头城”。吴沙死后，其子克绍其裘，为酬谢共同开垦的壮丁辛劳，将此地划分为壮一、壮二……壮七等分赏给壮丁，后来统称此地为“壮围”。

### （四）七股

股系为合股开垦的总股份数。根据台南市政府七股区公所网页[⑤]对于其历史沿革说明，七股之命名源自相传 360 年前由福建来台之居民七人共同垦殖一渔塭，名为七股塭，后随沿称为七股。

### （五）六张犁、八张犁、十张犁

早期开展农务需要牛只犁田，犁为耕地面积的单位，一般的说法是耕作五甲为一张犁，台湾有许多乡镇仍存有这样传统的叫法。“一张犁”是一只牛能供耕作的范围，所以今天可见许多六张犁、

① 李世荣、吴立萍：《台湾的老乡镇》，2003 年，第 168-169 页，台北县新店市：远足文化。
② 同 7 注，第 41 页。
③ 参考网站：http://e-land.gov.tw
④ 陈捷先、阎崇年：《清代台湾》，2009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54 页。
⑤ 参考网站:http://web.tainan.gov.tw

八张犁的地方；但各地所指的范围大小不一定相同。

（六）头份

头份市位于苗栗县北部，地名由来为垦户们合力垦成后，划分土地的分配次序，将土地划为头份、二份、三份、四份、五份等，在该土地上所建村庄各以名。

（七）左营、下营、柳营、林凤营、左镇、前镇、后劲

这一部分归纳为与郑氏军事行为相关的地名内涵。郑成功为解决军队粮食问题，实行“屯垦制”，分兵屯田“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陆续成立了四十多个屯田区，这种屯田区也叫做“营盘田”。今日台南与高雄仍保留与“营盘田”密切相关的地名[①]，如林凤营[②]、柳营、下营、左镇（以上均在台南市境内）； 左营、后劲、前镇（以上均在高雄市境内）皆为屯兵寓农下的产物。随着平民百姓的增多自然而成为一个聚落的名称。这些都是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命名方式。

（八）官田

《诸罗杂识》：“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台湾后，将荷之“王田”制度易名之为“官田”。郑氏治台，文化政治上用的是明代制度，经济上则部分承袭荷兰人的遗规。[③]官田位于台南市。

## 三、因应防御需求形成的建造物

清政府对原居住山地的民众采取保护政策，立石立碑以资缓冲移民同他们的关系，下述介绍的地名的产生是台湾在清治时期普遍设置的人文界线。

（一）土牛

土牛相对于自然山川为界，是一道人为的界线，乾隆年间，划分移民与当地民众的活动领域，目的为保护当地民众的生存空间。土牛线的画定原则上是以自然的山川为准，以天然山川之形势来画一条从台湾南部到北部的人为政治界线。但若到平原无明显地标或道路通衢之地，则挖土做土堆为标志，外围环之以土沟，观远土堆似牛卧地状，系为“土牛”或“土牛沟”之由来。[④]台中市东势镇是中横公路的起点，东势镇位于大甲溪与大安溪之间，原为拍宰海平补族支族朴仔离社分布地。乾隆年间，客家人陆续来此移垦，由于当时遍地荒野，又和原居住民众语言不通，为避免冲突，最初仅在今天东势镇以西的石冈地区从事伐木和制材。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为保护原居住民众领地，以免受闽粤移民拓展垦地逼迫，乃在北台湾大地上构筑一条“番界”，禁止闽粤移民越界开垦。今日石冈乡土牛村土牛国小内留有一“民番地界碑”，可知“番界”是一条土沟，所铲出的废土则置放在沟旁，在今天土牛村附近形成十九个体积二丈、高八尺的大土堆，做为原闽粤移民生活领域的界线。[⑤]

（二）匠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允许客家先民以从事军工匠人的身分，入山采伐木料，并在东势地区形

① 管家琪：《开发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年，第 61–62 页。
② 为纪念郑成功部将林凤而命名。
③ 殷允芃、尹萍、周慧菁、李瑟、林昭武：《发现台湾 1620—1945》，台北市：天下杂志。2011 年。
④ 张正田：《苗栗客家“土牛红线”与“紫线”历史空间比较》，广东嘉应学院：《“全球客家移民与地域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2017 年，第 204 页。
⑤ 李世荣、吴立萍：《台湾的老乡镇》，台北县新店市：远足文化，2003 年，第 82–83 页。

成一个小型市街，称为匠寮庄，今日则为“匠寮巷”。“匠寮”，即采伐军工木料的匠人所住的草寮，窄小曲折的匠寮巷，在东势开庄之初具有防御的功能。[①]特别说明“匠寮”虽非防御建造体，然在早年台中地区与土牛线的生成背景有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

（三）石牌

石牌位于新北市北投区辖内。据该区公所网站表示，本地初为原居住民众耕垦，雍正乾隆年间，漳州籍赖、魏、谢三姓来此垦辟，与原居住民众常起争端。乾隆十七年(1752)，淡水同知曾日瑛为确定界限，立多处石碑于该交界处，以绝争端，碑文云：“奉宪分府曾批段东势园南势田归番管业界”[②]。此碑现矗立于台北捷运石牌站前。

（四）土城

位于今日新北市。昔日为原居住民众渔猎之区，土城大规模的开垦则始于乾隆元年(1736)，闽粤移民为了顺利拓展土地，在今日土城区公所与土城国小附近，筑有“土墙”，由于“土墙似若城池”，乃相约称之为“土城”。[③]

（五）木栅

木栅地名在台湾多地仍有存留。台北市“木栅”是大家较耳熟能详的地方，因为有个“木栅动物园”。木栅，1945 年之后编印的《台北县志》曰：“本乡地区，带有木庄，开辟之始，于地设栅防番，故名。”日人安倍明仪将之定义为“防蕃设备”，1980 年由洪敏麟先生编著的“台湾旧地名沿革”，在“防御设施与界碑”地名类中列有“木栅”，并予以批注：“是往昔御番设施之一”[④]从名称上显而易见其作用。

## 四、小结

一个地名的缘起背景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缩影、一部“当代史”，台湾历经荷据时代、入清朝版图与日据岁月，让台湾有许多具时代性指标的地名内涵与命名方式。内部许多地名有源自闽粤移台对家乡的地名复制、或由原先的语意译来，也有日本殖民时期的命名方式。本文探讨的台湾地名主要关注以闽粤移民为主体的使用语，聚焦在闽粤移民开垦台湾时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互动下所产生的地方名称，及其蕴含浓郁的历史文化成份与打拼精神。透过地名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认识与追溯家乡的历史，凝聚对家乡的情感，对于认识自我与原乡文化有重要意义，也是维系情感的纽带。先民过台湾，向西回望是乡愁；在台定居后已是“日久他乡是故乡”，移垦台湾的奋斗历程，除了不应忘却“渡台悲歌”[⑤]的字字血泪，更要积极展望未来。今日台湾各地方仍保留与沿用当时因拓殖而形成的区域单位名称，从地方的命名方式，能生动地反映清代台湾时期族群互动与移垦历程，对今日来说，这是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遗存符号，更是探索家乡地名的重要来源，对于认识自我与原乡文化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① 管家琪：《开发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年，第 61–62 页。
② 参考网站：http://btdo.gov.taipei
③ 引用网站 http://hi6666.pixnet.net，土城市志，1994 年，土城市公所
④ 资料引用自台北市文山区公所，“木栅地名内涵”。参考网站：http://wsdo.gov.taipei。
⑤ 本诗为清季诗人写成，1986 年由新竹县文史工作者黄荣洛先生发现、整理发表。这首歌长达三百句，大量保留客家词汇，娓娓道尽“唐山过台湾”的辛酸血泪，为客家文学史诗类别中的巨擘。诗中多次出现相关劝人莫过台湾语句（劝君切莫过台湾、出过后世转唐山、不该信人过台湾、不知送命过台湾、切莫信人过台湾），让读者明显感受到客家人当时来到台湾生存的悲苦，意象鲜明。除描述食衣住行的简陋、劳动的极差待遇，社会文化习性也详细记载，一窥当时台湾社会的常民生活现况。参考自邱春美：《客家文学导读》，第 35–52 页。

# 妈祖信俗在江西客家地区的传播

## ——以龙南县为重点的考察

廖小凤

（赣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龙南县文化馆，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移民是妈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龙南妈祖信俗也是文化移植的结果，具体体现为龙南县程龙镇杨梅村民众以祭祀妈祖女神的方式纳福求吉的长期而普遍的活态民俗活动，杨梅村的妈祖庙是妈祖信俗的重要文化空间。龙南妈祖信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而且在发展中成了多种文化的综合体，为当地民俗文化提供了传承和展示的平台。目前，台湾有 1000 多座妈祖宫庙，有 1700 多万信众，占台湾人口的 2/3。从福建莆田传播到江西赣州客家地区龙南县妈祖信俗的保护和传承，将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并对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龙南妈祖信仰

闽西客家地区有不少妈祖庙，偏远的赣南客家山区罕见有妈祖庙和妈祖信俗。笔者于 2014 年 9 月 14 至 15 日、10 月 1 至 8 日、11 月 17 日前去龙南县程龙镇调查妈祖信仰，并通过对当地妈祖信俗理事会成员林国明、林家仁、李荣，当年的老包林才来、林月房、钟显旺、李余福，以及当年的头香首刘细清等人的访谈，试图揭开客家地区散点分布的妈祖庙的神秘面纱。

## 一、妈祖信仰传入赣南客家地区

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妈祖文化形成初期，其传播范围只限于莆田、泉州及其附近地区，到南宋，传播到福建沿海、浙江、上海、广东及海外地区。

妈祖信仰以海上保护神为基础，随着大海及江河分布为主，溯长江，西至湖南、贵州等地都有信仰。到今天，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北起丹东、沈阳，经天津、烟台到上海、杭州、福州、广东、海南等地都建有妈祖庙，甚至内地江西景德镇、贵州镇远、安徽天长县、内蒙古通辽和北京等地也建有妈祖庙。

福建的闽东、闽南是妈祖文化的核心区域，分布非常广泛，在闽西客家地区，如长汀、连城等县也有不少妈祖庙。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建沿海已有一些人迁居台湾，澎湖群岛是福建人首先开发的岛屿，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从此漳泉百姓就以澎湖为中转站，逐步迁入台湾的西部海岸。在清代康乾年间，随着漳泉厦及粤东地区移民至台湾，妈祖海神信仰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在台湾扩散，并遍及全台。

**作者简介**：廖小凤，女，江西龙南人，赣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龙南县文化馆研究馆员、副馆长。

然而，与此相关而又有不同的是，江西赣南也有妈祖庙，数量不多。据《湄洲妈祖志》之《清代以来大陆的妈祖庙》记载："江西南昌、赣州、会昌、长宁、九江、上饶、湖口、南康、瑞金、景德镇、吉安等，亦皆有天后宫建置记载。"[①]其中，赣州（今章贡区）、会昌、长宁（今寻乌县）、南康、瑞金等五县均属赣南客家地区。从地域上说，瑞金接壤长汀，信众多去长汀县城的天后宫朝拜；会昌、寻乌接壤福建武平，其信众多去位于福建武平县东留镇桂坑村的桂林山天后宫等地朝拜。章贡区、会昌、寻乌、南康的妈祖庙今已不详。就笔者所知，目前赣南的妈祖庙仅存两处，一处是位于瑞金城南绵江岸边河背街小学附近，即下吊桥巷口与下半团巷口交叉地带的天后宫，那里供奉有妈祖塑像，但大部分为新创设的佛堂；另一处是至今鲜为人知的龙南县的妈祖庙，也就是本文调查所要研讨的程龙镇杨梅村妈祖庙。

## 二、龙南客家妈祖庙的兴替与俗信传承谱系

妈祖文化肇于宋、成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是海洋文化的一种特质。移民是妈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龙南妈祖信俗也是文化移植的结果，是一项龙南县程龙镇杨梅村民众以祭祀妈祖女神的方式纳福求吉的长期而普遍的活态民俗活动，杨梅村的妈祖庙（也称"天后坛"）是妈祖信俗的重要文化空间。

程龙镇位于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的西南部，距县城 15 公里，东接渡江镇、西接全南县、南邻东江乡、临塘乡、北接安基山林场、龙小公路，境内桃江河水穿境而过，辖五一、八一九、龙秀、杨梅、盘石、程龙 6 个行政村，近 9000 人，国土面积 127.1 平方千米。

杨梅村距龙南县城 15 公里，包括上围、下围、富坑、岗尾、砚水、寨下、新屋、坳下 8 个村小组，居住着林、罗、廖、王、钟、李 6 种姓氏，其中林氏占全村人口的 50%以上，程龙林姓占全镇人口的 45%以上，加之妈祖信俗起源于林氏，所以龙南妈祖信俗主要由林姓主持。

据当地林氏族谱所记旧谱资料，明万历庚子年（1600）首修的《西河林氏族谱》中的《澜祖房谱》载："始祖林太五郎，流至五世祖志通，因天下大乱，东逐西奔，天降我大明洪武主出，扫平中华一统。天顺间，通祖自闽省莆田分徙虔州桃川象塘堡罗盘石立基。祖母钟氏五娘，次娶黄氏，共生八子，福洪、润、漳、澄、澜、濂、泾、淦，内七子共住上村一方；惟第五房福澜一房，婆钟氏生四子，玉新、秀、侃、全，住下村老居罗盘石江口。"[②]由此可见，程龙林氏始祖林志通于 1457–1464 年间，由福建莆田辗转迁徙进入赣南客家地区，在今龙南县程龙镇罗盘石开基。林志通秉承林氏族谱所标榜的"忠孝"传统，把莆田妈祖信俗带入龙南县程龙，至今有 550 多年的历史。

1966 年以前，当地妈祖朝拜活动在杨梅村老屋下的妈祖庙举行。由于妈祖庙位于桃江河畔，1966 年的一场洪水冲毁了河边的村庄和妈祖庙，从那以后，朝拜活动改在头香首所在村落的祠堂举行，如程龙镇的耀前村、盘石村、杨梅村、安基山的林洞村等，这类似于闽南人把神请进祠堂中供奉。"客家文化中的妈祖信仰融合了当地文化，尤其是由林氏居民传入的妈祖信仰，把妈祖看作自己家族远祖的祖姑。客家的林氏居民常称妈祖为姑婆太、姑婆，把妈祖庙称为姑婆庙。"[③]程龙当地林氏民众称呼妈祖为"老姑奶"，成为祖宗神之一。也是 2013 年，程龙民众积极筹措资金，在杨梅村重

①《清代以来大陆的妈祖庙》，中华妈祖网，http://www.chinamazu.cn/mzdg/whyy/fxlc20121107/15348.html，2017-08-10。

② 当地林氏族谱现存放在林家琪家。林家琪，1936 年 5 月生，大专文化，曾任龙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经委调研员，住龙南县龙南镇官材岭小区。

③ 曹真进：《独特的客家妈祖信仰》，《湄洲日报》2016 年 7 月 7 日。

新选址兴建了妈祖庙，从此，朝拜妈祖的活动在杨梅村的妈祖庙举行。

关于龙南程龙妈祖信俗的传承谱系，在调查中，综合多位报告人的观点，认为龙南妈祖信俗当然来源于莆田林氏，根据当地林氏族谱的记载，可以推测是开基祖林志通自莆田迁徙到杨梅村始，由移民而带入，代代相传。其传承谱系概括如下：

第一代　不详

第二代　不详

第三代　林锦文，男，1928 年生，龙南县程龙镇盘石村人，担任过 10 多年督理，已过世。

第四代　林瑞拔，男，1930 年生，龙南县程龙镇耀前村人，担任过 10 多年督理。

第五代　林国明，男，1940 年生，龙南县安吉基山润洞村人，大学文化，从 1970 年起，担任督理 40 多年。

第五代　林家仁，男，1942 年生，出生在龙南县程龙镇盘石村，多年担任妈祖理事会顾问。

第五代 李荣，男，1944 年出生在全南县金龙乡树坳村，现住龙南县程龙镇杨梅村上围人，高小文化，曾任生产队长、大队会计、村支书，2013 年任兴建程龙妈祖庙理事会副会长。

## 三、龙南客家妈祖信俗的祭祀形式

龙南妈祖信俗是程龙镇民众常年举行的一项具有教化性、普遍性、适应性和经济推动性的活态民俗活动，祭祀的场所方便灵活，有家祭、路祭和庙祭等，祭祀的形式主要有拜年、祝寿、游神、庙会、传统文化表演等，其中，每年农历九月初七至十一日为祭祀的高潮期，整个程序一丝不苟，无比虔诚。“客家的妈祖信仰独特性就在于不仅把妈祖当作传统的海神、水神来崇拜，而且也把妈祖当作山乡守护神来信仰。”[①]这种生活化、常态化的妈祖信俗，在赣南乃至江西境内绝无仅有。

### （一）家祭

家祭的主要场所设在头香首家里，家祭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首先是，每天早晚祭祀。供奉的形式是每天早上开光、点蜡烛、上香、换茶水，晚上上香、点蜡烛。早上的供奉的具体程序是：点油灯–端洗脸水–换热茶–点蜡烛–上香–跪拜（洗脸水和换下来的茶水分别倒入两个桶里存着，装满后挑到河边倒入河中）。每天早晚祭祀的由头香首主持完成。

关于头香首的产生，笔者专门访谈了 2014 年头香首刘细清女士，据刘细清女士介绍，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下午朝拜活动结束前，民众争先恐后在掌管香首人选的督理手中抽签，希望自己能抽中下一届香首。香首共设 24 位，其中 6 位一等香首（一等香首中有一位是头香首），6 位二等香首，6 位三等香首，6 位四等香首。2013 年的香首词是“海神默娘，佑民安康，妙灵昭应，道法高强，贤贞美德，世代流芳”，抽中“神”字的为头香首。2014 年的香首词为“百姓虔诚朝拜，姑奶湄洲岛来，福荫桃川善行，民众安康物阜。”在九月十一日这天，头香首可把妈祖神像迎回家中供奉至一年。

家祭的第二种形式是，每月初一、十五和传统节日，头香首割鸡祭祀妈祖神像，求得庇佑。

家祭的第三种形式是民众家里办大事时祭祀妈祖。头香首家里附近的村民每逢传统节日或者添丁、婚宴、生日、升学、迁居等喜事前来妈祖神像面前割鸡祭祭祀。

第四种形式则是拜年和祝寿的方式祭祀。年初六，24 位香首齐聚头香首家里，向妈祖拜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香首们给妈祖过生日。

① 曹真进：《独特的客家妈祖信仰》，《湄洲日报》2016 年 7 月 7 日。

第五种形式，民众平常日子里的祭祀。路途遥远的民众打听到头香首家的住址后，自发带着香纸蜡烛、爆竹、鸡、肉、鱼、水果、香油等祭祀品前来头香首家的妈祖神像面前祭祀。

家祭的另一个场所是平常百姓的家中。在程龙镇杨梅村有些村民在自家设立了妈祖神牌位，祭祀的形式和头香首的祭祀方式相同。

（二）路祭

九月初八是妈祖神像下座游村的日子。

老的妈祖像是“黑面妈”，所谓“黑面妈”指因年代已久，受香火薰脸成黑色，故称“黑脸妈”，又称“香烟面妈”，这是妈祖神像的一种。在老的妈祖庙被水毁后，黑面妈按惯例轮流安放在每一年的头香首家里，享受晨昏祭祀，妈祖出巡游村时所抬的也就是这尊妈祖。新的妈祖庙建好后，重塑了一尊更高大的立式金色妈祖像，安放于妈祖庙上厅靠墙正中间的固定位置，庙会期间会把原来的“黑面妈”抬到妈祖庙，安放在“金色妈”左侧，庙会后再抬到新一任头香首家里供奉。

一大早，两位 10 多岁的小姑娘（当地称之为玉女）在当地老人的指导下给妈祖神像换上新衣、新鞋、新袜子。上午九点多钟，24 位香首齐聚在头香首家中，由鼓、钹、唢呐组成的乐队进行吹奏，由礼生主持，信众及村民进行一番祷告之后，将妈祖神像请至轿中，俗称“妈祖下座”。在热闹的鞭炮声和鼓乐声中，在 24 位女信众（香首为主）组成的彩旗队的簇拥下，由 2 位玉女陪伴扶轿，4 位童男抬着轿子中的妈祖神像到本村及附近村庄出巡。所到之处，鞭爆齐鸣，村民设案祭祀妈祖，称“路祭”。游村之后，把妈祖像请至妈祖庙。至妈祖庙门口时，9 位老包（督理）在门口跪地接驾，从庙门口到妈祖神像座基，用红布或妈祖神像搭好“天桥”，设好香案，妈祖神像在金童玉女的护送下在庙内神案就位。

九月初十的夜晚，香首们把供奉妈祖的米饭做成米粄，撒在妈祖庙附近的各条小路上，向路边小神施食功德，俗称“施功”或“施食”。

（三）庙祭

九月初八上午，妈祖游村之后，民众毕恭毕敬地把妈祖神像迎至妈祖庙之后，开始进入了庙祭的阶段。庙祭的时间是每年九月初八至十一日，是庙会活动的高潮期。

庙祭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有：

九月初八上午妈祖神像在庙内就位后，民众聚集在庙内接驾，其中一等香首手捧香炉，二等香首双手托住放有施衣簿的托盘（当地人发音“施衣薄”，笔者怀疑更应理解为“赐予簿”，即载明当年香首名录、祷告词等，一共 6 份，祭祀时放在神台上，预示得到神灵的赐予与护佑），三等香首和四等香首恭敬地站成一排，上香祭拜。接驾仪式结束后，妈祖庙门口搭起小舞台，当地传统节目纷纷登台表演，娱神娱人，营造了一种热烈、祥和的气氛。

九月初九，民众给妈祖拜寿和赴会的日子。这天早上 5 点钟以前，当地民众争先恐后到庙内上香。早上 5 点钟，24 位香首、24 位顶理（头一年的香首）、9 位老包（督理）、几十位总理（自愿承担分摊经费的民众代表）以及附近民众几百号人马聚集在妈祖庙，分期分批向妈祖拜寿。拜寿有严格而固定的程序，拜寿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拜寿前先给妈祖神像开光，开光时向妈祖神像面前的香炉倒入少许朱砂，起避邪的作用。正式拜寿时，民众每人手持一柱香，在礼生的主持下，首先是香首、督理和顶理上香、敬酒，接着是当地民众给妈祖拜寿。拜寿结束后，民众喝白粥祭祀。上午八点多钟，各地民众从四面八方陆续相聚妈祖庙，向妈祖神像顶礼跪拜，点燃香烛、燃放爆竹，向

司仪购买中午餐券和回家张贴、保佑平安的“神符”。礼毕，便同前来赴会的亲戚朋友相见相会，互传信息，共祝家人安康，生活幸福。正午，当地特色菜肴纷纷端上餐桌，一千多位民众共进午餐，被称作是“千人宴”。

九月初十下午，24 位香首和附近民众来到杨梅河边，将鹅和鸭子放入河中，象征让河浪将灾祸、恶煞飘走，同时安抚水中冤魂，祈祷来年健康平安，祈福求吉。傍晚，众香首将立在妈祖庙两边的彩幡徐徐降下，一等香首可以将竹竿背回家里用来做农具，预示风调雨顺，将彩旗做背带或者腰带，期望家人健康平安；二等香首可以把施衣簿带回家里留作纪念；三等香首可以把包过香炉的手绢带回家，四等香首可以把朝拜时所用的托盘里的毛巾带回家。不同级别的香首可以分别享有相应的把这些祭典用品带回家权力，这也是信众民主管理的结果，依据的是香首虔敬程度不同以及所付出的精力财力的不同，这也是乡村信仰、心理结构、权力空间三者交织博弈的结果，为乡村民众所认可。这些祭典用品在信众眼中，与其说有实力价值，不如说更具有神佑价值。

九月十一日，送圣回宫，又称“妈祖归位”。在热闹的鞭炮声和鼓乐声中，在 24 位新一任香首组成的彩旗队的簇拥下，在 2 位玉女的陪伴下，4 位童男抬着轿子，将妈祖神像护送到新一任头香首家中。所经之处，鞭炮齐鸣，村民设案恭迎妈祖归位。

## 四、龙南客家妈祖信俗祭祀组织管理

龙南妈祖祭祀是乡村的大型活动，参加的人员众多，需要一定的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管理与经费管理，在历次祭祀活动中形成了一套民主推举与管理制度，主要的管理人员分成一定的类别，并承担相应的职责与义务，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

### （一）人员管理

每年妈祖祭祀活动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

1. 香首

香首是妈祖信俗活动最忠实的参与者。每年九月初九，在妈祖庙里抽签产生，共 24 位。他们的任期从抽签之日起至第二年的九月十一日。任期内，香首自始自终、一丝不苟、无比虔诚的参与全年的祭祀活动，其中头香首是当中的核心人物。香首的主要职责有：年初六向妈祖拜年；三月二十三日给妈祖过生日；七月二十日请总理；八月二十二日一等香首立幡（起幡）、其他香首祭祀；九月初八至十一日，参加祭祀妈祖的一切活动（如果香首是外村的，则在祭祀活动期间借住在妈祖庙附近的亲戚或者朋友家，以便随时能主持或组织祭祀活动），聘请 9 位督理组织和管理妈祖信俗活动。

2. 督理

督理是妈祖信俗活动高潮的组织和管理者。督理主要负责组织管理七月二十日至九月十一日的一切祭祀事务和后勤保障工作，并分摊经费开支。担任督理的人必须热心、人品好、口碑好，具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和协调能力。人选由 24 位香首聘请，一般 9 人以上。

3. 顶理

顶理是头一年的香首。他们把做香首的经验传授给新一任香首，并协助分担经费开支。

4. 总理

“总理”是分担经费开支的民众代表。总理人选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人数不限。凡是自愿分担庙会经费支出的民众均可担任。总理的标志是，在七月二十日参加了“总理午餐”的，

都统称为“总理”；庙会结束后，总理按照平摊数出钱，一般在 100 元以内。

5. 香老

香老是妈祖信俗高潮期香火的管理者，一般由 2 名长者担任，引导信众敬香祭拜，同时维护香火安全，不致在上香时引发安全事故。

### （二）经费管理

妈祖祭祀活动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这些经费来源于民间，用于祭祀活动的开支，主要用于祭祀期间的餐费，请礼生、乐队的经费，祭祀用品等的经费，每次祭祀活动结束后均有收支情况报告，张贴于妈祖庙，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主要的经费来源有：

1. 九月初九民众赴会就餐参加者交的份子钱。每年不定，按预计并确定收取的数目。2014 年收到约 4 万元。

2. 民众捐款，包括头香首家里的功德箱捐款、妈祖庙的功德箱捐款和督理收取的化缘捐款，约 4 万元。

3. 来自香首、顶理、督理的分摊款，每人近 90 元，共计约 1 万元。

## 五、龙南客家妈祖信俗的特点与功能

龙南妈祖信俗是在远离福建妈祖信仰核心区的客家僻远山村，是莆田林氏移民带入，并融合到当地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场域，体现出以下特点：

### （一）妈祖信俗的本真性

龙南妈祖信俗中，因妈祖原身为未婚女性，传说其海上护佑有功而尊为“海神”，为女性保护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质是和睦、和平、和谐，女神能更好与这种文化精神相契合。充满风险的海洋生涯中，人们需要母亲的刚强、坚韧与深情”[①]。由此信众也以女性为主，香首中也大多为女性。特别是妈祖神像下座和上座时，抬神像者均为 2 名玉女（未婚姑娘）；妈祖神像出巡时由童男扛轿，但需有 2 名玉女扶轿，从某种意义上说，妈祖信仰移入龙南客家地区还保持着女性神的本真性。可以说“人们对传统仪式的遵守和还原也表现了对神明的尊重”[②]。这对保护女性权益尤其是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支撑起了重要作用。

### （二）妈祖信俗的扩散性

龙南客家妈祖信俗由林氏传入，祭祀的主持人、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均为当地林氏，随着妈祖信仰影响力的扩大，已形成为以当地村庄和当地林氏为主，当地附近村庄及其他姓氏信众主动参与的民间信仰活动，已融入当地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并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盛事。龙南妈祖信俗传承了 500 多年，从最初的几个村落逐步发展到几十个村落，从一个宗族逐步发展到多个宗族。

### （三）妈祖信俗的功用性

妈祖信仰经过历代演绎，已由当初的海上保护神扩充到其他领域，传入客家地区后，已承载着孝悌、感恩、祈福、消灾等多样功能，在民众中享有无所不能的“神力”。杨梅村妈祖庙门口楹联有“虔诚朝拜老姑奶，大力弘扬孝悌风”“海上神女长济家，人间无姓不归宋”“护国佑民封天后，德

① 王宏刚：《妈祖——中国海洋开拓的旗帜》，台北：立得出版社，2006 年，第 40 页。
② 杨君宁：《有妈祖的庇佑下：女性家族史与民间信仰》，《华文文学》2017 年第 2 期。

载千秋传两岸”，妈祖神像旁边有对联“神来湄洲岛，福荫桃川滨”，这些对联彰显了当地民众对妈祖信俗的理解。妈祖文化源自于莆田湄洲岛，在宋代得到赐封，而今得到信众的尊享，揭示出其所附载的祈福、感恩、孝悌、乐助等功用。[①]龙南客家妈祖信俗在内容上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惩恶扬善、忠孝信义、崇德感恩、公平正义等因素包含其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和价值取向，而这也正是客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四）妈祖信俗的综合性

在妈祖祭祀活动中，承载了客家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各种传统文艺形式纷纷登台亮相，如文艺表演、传统美食、灯彩、书法等得到尽情演绎，民众参与这项活动如同享受一场文化盛宴，可以交流感情，传递信息，娱神实为娱人，成为当地民众最为重要的精神生活载体，客家民间文化也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传承。

## 六、结语

龙南妈祖信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而且在发展中成了多种文化的综合体，为当地民俗文化提供了传承和展示的平台。目前，台湾有 1000 多座妈祖宫庙，有 1700 多万信众，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二。无疑，龙南妈祖信俗的保护和传承，将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并对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① 吴伟锋：《融入传统文化符号，彰显妈祖精神》，《湄洲日报》2017 年 7 月 18 日。

# 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及其诗作述论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唐五代时期，闽南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以中唐时期最为繁盛，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欧阳詹、周匡物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整个唐代诗歌历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纵观整个唐五代时期，闽南本土诗人的诗歌在形式上众体兼备，内容上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代表着闽南本土诗歌发展的初期形态和不俗的发展水平，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诗作

福建简称“闽”，初属扬州，自陈朝永定时（557–559）陈武帝为笼络陈宝应而设“闽州”，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州治在晋安（今福州），下领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唐代福建初隶岭南道，后改隶江南东道。终唐至五代，福建地区先后置有建州、泉州、福州、漳州、汀州、镡州（今将乐）、镡州（今延平）等七州。福建开发得较晚，文学发展也比较晚，在唐代以前福建很少有本土作家的作品传世，直到初唐，才开始有少数文人在文坛崭露头角。随着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格局也随之变化，福建地区出现诗人群体，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全闽诗话》提要所言：“闽士著名，始于唐初薛令之，盛于欧阳詹。故六朝以上，惟载郭璞、谢朓、到溉、江淹四人，而郭璞《地讖》尚以其全作七言律体，辨其出于依托，颇为谨严。唐以后则彬彬矣。”①

“闽南”即福建的南部，唐五代时期，泉州之地，曾称丰州、武荣州，唐景云二年（711）始称泉州，天宝元年（742）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领南安、莆田、仙游、晋江四县；漳州之地，唐垂拱二年（686）武则天敕建漳州郡（今云霄县西林村），自贞元二年（786）下辖漳浦、龙溪县、龙岩县三县，至五代未变。鉴于今之泉州、漳州与莆田地区语言、文化、民俗风情等相差比较大，通常所说的“闽南”并不包括莆田、新罗、漳平②，因此，本文所称“闽南”就其狭义而言，专指今之泉州、漳州、厦门三地范围，即唐五代时期泉州所辖的南安、晋江二县与漳州所辖的漳浦、龙溪二县范围。唐五代时期，秀丽的闽南山水和特定的中原移民入闽文化赋予闽南地区丰厚的自然人文底蕴，也使闽南文学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就目前而言，相对于其他区域文学的研究，闽南文学专题研究较少，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文从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考察闽南诗歌的发展状况，研究对象包括有诗作存世的闽南地区本土诗人及其诗歌创作，通过对他们人生轨迹、思想倾向、诗歌作品的梳理分析，探索研究闽南地区诗歌发展概况。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 2018 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固始移民入闽对闽南文学发展影响研究”（JAS180376）

**作者简介**：范丽琴，女，福建政和人，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闽江学院科研处编辑。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795 页。

② 林国平：《“闽南”小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 一、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及其诗作考

唐代以来，尤其是中晚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中原移民入闽、佛教发达等原因，福建闽南地区人文荟萃，出现较多诗人。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唐代闽籍诗人考》[①]，今之泉州籍诗人数为 13 人，漳州籍诗人数为 2 人。[②]其中南安钱熙（953–1000）于雍熙初登甲科中书，宋真宗即位（998）时迁右司谏，大部分活动时间在宋代，《宋史》有传，地方志也都将其归于宋代，因此本文予以排除，得泉州籍诗人数为 12 人，漳州籍诗人数为 2 人。其县属分布及诗歌创作情况大致如下表 1、表 2 所示。

表 1　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县属分布表

| 州 名 | 县 名 | 诗人姓名 |
|---|---|---|
| 泉州（12 人） | 晋江 | 欧阳詹、欧阳澥、王胐、释玄应 |
| | 南安 | 陈黯、释全豁、释义存 |
| | 县属不详 | 李郁、颜仁郁、刘乙、谭峭、康仁杰 |
| 漳州（2 人） | 漳浦 | 潘存实 |
| | 龙溪 | 周匡物 |

表 2　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及其诗作情况简表

| 诗人 | 活跃时期 | 登第情况 | 仕宦情况 | 现存诗作数量 | 诗歌名称 |
|---|---|---|---|---|---|
| 欧阳詹 | 中唐[③] | 贞元八年进士 | 国子四门助教 | 81 首 | 《自淮中却赴洛途中作》《早秋登慈恩寺塔》《灵岩述旧》等 |
| 周匡物 | 中唐 | 元和十二年进士[④] | 高州刺史 | 6 首 | 《古镜谣》《及第谣》《及第后谢座主》《自题读书堂》《应举题钱塘公馆》《三桥隐居歌》 |
| 潘存实 | 中唐 | 元和十三年进士 | 户部侍郎 | 1 首，残句 2 句 | 《赋得玉声如乐》 |
| 陈黯 | 晚唐 | 累科不第 | 无 | 1 首 | 《自咏豆花》 |
| 欧阳澥 | 晚唐 | 会昌四年进士 | 无 | 1 首，残句 3 句 | 《咏燕上主司郑愚》 |
| 释全豁 | 晚唐 | 八举不第 | 无 | 1 首 | 《曜日颂》 |
| 李郁 | 晚唐 | 无 | 未详 | 残句 1 句 | 《吊欧阳秬》残句 |
| 颜仁郁 | 晚唐 | 未详 | 永福县归德场长 | 2 首 | 《农家》《山居》 |

①《唐诗人占籍考》一文所收诗人以有诗存世且为《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收录者为限，诗人占籍除参考两《唐书》《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唐诗》等基本典籍的记载外，主要利用了《唐才子传校笺》《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所收诗人及诗作较为全面。

②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62 页、第 178–183 页。

③ 作家所属时代依其主要活动时期而定，时代的划分大体上分为初唐（618–713）、盛唐（713–766）、中唐（766–836）、晚唐（836–907）、五代（907–960）。

④ [宋]李昉等编著《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九引《闽川名士传》作“元和十二年”，[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三作“元和十一年”，今取前者之说。

续表 2

| 诗人 | 活跃时期 | 登第情况 | 仕宦情况 | 现存诗作数量 | 诗歌名称 |
|---|---|---|---|---|---|
| 释义存 | 晚唐 | 无 | 无 | 43 首,残句 1 句 | 《雪峰示偈》《自述》等 |
| 王肱 | 五代 | 累举不第 | 无 | 1 首 | 《无题》 |
| 刘乙 | 五代 | 未详 | 中书舍人 | 3 首，残句 1 句 | 《题建造寺》《晓望》《山中早期》 |
| 谭峭 | 五代 | 无 | 无 | 1 首，残句 1 句 | 《大言诗》 |
| 康仁杰 | 五代 | 无 | 户部郎中 | 残句 3 句 | 无 |
| 释玄应 | 五代 | 无 | 无 | 1 首 | 《临寂示漳州刺史陈文颢偈》 |

由表 1、表 2 可以明显看出唐代闽南本土诗人和现存诗作的时空分布特点，在时间分布上，唐初、盛唐时期尚未发现有诗作传世的闽南本土诗人，有诗作传世的闽南本土诗人的主要活动时间多集中于唐代中后期及唐末五代。在空间分布上，泉州是闽南地区开发最早的区域，早在三国时期吴永安三年（260）就设置了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丰州，辖今泉州、莆田、厦门及漳州部分地区。西晋永嘉五年（311），中原战乱，衣冠士族南渡入闽，沿古南安江两岸聚居，改“南安江”名为“晋江”。唐太宗时期又设置丰州、武荣州，州治皆在今南安丰州。唐代时期，泉州为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泉州文学开始勃兴，主要集中于开发较早的南安和晋江二县。这些闽南本土诗人凭借他们独具地域特色的诗风和成熟的诗艺，对唐诗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是整个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唐五代闽南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

唐五代闽南地区诗歌以中唐时期最为繁盛，出现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欧阳詹、周匡物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整个唐代诗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晚唐五代时期的闽南诗人创作也体现出或飘逸、或凄婉、或清丽的多样风格，体现闽南地区诗歌在生发期的阶段性特色。

### （一）中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欧阳詹、周匡物、潘存实的诗歌

唐五代闽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学家首推欧阳詹，唐韩愈赞誉道：“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①] 门人李贻孙亦赞道：“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其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②]

欧阳詹（约 755–800），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其先皆为本州州佐、县令”[③]。弱冠能属文，“操笔属词，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发于乡里之间。建中、贞元时，文词崛兴，遂大振耀，瓯闽之乡，不知有他人也”[④]，五试于礼部，于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时称“龙虎榜”，世以为荣，有人诗

① [唐]韩　愈:《欧阳生哀辞》,[清]董　诰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740 页。
② [唐]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第 5514 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786 页。
④ [唐]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第 5514 页。

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①]是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终于国子四门助教。卒年四十。韩愈为其作哀词《欧阳生哀辞》，言其事父母至孝，称其“慈孝最隆”，又云其“德行信于朋友”。[②]黄璞为其作《欧阳行周传》[③]。著有《欧阳行周文集》10 卷，其中诗 80 首，文 50 多篇，赋 13 篇，诗文赋各体兼备。《全唐诗》存诗 1 卷 80 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从嘉靖《略阳县志》卷六中补诗 1 首《灵岩述旧》。[④]

欧阳詹是闽南本土诗人中诗歌创作的主力，其诗歌数量约占闽南本土诗人现存诗歌创作总量的一半以上。欧阳詹的诗作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各异、各种诗歌形式应有尽有。从诗歌形式来看，在 80 首诗歌中，律诗 17 首（五律、七律）、绝句 31 首（五绝、七绝）、排律 2 首、古风 29 首、乐府曲辞 1 首，各种诗歌形式兼备。从诗歌的内容题材看，有咏史怀古、即景抒怀、写景抒情、酬赠应答、羁旅思乡怀人等各种题材，记录诗人从踌躇满志进京求仕以求建功立业，但历经坎坷、怀才不遇，却又充满自信积极向上，毫不灰心丧气的典型学子形象。有咏史怀古诗，如：

弭棹历尘迹，悄然关我情。伊无昔时节，岂有今日名。辞贵不辞贱，是心谁复行。钦哉此溪曲，永独古风清。（《题严光钓台》）[⑤]

想象精灵欲见难，通津一去水漫漫。空余昔日凌霜色，长与澄潭生昼寒。（《题延平剑潭》）

《题严光钓台》一诗借东汉高士严光谢光武帝高官厚禄之诺，甘心垂钓终老的典故，追慕古人严光的松柏操节，表达自己保持气节的愿望。《题延平剑潭》一诗借助干将、莫邪化龙，精灵显现难以遇见的传说，具有借古讽今之意。有即景抒怀诗，如：

宝塔过千仞，登临尽四维。毫端分马颊，墨点辨蛾眉。地迥风弥紧，天长日久迟。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早秋登慈恩寺塔》）

还有边塞征战诗，如：

闻说胡兵欲利秋，昨来投笔到营州。骁雄已许将军用，边塞无劳天子忧。（《塞上行》）

表现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对建功立业颂扬的诗还有《咏德上太原李尚书》《送张骠骑坌宁行营》，其中“九重帝宅司丹地，十万兵枢拥碧油”“宝马雕弓金仆姑，龙骧虎视出皇都”之句气势雄伟，借以表达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有写景抒情诗，如：

回峰叠嶂绕庭隅，散点烟霞胜画图。日暮华轩卷长箔，太清云上对蓬壶。（《晚泊漳州营头亭》）

不到灵岩又二年，重来风景尚依然。层峦迥出青霄外，倦鸟归飞夕照边。坐爱云林泉石好，行寻暖谷野桥连。同游不觉天将晚，暂借僧房一榻眠。（《灵岩述旧》）

高居胜景谁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欢。新柳绕门青翡翠，修篁浮径碧琅玕。步兵阮籍空除屏，彭泽陶潜谩挂冠。只在城隍也趋府，岂如吾子道斯安。（《题华十二判官汝州宅内亭》）

风景如画的胜景前顿生佳意幽情，写景的同时抒写诗人的理想生活追求和美好生活愿望。也有抒写闲情逸致的诗，如《玩月》“素魄皎孤凝，芳辉纷四扬。裴回林上头，泛滟天中央。皓露助流华，

① [宋]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二十一，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51 页。
② [唐]韩　愈:《欧阳生哀辞》,《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七，第 5740 页。
③ [唐]黄　璞:《欧阳行周传》,《全唐文》卷八百十七，第 8603-8604 页。
④ [清]郑　杰原辑，陈衍补订《闽诗录》将唐吕温以下 7 首诗《奉敕祭南岳》《送文畅上人东游》《巩路感怀》《衡州早春二首》《看浑中丞山桃花，初有他客不通，晚方得入，因有戏僧》《戏赠灵澈上人》《道州郡斋卧病寄东馆诸贤》收录在欧阳詹诗作下，有误。
⑤ 本文所引用的闽南本土诗人的诗歌，除了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

轻风佐浮凉。清冷到肌骨，洁白盈衣裳”几句，将朗朗月色风韵形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又如《汝川行》则有“垂空玉腕若无骨，映叶朱唇似花发”之闲情佳句。

欧阳詹的诗歌最多的还是酬赠应答、羁旅思乡之作。酬赠应答多是赠人诗、送别诗、应答诗、唱和诗等，赠人诗如：

外户通宵不闭关，抱孙弄子万家闲。若将邑号称贤宰，又是皇唐李鲁山。（《赠鲁山李明府》）

算日未成年，英姿已褒然。王家千里后，荀氏八龙先。葱蒨松犹嫩，清明月渐圆。将何一枝桂，容易赏名贤。（《酬裴十二秀才孩子咏》）

送别诗，如：

羸马出都门，修途指江东。关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风。矢舍虽未中，璞全终待攻。层霄秋可翔，岂不随高鸿。（《送袁秀才下第归毗陵》）

天长地阔多岐路，身即飞蓬共水萍。匹马将驱岂容易，弟兄亲故满离亭。（《泉州赴上都留别舍弟及故人》）

美人河岳灵，家本荥水滨。门承若兰族，身蕴如琼文。早折青桂枝，俯窥鸿鹄群。迩来丹霄姿，远逐苍梧云。有伊光鉴人，惜兹瑶蕙薰。中酣前激昂，四座同氛氲。海郡梅霪晴，山邮炎景曛。回翔罢南游，鸣唳期西闻。秦塞鸾凤征，越江云雨分。从兹一别离，伫致如尧君。（《福州送郑楚材赴京，时监察刘公亮有感激郑意》）

酬赠应答这类诗歌多是叮咛对方，鼓励对方，赞颂对方，如其中“早折青桂枝，俯窥鸿鹄群”“层霄秋可翔，岂不随高鸿”等句，以理想抱负激励友人，寄托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应答诗如《答韩十八驾骥吟》，唱和诗如《和严长官秋日登太原龙兴寺阁野望》等亦表现出与友人的深厚情谊。

欧阳詹的羁旅思乡怀人之作，多描述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凄楚辛酸并引发对亲人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归，对自我人生如寄处境的感慨。这类诗歌在整个唐诗思乡类主题诗歌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有写羁旅路途的艰辛，如：

惆怅策疲马，孤蓬被风吹。昨东今又西，冉冉长路岐。岁晚树无叶，夜寒霜满枝。旅人恒苦辛，冥寞天何知。（《自淮中却赴洛途中作》）

有抒发思乡之情，如：

客路度年华，故园云未返。悠悠去源水，日日只有远。始叹秋叶零，又看春草晚。寄书南飞鸿，相忆剧乡县。（《春日途中寄故园所亲》）

正是闽中越鸟声，几回留听暗沾缨。伤心激念君深浅，共有离乡万里情。（《与林蕴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认得越鸟声呈林林亦闽中人也》）

中宵天色净，片月出沧洲。皎洁临孤岛，婵娟入乱流。应同故园夜，独起异乡愁。那得休蓬转，从君上庾楼。（《旅次舟中对月寄姜公（此公，丁泉州门客）》）

青苞朱实忽离离，摘得盈筐泪更垂。上德同之岂无意，故园山路一枝枝。（《与洪孺卿自梁州回途中经骆谷见野果有闽中悬壶子……闽人》）

南北风烟即异方，连峰危栈倚苍苍。哀猿咽水偏高处，谁不沾衣望故乡。（《题梨岭》）

村步如延寿，川原似福平。无人相共识，独自故乡情。（《蜀门与林蕴分路后屡有山川似闽中因寄林蕴蕴亦闽人也》）

征途渺渺烟茫茫，未得还乡伤近乡……林间啼鸟野中芳，有似故园皆断肠。（《许州途中》）

有表达思念之情的情诗，写得亦情真意切，如：

驱马觉渐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犹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屡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欧阳詹与太原妓两情相悦，惺惺相惜，离别后互相思念，太原妓《寄欧阳詹》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①]欧阳詹亦有《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两首诗遥相呼应，两人心有灵犀，互诉衷肠，表达对情人的柔情别绪、忧愁伤感，可见二人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读完不禁令人想起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千古良缘，为之动容。

中唐时期，欧阳詹之后，闽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作家有龙溪周匡物、漳浦潘存实。

周匡物（生卒年不详），字几本，号名第，漳州龙溪人，唐元和十二年（817）进士及第，仕至高州刺史。曾在天城山之麓读书[②]，"未第时，赋《轩辕古镜歌》，驰誉一时。御试《学殖赋》《莺出谷》诗，为时传诵，号为名第先生"[③]。刘禹锡《名第山诗》有"危亭谁结据山椒，名第山人不可招"之句。当地元和中建有名第坊、名第桥、周先生祠、得仙亭来纪念他。宋张征诗云："漳南周匡物，竞秀元和年；作句诧亲友，进为乡党先。"[④]得仙亭在名第山，宋蔡如松序曰："泉人欧阳詹与吾乡周匡物、潘存实两先生相踵而出世，有元和得仙之谣，因以名亭。"[⑤]周匡物读书处有周潘书堂和自隐堂。周匡物以歌诗著名，有《周匡物诗集》。现存诗作仅 6 首，其中《轩辕古镜歌》《及第谣》《及第后谢座主》《自题读书堂》《应举题钱塘公馆》等 5 首收入宋尤袤所撰《全唐诗话》。《全唐诗补编》又录一首《三桥隐居歌》。

《应举题钱塘公馆》又作《西陵待渡诗》，诗曰：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闽川名士传》载："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⑥]唐诗纪事亦有载。

轩辕铸镜谁将去，曾被良工泻金取。明月中心桂不生，轻冰面上菱初吐。蛟龙久无雷雨声，鸾凤空踏莓苔舞。欲向高台对晓开，不知谁是孤光主。（《古镜歌》）

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遥望龙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醉。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及第谣》）

一从东越入西秦，十度闻莺不见春。试向昆山投瓦砾，便容灵沼濯埃尘。悲欢暗负风云力，感激潜生草木身。中夜自将形影语，古来吞炭是何人。（《及第后谢座主》）

窗外卷帘侵碧落，槛前敲竹响青冥。黄昏不欲留人宿，云起风生龙虎醒。（《自题读书堂》）

谁家作桥溪水头，茅堂四月如清秋。白云已过暮山紫，黄鸟不鸣春自幽。掀髯背向孤舟立，

①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八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3 册，第 9024 页。
②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上册，第 142 页。
③ [明]徐　燉编，费道用、杨德周等补之：《闽南唐雅》，转引自：[清]郑杰原辑，陈衍补订：《闽诗录》甲集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1 页。
④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下册，第 393 页。
⑤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四，下册，第 757 页。
⑥ [唐]黄　璞：《闽川名士传》，[宋]李　昉等：《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61 年，第 1494 页。

犹记仙源旧曾入。雨打疏篷醉不知，桃花一夜新流急。（《三桥隐居歌》）

《及第谣》中“三十三人名字香”是指元和十一年（816）中书舍人李逢吉所擢登第者多家世清贫低微，时人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①]诗中“三十三人名字香”的典故描写及第前后从“袍似烂银”到“白日上青天”变化，表达登第后的喜悦心情。周匡物诗歌擅于即事抒情、即景抒怀，擅于细致抒写心境，将士子从登第前落魄时“又阻西陵两信潮”的无奈心境，到苦读时充满“云起风生龙虎醒”的自信心态，再到及第后欢欣鼓舞的喜悦心情和愿为“天下瑞”的踌躇满志一一描摹得细腻而深刻。

潘存实（生卒年不详），据《全闽诗话》记载，字镇之，漳浦人。初应举以《晨光丽仙掌赋》及《双陆子赋》得名，元和十三年（818），庾承宣侍郎，下试《礼耕情田赋》及《玉声如乐诗》，入格登第，初授东宫左庶子，累迁户部侍郎。[②]潘存实是漳浦第一位进士，曾与周匡物相善，读书天城山，又自修业于梁山，时称周、潘二先生。[③]史载“始存实有用世志览，郭璞《闽城记》曰：南台沙合公辅即出，自是凡遇自闽来者辄问南台江可揭衣未也。”著有《良山存稿》。现存有《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四公子赞》《藏剑铭》载于北宋姚铉编《唐文粹》，有《晨光丽仙掌赋》《赋得玉声如乐》载于宋李昉编的《文苑英华》。《全唐诗》收有现存诗 1 首《赋得玉声如乐》，《全唐诗补编》收《壶公山》一首；又有据唐黄滔《壶公山》诗自注辑其残句“双旌牧清源，吟看壶公翠”一句[④]；又据《八闽通志》卷之八辑其残句“根盘来楚、蜀，作镇表瓯闽。”[⑤]

其诗文采斐然，语言优美。如五言诗：

表质自坚贞，因人一扣鸣。静将金并响，妙与乐同声。杳杳疑风送，泠泠似曲成。韵含湘瑟切，音带舜弦清。不独藏虹气，犹能畅物情。后夔如为听，从此振琮琤。（《赋得玉声如乐》）

诗歌将玉声的清冷高雅刻画得细腻生动，作者借玉咏怀，表达自己的坚贞情操。

纵观中唐的三位诗人，皆为当地较早甚至最早的进士，对当地士子起到先导的作用，《郡斋读书志》卷十七《别集类》上《欧阳詹集》十卷载：“初，闽人不肯北宦。及常衮为观察使，兴学劝士，詹始以进士举。”[⑥]《明一统志》卷七十八《人物》载：“唐周匡物，漳州龙溪人，初州人未有业儒者，匡物兄匡著擢贞元进士，而匡物复擢进士，官至高州刺史。唐世郡人登科者，始于匡物兄弟。”[⑦]《全闽诗话》亦说“浦人登第自存实始”[⑧]。

### （二）晚唐时期——陈黯、欧阳澥、李郁、颜仁郁的诗歌

陈黯（800–877），字希儒，号昌晦，祖居莆田，后迁至清源郡南安县大同场嘉禾屿（今厦门）。据《闽书》记载，陈黯少聪颖，10 岁能诗，13 岁袖诗通谒清源郡守，献上自己的诗作《咏河阳花》。郡守赞不绝口，从此黯声名大振于州里。17 岁时，作《苏武谒汉武帝陵庙赋》为士人所推服。但其仕途不畅，会昌迄咸通间（841–873），凡十八举不第，“世叹其屈”，自嘲为“场老”，现嘉禾屿

①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787 页。
② [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一百十九《英旧志·缙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570 页。
③ [明]徐　燉编，费道用、杨德周等补之：《闽南唐雅》，转引自[清]郑杰原辑，陈衍补订：《闽诗录》甲集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页。
④ [唐]黄　滔：《黄御史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084 册，第 126 页。
⑤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八，上册，第 146 页。
⑥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孙　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874 页。
⑦ [明]李　贤等：《明一统志》卷七十八《人物》，《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73 册，第 654 页。
⑧ [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一百十九《英旧志·缙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570 页。

有场老山、陈场老钓矶，《雁汀叠韵》云：“场老空留钓石存，衣冠族望尚追源。”[①]所著有《绮藏集》，同郡王肱、萧枢，同邑林颢，漳浦赫连韬，福州陈薖、陈发、詹雄齐名，时人誉为“福建八贤”，“名价相埒而并不遇，世叹其屈”[②]。陈黯先隐居终南山，后回到嘉禾屿，隐居金榜山麓，筑石室读书著述。有《大易裨正》三卷，《颍川先生集》五卷。一生诗文甚多，但多散失。今见于《全唐诗》仅有《咏河阳花》一首：

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满面与妆花。（《咏河阳花》）

陈黯体态丰拔，举止潇洒，有“松姿柳态”之誉，黄滔在《颍川陈先生集序》中称陈黯“文词不尚奇，切于理也，意不偶立，重师古也，其诗篇词赋笺檄皆精而切，故于官试尤工”[③]。关于陈黯的籍贯，历史上有多种说法。一为泉州南安人，如《五代史补》卷一、《新唐书》志第五十艺文四、《唐史·艺文志》所载。二为颍川人，如《八闽通志》卷之六十八、《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大清一统志》《福建通志》所载。《福建通志》：“避黄巢防乱，隐居终南山，后徙同安之嘉禾防读书。”三为东瓯人，如《五代史补》所载。四为莆田人，如《漳州府志》所载。《道光厦门志》卷十三作了较为详细信服的分析，认为“当以同时黄滔、罗隐前后二序为准……据黄序曰，与同郡、同邑、漳浦、福州八贤名价相上下；以文而论，则为泉人无疑矣”，又根据罗隐序言“相接于京师；庚寅春（庚寅疑庚辰之讹，咸通元年），胶其道于蒲津秋试之场”，又因唐都长安，蒲津乃蒲州，得出“当以《唐史·艺文志》‘南安人’为断”的结论。[④]

欧阳澥，字沙章，号潘湖，泉州晋江人。据唐末五代王定保(870–940)《唐摭言》卷十载，参加科举考试近二十年，终于在唐朝会昌四年（844）中进士。“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少年时稍稍见长于吟诗做赋，现存诗作 1 首《咏燕上主司郑愚》载于《全唐诗》卷六百零七，残句 3 句载于唐范摅《云溪友议》。

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欧阳澥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⑤]欧阳澥有诗曰：

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咏燕上主司郑愚》）

《徐氏笔精》卷四“下第咏燕”中称此诗“托讽微婉得风人之体”[⑥]，诗风温婉中充满哲理。

李郁，泉州人，《全唐诗》卷七九五有《吊欧阳秬》诗残句：“身死为修刘稹表，名高因让陆洿书。”《稗史汇编》云：“秬，詹从子，开成中擢第，司勋郎中陆洿弃官，隐吴中，后赴召复出。秬移书让之，因不出。秬名益闻。竟赴泽潞刘稹幕辟。稹表指斥时政，朝廷疑秬所草，流崖州，赐死。”[⑦]

颜仁郁，字文杰，号品俊，泉州德化人。生于唐大和（827–835）间。祖籍河南温县。祖父颜景

① 陈　衍：《石遗室诗话》卷二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46–447 页。
②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486 册，第 16 页。
③ [唐]黄　滔：《颍川陈先生集序》，《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四，第 8685 页。
④ [清]周　凯、凌　翰等：《厦门志》卷十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 273 页。
⑤ [唐]范　摅：《云溪友议》，转引自：[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486 册，第 17 页。
⑥ [明]徐　燉：《徐氏笔精》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856 册，第 494 页。
⑦ (明)王　圻：《稗史汇编》，转引自：[清]郑　杰原辑，陈　衍补订：《闽诗录》甲集卷二，第 68–69 页。

茂为兵曹参军，入闽任福州侯官县令。父颜芳（787–860），随其父入闽，辗转来到永福（今永泰）县归德场，受聘于金员外为家塾教师，后定居于此。颜仁郁为颜芳第七子。据《十国春秋》卷九六载，仕闽王审知，为归德场长，“时土荒民散，仁郁抚之，一年襁负至；二年田莱辟；阅三岁而民足用”[①]。即朱继芳《龙寻稿》所说的“五代时能抚循其民，使不见兵革”[②]，龙寻邑东有颜长官仁郁祠来纪念他。颜仁郁有诗百篇，宛转回曲，历道人情，邑人途歌巷唱之，号“颜长官诗”。[③]朱继芳《龙寻稿》亦称“龙寻志所刻诗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给之状，余生三百年后奉天子命守兹邑，首谒祠下，因次韵以寄甘棠之思，且使来者知我爱桐乡之意云”[④]。现存诗仅 2 首，收入《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三。一首是《农家》,《十国春秋》称其为“劝农诗”：

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另一首是《山居》:

柏树松阴覆竹斋，罢烧药灶纵高怀。世间应少山间景，云绕青松水绕阶。

由于颜仁郁为基层地方官员，与当地百姓交往较多，其诗歌注重描写民生疾苦，体恤下民，知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的辛劳，也知“羸牛无力”的无奈；同时颜仁郁诗擅于抒写“云绕青松水绕阶”的优美“山间景”，怡情山水，陶醉其中，表达诗人热爱自然山水的旷达情怀。

### （三）五代时期——王肱、刘乙、康仁杰的诗歌

王肱，字用辅，晋江人，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云王肱与陈黯同郡，是“福建八贤”之一。《漳州府志》载之于《文苑》。《福建通志·艺文志》小说家类录《济状》一篇，云“晋江王肱著”[⑤]，并据何乔远《闽书》云：“为文好讥刺当世，以是累举不第。尝著《济状》一篇，言浊河贯清济，济诘其诡溷，时甚奇之。”[⑥]《全唐诗补编》称王肱有《无题》五十首，仅存首篇。又引《闽省通志》说王肱“有无题古诗一百三十首词，多凄惋”[⑦]。但《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五十五《人物志》、卷之七十《典籍志》取“《无题古诗》一百三十首”[⑧]此说。王肱诗正如《全唐诗补编》所称诗“多凄惋”，如《无题》诗曰：

茆屋江山上，夜来梦吴越。岩溜穿白云，桂花落明月。子规啼空山，一声一滴血。何事□秋风，出门又离别。

《无题》诗中借助“杜鹃啼血”的典故来表达离别之情，又用“梦”“落”“空”等极有表现力的动词来渲染气氛，整首诗充满凄婉哀伤之情。

刘乙，“字子真，泉州人”[⑨]。后晋天福年间（936–946），仕闽为凤阁舍人，蒋挺《对增赀就赋判》称“刘乙为邑，道百姓增赀就赋，减年从役……刘乙怀符宓贱，比绩刘平。增赀减年，诚一时之异政；以今方古，亦千载而同风”[⑩]。后因受散骑常侍卢损的讥笑“布衣芒履”而弃官遁去，隐于安溪凤髻山，终身不出。[⑪]刘乙与吴中处士周朴、本县令詹敦仁友善。詹敦仁赠刘乙诗《寄刘

①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89 页。
② [宋]朱继芳：《龙寻稿》，转引自：[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十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1 页。
③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六，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89 页。
④ [宋]朱继芳：《龙寻稿》，转引自：[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十二第 131 页。
⑤ 沈瑜庆、陈　衍：《福建通志·艺文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本。
⑥ [明]何乔远：《闽书》，转引自[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486 册，第 17 页。
⑦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556 页。
⑧ [清]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五十五、卷之七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335、1671 页。
⑨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93 页。
⑩ [清]董　诰等：《全唐文》卷二百八，第 2111 页。
⑪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50 页。

乙处士》云：

音问相忘二十秋，天教我辈到南州。无穷风月随宜乐，有分溪山取次收。好语传来如昨梦，离情欲剖带春愁。何时载酒从东下？细与刘君叙昔游。[①]

这首诗充分展示了对待朋友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表现出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又遣子詹琲访刘乙，赠之以诗《遣子访刘乙》：

扫石耕山旧子真，布衣草履自随身。石崖壁立题诗处，知是当年凤阁人。[②]

据《全唐诗补编》说，詹琲访刘乙时，刘乙已殁，因吊以诗，以表达思念之情。据传，刘乙曾编成《百悔经》自警，宋陶谷撰《清异录》卷上载："闽士刘乙尝乘醉与人争妓女，既醒惭悟，集书籍凡因酒致失贾祸者，编以自警，题曰'百悔经'，自后不饮至于终身。"[③]可谓勇于改过。有《凤髻山集》一卷，今存诗 3 首，残句 1 句。其诗曰：

曾看画阁老健羡，如今亲见画犹粗。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题像阁人渔浦叟，集生台鸟谢诚乌。我来一听支公论，自是吾身幻得吾。(《题建造寺》)

地祇逃秀境，神化或殷雷。裂汉娲补合，高峰剑跃开。即今新定业，何世不遗才。若是浮名道，须言有祸胎。(《晓望》)

鸡调扶桑枝，秋空隐少微。阔云霞并曜，高日月争辉。若厥开天道，同初发帝机。以言当代事，闲辟紫宸扉。(《山中早起》)

扫石云随帚，耕山鸟傍人。(《句》)

康仁杰，泉州人。少祝发为僧，"喜儒学，颇自励，尤工于诗。因游江淮，会南唐陈德诚出次池阳，仁杰以诗投之，有'红渡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之句，陈德诚荐至金陵。时陈洪进据漳、泉，南唐主召问其土俗，仁杰对答无滞，和《登阁》诗有'云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长占半城阴'之句，座皆大惊，授鄂州文学，补溧阳簿。性循素俭，唯食公俸，门无私谒，终汾阳令。"[④]《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五十五《人物志・文苑之一》亦有载。著有《诗文集》,《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五收录现存诗残句 3 句：

红渡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

云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长占半城卫。(《升元阁》)

只住此山宁有意，向来求佛本无心。(《赠嘉禾峰僧》)

康仁杰留存的诗句虽然，但由此三句诗足以看出其豪迈、洒脱的诗风。

此外，佛教自西晋传入闽地至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高僧辈出，名刹林立，出现许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僧和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誉的寺院，如建于唐长庆二年（822）的泉州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五代闽国，福建佛教繁盛，闽王王审知重视佛法，全力扶持佛教，特地命令浮海运木料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就连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正如南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十七所说："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⑤]在此背景下，福建出现众多诗僧，而且文学修养都较高，终身悟法。《全唐诗》辑录

① [清]谢宸荃主修，[清]洪龙见主纂，凌文斌、王伯兰、李启厚点校：《安溪县志》卷之十一，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2003 年，第 213 页。
②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六一，第 8643 页。
③ [宋]陶　谷：《清异录》卷上，琅竹堂刊本，第 19 页。
④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六十七，下册，第 590 页。
⑤ [宋]黄　榦：《勉斋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68 册，第 438 页。

诗僧共 115 人，福建地区就占 52 人，完整的诗偈颂达 149 首。闽南地区诗僧数量也不少，有诗作传世的主要有释义存、释玄应、释全豁 3 人。闽南诗僧的诗作往往通过偈颂等形式阐述教义，但并不生硬俗白，而是具有空灵的审美情境。

释义存（822–？），唐长庆二年（822）生于泉州南安县曾氏，自祖父辈以来皆友僧亲佛，传说义存生而鼻逆荤血，乳抱中或闻钟磬或见僧像，其容必动。九岁要求出家，父母不允，十二岁随父游莆田玉涧寺，遂留寺不回，礼寺僧庆玄和尚为师，随侍五年。[①]据《淳熙三山志》记载，义存初游吴楚至武陵，传法于五祖德山，乃归闽，居芙蓉山石室，后称雪峰山，引《闽中实录》说，雪峰山初名“象骨山”，闽王王审知因“山顶暑月犹有积雪”而改其名，改名之后寺庙信徒陡增、寺庙规模扩大。唐乾符二年（875），赐号义存“真觉”及“三衣”，乃号“应天雪峰禅院”。[②]义存对佛教宗派的建立作了很大的贡献，是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之一云门宗的六世雪峰义存禅师。《闽诗录》转引《闽书》云：“雪峰难提塔，义存禅师所造，有自序。塔后，黄滔为作铭。旁蘸月池，有古杉，乃闽王审知与义存手植，皆数十围。义存植者直而参天，闽王植者樛而逮地。水磨，磨下绝雀。因义存初有诗题，至今信然。”[③]其对闽南诗歌的发展亦有较大的贡献，现存《雪峰示偈》《自述》等诗偈 43 首，残句若干，录于《全唐诗补编》。其诗曰：

光阴倏忽暂须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岭年登三十二，入闽早是四旬余。他非不用频频检，已过还须旋旋除。为报满朝朱紫道，阎王不怕佩金鱼。(《雪峰示偈》)

思量未到雪峰时，爱把浮生取次疑。及至法门非法法，到头无我亦无师。(《自述》)

庵前永日无狼子，磨下终年绝雀儿。(《句》)

释玄应（910–975），《景德传灯录》卷二四载：“漳州报劬院玄应定慧禅师，泉州晋江县人也，姓无式。”[④]《书目答问》卷一经部、《开元释教录》卷第十三等著录，《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为大唐翻经沙门释玄应撰。此书为训诂学音义类专书，对佛经中感到困惑之字词录出作为词目，注音训于下，并广引字书传说以证之，征引群籍百数十种，被清儒之治小学、校雠、辑佚者视为瑰宝。现存诗偈 1 首，曰：

今年六十六，世寿有延促。无生火炽然，有为薪不续。出谷与归源，一时俱备足。[⑤]

释全豁，字希孺，《宋高僧传》卷二三、《景德传灯录》卷一六皆作泉州人，《祖唐集》卷七云：“俗姓柯，泉州南安县人也。”自会昌乙丑至咸通乙酉，凡八举不第，著有《绮藏集》。法名作“全豁”。少而挺秀，器量宏大，值光启已来，中原多事，诸侯角立，狂贼来剽掠，贼责弗供馈，忿怒俾挥刃之，曾无惧色，光启丁未岁夏四月八日，门人权葬，葬后收焚之，获舍利七七粒。僖宗赐谥曰清严，塔号出尘。《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三有传。《五灯会元》卷七谓光启三年卒。《全唐诗补编》据《祖堂集》卷七辑录诗偈 1 首，其诗曰：

当机直下现前真，认诗之徒未可亲。本色先陀如[illegible]，岩头松桧镇长新。(《曜日颂》)

以上释家之诗，多是以偈颂的形式来寄寓佛理、衍推禅意的禅理诗，充满禅理禅趣，禅诗的意境空灵，多有为超凡脱俗之感，可谓是僧诗中的优秀之作。

① [宋]赞　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1052 册，第 164 页。
②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四《寺观类》，《宋元方志丛刊》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8174 页。
③ [清]郑　杰原辑，陈　衍补订：《闽诗录》甲集卷四，第 81 页。
④ 顾宏义：《景德传灯录译注》卷二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一册，第 1882 页。
⑤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三〇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6 页。

另外，福建道教在唐五代也有很大的发展，闽处士张标“有道术能通冥府”[①]，闽南地区道教也大有发展，如泉州人蔡如金弃官入道，修真炼法，其声闻于朝廷，敕赐“灵应先生”。五代时闽王王延钧、晋江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都宠幸道士，热衷修建道教宫观、庙宇。王延钧还拜道士谭峭为师，赐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留从效在泉州城里建紫极宫迎恩馆，陈洪进建奉先观于惠安城南。其中不乏文学素养高的得道之士，谭峭就是其中一位。

谭峭，“道士谭紫霄，泉州人也”[②],《四库提要辩证》卷一四考定“谭紫霄”即“谭峭”。《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六十《人物志·仙释》有传曰：“五代谭峭，向嗜黄老，游终南、华、岱诸名山，师嵩山道士，得辟谷御炁之术。尝醉游，夏着乌裘，冬衣葛衫，或卧霜雪中。南唐主召至建康，赐号紫霄真人。归，修炼于清源紫泽洞。”[③]《十国春秋》亦有《南唐谭峭传》。著有《化书》，全称《谭子化书》，别称《齐丘子》，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化书”条下云“《通考》载伪唐宋齐丘子嵩撰，宋景濂以为谭峭景升作，齐丘窃之。”[④]现存诗 1 首，残句 1 句,《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一有收录，其诗曰：

线作长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东边。蓬莱信道无多路，只在谭生拄杖前。(《大言诗》)

云外星霜如走电，世间娱乐似抛砖。(《句》)

《大言诗》诗中首句“线作长江扇作天”的描写，想象大胆、奇特，“靸鞋抛向海东边”句夸张、大气；剧曲《牡丹亭》第十五出《虏谍“北尾”》有引用“线大长江扇大天”之句，可见其为绝佳之句且流传至广。残句“云外星霜如走电，世间娱乐似抛砖”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云外星霜、世间娱乐，亦令人叹服。

综上所述，纵观整个唐五代时期，闽南地区本土诗人数量不多，众多作家作品大量散佚，留下的诗歌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文坛上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关注，但实际上这一时期闽南地区诗歌在形式上众体兼备，有古风，有律诗（七律、五律），有绝句（五言、七言），有乐府等；在内容上咏史怀古诗、咏物言志诗、借景抒情诗、酬唱赠答诗、羁旅诗、边塞诗等应有尽有，题材广泛，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丰富，或是忧国伤时，或是建功报国，或是思乡怀人，或是长亭送别，或是应酬唱和，或是生活杂感；诗歌风格也因诗人生活经历、艺术素养不同而形成或刚健雄奇，或飘逸自如，或缠绵凄婉，或清新明丽，或恬淡自适等多样风格；因此，这些尚存无几的诗歌却闪耀着点点星光，折射出闽南诗歌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俗的发展水平，代表着闽南本土诗歌发展的初期形态。

① 沈瑜庆、陈　衍：《福建通志·道士传》，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本。
② [宋]马　令:《马氏南唐书》卷之二十四,《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刊本。
③ [清]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六十《人物志·仙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1382 页。
④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补正》，黄云眉补正，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20-321 页。

# 陈昂《白云集》简论

李晓雪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陈昂（1524 前后—1603），福建莆田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攻陷兴化府（今莆田市）时，背井离乡，逃至豫章，流落楚、蜀，老死金陵。林古度林其家搜得《白云集》，后与钟惺刻于北京；钟惺为之序。其集多为反映寇乱的纪实诗。陈昂诗在晚明独树一帜。宋珏评其诗：不论元白王杜，尽锤炉而出，而以沉郁为主。

**关键词**：晚明诗歌；陈昂；《白云集》

陈昂（1524 前后—1603），福建莆田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攻陷兴化府（今莆田市）时，背井离乡，逃至豫章，流落楚、蜀，老死金陵。林古度林其家搜得《白云集》，后与钟惺刻于北京；钟惺为之序。其集多为反映寇乱的纪实诗。陈昂诗在晚明独树一帜。宋珏有天启重修本。宋珏有心留存陈昂所存诗的全貌，并不凭己意删削。《白云集》诗歌，按宋珏天启重修本，加上补遗，共 737 首，其中五言近体 688 首，七言近体 44 首，七言绝句 4 首，排律 1 首。

陈昂并没有直接提及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只在《五言今体自序》中说："第家贫，无多古书，得王右丞即诵读右丞，得杜工部即诵读工部。"[①]闲暇之余取二位诗作之"中规中矩者"，推敲磋磨，大体走的还是复古的路子，《四库全书总目·白云集七卷》提要评价"其（陈昂）诗颇学少陵、右丞，得其形似"[②]，认为他但仿杜、王躯壳而无精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七言其"可谓多师以为诗者也"[③]，说他不止学杜、王，风格杂糅，师法多家，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二十五称《白云集》的整体风格"孤迥清峭"[④]，倒似是因为钟、谭刻书，强套个竟陵的名目给他，不免欠妥，况且陈昂在时，竟陵派尚未崛起，以上种种皆是因诗忘人之论，即便各据道理，总觉缺憾，宋珏《重刻白云集题词》[⑤]则道：

> 如自谓得工部矣，而未始无青莲，得右丞矣，而未始无襄阳，其间有初盛矣，而何必不中晚，皆李唐矣，而何必不宋元，他如郊岛元白，谣谑仙鬼，无不炉锤而出之，以自满其志，而成其一家，乃其苦吟险觅，若号若笑之状，于楮墨外更有可思焉，世谓先生但能学杜甫者，陋也。

陈昂的诗作在宋珏眼内无所不包，宛然自成一家，实有过誉之嫌，却妙在发现了纸砚外的诗人本身。陈昂自己也说，天之生人，予材各异，他是"受短"之人，"末由着力，相安于天而已"[⑥]（陈昂《五言今体自序》），人之才情禀赋与先天有关，亦和后天的环境、经历，以及人的性情勾连，青

**作者简介**：李晓雪，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① [明]陈　昂：《白云集》，宋珏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② [清]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③ [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清嘉庆十二年扶荔枝山房刻本。
④ [清]陈　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671 页。
⑤ [明]陈　昂：《白云集》，宋珏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⑥ [明]陈　昂：《白云集》，宋珏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以下引陈昂诗、文，皆为《白云集》此版本，不另行出注。

莲天才，少无拘束，老杜稳重，长于士族，诗鬼之瑰奇怪诞，诗佛之空明淡远，尽无法完全重现，因为诗人的生活是无法复制的，后人学前人，依样摹画，只能形似，陈昂或许在诗艺上力求复古，就才情论不算出众，但人生经历是独特的，也是他人无法复制的，一如钟惺《与蔡敬夫》中说“其（陈昂）诗其人其行径，为明布衣第一人，孙太初、宋鹅池，竖子也”[①]，推他为明布衣第一，非全因诗，还有人品与行径，钟惺说“今观其五言律七百首，则先生所学所得，实录实际，尽此数言”[②]，诗中的“实录实际”，写的是他的人生，即便老杜在世，也无法代之，故而何必着意他学王学杜，但说陈昂足矣。

要说陈昂，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怀，亦需从他的诗歌入手。

## 一、以倭寇题材为主的纪实诗

嘉靖间倭祸惨烈，倭患便作为一个全新的题材进入了诗人们的作品里，这些诗人或守边抗倭，如唐顺之、张经、陈第，或关心民瘼，将间接所闻和自己的想象熔铸于诗，如归有光《甲寅十月纪事》、徐渭《海上曲》，或一介布衣却亲罹巨变，陈昂即属此类。

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能浮沉在历史的洪流间，任其顺逆拉扯，陈昂的半生苦难都始于倭祸，他无衔职，不需搏之以命，但作为丈夫、父亲，他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在战乱中存活。1562 年兴化府城为海倭攻破，陈昂拖家带口，觅地逃生，试观卷一《城破矣领老妻逃入仙游胡岭》三首其一：

丧乱余生在，饥寒何所投。昼逃闻鬼哭，夜窜望仙游。有径风先惨，无山鸟肯留。老妻向天问，贼势几时休。

其二：

触目惊犹故，逢茅伏自遮。扶行衣尽荆，衰削面如瓜。桥断深宜厉，途昏曲恐差。斜风飘细雨，忙杀未归鸦。

其三：

兵火可谓惨，流离更遇灾。山盘临虎穴，林伏令鸠媒。烽举天同亮，岚稠岭不开。经旬头白尽，只为贼中来。

第一首写出逃之始。倭寇破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将近年关，即使福建也有彻骨之冷，逃难自不易，何况正值苦寒，又饥肠辘辘。一个“余生”，已见其甫遭大难的惊惧，后二句上承“何所投”，“逃”和“窜”，正是不知何所投时的盲目慌乱，白昼奔走却如闻夜半鬼哭，黑白颠倒，一方面因为现实的酷烈，一方面缘自内心的煎熬，陈昂在此将情入诗，颈联更是以情写景，路径风凄惨，山中鸟飞绝，冷风静林，或许是冬日常景，这里却像是由于贼势滔天，连带着风和鸟都受了诛连，尾联用妻子之问转回现实，人凡有疾痛惨怛，无能为力，莫不呼母呼天，以此作结，恰深化了之前的苦难感。

第二首主写逃难中。惊魂未定，路遇茅草则蛰伏遮蔽，衣衫刺破，面容憔悴瘦削，“深宜厉”写出断桥之险，且“途昏”，曲折难认，此“昏”貌似说天色，实际还涵盖了前路迷茫之忧，尾联“未归鸦”双关，“忙杀”的未必是鸦，而是他们这些细雨斜风里急切逃生的难民。

第三首亦是难中经历。他们似乎在半途受了灾祸，从“烽举天同亮”判断，极有可能是遭遇了

① [明]钟　惺：《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68 页。
② [明]陈　昂：《白云集》，宋珏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贼寇，深山猛兽盘踞，雾气浓重不见山形，前途更觉险恶，陈昂连历兵火，经旬白头。白头之说当然是夸张语，但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心中的急痛。

破城之祸，何其惨烈，这组诗备极哀感，是陈昂目睹家乡劫难后的血泪之语，不是一句学杜能概括的。

再如卷一《岁暮》：

久历夷侵后，将更国破年。瘴林飞细雨，枯树吼寒天。离乱山争废，飘零鬓改玄。四郊多战垒，岁暮泪双悬。

这时他已逃得命去，妻子得保，然而丝毫没有欣慰意，“瘴林”“枯树”“细雨”“寒天”，皆是萧索意象，“飞”和“吼”带出了风声，山河不如故，飘零两鬓雪，战乱仍在继续，他的痛苦也不能消解，岁暮临除夜，本是阖家欢聚之日，而他却有乡不能回，无形之下，倍添愁绪。

从他的这些诗作中，能真切感到倭乱对黎庶的影响，卷一《闽南登楼》是战斗后的闽南：

切莫登楼望，令人更惨凄。战场闻鬼哭，息壤聚鸟啼。黄雾埋城郭，寒风死鼓鼙。深林巢燕子，来往亦衔泥。

登楼情怯，因为不忍见那凄凉之景，此处鬼哭与前诗不同，前诗纯是想象，此处却藏了无数白骨，黄色的雾气笼罩了城郭，雾色为黄，除了自然现象，还有可能是黄沙来聚，即是战斗的激烈导致尘土飞扬，更能体现“埋”的意思，鼓鼙噤声，死寂里唯有鸟啼。冷森的环境下，只燕子未受影响，衔泥筑巢，可叹人世大为改易。笔者觉《闽南登楼》是他写倭寇题材的诗歌之最，不闻战斗之声，不见离乱之人，倒比直叙动人心魄。

另有上文提及的卷一《乱后还家》一首，道出了大难后兴化府的惨淡景象，可与史印证。

陈昂的倭寇诗，不是所有的基调都那么沉郁，也有昂扬些的，卷一《闻戚将军至领老妻从万山中往镡州赋》三首其三（下以《闻戚将军》代称）：

元帅闻将至，七闽徯后秋。欲回上帝怒，先复匹夫仇。献馘鲸波上，招魂剑水头。残生留眼看，平复旧神州。

表达了他对扫平倭寇的期许，有一种不同于前的豪迈气度。

值得留意的是，陈昂与倭寇相关的诗歌里，缺乏“日本”的概念，连“倭寇”的概念亦比较模糊，而代之以“犬戎”（卷一《有叹》“犬戎何日灭”），“夷”（卷一《岁暮》“久历夷侵后”），“海夷”（卷一《寄江东友》“海夷连入寇”），甚至说“十年群盗剧”（卷一《闻戚将军至领老妻从万山中往镡州赋》三首其一），目之以一般盗寇。

以上是陈昂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廖芸的《嘉靖间抗倭诗研究》统计了明嘉靖间的大部分抗倭诗，从她附录的《明代嘉靖年间抗倭诗汇总表》来看，写过倭寇题材的诗人不少，计有 68 位之多，他们中间，不乏与陈昂类似，经历倭患的普通人，也有亲披战甲守御国土的儒将，和虽未直接参与其中，却对倭警时刻关注的诗人。宗臣《送王判之裕州》：

浮云回首有穷通，丈夫得志无先后。只今南北讲戈矛，至使疮痍盈宇宙。东吴未见净江氛。中原且复忧山寇。知君久抱青云志，乘时即把苍生救。[①]

与陈昂《闻戚将军》一首相似，这首诗的基调也是较昂扬的，不仅鼓励友人一展抱负，驱除北虏，亦有肃清南倭的志向隐藏其中。

① [明]宗　臣：《宗子相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7 册，第 26 页。

和陈昂经倭乱流离不同，归有光是旁观者，他的《甲寅十月纪事》其二[①]有句“何自征科吏，犹然复到门”，遭海倭洗劫，民不聊生之际，税吏依旧登门，突出的是黔首在外患内忧下的悲剧。相似的还有徐渭《海上曲·其二》[②]，城外受难的民众辗转求生，“朝餐没雪胫，夜卧风吹肘”，而城内的官军只顾自己守御，“彼亦何人斯，炙肉方进酒”。实际已经不能归为一般的倭寇题材了，他不仅写的是倭患对民众的迫害，还将本国的现实问题带入了其中。

除了倭寇题材，陈昂卷二《入市偶有所闻》，有句“天朝闻起废，堪笑亦堪悲”，似是言张居正夺情事，语焉模糊，不能索解详细。

## 二、羁旅诗

钱谦益《刻白云集序》言：“然谓尔瞻为闽人可乎？”[③]陈昂之足迹，自中年起再不履乡土，天涯漂泊，长久做客，流寓某地往往住不长，直到晚年卜居秣陵，方重新安定，中间十数载春秋，留下了大量的羁旅诗，羁旅诗特多，是《白云集》的一个特点。

### （一）旅中

这一类主写旅途见闻，将沿途景物入诗，同时又抒发自己久客的各种细微情绪。

其一是生活压力的苦闷。卷三《过细阳雨中》：

流落人间久，三春雨里遭。污泥薪若桂，逆旅日如年。海岳谁家画，林莺何处弦。方知书满腹，不若一囊钱。

三春之际，陈昂坎坷道中，薪米腾贵，日子艰难，眼前山河虽美，林莺歌声再好，终究是“谁家画”“何处弦”，和他无关，他是个局外人，被清寒的处境所累，不由牢骚满腹。但需强调的是，这样的情绪只是一时兴起的戏谑，并无怨怼之辞。

卷三《过陈州宿小庵》与之类似，相比之下稍含蓄些：

一雨荒精舍，孤吟见早霜。禽寒移密树，萤湿定疏篁。入洛空携赋，过陈易绝粮。不眠数更点，二十五声长。

都是说自己囊中羞涩，此诗将情绪融在景物里，颈联刚要抒发，末尾又戛然而止，把“不眠”的心事推向更点深处去了，意脉似断实续。

旅中抒发生活苦闷的诗作还有一些，“秋蓬似身世，憔悴弋阳溪”（卷三《弋阳溪》），“独客天地外，孤灯四壁余”（卷二《三江除夜》），“穷如关鬼使，命敢怨书淫”（卷三《羁旅无聊自嘲》二首其二），殊途同归，无庸多言。

其二是依止宗教的向往。如卷二《夜泊浔阳》：

十载别匡庐，宵停溢浦骥。只闻虎溪钟，莫辨天地寺。未与人间离，安能物外遂。灯前感慨多，漏静不能寐。

黑夜闻钟，往往动人心魂，寺院钟声使陈昂陷入一种宗教情绪里，让他生了物外之念，可怜身是眼中人，现实的他不能隔绝尘世，在这种矛盾的境况下，陈昂思索不定，慨叹难眠。由之能感觉到他对宗教，是有向往的，或是因为身如浮寄，才愿心灵能够栖止，卷二《庐山夜雨老僧对坐》明

① [明]归有光：《震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13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 805 页。
② [明]徐　渭：《徐文长集三十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75 册，第 547 页。
③ [明]陈　昂：《白云集》，宋珏天启五年重修本。

显道出了这种感情：

万壑秋深雨，空山夜半灯。步残黄叶寺，坐对白头僧。可惜一弹指，翻成三折肱。归依如未晚，习静问宗乘。

秋雨山寺，夜半清灯，与老僧对坐讲论，诗中直接提到了“归依”，足知他心。

其三是思念家乡、怀想亲人，言说为客愁肠。

陈昂旅途中每被某物所感，便起了乡关之思，如“渔歌终有意，兴况指家乡”（卷三《东还南浦落日道中》），“妻孥天以外，夜夜梦相关”（卷三《秋夜舟中正阳》），“折方横两路，喜似得千金”（卷一《得家书》），“子规声颇惨，客泪可能干”（卷一《小艇》）。无论是睡里梦里的牵挂，还是得到家书后的狂喜，均细腻真挚。

（二）旅止

此类诗多是写暂停旅途，卜居某地，内容不离叙述迁居原因，夸赞某地适居，自我排解苦闷，感慨风土人情之类，卷一相邻的《移居巴陵》（二首）、《移公安》（二首）、《松滋赁草屋（四首）》便是个中代表，《移公安》二首其一：

交久情可知，秋深居遂移。卜邻逢哲父，拾穗许痴儿。采药防衰急，添茅得暖宜。江干二麦好，生意望来兹。

讲述了一些邻里交往与居家日常，特别说到了他的经济来源，麦子长势喜人，那么他生计便有着落了，可见陈昂不停的移居，做零散工作，虽然是拖家带口赁屋暂住，实则很不稳定，与旅中无异，也应归为羁旅生涯。

或许因为更变居住地已成为生活之常了，陈昂居南京后，自马粪巷移回凤凰里也特意写诗记录，卷四《暂住马粪巷复还凤凰里》：

地固爱马粪，心终傍凤凰。仰攀宵汉近。俯拾竹梧芳。坐就归云涧，锄怜审雨堂。加餐扶肺病，垂老会羲黄。

此诗内容与其他写迁居的诗歌无异，只是老年的他肺病反复，远不如壮年时能“歌从耕凿后”（卷一《自沙市复移居百花庄赋》四首其三）了，而是转向了岐黄之术。

（三）旅中游览

陈昂特爱游览，半生在外，除为生计奔波，他便偏好登临揽胜，将名山古刹、丽水险滩纷纷入诗，甚至平居之时，行郊踏春，泛舟溪上，也尽数摹画，实为一嗜游之人。而且，他不仅写游景，更将情致融于景内，花草树木皆能映照他的性情。

卷二《西山洪崖道中》：

前辈所深遁，幽深未易言。风光如石纽，春景显桃源。莺选苍芳树，人安生长村。青蚨尚半百，随处倒芳罇。

石纽桃源，都是传说中的世外之地，他用想象中的美景来写西山的实景，虚虚实实中，便把“未易言”的幽深递予读者手上，众人心里的桃源如何，那么洪崖的景色就是如何了。尾联的诗人形象潇洒任真，恰如山林隐者，与景相谐。

卷二《宿虎溪偶过香炉峰》：

爱僻入峰阴，香炉径绝深。云光描幻景，山色印真心。嫩草芳相映，乔松静自吟。夕阳不待我，先下虎溪浔。

虽是写薄暮的香炉峰深径芳草，松乔静美，其实已把自我性情铸入，峰头的云光如幻，山色却印“真心”，且自吟的不是乔松，而是诗人。

陈昂的纪游诗，有的还能反映些自然规律，如卷二《宿庐山大林寺》二首其一：

庐顶去人远，方知节气迟。客来小暑后，天似早春时。竹自轩辕古，泉由河汉奇。不虚盘已道，世外日吟诗。

庐山顶与山下有较大的海拔差异，所以气温也有区别，陈昂去时小暑，山上倒如早春。

除了有关倭寇和羁旅的诗，他还写了赠答送友、应酬、书事等题材的诗歌，但总的说来，对他的人生影响至为深刻的，便是早年的倭患和半生的羁旅，其他题材，相对而言单独拿出来讨论的价值不大。

## 三、《白云集》的诗歌艺术

### （一）用典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①]解说了用典的内涵，陈昂少时读杜甫、王维，又深爱之，二人可看做陈昂诗歌开蒙的老师，或多或少要受到他们的熏染，王维影响了他处困境时，向佛理山水寻求慰藉的情怀，杜甫则影响了他严守韵律，善用典故的创作实践。宋人张戒道：“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②]杜诗的创作技巧登峰造极，无一字无来处却能做到自然和谐，毫无穿凿生硬之病，妙在手笔刀工又浑如天成，这跟他的艺术天赋、后天磨砺密不可分，陈昂一来天分不及老杜，二来读书的条件受限，杜甫即便家道中落亦是书香门第，陈昂父辈无名，出身贫寒，基础不厚，指事用典不能做到杜甫那般老练，但基本能运之自如，准确畅达的传情致意，如卷一《途穷书愤》：

有书不得上，行乱遂途穷。痛哭逢河洛，徘徊笑华嵩。汉朝疏贾谊，隋代屈王通。天问安能得，溪山负二公。

此诗用了穷途之哭、贾谊满腹才华投递无门、王通博洽大儒命途多舛等诸多典故，表达出了自己有志不能伸的无奈与郁结。

又如前文提及的卷一《四十明朝过》其二，有句“左马时憎后，夔龙志减初”，用左丘明、司马迁时运不济，身遭劫难之典，表达自己避倭流离，蹉跎岁月，壮志消磨的苦闷。再如“西楚烟波净，东吴兵马围”（卷一《送次兄乱后赴秋浦三首》其一），“五色丝何益，离忧叹屈平”（卷一《五月三日作三首》其一），“鸟中之伯夷，可以风人世（卷二《闻蝉赠以八句》），“支遁幽栖处，苍然万壑阴”（卷二《访灵山白云岩养公》），“共有沧州趣，清言夜未央”（卷三《与姚太守宿三山别业》），“俊如陈祭酒，逸似鲍参军”（卷五《赠张征君》）等等，皆借典故丰富了诗歌内涵。

### （二）炼句

《白云集》主为五律，五律难书，要做到气格不俗，意脉不断，起承转合章法接续自然，实非易事，陈昂属对精巧，严守格律，有时过于在意形式，难免失去了诗歌整体的浑融贯通，他仿杜甫《春夜喜雨》而作的卷二《小雨》即是如此：

骤尔谁能见，居然善发生。初沾枝亦觉，久湿叶多情。野径无非润，茅茨不贵声。晓来花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14 页。

②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452 页。

似锦，开遍秣陵城。

完全不似杜诗的自然，“多情”亦用的很俗，此诗整体虽然没有到难以卒读的地步，但画虎不成，是二流的模袭之作。类似的还有卷一《进云安》颈联“峰眇孤烟直，江空落日团”，生剥自王维《使自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好在这种生搬硬套的诗歌在《白云集》中不多，实际上，陈昂的诗整体看虽不上佳，但有赖他的揣摩锤炼，常可见到不错的句子。卷一《风色》颈联“万里无家客，孤灯独坐心”，摹绘出天涯客孤灯静坐时的寂寥心境；卷五《和宋广文秋夜即事》颔联“雁影五湖月，砧声一巷秋”，明写的雁影和暗写的月影，夜间深巷里的砧声，秋意浓烈；卷三《东郊》颔颈二联：“晓山浓似酒，露叶绿于油。湖面开金镜，云英结玉楼。”想象奇特，将清晓山岚比作酒，别出心裁，其他各句亦都用了比喻，兼是对仗工整；卷五《丰城夜泊》颔联“绵云温野岫，弓月射虚窗”，炼字也巧，“绵”、“弓”抓住了云和月的形象。卷六《江南旅情》颔颈二联：“林深常似雨，江静易生秋。凉月来天外，明河俯渡头。”以及“夕阳粘道路，树影扫江门”（卷三《暮过山村》），“溪枫丹两岸，山雨暗孤舟”（卷三《客中秋日忆友》）等等，均能见到他炼字炼句的努力。

### （三）意象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①]从作者运用的诗歌意象，便能看出诗人想要表现的艺术风格。首先，陈昂诗歌中常用的有“猿”“鸿雁”“鹤”“黄鸟”“风”“雨”“雪”、“露”“云”“月”“黄叶”“灯”“林”“山”“花”等与自然相关的意象，同样的意象，在他的诗作里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如“风光明翠岫，江色淡新秋”（卷一《雨后天晴放舟下峡》），较为清新，“万壑秋深雨，空山夜半灯”（卷二《庐山夜雨老僧对坐》），颇为冷峭，“松凉疑雨后，山静若秋初”（卷四《暑夜宿峰头精舍》），偏向空明，此三联“秋”的意境全然不一样。再如“花落春虽去，风薰日更迟”（卷四《夏》三首其一），以及卷五《薰风散步》的“五月薰风满”“花间粘蝶粉”，这几句诗的花与风，是悠闲冲淡的，“风黑江南雨”（卷一《松滋赁草屋》四首其二），“虽春花溅泪”（卷一《乱中元夕》）的花、风则是冷寂的。他使用一样的意象，所表现的诗境却有分别。其次，从语言上看，他添加的修饰语会根据诗境不同产生变化，好比“灯”则有“孤灯”“半灯”“清灯”等，风亦是“熏风”“寒风”“凄风”“暖风”等。

陈昂诗作的风格不能一以概之，他巧妙地搭配修饰语和意象，呈现出不同的诗风，有的沉郁，有的清峭，有的淡远，正如宋珏所评，陈昂写诗，是不论元白王杜，尽锤炉而出的。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 493 页。

# 《榕庵集》诗歌浅论

贾丹慧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韩锡为晚明福州一介寒儒，善书法篆刻，博闻广识，摒弃世俗纷扰，于榕庵安居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榕庵集》。《榕庵集》诗歌约可归为时事诗、抒情咏怀诗、写景纪游诗、咏物诗及题画诗四类。晚明风云变幻，韩锡襟怀绝俗，树义高古，其诗寓国事衰微、时局战乱之忧，借景抒情，寄情高旷，意境简远。

**关键词**：晚明；韩锡；《榕庵集》；

《榕庵集》收录韩锡诗歌凡 408 首。其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也较为丰富。本文按诗歌题材分类，将韩锡诗歌分为叙事诗、写景纪游诗、抒情咏怀诗、咏物诗及题画诗。

## 一、韩锡的叙事诗

韩锡的文苑诗海中，叙写战争纷乱，言关天下，反映世情，臧否人物，表达对时事的焦灼与忧思，属辞间则充满着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旧式热忱与精神气象，此类诗作伤民之多难，哀民生之多艰，词旨悲愤怨叹。韩锡一生寄居闽海一隅，历经艰辛，生活困苦，但其满含眷顾忠贞之心，故而家国变故一寓于诗，其诗深具忧国伤民之情，对乱世之象亦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这类诗有两个特征，兹拈出以见其措笔不凡：

### （一）包孕时感，幽思多愤

明末政局弊病丛生，纲纪既毁，世风浇薄，统治阶级内部腐朽糜烂，党争昌炽、横行海宇。国事日非，时局不清，加之外扰不已，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各种社会危机纷至沓来，蓄势待发。具有敏感触觉的文人们意识到风云骤聚，山雨欲来，故遭时不吊，兼目变故，时寓忧愤。“大雅久不作”[①]，时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耿介拔俗的韩锡不避权要，言关天下。韩锡忧患拂逆，规摹少陵，风格高华，衰世中救治世道人心，踵武前贤，负载起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韩锡此类诗中的描写带有强烈的纪实色彩，感时伤世，忠义慷慨之气灼然可见。如韩锡写于万历十五年的《战辽东》，是一首幽思多愤杂陈的乐府诗：

> 战辽东死抚顺，暴骨如莽血为鳞。旌旗云靡砲雷震，壮士虓怒首先陷。陈剑铎缺兮车绝靭，数日不食兮士尽病，羽书告急不得命。咽泥丸以为饭，窄马溺以为饮。一呼劳军士气犹，竞张空拳冒白刃。丈夫死而宁委身獟獟，弃予于兮谁实为政，死诉于帝兮为诛谗佞。
>
> 战辽东死开原，前行未刜后军奔。旌蔽野兮鼓声喧，砲连发兮殚殚熇熇，满空飞矢兮雝雝

---

**作者简介**：贾丹慧，女，河南商丘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与周章甫》，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784 页。

扬尘。刀余室兮弓失余鞬，城未及闭夷已门。燔予室兮隤予垣，掳予土兮戮予民。天色暗淡日黄昏，子失母兮父不见弟与昆。骨如山兮死者平□，沙场月白兮鬼血燐。欲南归兮血污游魂，钲残军兮壮士列断。丈夫死而宁为夷臣，剑予吭兮死报君恩。喟摧心而不平兮肉食坐论。

战辽东死铁岭，天降割兮越兹蠢。帝燄怒兮锡命蕃屏，竭东南兮仓箱已尽。召虎臣兮宁台边境，戍薄暮兮边笳悲哽。虏围合兮沙场月冷，救已绝兮陈行不整。刀摧不可击兮矢矧尽，短兵接兮忘予要领，心逾烈兮首其□殒。欲言事兮阍不得请，臣误国兮死有余眚。

战辽东死磎阳，丑夷犯顺兮变天常。金鼓鸣兮震山岗，经予陈兮躐予行。孤城血战兮救死扶创，弓矢尽兮士无宿粮。刃集首兮气愈刚，丈夫死而骨犹香。残角鸣兮边草荒，白骨粼兮星月自光。蜡书亡卒兮归报天王，服节死义兮臣志在封疆。大夫不均兮臣盖不能无望，士膏野草兮大冠徜徉。

战辽东死北关，空城蹿兮千里无烟。王臣蹇蹇兮为君捍边，剿耶退缩兮断首迁延。三军发指兮哭声震天，愿以身死兮卫我京燕。请事天王兮君侧多谗，军无馕兮弓矢无弦。鼓士不进兮驱车绝骖，士卧辙兮御轮朱殷。陈既动兮陷我中坚，裔野土兮日暮鸣鸢。臣无状兮报陛下以无颜，请归受诛兮死有余惭。[①]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宣布脱离明朝统治，并以“七大恨”誓师，历数大明朝廷的七大罪状及向明朝宣战。以后便出兵偷袭辽东各堡，连陷抚顺、东州、马根单、抚安堡等地，史称“萨尔浒之战”。该役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据清代《满文老档》卷八记：“尼堪(指明朝)皇帝的马步兵总计二十七万中，分四路出兵，只有一路兵归还，三路兵都被杀了。”[②]韩锡身处时代的风雷之中，骤闻此战，一股忧愤之心便油然而生，伤战争之无情，惜民兵之无辜，愤权宦之糜朽。诗从战役开端抚顺而始，沿兵力之所踪，以三军惨败而为终结。韩锡虽未亲历此战，但乱世的波涛已然席卷至东南一隅。韩锡身怀忧国之志，兼济天下之心，虽不能出将入相，力挽狂澜，其便以诗文创作视为畅舒理想、倡言建策的蹇修之具。“萨尔浒之战”在抚顺失陷之前，并未引起明宗的重视，抚顺总兵李永芳乞求降后金，范文程兄弟亦投降后金，抚顺守备王命印拒降而战死殉国，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诗第一节便描述了抚顺之战的惨烈景象。忠肝义胆的将士们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以期保家卫国，奈何奸佞当道，小人作祟，以至于前线兵将粮饷未备。物资的匮乏使将士们在战争之余还要忍受饥寒交迫的困苦。战争的失败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韩锡对此表示痛心疾首和对朝廷无作为的失望愤慨。诗第二节至第五节描述开原、铁岭、磎阳、北关四处的战役。战争后期，由于粮饷不足，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导致尸横遍野，千里无人烟。韩锡为慷慨之士，自当知国家社稷为重，恨不能背生双翼，飞度战场，以身报国，但他常怀谋国之忠，却不能救国于危难。诗中呈现出一个久困山林的晚明士子徘徊于青山与家国之间的两难境地，感慨颇深。翕然遁世之怀与补天豪迈之气互相交织，作者发瑜亮之音，笔含俊凯之气。韩锡另有一篇四言长诗《戊己颂》：

闽国海喙，厥土泥塗。民满壤缩，分鼾施农。施农无所，寇宅其区。出犯寇舶，血予于殳。身领不蜀，绿系妻孥。官上其事，天子曰吁。其简重臣，奉命以徂。师锡徐公，能断善谋。帝曰钦哉，畀之简书。纾予南顾，绥此一隅。徐公传来，民企以髭。公胡不胄，公来民苏。公既建□，申令修衢。氓有一得，毋伏告予。群策既集，群心既孚。公知可用，简献者夫。撙扑而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己未集》，第133页。
② 本文所引《满文老档》译文均转引自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

誓，翼之以于。诛止其魁，数厥逃逋。有黠者民，私藉寇糈。公廉得之，威之王鈇。招权顾钱，为请厥辜。公法如山，不可以渝。寇穷于岛，自相戮屠。公不刃血，寇尽献谟。归者载路，公赍而酤。格者无数，血殷首殊。海民偕偕，屡舞扬祛。予非乐寇，上则我驱。公推炎心，旅公于都。弃厥刀剑，服而犁锄。我入室处，公畀之庐。我有子弟，公为之传。俶载南亩，泽泽以畲。波流既安，濊濊而渔。昔食不饱，今人舍餔。昔出则死，今遨于途。公绩胡捷，公文武俱。屈策以度，无二无虞。介特自守，慎发机枢。矢厥文德，民食公休。报政天子，天子曰俞。晋公执法，总宪崤岨。公良□狱，名占于胥。有婴有伦，中听匪家。帝曰邻哉，升公卿孤。九有有截，厥功允肤。跻世上古，比德黄虞。诸生韩锡，作颂穆如。护民人口，以代歌讴。[①]

崇祯初年，时“巨寇郑芝龙弄兵海上，所向焚歼”[②]，郡邑茹其毒，民人深受其害。后郑芝龙被福建巡抚招抚，其余两部下，李芝奇叛变，“沈钟斌左右无所属”[③]。本诗记载时任巡海使的徐日久献良计，与巡抚熊文灿合谋不费一兵一卒便将贼寇擒于马下的传奇战役。此战解民之忧，抒民之恨，其政绩亦上达天听，天子感其智谋无双，特晋升为山东总宪。时民众再三挽留不得，便载歌载舞欢送徐公。韩锡另有四言诗《哀麦浦》记录贼寇残暴罪行：

累累寇舸，集于江沱。孤城援遐，乡民何戈。多祀酒其，酡舞且歌。假寐听讹，寇入城瑕。民号于家，斫夫縶娃。白骨如麻，日入啼鸦。[④]

此诗写于崇祯壬申（1632）七月四日，记载盗寇兵临麦浦城下，城内防守极为薄弱，但民人万众一心，誓死抵抗，斩杀众多贼寇于城下。寇见毒计不行，便佯装撤退。城内民众见敌已败退，便兴高采烈，饮酒彻夜，歌呼达旦。不料次日傍晚贼寇趁城内无人防守，便大举进城，屠尽城内乡民。[⑤]此诗颇有杜诗之风，语含悲戚，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满载浓郁的写实性。韩锡“仰希雅颂”[⑥]，此诗亦是如此，它实录其事，以此昭示后世。读其诗，感其事，从中不仅能从中窥见当时闽地人民的生活情状亦能方便对当时贼寇恶行作详细的探究。

### （二）生离死别，忧患时多

人生最苦莫于死别生离。韩锡一生相交甚多，相知、至交迎来送往，离别已然屡见不鲜。《榕庵集》中有大量的送别诗与悼亡诗，前期送别诗最多，后期以悼亡诗为最众。韩锡此类诗多直抒胸臆，语言悲怆，风格哀婉缠绵，兹述两端以见其言辞凄切。

送别是诗歌吟咏的永恒主题。送别诗更多地表现了生命的痛苦和不自由，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承受空间阻隔的痛苦，满怀走向未知的恐惧，承受与亲朋、故乡告别的感情折磨。韩锡的送别诗，在凄苦的离情别意中显示出情感发展的脉络，让别情更加刻骨铭心。这类诗，情感真挚并带有强烈的叙事风格，如《书别》：

莫如别最苦，况在弟与师。分手且千里，聊复此须斯。心绪变若许，偏值三春时。寂寞桃花片，萦回杨柳丝。趋近再拜跪，俯躬前致词。东山毋久卧，世事正离披。

诸生赓请益，夫子谓曰居。诏戎易礼乐，申之诗与书。谈深坐自久，提唱尽灵愚。会心各无语，金樽倾玉壶。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辛未集》，第 830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西安公传》，第 1073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西安公传》，第 1083 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第 1003 页。
⑤ 参见[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哀麦浦》序，第 1003 页。
⑥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韩子索句图赞》，第 1091 页。

车尘望不见，陟降犹踯躅。差池燕燕飞，上下音相属。露气侵衣裾，草色盖已绿。沉凝若有思，伫立聊远瞩。怀中留别诗，珍重如金玉。长歌意惨悴，杲杲扬朝旭。

别意满天地，凄凄日将昔。江平烟欲归，四顾何澹莫。偃卧不成暝，起行且焉适。兀兀中夜兴，坐对寒山石。回忆分手时，俯首乃不怿。胡为今宵月，偏向沙洲白。[①]

这首诗写于天启二年（1623），时钟惺离闽已逾一载，韩锡夜晚心绪纷杂，不能成眠，忽忆起与钟夫子离别之景，心中无比怅然。韩锡与夫子相交时，正值暖春四月，桃花成片，杨柳成帘。哪想如今再回首时已是别意萦怀，泪洒寒山。想当初韩锡于闭关（在今福建闽侯）送别钟惺，诸子与钟夫子饮酒畅言，言笑晏晏，师生之间的敬重与流连萦绕期间，一派尊师重道的和乐之象。后两节叙写钟夫子别后景象，即使夫子的马车已经不见，韩锡依然伫立遥望，傍晚的露气已经浸湿了他的衣衫，寒意从内而外渐渐升起，但被满心的怅然所掩盖，唯余惨悴的伤怀与上下翻飞的春燕。相别一载，又是春时，中夜安坐于寒石之上，那些记忆犹新的景象还依旧时时在眼前回放。别前、别时和别后的心绪变化，使这首诗中的情感逐步深化，意境渐渐升华，读其诗便仿佛能感受到韩锡那诚挚的感情。另有一首《送刘微翼归楚并赋书于周日台夫子》（只节选送别部分）：

逢君秋色里，秋尽送君归。草草乃如此，盈盈方自兹。寒云依岳远，返照入江疑。匹马西风暮，应怀离别时。[②]

萧瑟秋天里的离别总是让人愁上加愁，看着朋友骑马踏上归途，形单影只倍加凄清。秋天相逢，又在秋天离别，生活总是这样反复无常。韩锡的送别诗又不是单纯只写离情别意，例如《古别离》：

当季别君指江水，每来见水心欲死。古路仍仍直如矢，仗剑君行从此去。君今一去不复归，路边流水无尽时。

踟躇握手愁云碧，赠予明珠双琮璧。森森岁几卒，鹘叫鸦栖日已夕。深闺阒寂月夜白，血泪模糊凝素发。恨深触眼肠尽枯，椎破琮璧明月珠。[③]

这首诗借离别之情抒己之志，上阙借江水之循环往复表达对友人的无限思念。然而，在下阙却笔尖急转，借深闺妇人之意象抒发自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无奈衷肠，言辞凄婉，令读者倍其情真意切。再例如《柳色歌送周章甫就试北雝兼谒董见龙夫子》：

春深柳色依平楚，踟蹰伫立长江浒。烟波浩荡苍蛇怒，触眼枯肠不得语。别君斗酒为君祝，羡君从此干明主。[④]

此诗在依依不舍的离情别意中夹杂着凄然的艳羡之意，思及韩锡自身在隐居与仕途两者之间的选择，便可想象他在送别友人北上应试之时的复杂无奈心情。但世事总是两难全，事已至此，多想也是徒增烦恼吧。

死亡即是永别，死亡所带来的死者永逝、生者永伤的体验可以说是人世间最为深重的痛苦，而人往往在最为痛苦时会产生倾诉的愿望。韩锡年少失孤，与母亲形影相吊，崇祯壬申（1632）仲冬二十六日，被病痛缠绵数月的老母永辞人世。初时，韩锡苦痛难抑，心惨悴而笔不能下。直至崇祯癸酉（1633），母逝已逾一载，往日欢声笑语、抚慰嗔怪俱已幻化作泡影，《哭母诗》方才完成。全诗叙事议论夹杂，情真意切，令人感同身受，唏嘘不已。诗（全诗过长，因篇幅所限未能全录）曰：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癸亥集》，第223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乙丑集》，第406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第311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第312页。

一病缠绵五月余，求医问卜敢辞劬。夜中稽首向天祝，愿得代亲戕贱躯。
死前一夕谓儿言，命尽明宵不可存。执儿右手与儿泣，呜咽酸凄声半吞。
更端用爪摘儿手，命儿勤俭不绝口。今方长往别儿行，儿当记忆无违母。
先是儿知母病深，强笑母前长泪独。及兹闻命不能禁，伏母胸怀儿恸哭。
哭深收泪慰吾母，按脉依经母当寿。脉行四至和且柔，胃气频伸触儿手。
弥留命儿执笔识，恐遂不获誓言嗣。治丧依礼用儒言，毋渝百昔先公志。
当季不得从公死，为公鞠育两兄弟。今当下报负公深，棺衾丧葬毋成礼。
设奠食飧用菜鬻，平生持戒好幽清。茹蔬啖菽遂予愿，毋治腥荤轻杀牲。
儿拜稽首泣从命，敢弗依经承以正。愿慈持志顺天行，一念惺然安体性。
崇祯五载岁壬申，仲冬二十又六日。时当阉茂漏初传，正衾内寝慈亲卒。
屋脊招魂摄短齐，振衣更历夹东西。四方上下母无往，愿早归来抚视儿。
生事方终死事始，抗衾浴体弃余水。饭含既毕陈敛衣，摇狄副祎施两杔。
一恸棺前体自摧，妻儿争唤语喧啾。醒来不见慈母面，悔向迷中觅路回。
衾敛仓皇难措手，助儿沐掷荷良友。吾母若母情蔼然，刻骨铭心长不朽。
欲题凶计寄家兄，泪落沾濡字不明。一片哀情将笔墨，频频换纸不能成。
数番移纸频施笔，千万心情书不出。封成珍重付行人，屈指为期到京日。
三日水浆不入口，焦肾干肝形半朽。悲号气竭不能胜，闭息少休魂帛后。
幼向先君授礼书，指儿砥志学为儒。儿今敢不遵严训，啖菽茹蔬居依庐。
依经为母成凶服，序立懿亲张素幄。音容未远哭声中，勤思不见然疑作。
丧母未尝作佛事，持旛奉帛之僧寺。儒书指点自先君，服行敢自予身坠。
总宪申公降束刍，德音珍重慰离忧。下士知公情独切，持符泣下不能收。
分当匍匐从公谢，不敢脱衰随俗借，感公厚意不能忘。起坐彷徨泣中夜。
朝奠柔甘列庶羞，奉杯珍重向床酬。灵魂且逐香烟去，肠断西风哭未休。
酸风猎猎吹人面，魂去魂来人不见。聊修人事手鬻糜，痛哭床前儿夕奠。
亲宾揖让西阶上，吊唁帏前词怃怆。感荷厚意不胜哀，拜谢扶衰孤稽颡。
长向灵前泣血跪，平生儿跪母为起。扪儿头面捋儿须。两袖与儿□桌子。
……[①]

全诗共 100 节，2800 字。诗中把母亲缠绵病榻、弥留、浴体敛衣、告知亲友、作佛事、抬棺、入葬、守孝各事，巨细无遗地一一写入诗中，中间还杂以回忆抒情，使全诗具有强烈的叙事色彩。全诗风格庄严郑重，感情悲痛。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终结了唐宋以来军事上的弱势，并在宋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文化和艺术，弥补了元朝统治带来的中华千年血脉的割裂。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写道："明当礼乐崩坏百余年后，诸尚节之士犹多灭影泉石，自是其高会所守，以不见诸侯为义。使非超轶挽代，抑心三古，孜孜延访恐后，海内宁知有揖让!"[②]明代丧葬礼仪上承唐宋，下启清代，在中国丧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明代丧葬的研究还尚在开荒阶段，韩锡此诗记录了韩锡母亲死后较为完备的丧葬过程，内容可对研究明代，尤其闽地庶人丧葬文化的学者提供例证。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癸酉集》，第 1131 页。
② 查继佐:《罪惟录》卷之七，第 624 页。

韩锡相交甚众，朋友一旦离世，往日温情便成为剜心利刃。如诗《纪寐》:

风轻雨乍歇，暑薄时方夏。偃卧不成暝，辗转诛茅舍。忽觉有人来，俯首迎道左。肃入抚绳床，丈人且安坐。客起循阶除，手缄古锦裹。云是钟公书，珍重寄足下。接得未及开，题字囊头大。截断右丞诗，手迹生前写。方期仔细询，竹拂檐间瓦。魂附竹声回，寐醒纱窗火。静忆受知恩，泪落如倾泻。如何夜台中，还念平生雅。长歌声杀噍，松子从空堕。悠悠宇宙间，谁是知予者。[①]

韩锡此诗书于钟惺亡后数年，梦中骤现一信差，手持钟公生前所写书信，信曰："春草季季绿，王孙归不归。"[②]抬头间信差已杳然不见，梦境离奇，幻化无端。待到风停雨歇，韩锡乍然惊醒，才觉已经泪流满面。一别经年，往日惊闻噩耗的震痛已然被时间的尘霜悄然遮盖，此时一场梦境又重新掀起死别的伤疤，昔日与钟公相交的一幕幕便闪现于脑海。梦散人空，唯余天地悠悠。

## 二、抒情咏怀诗

时值明室板荡，时势变迁，腥风血雨弥漫士林的多事之秋，韩锡遁迹山林，隐居榕庵，足迹二十多年不入城市。郁郁不得志的贫瘠生活为他的诗作平添冷寂凄婉之色调。本节兹略两端分述其抒情咏怀诗，以作瓮牖之窥。

### （一）咏志节不屈

韩锡为人正直不屈，清高桀骜，不屑与世俗虚与委蛇，坚持以"狷持"二字傍身。虽一生未能发达，却操守自持，甘于贫贱。他擅长诗文篆刻，却保留诸多底线，不以此作为媚上的工具。韩锡一介书生，颇有文名，又擅书法篆刻，一时求者甚众，但奈何他个性狷介，不喜交接世俗，不随时俗俯仰，为人作文刻字也有诸多禁忌。《戒》[③]中声称"所不作者五，所不书者九，所不刻者六。"如"送在任官长诗文"不作，"送在任官长册页、手卷、题头"不书，"送在任官长印章"不刻。不仅如此，其他如"一切称贺诗文""婚书、祭文""募缘疏头"不作；"墓志铭篆额""神庙碑板、联板""书签"不书；"乡先生印章""五字以上印章"不刻，等等。他曾说"士不遇则当静默自守，岂空无介而轻肆其笔于当世贸人也。"[④]对达官贵人，他不善奉承阿谀；对朋友，他"时过率直而心实无他"[⑤]。认识他"非二三季间所能了也"[⑥]，要久久才能自知。他天性如此，但知其弊却"不能自变也"[⑦]。韩锡终年深居山林修身养性，与外界俗事纷扰一概无关，他深知欲望是使人不得自由的樊笼，要想自由就必须断绝一切欲望。他明了世间美丑，洞悉人情善恶，并且决意不随波逐流，不谄言媚俗。他在世间从容辗转，终获得潇洒自在。《自叙》诗云：

八闽之三山，中有一狂士。俯仰千古间，自命榕庵子。尽日闭户居，蒲团耽内视。突有会心时，听笑长自喜。问我笑者何，亦复难举似。人情如波澜，顷刻尤丑美。我又对之笑，笑我无关尔。妍媸独自开，我自旋其履。累尽身自闲，身闲念亦止。身念两无营，笑笑何时已。[⑧]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辛未集》，第 839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辛未集·纪寐》，第 839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戊辰集》，第 596 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戊辰集·上董夫子》，第 599 页。
⑤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与徐子仪》，第 779 页。
⑥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与徐子仪》，第 779 页。
⑦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与徐子仪》，第 779 页。
⑧ [明]韩廷锡:《榕庵集·癸亥集》，第 230 页。

韩子襟怀绝俗，树义高古之人格操守，自感人情鄙夷，世情益乖，于是在尘世中独善其身，隐居山林不问世事，其清也，其狂也，在此诗中可见一斑。其人性情如此，以致“幽斋枕石卧，门径碧苔深。”[①]门前车马稀少，韩锡自知性情乖异，知己难求，他在诗中感叹“投我高山咏，真成空谷音”[②]“应知有心者，世外独相求”[③]。人有情思，发诸楮墨。韩锡时常自嘲其愚阔，但并不以此为耻，这反而是他对世事纷杂、人情乖逆的反对抗争。这种心态满溢在五言诗《人间不肖者》之中：

人间不肖者，谁复过韩生。破屋经季闭，枯豪率意鸣。万言能立就，一第未成名。屈指数余子，偏偏公与卿。[④]

道德文章，均为世重。韩锡托迹大儒，砥行砺节，躬行实践，韩锡终其一生奉为圭臬。俯仰之间，犹有余恸。如诗《仆谓》表达了其甘于贫贱、坚守自持的品格：

韩子谓奚仆，哪堪长忍饥。半生今若此，歧路果安之。宁作沿门乞，耻干当道施。杖藜从所往，其奈拙言词。[⑤]

韩锡之建州行役，寓居此地，未及事必，“使资斧已尽，并日而食，饥甚”[⑥]。他性格迂拙，即清高孤傲又不善言辞，以至于沦落到此境地亦坚决不向他人求助，平生谨守“澹台子羽”之戒，绝不朝令夕改，食言而肥。他亦深知自身性格秉性，所以从不曾积极入世。戛戛独造，不与世伍的桀骜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韩锡闲适自得的罅口。又如《有感》：

自怜少小学为儒，半世无成发渐疏。室有古文孙仲彧，家徒四壁马相如。宁从妻子嗟艰食，耻向公卿赋索车。生事不关多暇日，北窗高卧一床书。[⑦]

韩锡怀移风易俗之志，抱书隐居在榕庵，不闻时事，安贫贱以著述。他性格坚忍，耻向人低头，无事绝不入公门，清高自诩。从韩锡此类诗作中可清晰见知其人之桀骜孤高之秉性。

### （二）抒归隐之意

韩锡自感个人的秉性际遇，发而为高古之音。韩锡的诗歌无所矫饰，均发自肺腑，情感沉挚，表现的不仅是一种高标自蹈、孤芳自赏的清傲，且充满一种厌俗鄙世的悠游自在之意。录诗《孟冬过林用始直庵谈于月下》（同林孟采），以见诗中一格：

为扣幽居寻静者，竹门茅径古崖端。月明石上四人语，霜落阶前孤障寒。杯绿浮余香气溢，篱黄未尽菊花残。坐深入夜还赢兴，袖手枯吟诗思宽。[⑧]

诗人幽隐山林，远离尘嚣，闲来无事便邀一二好友共赏夜间月色，把杯共饮，兴来遣诗作对，不觉夜已深沉。菊花易残，香气易散，时移世易，侘傺穷愁，诗人对此感慨万千：“萧瑟难禁岁序迁，孤灯挑尽不成眠。霜明星动三更后，一片愁心寄两季。”[⑨]敏感多愁的心绪被眼前景色挑动，韩锡深感世事无常，遂生世事难常之悲怅。又如《秋夜坐林奋之池亭》直接表明对隐世的渴望，诗曰：

挟笻远相过，共眺林园景。况值秋气深，野寒夜方永。篱菊已能花，香轻孤月冷。持杯藉草歌，白云半在岭。天际空江明，窗中远山尽。萧萧松柏声，寂寂藤萝影。猿啸林木幽，鱼跃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答林正则讯予及林孟采因招之》，第 461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答林正则讯予及林孟采因招之》，第 461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答林正则讯予及林孟采因招之》，第 461 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乙丑集》，第 397 页。
⑤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第 303 页。
⑥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仆谓》，第 303 页。
⑦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第 985 页。
⑧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第 761 页。
⑨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庚午除夜》，第 767 页。

池水静。深坐默无言，悠然若有时。愧我尘网羁，羡君迹先屏。[①]

诗中的孤月、白云、江、山、松柏、藤萝、猿啸、鱼跃的意象组合成一幅世外幽寂闲适的无忧生活画卷，画面远近分明，动静交错。诗风清幽冷寂，寓诗情于画意，杂五味于清奇，暗含诗人对自然的向往，是韩锡对遁隐的最高礼赞。韩锡隐居之后，对出处行藏，寻幽探胜的生活多有赞美，如诗《山中》:

山中日多暇，研朱点易罢。秋色自远来，烟凝初入夜。卧看不觉久，明月生石下。[②]

山水所发，弥见清思，悠远绵长。境随心生，韩锡徜徉山水之间，虽无波涛惊雷的豪迈人生，却在世外山水中终得心灵安逸宁静。全诗字里行间，处处流溢着诗人对自然山水、林壑之乐的眷念之情及光风霁月之怀，足可见诗人对生活的满足以及自得其乐的闲适。

## 三、写景纪游诗

韩锡与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结下不解之缘，数次的行役之途让他纵情山水、寻幽探奇、游仙寻异，超乎出尘。韩锡发扬蹈厉，状世情之炎凉，时露于笔墨之间。韩锡此类写景纪游诗多绘山水之清幽，发感慨顿郁之气。笔者择要分述两端，以窥其笔力之清健。

### （一）幽隐世情，皆入襟怀

徜徉山水助力于韩锡直抒胸臆，泛涌文思。诗人不论幽居、登山、渡江、探友、集会，皆不忘寻幽探胜，沿途畅游，悠游自在。以期在模山范水中洗涤尘世的污浊，寻找心灵的慰藉。韩子足迹踏遍福建一隅，虽不曾远游，但闽地怪奇山水已足以逞其幽思佳兴。韩锡写景纪游，时有深秀之句，常露清高淡泊隐逸之风。如诗《半山院记事》:

穷山绝往来，君自何方至。相对泉石间，商略幽居事。
乘兴欣共往，欲穷山上路。岚气扑面来，不见前头树。
修林断树里，扶笻取次行。长歌惊落叶，林尽忽闻莺。
磐石松林幽，趺坐藉双履。静听溪流声，不觉日已暮。
雨过山光近，斜晖半短垣。持杯同据石，树梢看归猿。
簇火我烧笋，汲泉君试茶。山中无别供，数斗煮胡麻。
凄雨苦不歇，中夜不成眠。共起据胡床，我歌君扣弦。[③]

半山院远离尘嚣，人烟稀少，韩锡镇日居住于此，毫无寂寞孤独之意，每日读书之余，乘兴踏山，取道松林，途闻莺鸣，静听泉声，在此任意骋怀，天地之间无所束缚。时光之荏苒，光阴之移转，最好的观景时机当在雨过天晴之时，傍晚殷红的残光投射到半山院颓圮的断墙上，树梢山猿啼叫，映衬出一派幽思之意。诗人以白描手法将山中景色娓娓道来，平淡之中时见惊奇，静谧之中突现灵动，以诗人足迹为线索，尽现林中多姿景色。诗人心静遂觉处处皆为景致，字里行间处处满溢着其对自然山水的眷念之情和自得其乐的满足。

韩锡虽半生隐居，数次的羁旅行役还是让他在熟悉的山水之外获得别番的乐趣，且这类诗歌多以时间为序，按照行役初始直至抵达目的地的路线来描写，中杂以途中景色见闻。如组诗《建游诗》[④]: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第 474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戊辰集》，第 576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乙卯集》，第 43 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第 295 页。

于役不遑处，空江触浪行。棹歌烟外没，渔火夜深明。风起螭龙怒，涛来天地惊。蒙溪聊野泊，魄荡未能平。（其一 《一日舟发芋江，薄暮风涛猛恶，舟触于石。篙师呼声甚厉，韩子曰："止。"止泊舟于蒙溪山足》）

此诗写于天启五年（1625），孟春时节，诗人乘舟沿江而下之建州（今福建南平建瓯市），不料船始行，便遇风浪，下船步行，依旧魂魄震荡、心绪不能平。

晓霁一峰出，江光沙际分。扶筇登古石，倚树看归云。香落闻能远，梅残花尚殷。欲寻深坞去，傍水问渔翁。（其二 《二日早，抵白沙。风远天高，霁色可挹，一峰崒起如画，渔者曰："瀛山也。"韩子游焉》）

第二日抵达瀛山（在今福建闽侯），晴日方好。韩锡游兴勃发，登山扶节而行，山间残梅点点，幽香隐隐，颇觉可爱。

挥手谓长季，开窗我欲眠。素书堆枕后，浊酒挂墙前。将泊古榕下，聊循怪石边。静观崖上曳，安坐钓深渊。（其三 《三日舟次水口》）

第三日继续舟行，抵达水口（在今福建宁德市古田县）。

车驱赪日夜，杖履渡高逯。树色云中变，泉声草外繁。缘萝登石鼻，避雨坐松根。乡思无端发，岩前孤啸猿。（其四 《四日行黄田茶洋道中》）

道路崎岖难行，沿途树丛森森，草色绵延无际，乱石耸立，泉声萦耳。不料云聚雨落，诗人只得匆匆避雨松树之下。夜以继日的匆忙赶路使得诗人身心俱疲，加之资斧已然见底，前路又不知是何境遇，思乡之情自此便油然而生。

偶尔遂倾盖，相看若旧知。谈深凝剑气，坐久落松枝。感尔售三雅，当予赋五噫。人间真侠士，即是大禅师。（其五 《五日抵延津游天宁寺值镜空上人，一见如故。知予饥，饮食予》）

第五日抵达延津，诗人兴来游天宁寺，偶遇镜空上人并一见如故。镜空上人与诗人谈经论道，相谈甚欢，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镜空上人为其准备饮食，这可解了诗人的燃眉之急。

孤灯依旅舍，独坐且三更。一掬丈夫泪，万端游子情。如卿何足较，愧我未出名。无限凄清意，啾啾杜宇声。（其六 《六日抵建州值诸公他之，未得毕使，为申所窘僦居旅舍，篝灯独坐，境况萧然，感而有作》）

资斧已尽，任务还未完成，诗人值此窘迫境况，愈感游子之艰难。僦居旅舍，灯光暗淡，窗外杜鹃"啾啾"的鸣叫声在此刻显得愈加凄凉。

抠衣聊肃拜，聚足一升堂。万古诗书在，千季俎豆光。扪碑知岁月，瞻像俨冠常。古树空庭侧，春新色转苍。（其七 《七日谒朱文公祠》）

朱文公祠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所建。观其景，古意盎然，瞻其像，威严端方。

旅人思多佚，心远售所慕。患此境旷幽，迹荣不能去。突入不问主，几案聊复居。盈天风雨来，泉原猛若注。江烟上薄天，舻舳缆相附。舠从烟中来，蓑笠翁与妪。呼啸声方厉，左右挥屡顾。云合山转奇，石怪涛愈怒。上下一色函，不辨霿与雾。欲前足且怯，湿重不得步。梁亘蛟龙蟠，阁迥精灵聚。远望迷濛中，参差三四树。顷刻复失之，山足离且传。石啮树颈颠，水怀石根露。目力穷尺咫，不见江头路。行人耦共谈，声从石中吐。审视不见人，两石相蹲踞。飘撼榱栋倾，疑得神鬼护。诡兀何巉巍，能令主者妒。螮蝀悬虚无，残雨点可数。山从霿中出，

苍翠如欲仆。晴觉图趋避，怵恧精魂怖。涛息波已平，千里望成素。鳞鲿负波没，矫首若有诉。崖远草欲青，水曲沙转赴。幽闲白复静，浩荡浮鸥鹭。阴晴顷刻移，播弄毋乃遽。至理黜思议，静默尝所趣。境息视听亡，独立久无讯。文字有百因，登高每能赋。城西多酒垆，沽酒羞糜脯。吟眺方无穷，其如日且暮。(其八 《八日携酒登水西阁》)

诗人匠心独运，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状写山海景物之怪奇瑰丽。“石啮树颈颠，水怀石根露”偏师出奇，运用新奇的拟人手法，将自然景观加以变形，展示出一种光怪陆离的状态。“蜻蛉”“晴觉”“鳞鲿”等词佶屈聱牙，奥博新警，令诗作脱离韩锡日常之质朴诗风，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山海景物，极尽奇丽谲幻之观。该诗巉削而不失浑厚，奇绝而时见清丽，足见诗人游刃笔墨的匠心巧思。

开国推名世，先生实此乡。无为居北极，有事问东杨。燿火曾三浴，深心在一匡。宗功元祀日，叹息思方长。(其九《九日谒杨文敏公祠》)

杨文敏公祠位于福建建瓯，杨文敏为明朝杨太师杨荣。

苦雨迟游兴，风生今日晴。寺幽峰愈峻，阁迥树皆平。变石纡云路，飞梁聚水声。归途山月满，阒静已初更。(其十 《十一日游光孝寺》)

第十一日，雨下不尽，诗人畅游光孝寺(在今福建建瓯)。寺内幽静，流水潺潺，景色清奇可爱。第十二日接诏城西，至此使毕。此组诗以自然山水的天然布局组构，按游览顺序胪列，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这种组合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景，一景一诗。全诗情思劲切，文情摇曳，写缠绵悱恻之情，仍含侘傺穷愁不尽之意。其中的实质仍然是诗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其意之深广，见于言外。发抒羁旅之感，既落落寡合，又清美无限。韩锡观摹山水，亦使他能够在琐碎繁杂的家庭重压与无聊反复的山林之居中找到一个能够发烦闷之辞，泄颓败之恨的豁口。

### (二)即景遣兴，有新奇之趣

值得关注的是，韩锡诗歌中个人的情感表现得非常鲜明，运以魏晋风藻。韩锡诗规上古，在早期已有端倪。此类诗作诗风清空疏朗，隽永远趣，不似峭拔之笔。如《藤山看梅》:

为访藤山胜，萝深幽径遐。满坪无别树，数里尽梅花。坐倚枯株秃，仰看旋竿斜。欲迟峦下月，沽酒问田家。[①]

诗人往藤山看梅，去路幽静而行人甚少，梅花遍野，中无杂树，景色极其壮丽。诗人背倚秃干，遐思甚远，沉浸于此，不觉时间移转。全诗蕴而不发，日臻圆融之境，蕴蓄恬淡、冲远、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又如《幽居依古石》:

幽居依古石，避俗暂逃禅。深坐空林内，枯吟积雪前。钟声月下白，塔影夜中圆。寂寞谁相似，松端孤鹤眠。[②]

钟声为白，塔影竟是圆的，诗人运用的修辞颇富新奇之意，叙雪夜之新奇，能超所想，实则感情灌注展示内心的寂寞痛苦。韩锡善于将阔大之景与细微之物并列呈现，据此可见诗人游刃有余，笔墨独到的运笔功夫。又如诗《舟行》即是如此:

偶随舟楫便，到此非人间。烟水忽分处，崔嵬见近山。桃花红历乱，洞口隔潺湲。欲即不可得，徘回未忍还。[③]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第 475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辰集》，第 104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己巳集》，第 651 页。

诗人视野由远至近，舟从远处驶来，人立于舟中，观极远处烟水朦胧的天际，随着舟渐渐前行，远处烟雾消散，忽现崔嵬青山。视野骤然清晰，慢慢地山间纷乱的桃花也历历可数，洞口潺潺的流水声也萦绕耳间。诗人见景色清奇可怜便欲前往观赏游玩，奈何因条件所限，不能成行。此诗角度独特，意颇新警，以舟行轨迹为线索，描摹新奇物象，句新与情意兼之，赋予山水诗独特的视角和心灵感受。韩锡摹物写景的角度大多以自身视角为主，这种运笔方式更能引起读者共鸣，像 3D 电影令观者如身临其境，喜诗人之所喜，悲诗人之所悲，见诗人之所见，感同身受，触感颇深。如《白云洞道中》:

嵌戏仄入石林中，体疲魄越心忡忡。险阻既尽级且穷，凿石受足罅虚空。天门阴畏倚高松，天风远来涛无终。泉趋断渴声淙淙，石泐其腹径微通。侧身迂度古桥东，缘萝悬上最高峰。回首平畴青不已，日光斜薄云过水。①

此诗开篇即言诗人已是身心俱疲，加之前路漫漫，路阻且艰，更令人倍感疲累。果然，石凿的台阶窄且长，置之上如临万丈虚空，无所依附，心惶惶然而不知其处，胆颤颤然而不知如何下足。径自前行，泉声淙淙，不绝于耳。继而穿过狭窄幽暗的隧道，度过蜿蜒的古桥，沿着蔓延的绿萝前行，不久便位于最高峰了。其时诗人定当已经精疲力竭、心力交瘁，辗转间回首一望，山下郁郁葱葱的田野铺展开来，无边无际，如此诗人眼中便都是这绿了，绿在眼中，渗入心里。来时的艰难险阻便在这清澈的日光与洁白轻盈的云彩中融化了，消散了。还有什么比这种历尽艰辛之后豁然开朗、遂觉身心一清的感觉更美、更妙呢。全诗并无华丽辞藻，显得沉着质朴，诗人运用精简的语言，用平铺的方式一层一层逐渐叠加来表示上山的危险与艰难，最后笔锋一转，小径通幽、豁然开朗。

## 四、咏物诗及题画诗

### （一）咏物诗

韩锡咏物，善观其形，察其色，品其味，并时常托物咏志，中多感慨。其人性喜清幽，其诗尚质朴，这些特征在咏物诗中亦多有体现。如《品梅诗》:

寒入幽斋独举觥，素晖极目雪方晴。芬氲玉几冷香集，历乱瑶阶竹影横。絮落樽前风暗度，涛来中夜月初生。关山笛内声偏剧，疑在辽西沙迹行。（其一《白梅》）

次取乘骝为问梅，如云如锦触寒开。烟生薄暮丹霞没，风过空林降雪来。词客醉余彤管乱，美人舞罢守宫隤。拏舟失路渔郎入，不是桃康莫浪猜。（其二《红梅》）

异品竞传南坞种，移来散植近烟霞。色从林外偏先见，影向窗前独后斜。玫瑰双悬英半吐，珠玑参缀带金遮。寻芳女伴齐肩入，三四为群欲拟花。（其三《品梅》）

谁将苍翠点瑶台，吟赏还携竹叶杯。柳絮欲飞还著树，梨花初落故沾苔。山春带雨云方起，松古依岩霜未回。欲拟美人谁得似，石家金谷绿珠来。（其四《绿萼梅》）②

梅生于寒时，绽于枯枝。虽冰枝枯韧，又疏影清雅美秀，但铁骨临霜、傲雪而豪放。自古便有文人墨客颇喜赏梅、画梅、咏梅，拟人、喻事、劝风物眼量。梅花需品，品质、品性、品格。品质思韧，品性思魂、品格思于无畏。韩锡此诗便品花四种，一曰白梅，一曰红梅，一曰品梅，一曰绿萼梅，均为诗人斋居之时所手植，久而成林。第一首中诗人独具巧思，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申集》，第 969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辛未集》，第 859 页。

细腻的笔墨，状写白梅之冰清玉洁，花开似锦。“絮落樽前风暗度，涛来中夜月初生。”运用形象的比喻，将花落之无声，梅开之繁盛描摹的栩栩如生。最后一句“关山笛内声偏剧，疑在辽西沙迹行。”踵武苏轼《梅花二首》中“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一句，由梅落之纷纷扬扬形似雪花而转思边塞关山，使全诗意境为之生华，凄凉悠远之意油然而生，当为整诗的深化之笔。第二首中“词客醉余彤管乱，美人舞罢守宫隤”为新奇的拟人之语，以彤管声之迷离、美人容颜之娇嫩来比喻红梅色之艳丽，以词客之醉态、美人舞罢之娇喘连连来比拟红梅花落之纷乱、姿态之奢靡。白雪和红梅形成强烈的视觉悬殊对比，可见韩锡修辞运用的恰到好处。最后一句化用《桃花源记》之典故，令整首诗意境登上一层楼。第三首诗人赏品梅，品梅为异品，点缀条条金带，颜色奇异，夺人眼目。韩锡描摹此花，重点放在它奇特稀有的颜色上。诗作语言活泼亮丽。绿萼梅香气浓郁，花梗短，花萼为绿色，花瓣碟形，花色洁白。“柳絮欲飞还著树，梨花初落故沾苔。”运用形象的比喻，把绿萼梅花芯中点点绿蕊描摹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运辞活泼清新，令人读来颇觉心旷神怡。

韩锡运诗状物，喜用对比，并且善摹物之靓丽色泽，用颜色的对比反差悬殊来达到丰富的视觉效果，如诗《荔子》:

荔子注晶盅，水魂白水中。光凝还在色，香散湛于空。尚觉露华满，能令暑气融。食余还想像，倚树摘来红。[①]

荔枝皮红肉白，诗人紧抓这一特点用白描的手法把荔枝的颜色特征简练的描绘出来，两相对比，愈加显露荔枝的鲜嫩欲滴，看在眼中便觉可口无比。第二句用荔枝上映出的光线之静与荔枝的香气飘散之动作对比，动静结合，生动有趣。第三句写食之味甘，汁水丰盈。最后一句写食之以后回味无穷。诗人从观赏，品尝，回味三个方面尽摹荔枝之色、香、味。使人读来垂涎欲滴，足以见诗人摹物之功力。

韩锡摹小物得心应手，摹山水景观也是不遑多让。福州依山傍海，景色亦颇为可观，韩锡居住于此，其漫长的人生中，足迹踏遍闽中。他走访山川，吟赏烟霞，状新奇之物，观别致之景，笔法细腻，观察入微。他之连江行役途中，得以观赏前所未见之景物，语多新奇之句，组诗《连游诗》（已巳季夏十又四日，韩子奉使之连江，得诗八章。）[②]（本文择其六首以作鉴赏）:

对月临修阁，下观多白云。潮回沙屿出，烟散树林分。渔子歌声发，禅僧定里闻。静参当入夜，落叶已纷纷。（其一《宿紫萝阁》）

入连多高峰，最高惟此独。顶茹苍云中，削兀刺远目。住笻仰自任，绿藤跻石屋。穹然坐四隅，如釜颠其足。似是古仙人，鬻石为糜粥。就釜作飧终，故向山头覆。（其二《覆釜岩》）

满山多白云，洞门何处在。遥闻钟磬声，还隔孤峰外。僧老定方深，缩首高其背。就壁取蒲团，与彼静相对。（其三《玉华洞》）

玉人婉约不胜笄，独立无言翠黛低。为患梵声归去晚，几番烟雨古峰西。（其四《玉人峰》）

为访古石门，驾言适于野。修影连清池，永日林方夏。平楚青欲来，源泉溜方泻。榛莽径就荒，重兰殷双踝。穷力乃得之，休坐石壁下。中多前代文，苔蒙不能写。呼酒静对之，如见留题者。（其五《石门》）

石古成修鱼，奋首如惊举。会闻风雨声，且向南溟去。（其六《石鱼涧》）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辛未集》，第 843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已巳集》，第 654 页。

诗中所提及皆是连江著名景色。韩锡偶到此地，怎能不畅游一番。各种景色在诗人的描摹下栩栩如生，仿若身临其境。组诗描摹沿途多处景点，并以景点名称为题，诗人独具巧思，以丰富的想象状景之独特，以新奇之景发悠远之思，模山范水之中流露出怡情遣兴、郁勃之气。且笔法圆融，如流水一般静静蔓延，浸润每一个篇章。

（二）题画诗

题画诗与画作的联系十分紧密，诗歌不仅改变了图画的画面布局，并且可以阐释和深化画境，还能够弥补单纯的画作在情感表达上的局限。正所谓“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画得诗之意，诗助画之思”。诗可以因有画意而更加引人入胜，画会因为有诗情而更具艺术魅力。以画为题的诗歌，或题写在画上，或题咏于画外，或赞美画作，或寄托情怀，或阐明事理，或讽谕世情。韩锡有挚友林正则善画，韩子曾言：“读林子诗不知其画也，玩林子画不知其非诗也。古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殆非虚语。”[①]画成，韩子每每见之惊叹不已。林正则尝为孟采作画像，其像栩栩如生，纤毫毕现。韩锡见之以为其为真人。韩锡喜正则之画，亦喜为之题诗，这类诗以画中景为题，杂以人生百味，浮沉慨叹，使人在画之意境外，尚能对生活有所感悟。如《题林正则画册诗为林孟采》，诗曰：

山静日迟莺满林，草庐寂寂碧烟沉。此中定有高人卧，审听如闻鸡犬音。（其一《“深旭照高树，流莺迟日鸣”正则每幅各题十字，予因之以为诗》）

衰杨两岸晴，烟入孤峰变。唤子晚维舟，歌声若可见。（其二《晚晴杨柳岸，唤子泊舟时》）

岚重小舠泊，蓬底孤客眠。寥寥愁绪引，局局寸心绵。魂入空江远，情依碧草牵。家乡数千里，踪迹片时还。瓜苦蒸階砌，伊威满室椽。妻儿争问讯，揖立互周旋。以得性情和，其如笑语妍。何为音信阻，无若道途延。十载樽前别，今宵灯下怜。期将寸晷意，了却半生缘。鸟鹊喧高树，波涛拍短舷。惊回玉枕寐，还拥竹床毡。毋乃精魂幻，应知笔墨便。离人凄寂意，图画向山川。（其三《岚抱青螺出，应怜蓬底暝》）

岩壁半天坐，苍云萦绕之。桧松平屿足，石笋立溪湄。泉落声犹在，风回声若疑。此中有玅理，可向笔前思。（其四《云生苍石迥，松桧带泉声》）

泉声触石来，千峦一时雨。断霭起孤邨，旋烟生短屿。杖盖独迈征，断桥流水路。似是世外人，遥呼与共语。隔纸不可亲，酬以杯中醑。（其五《雨湿泥塗泛，孤踪何独行》）

越有畸人，青蓑竹笠。绝水进舠，如有所即。呼而讯焉，今方何之。所谓伊人，在水之湄。烟动风来，波涛欲白。山静天寒，兀然危石。卉木陨落，如云如雨。鼓枻犯之，其往甚怒。乘兴而舶，夙怀不忘。道修且阻，宛在水央。（其六《江间风信急，却怪逆舟行》）

秋江露冷，侵骨烟重。远山欲没，笛声何处。扁舟两岸，芦花孤月。（其七《月色清江近，庐中起笛声》）

有一士兮，眼中无人。泼水墨兮，写其不平。迷濛不辨兮溪山暮烟，群峰若断兮岩峦就淹。潺潺自远兮泉脉殷，溪流续兮静弥深。侧耳听兮頫予身，若有声兮随耳生。士顾笑兮笔所成，中有故兮不可陈，后有识者兮明予苦心。乱曰：稽古尚论交先民兮，视笔墨迹如觌厥身兮。向予而喜向予而嗔兮，今之视古后之视今兮。（其八《烟锁连峰断，泉流水口分》）

悠然独迈碧溪湾，霜重流清石齿顽。逼仄迂回孤木栈，崔嵬峭立万重山。稀微篱落旋林外，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庚午集·书榕庵赋后》，第 788 页。

隐见浮屠断霭间。对此令人神欲往，不知何日得身闲。(其九《霜晓溪桥泚，谁人侵早行》)

卜居小隐道山中，其地幽岑多古榕。孟采欲穷世外趣，傍榕复种双松树。枝桠萝坐贞石前，静对森森朝复暮。把臂常从月下看，干老能经霜露繁。风飘震荡涛声作，岩壑常令白日寒。予为贞松嗟不遇，讬枳南服非其处。何莫移之向朔方，挺尔孤标雪方曙。孟采生闽未见雪，要我为言飞絮洌。答云此物须自观，不得随方向君说。林颠闻言顾大呼，酒酣为作双松图。亭亭故向雪中立，顷刻严寒生坐隅。孟采获之如肉璧，兴来展玩施瑶席。绕屋峰峦一时白，我欲从之终日夕肩橐系书著两屐。怪兹笔墨易化工，补我榕庵一段缺。(其十《雪霁千岩澹，松枝映壑孤》)[①]

韩锡的题画诗常常移情于物，挖掘诗歌中蕴藏的画面，抓住某一联系阐发其心中所想，由画及诗，因画中事物的触动而想自身之境况，由诗观画，借物生成画境。此组诗中诗人皆把自身置于画中，在虚幻中感受画中景物，使画如真物一般，令人可观、可感。诗风延续韩锡一贯的写景风格，淡泊，悠远，高洁情操寓于其中。另诗题小序云："予友正则林子，眼空一世，时号狂生，而独喜与予游而并喜予之友林孟采。予迂者，孟采迂又加于予。时过山庵，狂者、迂者纵谈于古榕之下而性适相入，人多不解也。于时正则有所不平，欲于画图泄之，时孟采得藤纸十幅，正则随意为泼墨成各体。孟采喜甚，因蜀予题咏之，亦随意应焉。其体与画相称，而手为书之以问后之识者。一狂一迂并主人而三，其所以狂迂之故。而狂迂所以相入之故，可于画图诗句闲得之矣。"[②]可知韩锡与正则二人皆非循规蹈矩之人。由于诗与画非同一人所绘，故十首诗中不仅含有对画面的描摹，也在画面之外辅以诗人自身由画内而及画外的思索，因此同一幅画上叠加了两个人的思想，观者可弃诗而观画，也可摒画而读诗，无论读诗还是观画，皆能发现其中所要表达的完整思想。然既观画又读诗，含义无疑更加丰富。韩锡另有几首题自然景物的诗作如《题画》，诗曰：

古树何郁丛，悬岩如倒挂。水气腾空濛，烟云际天界。返照入枫林，舟迅风逾迈。踞坐两逸人，抵顶深相话。寺隐钟磬寂，僧定知守戒。我欲置身游，山水舒所快。理策意欣然，久乃知为画。[③]

诗人于画中之景的描摹颇为全面，生长在悬崖边的古树、云雾弥漫的天际、随风远去的小船、盘踞而坐的两逸人、庄严肃穆的寺庙，诸多景色都让人具体可感，读来如身临其境。类似于白描的手法不似东方写意，更像是西方油画，画中静谧又富含东方韵味的如泼墨山水一般的景致却使人遐想连篇，透露出一股深远的禅意。韩锡的题画诗不仅有这种直接描摹画中之景的篇章，还有用写意的手法表达细腻意境的诗篇，如《题墨兰》(为薛廷似)，诗曰：

烟云漠漠澹秋光，南望湘江欲断魂。一片素心成笔墨，偏于空际见幽香。[④]

文士写兰，是一种寄托。用墨画出的兰花如一片的烟雾，朦朦胧胧，丝丝缕缕。诗人没有直接可感地表述出兰花的形状、颜色，却在具体的言辞之外留出一片余音绕梁的意境来，把真实的兰花的幽香透过画纸一端徐徐地传递过来。画有意境，诗有余韵，两者结合，更添一层回味。

韩锡的题画诗有时如佐餐小酒，清爽回甘；有时似月下之花，朦胧淡雅；有时又若小曲独白，调笑戏谑。如《为王有巢题帕赠其所思》(有巢画帕作烟柳，曾弗人题其左，蜀予题其右)此诗为题帕诗，诗曰：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丙寅集》，第462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申子集·题林正则画册诗为林孟采》，第462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壬戌集》，第203页。
④ [明]韩廷锡:《榕庵集·丁卯集》，第511页。

欲赠同心人，微言叩蓬户。就问所赠谁，笑笑不作语。指予烟柳图，如见相思处。[①]

诗题小序曰：“有所思而可言，其思不深，为人言其所思而必知其人其言不深。王子有所思而不言，曾子不知其人而为之言之。思之深，言之深，予不可复益也。故以浅调酬之。”[②]由此可知诗与画是割裂的，两者内容并无关系，此诗无关于画，仅是诗人对友人的调侃之语。了解缘由之后再读此诗，便觉其中情谊大于诗画本身，令人可叹。

## 结语

韩锡是身处晚明政治动荡之际的学者，性不俯仰随俗，一生著述颇丰。经史子集，靡不贯通；诗文篆刻，一一通晓。耐人寻味的是，学术界对韩锡的研究与他在闽中文坛的影响仍不相符，尽管他生前文名藉藉，身后其诗作却难以摆脱被轻视甚至被遗忘的命运。当然，这与韩锡“宁终身无闻，决不肯低头随俗”[③]的为文之道有关，他学不循世，终身蓬荜，声不出里闬，“世亦罕称之”。沧海遗珠之憾，于此亦可略见端倪。韩锡以“情”为诗之内核，幽深澹远，情思邈邈。

① [明]韩廷锡:《榕庵集・丁卯集》，第 509 页。
② [明]韩廷锡:《榕庵集・丁卯集・为王有巢题帕赠其所思》，第 509 页。
③ [明]韩廷锡:《榕庵集・乙丑集・答高宏度论文》，第 437 页。